非对称与国际关系

ASYMMET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BRANTLY WOMACK

[美] 布兰特利·沃马克 著

李晓燕 薛晓芃 译

东方编译所译丛

非外借

上海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非对称与国际关系

ASYMMET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BRANTLY WOMACK

[美] 布兰特利·沃马克 著

李晓燕 薛晓芃 译

东方编译所译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对称与国际关系/(美)布兰特利·沃马克著;
李晓燕,薛晓芃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Asymmet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ISBN 978-7-208-16020-0

Ⅰ.①非… Ⅱ.①布… ②李… ③薛… Ⅲ.①国际关系-研究 Ⅳ.①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061501 号

责任编辑 王 冲
封面设计 小阳工作室

东方编译所译丛
非对称与国际关系
[美]布兰特利·沃马克 著
李晓燕 薛晓芃 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7.25
插 页 2
字 数 245,000
版 次 202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6020-0/D·3473
定 价 68.00 元

前　言

本书的写作源于我对中国与越南彼此之间产生的错误知觉的反思，后来又发展到对中越关系的分析，进而延伸到对中国及其所有邻国之间非对称关系的研究。然而，随着我对以亚洲为中心的研究的深入推进，我发现尽管非对称尚未受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足够重视，如何管理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却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普遍问题。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错误知觉

回到起点。自1985年以来，早在中越两国十年敌对期间，我就一直与越南的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国的越南问题专家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并且对双方都怀有绝对的尊重。我时常从河内飞往北京，中间却要经停曼谷。那时与当今时代存在的相同问题就是世界的分裂，但是原因并非一方与另一方对立，而是双方都从完全不同的视角看待相同的现实。

例如，一个炎热的夏天在河内的国际关系研究所（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外交科学院），青年学者们告诉我，中国的边境机构正在强迫中国农民将已经怀孕的越南妻子遣返回国。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人试图将其后代渗透到越南的做法。他们当然比我更了解事情的细节。那就是他们的工

作，并且中国也不过只有百里之遥。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考虑更可能的原因是当时中国所有的农村都在实施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而外国妇女是当时政策最容易针对的群体。越南学者很明显是将影响到越南的中国行为视为带有针对性的和经过调整的，然而事实上，其中很多做法仅仅是不同地区和部门行为的偶然产物。

越南学者是把那些事实上并无联系的情节关联起来，并且形成了“阴谋论”的观点。当时研究所的中国问题负责人说得更直白：“沃麦克教授，你们美国人才跟中国打交道多长时间，两百年吗？我们越南人已经跟中国交往五千年了。你需要明白我们从中学到的唯一一点教训，就是中国根本难以预测！”

相反，中国却认为越南完全可预测。用一句中国民间谚语形容越南的“忘恩负义”就是“有奶便是娘”。越南的大战略被理解为敌视中国。就在那同一个星期里，后来又有位中国国防大学的学者在北京告诉我，中国与越南之间敌对的原因是苏联企图包围中国。苏联唆使越南进攻柬埔寨，越南充当苏联人包围中国计划中的小兄弟，进而建立它在印度支那甚至更大范围内的霸权。红色高棉对越南村庄的袭击和波尔布特（Pol Pot）对越南发自内心的仇恨都无关紧要。越南正在参与一场全球战略的博弈，而中国就是它的敌人。

我认为，双方的分歧不在于对各自立场合理性的辩护，而是它们对彼此互动的不同认知。虽然作为不及任何一方更了解细节信息的第三方观察者，我还是非常确信它们双方都是存在错误的，而且它们彼此的错误解读一定具有互补性。越南人看待中国其实是把中国当成了放大的越南，他们认定中国与越南对双方关系的关注程度相当。中国人则把越南视为一个缩小的中国，同样是一个受大战略因素驱动的国家。无论如何，双方的问题都不是缺少信息，两国都富有智慧，都比其他任何第三方对彼此的了解更多。

中越之间的错误知觉是结构性的。越南受双方关系的影响更大，因此对关系更关注和焦虑。中国则受双方关系的影响更小，同时也有更重要的关系需要关心。双方都把对方视为自身的实力加大版或者实力缩小版交往对象，而事实上中越关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互动的组合，既包含越

南对中国的关系，又包含中国对越南的关系。正因为双方对彼此的错误解读是结构性的而非偶然性的，二者才会相互夸大。20世纪70年代末双方陷入冲突也因此可以被视为非对称错误认知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越南在与中国的关系中扮演焦虑的小国的同时，它在与柬埔寨的关系中却是一个对越柬关系关注度不高的大国。[1]

中国与越南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越关系的正常化，我发现双方关系非对称的维度更加清楚。首先，结构性错误知觉可能引起敌意，但是敌意不会一直持续。如果非对称只是导致敌意，中越关系的发展就前途渺茫了。事实上，1985年的中越关系出现僵局，随后的六年间双方逐渐冷静下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之后就是十年的关系恢复阶段。任何一方都没有获胜。中国并未“给越南以教训”，越南也不得不承认因占领柬埔寨而导致的被孤立根本不值得。从这次僵局开始，中越两国开始慢慢地调适双边关系，因为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获胜，任何一方都不掌握主动权。

其次，即使敌对结束后，非对称仍然主导着双方的关系。在双方关系的任何领域，从贸易到旅游业，受关系影响越大的一方越脆弱，这是一种客观事实。即使出现新的关系正常化，在中国推动下变得更加开放的越南仍然是一位谨慎而焦虑的伙伴，其中原因之一是它已经形成惯性的敌意。打个比方，如果越南从中国进口电风扇的话，对中国市场来说仅仅是出口的一点点扩大，而这些物美价廉的风扇则会冲击越南的整个工业。相反，即使越南的斗笠帽子在中国成为一种时尚，对越南来说可能是一次巨大的商机，但却根本威胁不到中国的帽子产业。

因此我的结论是，即使存在错误知觉，非对称关系仍然非常重要；即使能够出现关系的正常化，关系中的非对称影响也要受到管控。非对称不止是一种异常状态。较之于研究几千年的中越关系，研究非对称关系的全部过程及其变化无疑是更好的选择，这就成为我的下一个研究主

题。[2]从10世纪中期宋朝初年越南获得事实上的独立，到1 000年后被法国殖民者占领，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对称的，两国的边界也基本稳定。有一次大的例外特别有意思，即1407年明朝再次兼并了越南，并且维持了20年才以失败告终。然而，失败其实是在明朝承认了越南的自主权之后，继而越南就开始了信奉儒家思想的黄金时期，中越关系在接下来的500年间也基本稳定。进入现代社会后，非对称又增加了新内涵。来自西方世界的压迫促使中越两国的革命力量结成了亲密无间的反抗同盟，因为当时两国都面临着更强大的敌人。中越两国也首次实现了肩并肩合作，而不是面对面对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角色又逐渐从“老大哥”退回成有威胁的邻国，越南重新统一后的狂妄自大也导致其产生胜利的错误观念。20世纪80年代双边保持克制的僵局之后，两国一直维持着至今仍是互惠同时又存在问题的关系正常化。

作为东亚土地中心的中国

很显然，越南并非中国唯一的非对称关系对象，朝贡体系中的传统仪式都可以被重新解释为管理东亚地区前现代非对称关系的一种普遍机制。这些想法需要通过更全面地研究中国外交史来加以验证，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经验与西方世界的确有非常明显的根本区别。如康灿雄所言，与西方帝国和国家间连绵不断的竞争性战争不同，中国在亚洲占据中心地位，提供了一种更加稳定的国际秩序。[3]然而为什么会有秩序？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秩序？王赓武的研究以及伊夫琳·罗斯基(Evelyn Rawski)的评论给了我很多启发。王赓武认为，宋朝对其军事实力的局限性有非常清楚的认知，因此需要管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而非对其使用武力。[4]朝贡体系的仪式可以被视为中国以承认自主权换取邻国顺从姿态的一种交换。

但是，中国并不总是最强的大国。伊夫琳·罗斯基和她的“新清史研究”的同事们认为，中华帝国经常处于北方边界上以一敌多的境地，有时

也并非最强者。[5]事实上，中国经常陷入混乱，元朝和清朝都是由非汉民族统治的王朝。历史上，中国并非总是地区霸主。

当然，中国一直是东亚地区人口和生产力的中心。即使并非始终是亚洲的霸主，中国在直到进入现代以前也都是亚洲的陆地中心。因为有长城的存在，中国事实上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门户的共同体。中国的繁荣不需要无休止的扩张，而要依靠有效的防御，最有效的防御就是邻国的顺从。西方世界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西方世界里，“地球的中心”是“地中海”，“地球的中心”是一片自古以来就吸引着沿岸国家竞争和涉水冒险与殖民化的水域中心。进入现代以后，大西洋取代地中海成为西方世界的中心，最终，作为首强海洋大国的英国遭遇并且击垮了固步自封坚持大陆主义的清王朝。[6]

超越中国

大国竞争的地中海时代以及后来的世界经验固然解释了西方世界关于国际关系中的冲突和霸权思想的核心，东亚关于非对称管控的经验又是否具有与西方世界的相关性呢？或许进入现代后，东亚的历史本身都不再具有相关性。但是，非对称关系无处不在，美国与加拿大、古巴、墨西哥之间都是非对称关系。墨西哥与危地马拉、德国与奥地利、南非与安哥拉之间也是非对称关系。实力的悬殊一般都会导致结构性受影响程度、观点、认知的差异，或者错误知觉吗？非对称管控中是否也有普遍相似的难题？如果亚洲以外也存在类似的现象，是不是在某些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中已经有了充分的研究，而我尚未发现？这些问题都需要大量的研究才能找到答案，本书正是回答这些问题的一种尝试。

答案无外乎肯定或者否定。肯定，即双边非对称模式可以研究，也能够建立一般性理论。否定，即非对称并非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已经有些关于小国外交和国际关系地区文化的研究的确有所涉及，但是它们并没有集中研究非对称关系的管控问题。非对称远不及大国之间的大

博弈更吸引人。有些并非不可避免的现象，比如大国在小型战争中遭遇的挫折，也都被解释为仅仅是无关紧要的反常事件。唯一例外的是安德鲁·迈科(Andrew Mack)在研究中证实了这一规律，他将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进行了经典的分析，见解非常深刻，但是也仅限于将其解释为非对称的异常状态。[7]非对称理论还有发展的空间，不过必须超越双边关系，发展到研究多边、地区，以及全球的非对称。中越关系的历史经验是非对称关系的一个完美案例，同时又过于完美：局限于双边关系，已经固定为某种文化模式，而且范围也太小。来自中越关系的观点可以借鉴，但是不能简单挪用。本书中，我必须首先对基本的双边互动中的非对称作哲学分析，然后逐步延伸到非对称的全球模式。

回归中国?

与此同时，历史也在发展。2008 年，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国单边霸权的力量业已受到动摇，而中国则从和平崛起势不可挡地进入了和平跃进阶段。我们正面临一场新的霸权斗争？抑或是将会出现一个“天下”体系？又或者二者都不是？借助在弗吉尼亚大学给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讲授“你生活中的中国”研讨课的机会，我努力了解了全球化的基本趋势、政治权力的结构，以及可能影响中美关系和更广泛的世界秩序的未来人口特征。我在本书第六章中得出了结论，认为中美之间的敌对仍可能持续，但是不再可能出现冷战时期的阵营对抗。中国不顾美国的反对，成功吸纳美国的盟友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是因为中国阵营在扩张，而是因为全球化的世界给各国提供了更大的选择范围。当今世界并非两极，更像是一种“多节”的框架，美国和中国都是其中的主要“节”点，但是还有很多其他中等强国和地区节点存在。[8]

实力起作用，非对称也会持续影响行为体的认知。然而，日益密集的全球结构会使意欲确立统治地位的尝试更加不明智，不明智的尝试则会更加作茧自缚。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生活机会的

趋同导致经济总量的重新分配，中国就是其中唯一一个最突出的案例。虽然数字大国与科技和资本大国存在重大差别，世界其他地区与西方大国之间的距离的确正在缩小。即使中国已经在总体经济规模上与美国匹敌，它也仍然在人均值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人口大国与技术大国的竞争还在，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二者既不能彼此控制对方，又不能形成对立。

如果"多节"世界也是非对称的，如何管理非对称国际关系就成为最重要的问题。难点在于相互联系并不会产生彼此理解。小国可能越来越清楚自身的脆弱性，大国也会因为缺少对关系的控制力而深感受挫。国际政治可能随之带来更多纷争。有鉴于此，本书提出了理解国际关系的一个新范式，关注和强调日益影响世界政治的非对称因素，并据此提出维持非对称世界稳定性的建议。

注　释

1. Brantly Womack, "Asymmetry and Systemic Misperception: The Cases of China, Vietnam and Cambodia during the 1970s,"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6:2(June, 2003), pp.91—118.

2. 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 David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4. Wang Gungwu, "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in John K. Fairban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34—62.

5. Evelyn Rawski, "Chinese Strategy and Security Issu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Bratnly Womack(ed.), *China's Ris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Boulder, CO: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0), pp.63—88.

6. Brantly Womack, *China among Unequals: Asymmetric Foreign Relations in Asia*(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ress, 2010).

7. Andrew Mack, "Why Big Nations Lose Small Wars," *World Politics* 37:2 (January 1975), pp.175—200.

8. Brantly Womack, "China's Future in a Multi-Nodal World Order," *Pacific Affairs* 87:2(June 2014), pp.265—284.

致　谢

如前言所说，这本书的研究从构思到尝试创作经历了很长的过程，自然得益于很多学界同仁贡献智慧。我在此只提及那些直接帮助了写作的朋友，即使如此，还是难以周全。

首先要感谢我所在的弗吉尼亚大学，特别是政治学系和米勒中心，它们给了我的研究最主要的支持。更关键的资助则是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东亚中心，我在那里做访问学者期间获得一段集中的时间和同事们的帮助，这对于完成本书的初稿是必不可少的。

弗吉尼亚大学的同事们从来不吝于花费时间和精力向我提出建议，特别是：艾伦·林奇、比尔·匡特、彼得·菲里亚、杜安·奥谢姆、杰弗里·勒格罗、哈里·哈丁、约翰·欧文、梅尔·莱弗勒、托德·泽希泽、赫尔曼·施瓦茨、约翰·埃切韦里-金特、伊尼斯·克劳德。还有很多我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无论是个人还是在我的课堂上，他们都给了我很多帮助。他们是：伊丽莎白·斯普林格、布兰登·约德、阮图维、普拉尚特·帕拉梅斯瓦兰。特别是咸命植、丹·史密斯提出过非常有启发性的建议，卡尔·黄还帮我整理了本书的参考文献。除了我所在的弗吉尼亚大学，还有很多其他朋友提出过有益的建议，包括：鲍勃·厄尔、比尔·特利、休·拉各斯代尔、乔·奈、巴里·布赞、保罗·皮勒、那拉·加内桑、唐纳德·艾默森、唐纳德·凯泽、卡尔·塞耶、艾伦·瓦赫特曼、胡安·托卡特廉、谢康·冷、贝茨·吉尔、斯科特·菲尔兴。在新加坡，王赓武和郑永年给了我至关重要的鼓励，薄智跃和蓝平儿(Lam Peng Er)提出过非常有价

值的建议。而且,如果不是因为薄智跃的建议,这本书还会多出一章来。在中国,也有很多朋友向我慷慨贡献了智慧。他们是:秦亚青、冯绍雷、刘德斌、吴玉山、杨雪冬、林民旺、李晓燕、王秋彬、刘军、宋鸥、杨继全、卓慧万(Cho Hui-Wan),等等。在越南,胡海瑞、阮武松、彭康明也提出过有益的想法。这本书虽然不是以上朋友们集体智慧的汇总,却因为他们的帮助得到了完善。

在此我还要向那些可能认为我对他们的相关研究不够了解的学界同仁表示歉意。其原因:一是我不希望本书涉及范围太宽而使核心观点埋没在大量脚注中。二是如前言所说,本书的基本思想起源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以外,虽然我并没有进行完全的创新,但是开展的的确是一项跨界的研究。

非常荣幸,这是我得益于卢·贝特曼的帮助在剑桥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本书了。在此要特别感谢出版社的几位编辑提出的透彻而深刻的意见,以及他们的慷慨评价。文字编辑凯文·伊根帮我加了很多逗号,使原本太过紧凑的语句有了呼吸的空间。另外尤其要感谢马克·福克斯、阿南德·尚穆加姆两位编辑的高效工作帮我加快了出版进程。

来自家人和朋友们的支持对于我个人和对于这本书的完成更是不可或缺的。妻子安和女儿莎拉为了让我专心写作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此外还要感谢儿子戴维和儿媳爱丽丝一直以来的支持,以及小孙子奥托总是给我最受欢迎的“叨扰”。最后还要把这本书献给我的老师们,当然在一定意义上也包括上面我已经感谢过的朋友们,除了他们以外,还特别指:我在达拉斯大学的本科导师戴维·巴拉斯(David Balas),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心理学老师保罗·里克尔(Paul Ricoeur),以及我在参与和移情式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导师邹谠。不敢妄言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但是我的确追随他们的脚步展开了研究。

目录

前　言　/Ⅰ
致　谢　/Ⅷ

导　论　/1
　非对称由来已久　/4
　霸权与非对称　/5
　非对称的定义　/7
　非对称理论与国际关系研究　/22
　方法论　/29
　本书框架　/31

第一部分　非对称与双边关系

第一章　非对称关系的基本结构　/43
　利益的位置性与参数的合理性　/43
　国际关系与国际交往　/46
　A 国与 B 国　/47
　非对称关注的政治学　/51
　自主权、顺从和尊重　/55
　对非对称互动的估算　/57
　非对称与统治关系　/61

国际主动权 /63
非对称关系的变化与深层结构 /65

第二章 非对称与冲突 /74
革新的危害 /75
非对称的边缘政策 /77
错误知觉与消极互补性 /80
非对称敌对 /82
定居者、掠袭者、教育者、资助者和毁灭者 /86
占领 /90
僵局 /93
从僵局到正常化 /96

第二部分 非对称体系

第三章 多边非对称 /107
多边互动、混沌与不确定性 /108
三角非对称模式 /110
非对称三角中的地位与选择 /115
多边形势下的虚假确定性 /119
管理不确定性 /121
国际联盟的模式 /125

第四章 地区非对称关系 /131
地区的模糊性 /132
界定地区 /134
地区关注模式 /139
软实力 /141
地区强国的困境 /145
中间地带:从地区看世界 /148

第三部分 世界体系

第五章 霸权循环及其可持续性 /153
终极地区 /154
最明亮的房子：全球认知的问题 /157
霸权循环 /160
管理全球非对称 /168
管理全球不确定性 /171
全球联盟 /173

第六章 多节性与当今世界 /181
日益呈现的多节性 /182
多节性结构 /192
双边敌对及其局限性 /195
多节性的纷扰 /198
当今世界：超越霸权循环的可持续性 /201

第四部分 政策意义

第七章 非对称的解决方案 /211
国家情报与非对称知觉 /213
国内复杂性 /216
平衡非对称互动 /218
双边正常化的结构 /220
非对称伦理学 /226
全球与地区关系 /229
互动的学习曲线 /231

译后记 /238
参考文献 /240

导　论

这本书与当今世界所有其他思考者关心的问题是一样的:统治与服从、战争与和平、世界秩序、权力循环。但是,我们选择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人们通常更关注那些最热点的议题,比如大战的风险、强国间的竞争、统治的道德性。本书里的“关注”则优先指向那些并不令人兴奋的国际关系,即弱小一方不能威胁强大一方,强大一方也因代价高昂而不能将其偏好强加给弱小一方,这就是非对称国际关系。当然,非对称国际关系的逻辑并不是简单的划线理论。大部分国际关系都是非对称的,2008 年以来的世界形势可以说是达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非对称高峰。以至于即使是超级大国,它的命运都要取决于它对非对称国际关系的掌控。

每个国家的认识都局限于由其实力和地理位置决定的视野之内,因此非对称关系中的各国都存在观点分歧。强者一方相对而言较少地依赖于非对称关系,这会影响其认知和行为。弱者一方则因为更加依赖于彼此的关系,所以也更关心非对称关系的可能变化。强者一方希望彼此的关系保持不变,由此期望弱者的顺从。弱者一方则更关注自身相对于强者实力的脆弱性,所以更需要确保本国的自主权受到尊重。正因如此,即使是在正常的、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弱者一方也往往会挑战既有秩序,而强者一方则希望双方的互动能遵守秩序。这种基本的、微系统情境就是非对称理论的起点。

诚然,实力的非对称不是影响国际关系的唯一因素。如果我们对比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系和美国与古巴的关系,就会发现制度和意识形态的

差异其实比实力的悬殊对双方关系的影响更大。有时候，双边关系之上的结构因素可能起到重要作用，比如冷战期间两国处于同一阵营。再比如，过去百年间德国与奥地利的关系变化如果脱离了欧洲的背景也无法理解。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不同于它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古巴与墨西哥的关系也不同于它与美国的关系。在有些情况下，非对称是影响国际互动的主导因素，非对称只要存在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原因。然而，强者一方通常较少关心非对称的作用，因此除非问及与加拿大或者古巴的关系，美国人一定最不了解非对称。本书并未宣称非对称关系可以解释一切，而是试图回答“非对称究竟能带来什么不同”。

在有些情况下或者有些时段内非对称关系带来的不同很简单，就是“你赢，我输”，甚至更简单的“你死，我活”。但是，这样的结果并不需要非对称关系。托马斯·谢林和恐怖分子都主张摧毁比创造更容易，船坚炮利通常都有用。如谢林所言，国际关系中实力优势的主要用途就是强迫他方服从而不必将其摧毁，“来自毁灭威胁的压力要求我们不能将自身利益与敌人的利益绝然对立”。[1]然而，强迫做交易会比强迫建立关系容易得多，前者类似于说“把你的钱给我”，后者相当于说“做我的奴隶吧”，互动时间越长，建立统治地位就越难。为什么？非对称理论说明的正是权力与脆弱性之间的关系。

本书强调非对称关系的复杂性其实不足为奇，前人也并非没有注意到。道家理论的创始人老子（生活在公元前 5 世纪至 6 世纪）在诗中提到：

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
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
……大者宜为下。[2]

著名观察家 A.O.赫希曼（A. O. Hirschman）在 1942 年提出轰动一时的观点，宣称经济依附曾经为希特勒的欧洲政治权力奠定基础的重要性。然而在 35 年之后，他又推翻了自己的假定，承认单凭经济的非对称并不能带来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基于美国在拉美的经验，赫希曼提出了更具辩证性的观点：

如果一国的贸易和投资都受制于它与另一个更强大且富有的国

家之间的联系,那么该国在某种情况下就可能全神贯注于这种不利局面,试图摆脱与强国的联系。强者一方因为与附属国的经济联系只占其国际经济关系的很小份额,当然会更为关注其他重要利益,比如它与更强大国家的关系。于是,基本的经济差距就产生了关注差距,或者说是带来了更高程度的关注,这种差距会刺激依附国更加积极有力地摆脱从属关系,相对而言主导国却不会积极对其加以阻止。据说当年的大英帝国就有点心不在焉。不过,更可信的说法恐怕是,它当时无论作为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帝国都行将瓦解了。[3]

赫希曼显然不是放弃早期的观点,也并未否定贸易依赖对于小国的重要性。事实上,正是由于依附关系的真实存在促使小国决意突破其影响。遗憾的是,赫希曼并没有继续发展这一新见解。他只是把书的再版序言题目定为《超越非对称》。而我的这本书将要系统分析非对称的作用,提出一个关于非对称的一般理论。

所谓一般理论是指本书将"非对称"作为支点分析所有的非对称关系。当然,我们不是要发明一个能够预测非对称关系的解释工具,而是在建立一种诠释模型。它将"关注度"引入对国际关系中物质差异的分析,强调"关注度"对认知和行为的意义。这样做就揭示了大多数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盲点,即笼统假定所有国家都是完全一样受权力支配的威斯特伐利亚行为体,而忽视任何两国之间都存在的差距。增加这一维度当然会使我们对国际互动的思考更加复杂而不是简化。借用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比喻,我是希望培养良种狐狸,而不是介绍一个新品种刺猬。*[4]

从定义上看,非对称关系是不平等的,但不是统治关系构成的一种简单等级秩序。美国在伊拉克以及在其他地方的做法已经证明,大国可能很容易击败小国的军队,却不能以单边的方式解决冲突。大国的军队能够取得胜利,然而随着敌对状态的持续,和平的承诺就化为泡影,取而代之的是对僵局的无奈。相应的,弱者一方会承受更大的苦难,因此也会更加反对强者一方。尽管弱国可能无法迫使强国接受自己的意图,它还是

---

* 意指追求多元,而不是崇尚统一。——译者注

希望持续的反抗能够赶走强国。每个强国和弱国都有类似的经历。越南在 20 世纪曾是法国、美国和中国的“麻烦”，反过来却被柬埔寨所制。这种关于挫折与反抗的记忆其实与核毁灭的可能性或者大国间的竞争具有相同的外交意义，那就是它们都旨在建立和平，并且都不确定敌对的结果。

非对称理论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但是最终也要对多边关系、地区关系以及全球关系进行重新界定。每一对双边关系都受到更大范围国际环境的影响，并且更重要的是，影响双边关系的相同标志性观点分歧也存在于更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以最简单的多边结构——三角关系为例，因为可能同时发生交互作用，对互动结果的估算足以复杂到令人眩晕的程度，于是催生了有条件的关系，比如结盟，就是把关系伙伴纳入既定的行动方案中以控制不确定性。在地区层面，非对称关系模式为强国创造了行使地区领导权的条件，却使地区外关系更为混乱。在全球层面，后冷战的世界既是非对称关系的最大舞台，又是国家间观点分歧的终极例证。如本书第六章所言，2008 年以来的世界秩序日益呈现出一种“多节”状态，或者说形成了一种任何国家都能发挥作用、大国越来越不能控制小国的国际格局。因此，管理非对称关系变得特别重要。

非对称由来已久

与很多著名学者的观点不同，我们认为，尽管在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弱国具备拖垮和挫败强国目标的能力更为常见，但却不是新鲜事物。[5]比如，越南在这方面最显赫的成就不是 20 世纪反抗法国和美国的胜利，而是在 1427 年成功驱逐了占领其长达 20 年的明朝统治者。还有，哈布斯堡西班牙在 1648 年授予尼德兰独立地位，也是双方长达 80 年的非对称斗争的结果。即使看起来是强者对弱者的胜利，比如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掌握了对爱尔兰牢不可破的控制权，实际上也可能导致弱者通过长期的独立斗争来表达其身份的异化。当然，如果一个政权与民众联系不

多又剥削成性，人民可能并不关心其灭亡。但是还会发生的情况是，强国经常占优势，而弱国一直被征服、被合并、被驱散，甚至被削弱成无足轻重的残骸。并且如果历史足够长，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过本书也提出，在20世纪，强者一方表现出自我克制和仁慈，从而给弱者一方带来更好的前途也不是新现象。如果相对实力是获胜的关键，可能弱者一方只有在强者被捆住一只手的情况下才可能占优势。但是实力的非对称往往会产生承诺的非对称，弱者发起反抗的理由远多于强者实施统治的兴趣。在内政外交中，长期的民众反抗已经成为确保统治符合道德准则的源泉所在。伯兰特·罗素(Bertrand Russell)说过："没有反抗，人类就会停滞不前，非正义就得不到纠正。"[6]

需要指出的是，非对称理论不是宣称相对实力不重要，或者说强国与弱国完全平等。恰恰相反，正因为弱国在关系中承受更大风险，双方在彼此的认知和互动中才存在根本的差异。强国原本是想施以有限制裁的行动，却很可能使弱国陷入紧急状态。强国众所周知的实力优势往往夸大其实施的制裁，从而让弱国感受到自主权甚至国家身份的威胁。相当于一个人如果被一只800磅重的大猩猩戳了一下，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很容易就会掩盖他只是被戳了一下这件事实。非对称理论关注的正是国际关系中真实存在的实力差异，这种差异比我们通常假定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霸权与非对称

非对称的视角为观察霸权的宏观历史周期提供了新角度。分析霸权周期往往基于一个不加检验的推论，即权力起支配作用。例如，罗伯特·吉尔平对现实主义观点的概括：

> 国家在无政府状态和相互竞争的国际关系中被迫扩张权力，并且试图控制国际体系。如果一个国家不这样做，它就可能面临风险，因为其他国家会通过增加相对实力取代其地位或者将其核心利益置于险境。[7]

假使首强的地位真的被挑战者取代，唯一有意思的问题其实是挑战者如何强大到(或者强者怎么能衰落到)让这种情况发生。非对称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希望回答权力在什么情况下，以及如何起支配作用？维持现有世界秩序是不是只需要保持对挑战者的力量优势这么简单？还是需要做到维持一个普遍认可的世界秩序那样复杂？

如果相对实力是一种可质疑的互动关系，对霸权周期的研究就应超越不均衡发展的自然历史，去考察复杂国际秩序如何维持的问题。尽管无意陷入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研究的历史细节，我还是承认国家间的相对实力取决于经济、技术和社会因素，并且相对实力是决定彼此间关系的根本所在。[8]但是，强者并非无所不能，弱者也不是一无所能。相对实力产生的领导权是得以存续还是遭到削弱取决于其他政治共同体自认为受到霸权的保障还是威胁。“帝国过度扩张”既是帝国的武力强大造成的，又与弱小共同体的反抗密不可分。诚然霸权存在周期，我们关心的只是调节非对称关系如何能够削弱或者扩展现有的权力格局(matrix of power)。霸权周期论聚焦的是下一个挑战者的到来，我们关心的则是确保可持续领导权的前提条件。

可持续非对称领导权的最典型例子就是古老的中华帝国。西方世界很少理解中华帝国的长盛不衰在多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它对自己的优势力量能够保持动态的认识，以及它愿意在和平及相互承认中包容小国的利益。事实上，中华帝国是灵活坚韧的，它总是在反复的严重内乱和外来侵扰之后获得重生。这种灵活性在霸权周期理论中得不到解释，因为破碎的霸权是不能被修复的。到了 19 世纪，中华帝国和政权也的确被发达的西方帝国主义瓦解了。古老的领导权只在一定意义上是可持续的，我们就分析这种古老的非对称领导权具有的优越性，及其自我限制的弊端。更何况无独有偶，当今学者津津乐道的现代西方保持竞争力和争取控制权的那些优势，如今也已经不能满足世界的发展了。我们正处于一个彼此关联的世界中，尽管中国在经济总量上正在与美国缩小差距，核心角色仍然是美国。对于可持续的非对称领导权来说，根本问题不是阻止下一个挑战者，而是防止当前领导者或领导者们与其他任何国家产生事关存亡的利益分歧。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风险凸显了上述挑战，挑战的根源不在崛起的中国，而是全球化本身，全球化使得支撑冷战两极格局的排他性同盟很难建立。可持续的领导权不是外部和平的秘诀，它不能解决非对称的难题。但是，它把非对称关系的世界格局（world matrix）视为正常条件，将互相尊重背景下的协商管控分歧视为己任。也许在未来世纪中，我们处在一个霸权循环周期的某一阶段，但是在当今一代中，世界和平能否再维持一百年、二十年，抑或是仅仅两年，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理应谋求的积极事业。

非对称的定义

鉴于国家间巨大的实力差异以及这些差异趋于稳定的现状，至少短期内很难就非对称关系的描述性定义达成共识。非对称的双边关系是指相关两国之间有明显且相对稳定的实力差距，同时又不是压倒性的差距。绝大多数国家间的关系都属于这一类型。典型代表有美国与加拿大、美国与古巴、墨西哥与危地马拉、巴西与阿根廷、德国与奥地利、南非与莫桑比克、印度与巴基斯坦，等等。所有宣称是非对称的关系都应该具有上述或者类似特征的关系。

充满差距的世界

虽然国家具备很多不同的实力，任何实力都可能影响其国际互动，但是人口数量和国民总收入（GNI）[9]是衡量国家间人口和经济差距的简便和基本对比数据。人口数量是一国大小的基本决定因素，总生产率则是一国可用资源的基础。本书第六章也对基于人口规模的人口大国和基于人均生产率的技术大国进行了区分，在这里只需要人口数量和国民总收入就能够说明国家间非对称的程度。

浏览一下全球数据就足以确信国家间重大差距的存在。为了描述清楚，我们用“明显”（clear）差距形容大国超出小国二分之一（小国占大国

67%)的情况,用"很大"(great)差距形容大国是小国 2 倍(小国占大国 50%)的情况,用"压倒性"(overwhelming)差距形容大国是小国 10 倍(小国占大国 10%)的情况。

根据这样的标准,国际差距无处不在。就人口数量而言,只有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与世界平均水平的 3 240 万相比具有压倒性差距,其次美国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再有 18 个国家都属于有"很大"差距的情况。更多的国家则处于另外一个极端,其中 71 个国家人口数量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还有 81 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就国民总收入而言,只有美国、中国和日本这 3 个国家与 2011 年的世界平均值 3 820 亿美元相比具有压倒性差距。另有 15 个国家超过世界平均值的两倍。但是更多的国家处于差距的另一端,其中 36 个国家位于与世界平均值有"很大"差距的下限,超过 100 个国家的国民总收入不及世界平均值的十分之一。事实上,仅有 25 个国家的人口指标与世界人口平均值相比不是非对称关系,17 个国家与国民总收入的世界平均值相比不是非对称关系,4 个国家属于按照人口数量和国民总收入这两项指标都在"对称"集团里的成员。

当然,联合国完整数据还包括很多超小国家和非主权领土。不过如果我们的研究限制在每个类别的前 100 名国家,就涵盖了世界人口总量的 96.4%和世界国民总收入的 98.2%,虽然非对称的分布状况不同,但是仍然很有代表性。

表 1.1　2011 年的全球非对称态势

	超过平均值				平均值	低于平均值			
	压倒性差距	很大差距	明显差距	接近		接近	明显差距	很大差距	压倒性差距
	>10x	>2x	>1.5x	>	=	<	<.67	<.5	<.1
人口	2	18	7	10	(3 240 万)	15	10	71	81
国民总收入	3	15	2	8	(3 720 亿美元)	9	11	36	105

注: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2014 年 2 月统计的《世界发展指数》,国民总收入包括 190 个单位,人口包括 214 个单位。

表 1.2 前 100 名国家的非对称态势

	超过平均值				平均值	低于平均值			
	压倒性差距	很大差距	明显差距	接近平均值		接近平均值	明显差距	很大差距	压倒性差距
	>10x	>2x	>1.5x	>	=	<	<.67	<.5	<.1
人口	2	7	2	7	(6 710 万)	12	7	63	0
国民总收入	2	10	3	3	(6 970 亿美元)	7	3	36	36

注:根据上表计算。

表 1.3 前 50 名国家的非对称态势

	超过平均值				平均值	低于平均值			
	压倒性差距	很大差距	明显差距	接近平均值		接近平均值	明显差距	很大差距	压倒性差距
	>10x	>2x	>1.5x	>	=	<	<.67	<.5	<.1
人口	2	2	2	4	(12 100 万)	5	8	27	0
国民总收入	1	4	3	5	(1.35 万亿美元)	2	3	31	0

注:根据上表计算。

由上述表格可见,中国和印度在人口数量方面具有相对于世界平均值的压倒性差距,近年来中国又和美国一样成为超出世界国民总收入平均值 10 倍的国家。在国民总收入方面,11 个国家属于有“很大”差距,另一个极端则分布着大量差距悬殊的国家。人口数量方面,有 63 个国家低于世界平均值的一半,国民总收入的差距分布更为失衡,有三分之一的国家低于世界平均值的 10%。在这两项指标上接近世界平均值的国家屈指可数,唯独土耳其和伊朗的两项指标均位于平均水平。“高于平均值”的国家之间也呈显著的非对称状态。人口数量第二大国印度与第三大国美国之间有“很大”差距。国民总收入方面,首强美国的经济是次强中国的两倍。因此,事实上大多数国际关系并不发生在“平均水平”的国家之间,这样的国家少得可怜,更清楚的事实显然是大量存在的非对称关系。

鉴于世界排名前 50 的经济体占全球国民总收入的 93%,排名前 50 的人口大国占全球总人口的 87%,我们对非对称的一般性研究就可以缩

小到这个范围内。当然这样的简化也有弊端。比如，相近的两个国家秘鲁和匈牙利在国民总收入方面没有明显差距，澳大利亚在人口数量方面排名世界第51。再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全球焦点的塞尔维亚其实只是国民总收入排名第80和人口数量排名第99的国家。但是，表1.3已经证明排名世界前50的国家之间的确存在决定性的差距。中国和印度在人口数量方面与美国在生产力方面一样，都比其他国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仅加利福尼亚州的经济就可以排名世界第9，2011年其国民总收入是2万亿美元。印度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拥有1.99亿人口，仅此一邦就超过了世界排名第4的巴西，而印度即使只保留其余的人口，它仍然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排除这些拥有压倒性优势的少数国家不论，事实上也只有7个国家的经济、9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接近世界平均值。此外，最能说明非对称范围之广的标志还在于，“前50”排名的国家中其实有21个国家仅仅在两项指标中的一项上占优。

一方面，上述表格已经充分证明国际非对称的普遍存在，另一方面，我们还将从另一个角度考察国家间差距的现实表现，从而印证我们的观点。除了表格显示的大量强弱对比，更重要的差距可能存在于邻国之间，或者是涉及至少一个大国的问题中。遥远的两个小国之间可能很少联系。比如，柬埔寨与老挝、中国和美国都是彼此互动的关系，而它与尼加拉瓜却连互设使馆都没有。罗伯特·杰维斯说过：“即使想找一本描写阿富汗与玻利维亚关系的书都不是件容易事。”[10] 由此看来，非对称关系更多的是指那些至关重要的关系。

如果能给出“非对称”的描述性定义，非对称指代什么就很清楚了。但是也有弊端，首先就是无论非对称关系的双方多么清楚，要界定非对称关系都不容易，而描述其多重特征又将引出存在不同类型的非对称的问题。例如，在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中，双方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的各自优势会相互抵消影响吗？又或者说中日关系是对抗性非对称的典型代表吗？其次的弊端是，有关非对称影响国际关系的经验研究往往局限于只是观察了显而易见的最终结果。比如，非对称关系是不是比对称关系发生了更多（或者更少）的战争？然而事实却是，相似的作用机制在不同的条件下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也可能将结果调整至对有无战争并不敏感的情

况。因此,还是有必要确定一个侧重分析性的定义,以便发现现象中的逻辑规律而不是经验规律,关注非对称性互动的作用机制而不是仅仅看到各种实力差距的规模。

非对称的分析性定义

下面是非对称的分析性定义。非对称关系是指由于实力差距,关系中的弱者一方比强者一方受到双方互动的更大影响,但是强者一方并不能在关系中单方面发号施令。双方的地位不可互换,弱者一方不可能成功挑战强者一方,即使是在和平的互动中弱者一方受关系影响的程度也是相对更大一些。历史记载的大卫击败歌利亚*,完全是个例外。本书用"受影响度"(exposure)而不是"脆弱性"(vulnerability)形容非对称,是因为双方互动的机遇和风险对于弱者一方来说都更为重要和活跃。小国在互动中对抗大国单边偏好的能力甚至强于大国试图推行其偏好拥有的资源优势。即使有时候大国会努力尝试推行偏好并偶尔遂愿,随后也会因小国的无尽反抗而备受挫折。

这里我们排除了国际关系的两个极端类型:对称关系和绝对悬殊的关系。在对称关系中,国家间的互动是基于真实或者假定的匹配实力,亦即一种交互性(reflexivity)互动,双方都具备以相似做法挑战对方的实力。而绝对悬殊的关系中小国一方甚至没有进行有效反抗的能力。非对称理论的某些方面可能与对称关系和绝对悬殊关系近似,但那不是我们理论模型的核心,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分析性非对称关系的特征。

三个基本推论:现实性、关系性、可再生性

从定义中可以得出非对称理论的三个基本推论。

第一,单元间存在相对固定的实力差距,每个国家的地区利益都具有特殊性。各国的认知由其自身条件决定,即使实力发生变化,认知也不会很快或者轻易改变。实力差距是产生国际关系非对称的基础。虽然只有少数国家可以长期占据某一国际地位不变,实力的非对称还是固定于特

* 《圣经·旧约》中《撒母耳记上》记载的非利士族巨人,为大卫所杀。——译者注

定关系的历史和预期中。非对称可以被视为国际关系的正常状态,并不受实力变化的可能性或者差距的不公正性左右。非对称不是常态对称的简单、暂时性失衡。非对称就是现实的。

第二,非对称关系中的大国与小国之间有重大的认知分歧。小国相对来说更关注得失。小国在安全领域几乎不可能以大国对待自己的方式回敬大国。即使是在可以假定平等的经济关系中,商品理应根据等价互惠的原则自愿交易,小国应对市场的力量也更脆弱。受影响程度和参与关系的不同水平决定了双方关注、冲突和常态的不同模式。如果一国比某个邻国小,同时又比另一邻国大,它就会根据各自关系中的非对称地位行事,而不是在两对关系中表现一样。例如,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越南与中国和柬埔寨都是敌对关系,但是它在与中国的关系中扮演小国,在与柬埔寨的关系中则扮演大国。[11] 非对称与相对实力有关,不是因为最强大一方稳赢不输,而是因为非对称互动中的两者会依据不同的认知行事。非对称是关系性的。

第三,不仅国家的相对位次不可能变动,大国一方的实力优势通常也不能确保其持久的统治权。大国一方受关系的影响弱,不可能受到致命威胁。它发动一次"小战争"都可能成为小国所在共同体的致命威胁。小国一方不能挑战大国,但是其反抗实力也能挫败大国强加意志的企图。双方发生冲突的正常结果是僵局而非任何一方的胜利。因此,非对称关系的典型互动方式是谈判协商而不是维持统治权。非对称关系通常由统治权管理而不是"解决"。非对称是可再生的。

权力、自主权和顺从

本书使用的非对称概念与政治科学中非对称的一般功能有很大差别。举个著名的例子,哈里·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重塑了政治学的权威模式研究就是建立在非对称关系基础上的。[12] 事实上,他把所有的人类关系都看作非对称的,他的目标就是清楚界定政治非对称中政治科学的范围。[13] 在他看来,非对称是能够产生权力的实力悬殊。与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如出一辙,埃克斯坦把非对称关系定义为:"人们在其中对其施加影响超过受其影响,对其控制超过受其控制,从中所得

远超过按其分配的关系。”[14]对埃克斯坦来说，“超过”比关系本身更有意思，“超过”带来的权力是一维的。沿着这样的路径，费利克斯·奥本海姆(Felix Oppenheim)则把谈判行为描述为两种单边影响的交换而不是互动的关系。[15]

与他们不同，我们的非对称理论是辩证的，它聚焦关系中双方的实质性相互依赖。差距真实存在并且塑造了关系，因此双方的地位无法互换。正常的非对称关系是互动式谈判的产物。在敌对关系中，强者试图实施统治，这往往会招致出乎意料的挫折。相比埃克斯坦和奥本海姆关心的国内政治而言，国际关系更符合这种情形。然而，即使是在国内政治中，常见的情况也是用权力推行具体问题的努力会引发长期的抵触和排斥。在某种程度上，国内政治也是基于长期关系的，强者一方或许暂时有所得，但是最终它们可能不再想要这些所得。

即使在稳定的非对称关系中，双方对彼此的基本预期也不同。鉴于自身的脆弱性，小国需要明确自己相对于大国的自主权。自主权意味着大国要尊重小国的空间、身份和利益。不是说大国要与小国一致，而是说差异应该得到协商，或者至少应该得到调解而不是被压制。对大国而言，它希望小国顺从，但是大国必须在确信小国清楚双方的实力差距，并且不否认或者挑战差距的前提下进行互动。顺从不等于投降，期待顺从与大国愿意承认小国的自主权是直接相关的，否则大国就是在容忍一个可能的篡权者。同理，如果小国在不能明确自主权的情况下顺从大国，它其实是处于被统治地位。

非对称与对称

对称是非对称的一个限制条件而不是二元对立，因此本书研究的重点不是区分对称与非对称的案例，而是希望说明非对称关系为正常情况。在对称关系或者预设为对称的关系中，双方的交互性是其关键特征。平等的实力意味着任何一方都能对另一方采取相同的行为。对称的逻辑属于一种可互换身份。[16]不平等可能存在，但是不会带来对称双方的认知差异，而只是产生谈判能力的差异。用数学公式表达就是，非对称理论分析的是 $A>B \rightarrow A\neq B$，而对称假定的是 $(A>B)=(A=B+X)$，X 表示实力

的差异。

对称与非对称这两种不同路径的逻辑结果意义重大。

如果 A = B + X,A 和 B 就是本质相近的行为体,参与同一游戏但却持有不同的资源。A 的较强实力(即 X)赋予其更多奖惩的机会,它在任何讨价还价的条件下都能占优。A 和 B 之间的差距越大,A 的优势就越大。[17] A 获胜。B 要么投降,要么与他国联合对抗 A。正如建立在对称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对非对称关系毫无兴趣一样,它们只关心强国间的竞争以及挑战者的出现。

非对称理论则认为,如果 A 比 B 强大,两者的利益和观点主张都会有结构性差异。A 和 B 不是持有不同资源来参与同一游戏的相似行为体,而是在进行不同的游戏。A 不是 B。A 对互动的影响更大,受到互动的影响却相对较小。在某种程度上,国际关系中存在一种关注经济学(economy of attention),A 花费在 B 上的时间不及 B 花费在 A 上的时间多。B 对 A 的反抗不是因为不在乎 A 的威胁能力,相反,恰恰是因为 B 推断 A 对自己的身份构成了致命威胁。B 虽然不能击败 A,但是在通常情况下 A 即使(甚至正是由于)拥有占优的资源,A 也并不能获胜。

A 与 B 之间仍能实现互惠,但却不能实现交互性互动,或者说完全平等。朗·富勒(Lon Fuller)说过,在个人层面"即使存在差异,甚至恰恰因为有差异,互惠才能够把人团结在一起"。[18] 非对称性互惠在 A 对 B 和 B 对 A 的两个方向上结果各不相同,互动更为复杂和有趣。交互性互惠不容易引起误解,并且可能得到相似的回报。非对称性互惠则可能引起结构性误解和误传,互动的过程也不容易进行自我纠错。因此本书第七章进一步提出了有助于确保误解的影响降至最小化的正常非对称关系框架。

A = B + X 的对称逻辑显然不适用于非对称关系,并且就对称关系而言也存在问题。即使两个国家具备对彼此"一报还一报"的能力,它们在利益、文化、志向、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也会造成其对互动的不同认知。对称逻辑关注实力的对等而忽略了认知的分歧。例如,波斯萨法维王朝的建立者伊斯梅尔沙赫(Shah Ismail, 1499—1524 年)皈依什叶派,改变了与逊尼派土耳其帝国的关系。接下来的斗争可以按照对称游戏来解

释，然而其根源却要追溯到造成分裂的认知差异。总之，对称与非对称的关键区别不是对称关系中的 AB 双方可能互换位置，而在于对称关系中的 AB 互动具有交互性。

对称与非对称两种分析路径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通常关注个体之间的交易，而后者强调作为一个整体的关系。因为假定了对称具有交互性，A 与 B 的关系就可以视为一系列独立的交易，双方身份一致而只是目前的资源不同。游戏者手中的筹码不同，但游戏规则和目标是相同的。非对称理论则假定 A 与 B 的每次互动都受到其认知分歧的影响，为了理解每一次互动都要分析整体关系，这样的方法论才更为恰当。既然大部分非对称关系都是可再生的，行为体的预期就理应由结构性非对称决定，而不应把它们看作总是期待在下一场交易中会有好结果的无常玩家。

在对称的双边关系中，人们会预期尽管双方有利益分歧，但是因差距而产生的认知分歧不大。彼此尊重是正常关系所必需的，然而这并不等同于一方采取顺从姿态而另一方承认其自主权。本书第二章描述的非对称错误知觉的循环其实很少发生，进攻性互动的模式往往是“一报还一报”而非“欺侮与反抗”。虽然不太可能断定战争发生的概率是大还是小，但是在对称性冲突中肯定需要战胜敌人的有组织军队，因为双方的基本战争目标都是获胜。如果是多边关系的模式很可能又大不相同。对称性竞争者可能成为其同盟的首领，而非对称情境中的多边联盟就更加复杂了。[19]

非对称与霍布斯状态

即使非对称关系有很强的经验基础，非对称的抽象逻辑仍然可以与肯尼思·华尔兹[20]的对称性竞争模型作一个对比，该模型源自托马斯·霍布斯[21]。本书接受其三个前提假定：

1. 两个国家，每个都有自己的利益；

2. 每个国家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没有强制性规则（无政府状态）；

3. 任何一方都可以选择使用暴力。

从这样的假定出发，似乎自然就会产生建立在无休止的权力竞争基础上的“狗咬狗”的世界。各方的最终利益都是生存，都对失败有着事关

生死的担忧，唯一的安全就是强大到足够获胜，由此就会带来至死方休的竞争，或者说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种殊死斗争中，可能落后的风险比任何边际改进(marginal improvement)都至关重要，所以各方都追求相对收益而不是共同获益。战争似乎无法避免，[22]合作事实上全无可能。[23]而且，如果我们忽略两国竞争的第一个假定，随即就会出现永无休止同时又难以确定的均势和追随强者联盟。

从无政府状态到“狗咬狗”的世界之间其实存在一些隐含的假定。首先就是双方都暴露在来自对方的致命威胁中。这个假定含蓄地表明任何一方都无法获胜，因此双方都必须力争优势。其次是失败方必须投降。这里霍布斯的观点并无新意，只是提出失败方在灭亡的威胁下投降时一定会尊重投降的礼节。[24]

霍布斯“自然状态”的深层假定是对称。这在他的理论中非常明显，尽管他谈的不是国家而是个人，这些个人多多少少都是平等的，并且不会联合成团体。[25]然而，如果我们假定国家间非对称，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

非对称关系的定义能够产生两个重要推论。一是小国不能对大国造成生存威胁，二是大国不能消除小国反抗的可能性。这些推论与霍布斯的三个前提假定并不矛盾，各方都是追求无政府状态下的私利，暴力也都是可能发生的。但是，这两个推论颠覆了霍布斯式或者华尔兹式的结局。

根据第一个推论，如果大国并不受到生存威胁，它的有限且非致命性利益最大化与小国的利益最小化之间就存在讨价还价的可能，否则就可能因小国的反抗威胁到大国的致命利益而引发战争。借用克劳塞维茨的观点，[26]政策选择优于战争选择，非对称战争对大国来说就是“小战争”，可能不及其他的国内或国际政策涉及的问题重要。对小国而言，非对称战争更没有获胜的可能，并且会威胁甚至直接造成其失败和毁灭。因此，除非大国想实现什么有限的目的，或者小国出于绝望，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才可能发动战争。然而即使这样，大国未必需要打仗，小国也未必想要打仗。

根据第二个推论，除非小国的政治共同体完全被消灭，否则即使战败，小国也能通过反抗大国的统治继续追求其利益。纵然小国的军队战败和政府投降，人民也不一定消极。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可以说明占领

比战胜更耗时且困难，重建和平又比占领难上加难。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非对称国家间比假定为平等的双方发生战争的概率更小了。[27]与个人不同，国家利维坦丢了脑袋还能再长出来，四肢都能反抗戕害。

大国并不担忧失败，取胜以及随之而来的统治需要付出多少成本？又能够带来多少收益？这两者之间的权衡才是其决定性考量。如果小国反抗的实力或者大国维持统治的困难导致成本大于收益，大国的最佳选择就是与小国谈判。的确，因为不受生存威胁，大国更可能有动机发动一场非对称战争。但是如果只是为了有限的目标发动战争，大国也更可能因为目标受挫而放弃战争。大国不是被小国击败，而是会陷入僵局，被小国持续的反抗束缚胜利的手脚。大国仍然保有更强的实力，却不能以合理的成本强加或维持其单边偏好。当然，小国（按照我们的定义）也不能击败大国。于是，非对称谈判的底线是出现任何一方都不能占优的僵局。

那么，非对称谈判的实质是什么？有限目标与持续反抗之间形成的僵持均衡应该促成谈判。谈判就要求大国承认小国的自主权，小国也承认大国的权力。大国希望以合理的成本实现其利益最大化而不会催生潜在的竞争者，小国希望终结其面临的致命威胁而确保生存。对大国来说，合理成本的上限——相当于"任何成本"——就是小国可能凭一己之力或者与他国结盟引发的致命威胁。换言之，当非对称关系接近对称时就会引发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然而，非对称假定认为的非致命危险或者持续反抗的程度不同，非对称的情境也就不同。对小国来说，如果预计来自大国的威胁达到了致命威胁，其反抗水平也会升至"全面反抗"，并且小国的反抗意志可能最终击败大国能够付诸实施其有限目标的力量。

非对称关系通常不容易改变，但是无论如何，对双方而言，只要非对称关系存在，在关系中实现各自的利益最大化都是有利的。大国期望减少小国反抗的可能性。根据第一个霍布斯假定，由于利益差异，反抗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较之升级到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小国就事论事的反抗对大国来说还是有益的。只要确保小国相信大国意图的有限性，大国就能减少小国的反抗。

除非能够突然逆转对称成为大国，否则小国也不能消除自身面临的危险。反抗的成本会不断升高，因此小国的上策是尽量降低挑战出现的

可能性，从而避免大国调动更多资源处理当前事务。小国可能很想对大国的要求“一报还一报”，然而事实却是小国不及大国的拳头硬。这就促使小国要弱化谈判的冲突面。

即使在没有更高强制力量的情况下，非对称逻辑也只是一种管理逻辑，而不是挑起战争或者无需克制的逻辑。大国的最佳战略是减少对小国的威胁姿态以降低其反抗。小国的最佳战略是减少挑战大国的姿态以降低大国“合理成本”的标准。在这个框架下，双方自然都要努力讨价还价。任何一方都不会放弃安全实力，战略并不基于信任。但是即使在双方相互威胁以避免失败的霍布斯情境中，各方也都在规避威胁和致力于实现最优谈判。

如果修改对两国的假定，允许小国通过结盟第三方寻求关系的平衡，结果会更复杂，但又殊途同归。无政府状态下没有强制的同盟，小国就面临新伙伴背叛的风险。克劳塞维茨恰当地说明了这一点，“从来不要指望一国代理另一国的事务时会像对待自己的事务一样认真”[28]。小国与此同时会抬高大国可接受的成本水平，而将自己置于威胁新伙伴利益的境地。这在敌对状态下作为一种积极反抗的战略可能是必要的，否则就是轻率之举。另一方面，如果小国明智地提高其非进攻性反抗的实力，深谋远虑的做法就是多方联系他国，这样就不会被视为针对大国的结盟。

非对称关系的稳定性不取决于大国强加规则，或者某一国际社会契约，抑或是什么更高尚的共同道德，我们接受无政府状态的假定。然而，霍布斯模式中非对称的结果是意义深远的。双方的实力差距稳定存在，所以即使并非收益完全均等，互惠也是可取的。既然任何一方都不能获胜，谈判就可以是双赢的。对称关系因为采用了霍布斯式假定，外交准则在最后发生的战争中才是有利的。而我们假定的是非对称关系，战争就是外交的失败。对霍布斯式的个人而言，致命危险决定了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但是对非对称的国家来说，一方并不在危险中，另一方也不是致命的威胁。

超越霍布斯状态的非对称

很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摒弃了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概念，在他们看来，

我们的上述观点似乎也是在批判一位逝去的哲人。戴维·莱克的国际等级制理论是最精致并有说服力的，[29]权力转移危机理论[30]和霸权稳定论[31]则推测强加国际秩序的世界会取代无政府状态。这些理论都假定国际秩序存在，并且可以通过强制产生。这与非对称理论建议的秩序其实有着根本不同的基础。我们具体看一下莱克的理论，他对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的摒弃是最清楚的，而且他对等级制的实际改造似乎比较接近非对称理论。

从对国际秩序事实存在的经验观察出发，莱克认为国际秩序就是建立在主权的关系性权威和附属国顺从基础上的一种等级制，或者一系列等级制。尽管双方的关系可能处在残酷的暴力统治下，但是更多的情况是一种社会契约关系，其中，附属国顺从是为了获得免受国内外威胁的保护，支配国则因此获得和平的顺从与合法性。[32]因此，国家间关系的自然状态就是一种类似社会契约的状态，它创造了国家的主权。在莱克看来，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主权既不是绝对的，又不是不可分割的。契约有一定的范围限制，附属国可以违反它们认为不具合法性的命令。等级制的强度也各不相同，既包括附属国根本没有独立国际地位的正式帝国，又包括更多非正式、有限度并且多变的协约关系，甚至在安全层面和经济层面也存在差异。[33]由此，莱克得出结论："主权事实上是一种随程度、议题和时间而各有不同的协商关系。"[34]

如果这样灵活地定义主权，就没有哪些非对称国家间不可以建构出等级制关系。所以，较之关注大国竞争并假定小国会完全顺从的理论家来说，莱克建立的秩序其实更复杂。他的模式承认一国对另一国的权力让渡，无论是通过谈判而来的让渡，抑或是部分的或者暂时的让渡。支配与从属关系的数量可能会像顺势疗法的良药一样减少，但是仍然是最活跃的要素，并且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近似于古老地图上的龙，等级制被逾越之后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如霍布斯所言："在确定正义或非正义的名分之前，必须有某种强制力迫使人们平等地履行契约。"[35]

如我们所见，无政府状态在非对称理论看来不是难题。对大国来说没有致命威胁，对小国来说也没有最终的臣服，这样就能产生一个基于相互协调进而带来互惠的关系模式。把通过承认对方自主权而获取顺从的

这种交换描述为一种社会契约关系是最好不过的比喻了。无论正式还是非正式的契约都适用,它们反映实力的差距,但是未必能形成一个哪怕是有限主权的共同体。比如,加拿大和古巴都不是美国的附属国,但是它们与美国之间都可以界定为一种非对称关系。

维持无政府状态的框架可能看起来不是崇高的目标,但是无政府状态能带来自由。无论是霍布斯理论的明示,还是莱克理论的暗示,无政府状态都是混乱的,协商才能产生秩序。非对称理论则把无政府状态与混乱无序分割开来,因为对关系的估算可以摆脱对霍布斯安全困境的担忧,以及等级制的束缚。既然大多数国家与其大多数交往对象——或者更强、或者更弱——都是非对称关系,非对称的作用就应该在大范围的关系中加以验证,而不是局限于既定等级制中的成员间关系中。本书第六章提出,全球政治已经进入一个未必是混乱、也未必是等级制的"后霸权时代"。如果我们在一个正式的帝国内部观察非对称,小国的选择就可能被视为另一剂不同的顺势疗法良药。然而,一个又一个的帝国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怎么压制——抑或正是因为被压制——反抗都是导致帝国解体的一个活跃因素。

回到戴维·莱克认为"秩序存在,但并非绝对"的观点上来,为什么说如果双方都能实现相同的有序关系,各方拥有决定性自由这个活跃因素比形成支配和从属地位更好呢?首先是因为,根据实力优势和反抗能力判断一对安全关系就是强调互动而非不平等本身。比如,加拿大并不从属于美国,但是它在自主权和利益受到尊重后反而顺从美国。[36]其次是因为,非对称关系的所有层面——不仅是安全——都受实力差距的影响,而支配权与其中很多层面无关。非对称关系的稳定不是承认实力差异的结果,而是要将其视为习以为常的工作关系。

非对称体系

从超越抽象的双边非对称关系来看,国家的地理位置及其相邻者甚至比国家之间的相对差距更稳定。即使失败的国家也不能重新选择地理位置。[37]唯一可能的情况是,游牧民族会由同一民族建立新的国家,这样原来固定不动的国家的解体和统一也会正式产生新的邻国[38]。比如,印度在

1970年的邻国是东巴基斯坦，而1971年就成了孟加拉国，但是印度绝不可能成为哥斯达黎加的邻国。即使游牧民族的邻国也不可能是完全随机产生的。因为与邻国的关系一般来说都比与遥远国家的关系复杂得多，地理因素造成非对称关系的结构，其中双边关系虽然是最基本的结构单位，但是更大规模的地区和全球关系又影响着双边关系的环境。比如，一组非对称双边关系中的两个国家可能同时与其更强大的邻国有关系，柬埔寨和老挝与泰国和越南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情况。最强大的地区大国，比如印度、巴西和南非，即使不是其所在地区的支配国，也都是地区各国关注的焦点，因为这些国家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邻国。相应的，地区大国也直接与全球大国有关系，同时它们的地区地位又较少受到全球大国的地区存在影响。冷战后的美国已经成为独一无二的全球大国，因此也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然而，"最强大"并不意味着"处处强大"。

对大国的较多关注并不一定意味着小国承认或者遵从大国的意愿。非对称领导地位的两难在于，地区和全球大国是各国关注的焦点，因此它们有能力获得周边国家难以企及的主动权，它们的外交如果兼顾了共同利益也会更有说服力。中心国家的说服性权威地位取决于它所建立的这种秩序具有普遍效用，而小国又不在一个可以提供替代秩序的位置上。如果大国用武力创建一个非对称秩序，小国在公开反抗中就很难协商一致。但是，大国武装其权威地位的成本势必高昂。并且，中心大国的独裁专制行为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妨碍合作，同时加剧它们在非对称关系中潜在的脆弱性。最终，中心国家的专制行为可能引发其他国家以多种方式与之抗衡。历史上的帝国因排斥周边地区而陷入孤立的例子不胜枚举，阿兹特克帝国在面对科提兹*时不堪一击就是因为它对附属政权的横征暴敛。[39]所以，要想维持持久的国际领导权就必须谨记这一真理，切勿排斥弱国的根本利益。[40]

非对称理论将非对称关系视为常态而不是变化莫测的失衡状态，与

---

* 阿兹特克(Aztec)帝国是前哥伦布时期中美洲最大的帝国。1512年被西班牙殖民者科提兹(Cortez)的军队击败，1521年西班牙人在其帝国中心的废墟上建立了墨西哥城。——译者注

此同时也承认相对实力的变化。当前最突出的案例就是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也是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实力差距缩小的唯一显著代表。本书认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图景正在变化，尽管紧张和冲突无法避免，但是不会出现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中国的人口实力和美国的技术实力呈现非对称关系。即使敌对仍然可能发生，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现在已经具备了不选择站队而是凭借与他国的直接联系来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的实力。[41]本书把这种局面称为“多节”而非“多极”的世界，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的非对称结构，而不是一系列强国的组合。非对称仍然重要，美国和中国将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主要节点，但是全球化使得轴辐式的同盟关系作用降低，发展中世界通过人口变革带来的崛起产生了更加多样的行为体和利益组合。

非对称关系的分析性定义与任何强调大国竞争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提假定都不一样。这些理论认为，一国意欲成为大国不一定要与其他大国绝对平等，它只要假定自身实力的任何相对不足都可以被某些优势克服或者抵消，该国就能成为大国的竞争者。否则它就必须承认自己是弱国。非对称在它们看来就是潜在竞争者之间变化莫测的失衡状态，或者是无力竞争国家的顺从状态。如果小国不是有志向的挑战者，它就是失败者。既然本书的定义也认为非对称关系中的弱国不能对强国构成致命威胁，除非将非对称视为导致国际关系中可能产生新的挑战者的原始根源，否则非对称关系本身就没有价值。正如肯尼思·华尔兹所言：“由于国家间不平等，重要国家只是少数。”[42]这恰是本书不能认同的地方，我认为，非对称关系对于强国一方来说仍然困难重重，即使是强国想要获得持久的领导权，也不是简单的确保相对实力的问题。

非对称理论与国际关系研究

本书详尽阐述了国际关系非对称是真实常态的观点，旨在发展成系统全面的非对称关系理论。它既不同于当代国际关系中具体关注国家或

者危机问题的研究，也区别于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和内容。

非对称与当今世界

当代外交事务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显然有趣并且重要的主题，当今世界的危机也引发了大量的评论和研究。无论表达的观点有多么千差万别，这类研究都可以被视为与世界事务相关的世界思想，因此也是其所描述的现实的一个重要部分。对美国人来说，分析和了解占领伊拉克的研究不仅是出于兴趣，而且会对当前和今后的外交政策产生实际的帮助。任何国家的严肃学术研究都是为了满足理解它们在世界中的历史和现实地位的客观需要。从学者的相关论点中就可以清楚看到这类研究的真实存在。在全球范围内，美国的重要性及其中心地位已经造成美国人的观点无论是维护或者批评美国的政策都是默认的主流观点。

本书则希望通过分析国际关系中不同观点的结构(structure of perspectives)作出点不一样的贡献。这是一件冷僻而繁琐的工作，它要求本书与任何观点都要保持距离。非常现实的结果就是，尽管我(作者)是美国人，我必须慎重地避免仅仅从美国人的观点出发观察非对称，或者是仅仅以当前最炙手可热的美国议题举证我的分析。这会格外困难，因为即使从世界的角度来看，美国也是最强大的国家并且稳居冷战后秩序的中心，所以对美国在非对称世界秩序中的特殊地位必须说清楚。不过，即使是在讨论政策意义时，本书关注的亦非美国该如何做，而是非对称如何影响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的政策选择，以及更重要的政策结果。

总之，非对称理论的价值在于完善对现实国际互动的解释。本书不指望提供一把金钥匙，能把所有的外交事务都归结为基于实力差距的观点差异。事实上，领导者、突发事件、危机的具体原因等因素都很重要。但是，这些活跃因素背后可能潜藏的非对称同样值得思考。而且，鉴于当今世界的冲突和决策制定如此紧张，思考对方因为受关系的影响不同而如何持有不同观点，或者如何与这些观点进行有效互动，无疑都是审慎的选择。本书最后一章就阐明了非对称理论的一般政策意义。

非对称与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都宣称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但是因为通常以大国为中心，原本就是来自大国的那些理论家往往认为没有必要在意别国。所以，约翰·米尔斯海默的书中开篇第一句话就断定《大国政治的悲剧》“对未来美国安全政策的预先分析意味着什么”[43]也就不奇怪了。姑且不说米尔斯海默书中貌似宏伟的主题，仅其关于权力作用的观点就意味着只有主导国的主张才是真正有用的。即使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关于相互依赖的经典理论中也提出“因为美国是体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聚焦美国的行为在理论和政策领域都是合理的”。[44]与此相反，非对称理论坚持认为各方观点的非对称结构是有影响的，因此即使是超级大国及其理论家也必须清楚自己的观点及其局限性。

非对称理论与现实主义之间是一种复杂的关系。一方面，非对称理论与现实主义共享一个核心假定，即相对实力的差异是影响国际关系的基本因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根据杰弗里·勒格罗（Jeffery Legro）和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对当代现实主义的权威论断，现实主义者本身都已经放弃该核心假定。[45]然而在非对称理论看来，承认相对实力的重要性不等于假定相对实力起主导作用。以肯尼思·华尔兹为代表的理论家把相对实力等同于支配地位进而发展成排除一切复杂国际关系细节的至简逻辑，但是同时也忽略了国际互动的实际特征以及所谓支配地位在实践中遭遇的失败。当代现实主义者关注了这些特征和例外，因而更接近那些严肃对待国际互动复杂性的理论，自然也就失去了现实主义最初的简明扼要。

在非对称理论中，相对实力的差异只是研究国际关系的起点。非对称理论的现实主义体现在对特定国际关系现实的关注上，而不是直接采用了霍布斯式混乱的微观逻辑或者霸权体系的宏观逻辑。任何一个国家的观点、利益，及其对另一国的关注都是由双方关系影响的程度决定的。准确地说，因为A实力更强，而B与双方的关系休戚相关，双方的互动就确定了所有可能的结果。小国的誓死反抗可能妨碍大国的实力优势。如果双方都关注互动的价值，外交作为一个关键因素就会得到更多重视。本书第七章将进一步讨论外交仪式，比如两国互访，可能在降低危机烈度

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支撑现实主义特别是结构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主张无休止的权力竞争而限制个体国家间的合作。[46]在本书看来，非对称是现实存在的，既不是变化莫测的失衡，又不会导致未来的对称性冲突。不平等的国家间产生稳定谈判模式的可能性并不高于下棋的双方在一方控制了四分之三棋盘的时候实现言和的可能性。因此，现实主义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现有主导国与挑战者之间的权力转移。[47]中国的崛起使得权力转移问题变得格外尖锐。然而，本书另辟蹊径之处在于将非对称视为常态，并且通常是稳定的条件。权力转移理论只对潜在的挑战者感兴趣，而本书涵盖了广泛的非对称关系及其地区和全球影响。以中国为例，它虽然在国民收入总量上正接近美国，但是中国的其他地区关系（即使不考虑复杂的中俄关系和中日关系）仍然是非对称的。诚然，非对称关系可能发生变化，“一报还一报”的逻辑或者挑战现有霸权的形势也都可能出现。但是本书认为，常被解释为霸权变动原因的“帝国过度扩张”，其实是由不恰当地管理非对称关系造成的。非对称理论还能更好地说明维持现有非对称体系面临的挑战。华尔兹宣称“战争是常态”[48]显然不对。战争是非常态，因为它把参与者的存续及其互动体系推到了危险境地。

超越现实主义的非对称

与现实主义关注大国和大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由主义理论强调共同的微观经济逻辑，认为国家无论大小都受此逻辑驱动，随着冲突的成本升高，该逻辑也必然催生合作。所有的国家、经济体，以及个人都秉持同一动机而规避战争日益升高的机会成本，于是经济日趋一体化。这等于无视了世界的区域划分而采用全球经济理性的相同规则。从这一点来看非对称关系的确是常态，因为实力差距不起作用。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分析非对称相互依赖时考察了美国与加拿大以及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这显然是复杂相互依赖的“最佳例证”，他们不仅从美国外交政策的观点出发，而且排除了使用武力的可能性。[49]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也认真考察了国际关系中非对称的动力机制，但是它与关于世界秩序的其他批判理论持有相同的假定，即非对称是变

化莫测的失衡而非正常状态。[50]列宁较之霍布斯关于帝国主义批判的进步之处在于，他将批判的焦点从帝国主义大国的道德转向了世界无产阶级打破国际链条最薄弱环节的可能性。姑且不论列宁主义政治学的失败，认可弱国对强国的反抗就是对当今国际体系的根本贡献。如果说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摆脱战争，首先就应归功于弱国的反抗而不是强国的良心。[51]然而如果将对强国统治权的批判与对实力差距的谴责混为一谈，就会产生一个建立实力平等世界的错误理想。因为出现满是蝼蚁的"后哈米吉多顿式平等"恐怕是替代由不平等国家组成的不平等世界的唯一可能结果。* 如果真有非对称存在，切实可行的全球最高目标其实应该是恰当管理各种非对称关系。

自列宁到布罗代尔再到沃勒斯坦以来，关于国家间相互依存的潜在条件和体系的研究已经成为了解世界现实的重要维度。即使不考虑国家的决策制定，塑造世界秩序的还有生产、分配、技术和生态等条件和联系。本书第六章会详述 2008 年以后的基本时代发展方向。但是，通常以国家形式存在的政治共同体仍然是世界现实的一个维度，而不能被贬低为隐性力量。黑格尔说的可能没错，"世界历史是最后的法官"（*Weltgeschichte ist das Weltgericht*），国家则是来面见法官，并就邻里关系接受评判的决策者们。

非对称理论与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的观点接近，高度重视国际互动的作用，以及在互惠基础上建立稳定的国际合作秩序的可能性。本书完全认可亚历山大·温特的三点主张，即国际格局是一种社会现象，国家身份远比微观经济学表达的复杂，系统性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互动的结构化。[52]因此，国际关系的基本现实只是关系中某些特定的点。个别的关系并不是从一般的体系中衍生出来的。国家间互动只有作为长期互动过程中的片段才能得到最好的解释，互动双方及其关系都是持续发展的。然而，随着沉迷于现实权力的现实主义理论被抛弃，国际关系研究中也表现出贬低实力差距以及非对称影响的趋势。非对称理论则是不仅将国际关系视为主体间互动，同时也着重研究现实的实力和地位差异如何

---

* 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指《旧约·圣经》里的世界末日善恶决战场。——译者注

影响国家的认知。所以，非对称理论也可以被称为“辩证的现实主义”(dialectical realism)。[53]

彼得·卡赞斯坦及其团队关于国家安全文化的形成及其持续性的研究，已经对厘清国际关系的真实本质和惯性(inertia)作出了突出贡献。[54]非对称理论还能补充的是关于战略文化的研究可以提出实力差异如何影响国家利益形成的问题。国家利益的界定是不是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不平等关系结构中国家地位的一种社会化习惯而已？即使是战略文化产生于战略现实，如果关系现实发生了变化，是不是还会有文化滞后的影响？卡赞斯坦证明了由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不能预测冷战后国际舞台的转型甚至解释未来发展，从而转向研究战略文化的合理性，但是也忽略了战略文化本身发生变化的可能。战略文化与战略现实之间的联系必须得到澄清，很多现实其实就是非对称的。

例如，研究东亚非对称与欧洲非对称之间的文化差异，其实与研究形成中的“南南非对称”中的差异一样可以成果丰硕。研究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关系，或者 2008 年以后巴西与南美的关系，都能证明非对称的影响，而不是支配权的历史惯性在起作用。再比如，也可以研究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的痛苦经历及其在普京时代的复兴努力，或者是印度在处理与南亚邻国的关系时以下级帝国(subaltern empire)自居的失灵。非对称理论不是要对上述现象给予恰当的解释，而是要指出实力差异如何可能举证认知的差异。

自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提出经典的行为主义概念以来，国际关系学界对权力的定义已经取得显著进展。达尔认为，权力即“A 比 B 有权力就意味着 A 能让 B 去做其原本不会做的事情”。[55]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t)和雷蒙德·杜瓦尔(Raymond Duvall)提出了更实用且全面而系统的国际权力定义，既包括强国利用制度地位、结构不平等的能力，也包括话语以及公开强迫行为的形成。[56]但是，本书对他们的权力定义有两点质疑，其中一个是根本性问题，即他们的权力概念都被局限于所谓“强国的权力”，完全不考虑劝说的能力，而把权力限定为各种形式的支配权。[57]他们所忽略的恰恰是非对称理论重视的，即弱国对强国真实存在的制约。然而，无论詹姆斯·斯科特[58](James Scott)的“弱国的武器”，还是

杰克・奈特[59](Jack Knight)的非对称讨价还价概念都不在该模型之中。如果强国不能简单地为所欲为,那么弱国、制度、结构、规范就可能决定结果。换言之,强国被迫接受了其原本不愿接受的结果,这就具有讽刺意味地违背了达尔的权力定义。[60]

巴尼特和杜瓦尔的权力定义存在另一个问题是对现实主义的背弃,忽略了权力关系中物质差异的作用。他们假定权力是社会性而非物质性存在,因此"生产性权力"也就局限为对话语的影响。事实却是,相对实力也具有社会性,对其他形式的社会互动具有直接和根本性的意义。现实主义者并不错在肯定相对实力影响相对权力,而是错在假定相对权力必然起主导作用。

非对称的反常情况:小型战争与东亚等级秩序

非对称理论其实是在更大的互动框架中研究敌对关系的,大国不能简单控制小国是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最大挑战,小国试图反抗大国又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提出了质疑。关于这个问题的开创性文章是安德鲁・麦克(Andrew Mack)的《为什么大国会输掉小战争?》。[61]另外,近几年也有很多有益的研究探讨了大国撤出非对称战争的国内原因、[62]为什么小国挑起战争,[63]以及影响非对称冲突结果及频率的因素。[64]本书并不认可上述研究的某些经验主张,[65]非对称理论的主要贡献是旨在说明非对称僵局问题不是微不足道的现实主义反常现象,而是能够重塑我们的国际关系认知的重要原因。在大国看来的"小战争"对小国其实是致命威胁。小国不会不在乎这场博弈,而是要背水一战。如果大国也不能始终握有胜算,现有的国家间非对称关系结构就不应被视为大国支配地位沿着宏观的霸权周期活跃运行的亚历山大・考尔德动态雕塑(Alexander Calder mobile),而是一种更为稳定和互动性的非对称关系结构。

康灿雄恐怕是与本书观点最为接近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他认为现实主义从根本上忽略了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因为东亚与西方是不同的模式。[66]在康灿雄看来,东亚成功运行了等级制模式,等级制提供的国际预期稳定性对于弱国而言比通过竞争获得的任何可能收益都更有价值。本书赞同他的观点,即现实主义太过简单,东亚可能是反驳现实主义

的先入之见最好的例证。但是,本书又揭示了决定东亚形成稳定的非对称文化的潜在互动机制,并且认为无论以正常抑或是病态的形式,这种机制在其他的文化背景中同样适用。另外,本书认为康灿雄的等级制思想中隐含的支配权主张是有问题的,支配权并不能成为稳定领导地位的基础。中华帝国在对外关系中形成的自我约束习惯不是因为中华民族的特性,而是他们在艰难推动关系的经验中学习产生的。[67]帝国的过度扩张不是地理或者文化意义上的扩张,而是由感知到来自周边的威胁程度以及相应的维持支配权必需的武力水平决定的。中国确立的中央权威地位堪称完美艺术,但是它却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也并不拥有关于问题答案的文化版权。[68]

麦克和康灿雄的观点都强调了非对称互动的客观现实中存在的战略文化根源,以及战略文化所蕴含的已知经验和预期互动模式的重要性。麦克反思了美国在越南的经验,并且首次恰当表述了这个迷恋冷战的宏大竞赛而陷入措手不及的超级大国所经历的"越南教训"。不幸的是,教训后来又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重演了。中国与周边邻国打交道的时间更漫长,其朝贡体系战略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朝时期(1368—1644 年)。而且,非游牧民族的邻国在与中国的互动中还效仿中国形成了它们的文化学习曲线。1427—1883 年中国与越南之间近 500 年的相对和平不是建立在信任或者友谊的基础上,而是由双方稳定的预期和相似的互动模式决定的。后来的国际局势打破了这种古老模式。1979 年,中国不得不更新其越南经验,越南也被迫学习中国经验。

方　法　论

尽管在研究方法和实质内容方面与其他理论有根本的不同,非对称理论并非旨在批判其他理论,而是希望提出认识国际关系现实的新范式。本书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清晰完整的模型,其说服力源于强调了被现有理论忽略的一个国际关系现实维度,即非对称关系。该模型能够对其

他理论中所谓微不足道的反常现象予以合理的解释。非对称理论提出的新范式从根本上说是更新了学术观点的核心问题，而不是对其他范式的批判。[69]我们关心的不是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张差异，而是从非对称视角观察到的国际关系现实究竟是怎样的。尽管科学的发展表面上看起来与各种研究中脚注的增加是相伴的，但是科学的进步终究还是要由现实来衡量。更务实一些地看，由于涉足新领域需要大量的理论工作，本书从方法论上尽最大努力减少了可能因为与其他理论探讨某些含混的共性或者差异问题而导致的跑题。

国际关系理论的实用价值往往要靠大量的案例研究，或者根据比如说战争的大样本数据统计相关性来验证。就非对称理论而言，我在本书之前已经有几本书全面分析了中国与越南之间数千年的非对称关系，以及关于中国对外关系的系统考察，因此说案例研究足够多了。本书希望凝练对双边非对称关系的分析，进而论证非对称在更大范围的地区和全球关系中的影响。既然旨在成为一般性理论，本书运用了我所知道的世界政治中以及根据朋友们的建议中尽可能广泛的例证。中国与越南的关系仍然是，并且在探讨非对称的多样性时尤其是一组重要的案例，不仅是因为我熟悉中越关系，而且是因为这两国的非对称关系历史悠久。至于全球层面的国际关系，本书聚焦自 2008 年以来的形势，这其中突出表现了多节世界秩序里的非对称特征。

非对称研究侧重的是关系而非事件本身，所以大数据统计相关性的方法——几百年来成千上万的信息——并不可取。本书重点不是要分析非对称能引发还是阻止战争，抑或是任何一方获胜的概率更大或者更小的问题。的确，如果所有的战争都发生在非对称国家间，或者是所有的非对称战争中都是小国一方战败，这就是需要分析其中具体关系的一般性现实背景了。在任何情况下，大数据分析对于确定反常现象的存在都是有用的。然而，就研究非对称关系而言，大数据分析却太过抽象了。

本书不适用大数据分析的根本难题在于非对称关系只存在于既定实力和位置的特定国家之间。非对称关系是由互动组成的，难以概括为普遍关系，因为在具体关系的漫长历史中每一次互动都环环相扣，而且双方对关系的发展总是有明确的预期。这些互动的顺序已经形成一种路径，

可能转变方向但是不会逆向发展。比如，即使美国断定占领伊拉克是个坏主意，它也不能退回到占领前的政策选择上去了。昨天就是在为今天下赌注。因此，最适合非对称研究的既不是澄清交易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又不是大数据分析的统计结果。既然要研究关系，就必须认真分析长时段的具体互动。

除了双边关系以外，关注非对称还增强了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其名著《系统效应》中描述的无极限系统效应。[70] 双边非对称是一种结构化的微观系统，随着分析范围的扩大也就出现了立场模式以及互动的集体形式。例如，三角关系就产生了新式的复杂性，[71] 本书第三章还会进一步探讨如果考虑非对称之后，可能存在 4 种三角关系的权力排序。正如杰维斯所说，对系统生态的影响其实是有意识行为的无意识结果，这些行为旨在催生系统模式而不单单是随机的噪音。这些系统效应不是由极点的数量决定的，而是源于那些同步且偶然的结果所共有的不确定性。基于国际关系的生态要对结果作线性预测很难，但是另一方面很多新兴的互动模式却清晰可见了。

不得不承认，囿于本人能力所限，还有很多与非对称相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是本书不能澄清和解决的。我很期待其他学者提出问题和质疑。如果乐观点，我也希望本书提出的分析方法能够被应用到更广泛的关系中去。无论被质疑还是被应用，只要非对称关系受到更多关注，我都会对自己的一点点贡献感到欣慰。

本书框架

非对称理论归根结底是国际关系的系统理论，但是基本分析单位是双边关系。本书就从双边非对称开始，第二部分探讨了多边和地区非对称的复杂结构，第三部分考察全球体系，第四部分及最后论述的是一般性政策建议。

第一部分“非对称与双边关系”分两章，提出了非对称理论的核心分

析要素。第一章介绍了非对称实力以及国家地区利益的基本情况，提出国家的实力差距意味着它们受关系的影响程度不同。双方对关系的关注度差异由此产生，强国会因为受关系影响少而关注度较低，而弱国则对双方关系更加关注。进而会造成互动行为的差异，通常强国更难协调，而弱国容易协调且行动迅速。出现非对称协商的前提是：具备可调和但并非一致的利益，意义重大但并非压倒性的差距。形成非对称关系需要既定的实力、身份、外交，以及环境，这四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发生变化，从而对关系发展提出新挑战。

根据非对称理论的基本假定之一——非对称关系具有惊人的稳定性，本书第二章探讨了错误知觉、敌对、僵局，以及关系正常化的周期。非对称错误知觉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双方都倾向于认定对方与自己观念相似而实力有别。非对称错误知觉的消极互补性会导致由欺诈到过激行为，再到敌对的恶性循环。错误知觉的这种循环在稳定的关系中不容易出现，因为双方的共识能预期关系的发展会延续历史。在一对新关系中，双方的错误知觉缺少统一标准，于是更容易走向敌对。双方在关系中的脆弱度差异还会造成更糟的结果，小国的整个政治共同体会全力以赴反抗大国的侵犯，而对大国来说，有限目的的遥远战争如果拖延起来只会伤害其人民和领导权。一旦意识到僵局，双方都会转而协商出一个终结敌对状态的结果，在外交上确认残酷现实已经证明的那个僵局：任何一方都无法获胜。关系正常化则是在单边胜利幻灭的基础上缔造一个正式局面的过程，即一方承认对方的自主权，而另一方表示顺从。

第二部分“非对称体系”从双边关系转向分析互动性非对称结构和地区结构。第三章首先研究的是三角非对称关系的问题。既然现实中的所有双边关系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其他关系的影响，超越双边主义的简单化假定而考察包含诸多关系的估算就很重要。超越双边关系的第一步中涉及的互动复杂性类似于物理学的“三体问题”，互动的结果变得不可预测。正如准确无疑地应对“三体问题”会导致混沌理论，多边非对称的外交实践旨在建立不确定性的参数（parameters of uncertainty），而不是提供可预测的结果，因此也会为了控制不确定性而试图稳定关系中的互动。于是，由各种有条件的关系组成的体系就提供了一个约束特定双边关系

的框架。

第四章分析非对称多边结构的最基本和最重要形式，也称为邻国的地区相互关系。尽管过去的两百年间人类联系的边界已经发生演化，国家的地理位置仍然会催生邻国间的复杂互动，这些互动需要稳定性以降低彼此面对的不确定性。因此，地区与国家一样具有自己的参数。多边非对称有不同的模型，然而一旦有一国或者几国比他国强大，这个最强的国家或者这几个强国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地区结构的中心。地区强国的中心地位首先是各国关注的中心，因为地区内的其他国家受强国影响的程度远大于强国受它们影响的程度。

然而，强国的中心地位也不无讽刺意味。其中心地位是被个体间的差距建构成的，A 国可能并不比 B、C、D、E 几国的总和强大。A 国在结构中扮演协调者的角色比它单独行动获益更多，但是协调需要周边国家的顺从，顺从反过来又意味着周边国家断定协调比不协调更有利于各自的利益。反之，如果 A 国对 B 国使用强制力，这可能对他国来说是一次有效制裁的教训，但同时也会把 A 国置于某一特定的冲突中，从而削弱它应对别国的可支配实力。如果别国认为 A 国是威胁，它们会破坏制约 B 国的地区合作，甚至可能团结起来对抗 A 国。因此，A 国的持续优势地位取决于互动性的“软实力”，亦即一种基于中心地位的领导权威，同时也是一种建立在地区内基本利益共同体之上的领导权威。本章的结论探讨了复杂地区结构和多边地区制度。

第三部分“世界体系”分两章考察国际非对称的最终框架。正如第五章谈到的，中心地位的逻辑也适用于世界优势，但是世界体系的规模极端强化了非对称的作用。与地区领导者不同，世界强国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都不表现出相对脆弱性，除非出现另一个竞争性世界强国或者一个可能的挑战国。所以，毋庸置疑，世界强国通常不会关注其庞大关系网中的其他小国。非对称理论与大多数强权理论的基本差别在于非对称理论不关心霸权循环，而是强调霸权的可持续性。可持续性往往被等同为能够打败挑战者，但事实上它是取决于从属国的排斥和反抗程度。帝国的过度扩张并非单纯的地理扩张，也意味着所产生的体系内分裂的严重程度。大手就需要强壮的臂膀，小手反而能触及更远的地方。不受他国反抗的

秩序也容易在挫败中复原，压迫性秩序则在鼓励反抗。大部分霸权循环的潜在悲剧性缺陷都是因为假定了体系只需要满足中心国家的狭隘利益。

第六章对 2008 年到达分水岭的全球政治经济时代进行了扩展分析，并且我认为这个时代会延伸到遥远的未来。如果假定全球化、主权以及人口革命会持续发展，这些因素就有望成为国家作决策的基础。全球化会产生反作用，不仅增加国家受国际影响的程度，而且通过一张不可预测的副作用之网而使国家行为复杂化。国家可能仍然是主权决策者，但是会越来越受制于公众舆论和有限选择的现实，结果导致国家组成的体系可能是稳定的，而政府（以及某些国家）可能受到更多挑战和更加不稳定。与此同时持续发展的人口革命正在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居民之间生活机会的差距，从而使得人口数量对综合经济实力的决定性作用更强。中国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最有力证明。但是，城市化人口的教育和健康改善也增加了国内压力，中国的国民总收入追平美国的时候，它的生产率却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仅此一种差别就把“对称”的概念复杂化了，但是全球化也使得冷战两极格局不可能再次出现。世界体系的最贴切特征是“多节”而非“多极”。非对称依然有效，但是霸权国的选择有限。

第四部分“政策意义”旨在总结对非对称背景下的有效国家行为分析得出的实用经验教训。第七章，也是本书的最后一章，首先概括双方的认知和标志性优势及劣势形成的非对称差异对于国家情报系统的影响。管理非对称关系的框架因此也要包括既能平息热点问题，又能防止危机演化为冲突的措施。非对称还给大国与小国间的利益交换制造了道德难题——平等地对待不平等的双方是否公平？这一章接下来又探讨了全球和地区关系，最后得出全书的结论，从研究危机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在不丢失颜面的情况下退却的难题开始，提出非对称的互动性学习曲线。毫无疑问，最终的学习曲线就是世界历史本身，它只会奖励现实而惩罚幻觉。

注　释

1. Thomas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6.

2. 老子:《道德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249页。

3. 原文为斜体。Albert O. Hirschman,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xpanded edn. 1980; orig. 1945), p.ix.

4. "狐狸通晓很多事,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Isaiah Berlin,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53),尽管是伯林让这个比方家喻户晓,但是菲利普·泰特洛克在书中对其进行了最恰当的使用,使其获得了深刻的说服力和普及度。参见 Philip Fetlock, *Expert Political Judgement: How C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5. 史蒂芬·平克的文章对关于武力普遍衰落的很多观点都作了清晰的概括,详见 Stephen Pinker, "A History of Violence," *New Republic* 236:12 (March 19 2007), pp.18—21.

6. Betrand Russell, *Power*, qtd. In Edward Hallett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London: MacMillan, 1939), pp. 208—209.

7.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86.

8.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9. GNI 是世界银行用来说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最新概念。下面的表格中作者将采用世界银行以美元为单位测算的名义生产率进行估算。

10.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26.

11. Womack, "Asymmetry and Systemic Misperception."

12. Harry Eckstein, "Authority Patterns: A Structural Basis for Political Inqui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7:4 (1973), pp.1142—1161.

13. 有趣的是,埃克斯坦把国际关系排除在政治科学之外了。

14. Ibid., p.1146.

15. Felix Oppenheim, *Political Concepts: A Reconstru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pp.40—43.

16. Hermann Weyl, *Symmet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p.4. 韦尔还把对称定义为"Ebenmass"(完美平衡),认为对称的关系建立在 P 与 P′之间微不足道的身份差异基础上。他引用莱布尼茨(Leibnitz)的观点,形容对称的作用发生在两件事单从自身来看难以分辨的情况下(p.127)。

17. Robert Powell, "Absolute and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4 (December 1991), pp.701—726.

18. 原文为斜体字。Lon L. 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23.

19. 威廉·汤普森关于大国联盟相似的观点,并且认为大国在冲突和结盟中有着更多的可能性。Thompson, "Principal Rivalrie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9:2(June 1995), pp.195—223.

20.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21. Thomas Hobbes, *Leviathan*(Andrew Crooke, at the Green Dragon in St. Paul's Churchyard, 1651). 在古登堡计划(Project Gutenberg)上可以在线查阅。尽管霍布斯的理论是在国内自然状态下论证绝对统治者的合法性,但是其观点也经常适用于国际关系。因为缺乏绝对统治者,无政府状态就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条件。

22. James Fears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3(Summer 1995), pp.379—414, esp.pp.384—385.

23.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2(January 1978), pp.167—214.

24. Leviathan, ch.20, section "Not by the Victory but By the Consent of the Vanquished."也可见 ch.14, section "Covenants Extorted by Fear are Valid. "。承认胁迫下产生的礼节在某种程度上符合霍布斯的著名阵营(尽管背景不同),"因为言辞是智者的筹码,他们使用也盘算,傻瓜则只是把言辞当钱花"。Ibid., ch.13, section "Of Names Common and Universal."

25. Ibid., ch.13, section "From Equality Proceeds Diffidence."

26. Carl Von Clausewitz, *Vom Kriege*, book 8, chapter 6B: "Der Krieg ist ein Instrument der Politik"(Berlin: Dummers Verlag, 1832).

27. William Reed, " Information, Power and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4(November 2003), pp.633—641; Dan Reiter, "Exploring the Bargaining Theory of War,"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I: I(March 2003), pp.27—43.

28. "Niemals wird man sehen, daß ein Staat, der in der Sache eines anderen auftritt, diese so ernsthaft nimmt wie seine eigene." Clausewitz, book 8, chapter 6A, "Einfluß des politischen Zweckes auf das kriegerische Ziel."

29. David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30.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edn.(New York: Knopf, 1968);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31. 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Inter-*

national Politics.

32. Lake, *Hierarchy*, pp.7—15.

33. Ibid., pp.45—92.

34. Ibid., p.175.

35. Hobbes, *Leviathan*, chapter 15.

36. 对美国与加拿大的复杂相互依赖关系的描述详见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Third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2001), chapter 7。

37. 本书不是要贬低此类变化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新奇外交形势的出现——比国家新生和旧国消亡还要新奇——成为非对称外交面临的最艰难挑战。最近的例子就是南斯拉夫和苏联的解体,以及越南和德国的重新统一。

38. 正如托尼·朱特(Tony Judt)在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New York: Penguin, 2005)书中描述的,20 世纪的种族清洗改变了大部分欧洲国家的人口结构,后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却是由非欧洲的移民来补充的。这种人口变化影响了邻国面临的问题,而不是改变了邻国本身。

39. 参见 Charles A. Jones, "Hierarchy and Resistance in the American State-Systems, 1400—1800 CE," in Stuart Kaufman, Richard Little, and William Wohlforth, eds.,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2007), pp.176—198。

40. 农诺·蒙特罗从不同的假设出发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参见 Monterio, *Theory of Unipolar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41. Brantly Womack, "China's Future in a Multi-Nodal World Order," *Pacific Affairs* 87:2(June 2014), pp.265—284.

42.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131.

43.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p.401.

44. Keohane and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p.ix.

45.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2(Fall 1999), pp.5—55.

46.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pp.167—214.

47. 根据奥根斯基及其追随者的定义,权力转移可能导致战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参见 Ronald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2000)。

48. Kenneth Waltz, "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8:4(Spring 1988), p.620.

49. Keohane and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especially chapter 7.

50. V. I.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1916), in

Selected Works of Lenin, vol. 5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d), pp.3—122.

51. 本书作者此处的观点不同于 John Mueller, *Retreat from Doomsday: 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52.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20—21.

53. 这个概念是阮武松(Nguyen Vu Tung)建议使用的。

54. Peter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55. Robert Dahl,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 2:3(July 1957), pp.202—203.这是一篇非常生动而富有思想性的文章。

56. 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Winter 2005), pp.39—75.

57. Ibid., p.42.达尔认为劝说也是一种权力。

58. James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59. Jack Knight,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60. 亚当·沃森用"制约"而不是权力其实更慎重,但是他的霸权概念又不能说明反抗的重要性。Adam Watson, *The Limits of Independence*(New York: Routledge, 1997).

61. Andrew Mack, "Why Big Nations Lose Small Wars," *World Politics* 37:2(January 1975), pp.175—200.

62. Gil Merom, *How Democracies Lose Small War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63. T. V. Paul, *Asymmetric Conflicts: War Initiation by Weaker Powe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Todd Sechser, "Goliath's Curse: Coercive Threats and Asymmetr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4:4(2010), pp.627—660.

64. Ivan Arreguin-Toft,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65. Brantly Womack, "Democratic Defeatism: Reconsidering the Logic of Asymmetric Wars," *China Among Unequals*, chapter 5.

66. 参见 David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4(Spring 2003), pp.57—85; "Hierarchy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300—1900," *Asian Security* 1:1(Winter 2005);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以及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67. Zhou Fangyin,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2(2011), pp.147—178.

68. 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nking,"*China among Unequals*, chapter 7.

69. 本书对"范式"的理解与勒格罗和莫劳夫奇克有所不同,他们认为范式的作用在于能够排除其他不在解释范围内的问题("Is Anyone a Realist?", p.53.)。诚然,范式一定能标明自身与其他理论模型的不同,并且宣称自己超越了其他相关理论。但是,本书希望回归托马斯·库恩的原始概念,把范式定义为一种更为整体主义的美学观点。既然范式是一种认识现实的新途径,首先就要尽可能解释清楚这种新途径、新观点。

70. Jervis, *System Effects*.

71. Ibid., pp.177—209.

第一部分

非对称与双边关系

第一章
非对称关系的基本结构

国家无论身处何地都要繁荣，并且它们不管在哪里，都要与或大或小的邻国有着多多少少的规模差距。因为它们受彼此互动的影响程度不同，也就产生了各具特色的关注模式和行为结果。久而久之，大多数非对称关系已经习惯化成为彼此可以接受的互动模式，然而一旦遇到全新的形势，双方的利益、行为和认知差异就会成为问题。

正常的非对称关系建立在各方互惠，但是彼此承诺又有差别的基础上。[1]大国必须承认小国的自主权。没有这种承认，小国的利益和身份就会受到大国的实力优势威胁。反之，小国也必须对自身与大国权力的实际悬殊表示顺从。如果小国表现为大国的挑战者，大国就会受刺激而使用其实力优势压制小国的野心。大国承认小国的自主权与小国对大国的顺从在正常的非对称关系中是互为补充的，是平等双方的协商关系。尽管双方的关系可协商，实力和关注度的不平衡还是把大国放在了支配地位。本章考察非对称关系的深层结构，以及相对实力、身份、政府和环境的变化是如何影响非对称关系的。

利益的位置性与参数的合理性

利益的位置性是由政治共同体的两个基本要素结合产生的。其一，

政治共同体必须是一个领土单位，人口在地理上是聚集的，领土上拥有确定的资源以及能够决定其人口直接面对的机遇和挑战的明确特征。其二，某一特定政治共同体是根据它不是其他位置的人口组成的其他政治共同体来界定的。界定一个政治共同体不仅依据它自身的情况，也要看它与其他共同体的关系，从而确定它是什么，不是什么。即使是一个拥有天然边界，或者是与邻国没有边界争议的共同体，比如一个岛国，它的某些实际存在也要依据与其他共同体的协议来确定，而这些协议则是由其他共同体的不同参数决定的，协议的类型也要受相对位置的影响。

利益的位置性是非对称理论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一个前提。一个共同体既有与其他共同体相似的利益（比如，对财富和权力的欲望），也有共同的利益（比如，规避相互摧毁的敌意，或者合作应对全球变暖）。这些利益累计起来就成了更广泛的共同身份。然而，位置的差异会带来观点认知的差异，进而形成了共同体之间的某种隔阂。法国对财富的追求与科特迪瓦（Ivory Coast）对财富的追求不同，这种追求与其他利益的关系也会受到位置性的影响。所以，一个共同体利益的决定性管理权不能转交给另一个共同体。帝国主义号称比殖民地更了解如何管理它们的利益显然是一种谬论，比这更根本的谎言则是宣称殖民地的利益对其母国来说完全清楚透明。

位置性与利益

想知道地理位置如何影响利益？可以看看下面的例证。有一艘游船，乘客正在享受旅行，没有人注意到航行的细节，也无人抱怨头等舱和经济舱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突然，发生沉船了，只有部分旅客和船员可以乘坐救生艇逃生时，对资源平等分配和领导者能力的关注就会马上成为焦点，决策制定变成个人之间的当面决断，而不会委托给船员完成。如果头等舱乘客坚持要求更多的食物和水，却又少划船，他很快就会发现同行的乘客再也无法容忍舱位之间的不平等。在这几个小时里，乘客的利益和行为将会被其生存方式的新参数重新塑造。再比如，如果是一艘途经的船对一艘游艇避而远之，可能被视为表达尊敬，但是如果它这样对待一

只救生艇，就会被认为是无情和自私。

有些政治共同体与游船上的情况类似，其他共同体则会有救生艇上的生存考虑，然而这里的普遍意义是指一个共同体的基本参数决定其利益的重点和选择的可行性。参数不决定行为，一个人可能试图成为救生艇里的头等舱乘客，但是参数决定其所作选择的重点。与微观理性不同，参数的合理性不是寻找实现既定目标的最有效手段，而是会调整目标以适应当前形势的紧迫性与可行性。一个理性的行为体如果目标设定不符合当前形势，它也会是不理性的，高效地追求不恰当的目标只会加剧混乱。

因此，认识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外部关系，首先就要了解决定其利益和塑造其眼界的基本参数。在《中国与越南》一书中，我提出中国的基本参数是规模、中心主义/地方主义、资源充足、不可再生资源的压力，以及历史；而越南的基本参数是地理、民族主义/世界主义、资源不平衡、统一/多样，以及历史。[2]历史是所有共同体的相同参数，它会影响集体预期，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史又是一个最特殊的参数，因为每个共同体都走出了自己的道路。这些参数不仅影响国际互动的内容和模式，也影响国内和国际政治的总体平衡。于是，中国和越南采取的相同行为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因为这些行为源自两国不同的国内环境。

位置性意味着关系中各方的地位不能互换。既然所有的政治共同体都有定位，即使是对称关系中的各方也是不可互换的。实力对等意味着有可能实现交互的、“一报还一报”的互动，但是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自己的边界。非对称则意味着既不可互换，也不可交互。非对称关系中不平等的阵地也是由这种边界分割开的。

位置性与关系

如果每个政治共同体的利益都有定位，位置决定外部关系，那么关系也就是有定位的。博茨瓦纳与南非的关系不同于它与莫桑比克的关系，博茨瓦纳对它与南非关系的认知也不同于南非对它们两国关系的认知。非对称理论的起点就是去理解那些源起于利益的不同位置性的国际关系

具有什么特殊性。

我们关于利益的位置性以及国际关系特殊性的探讨是在政治共同体的意义上进行的，而不仅仅指国家，因为在我们的研究中，参数和相对国际地位的影响比国家政府更大。尤其是如果我们考察长远的国际关系，务必记得国家的权威性取决于它代表政治共同体的能力，而且共同体对外部关系的反应能够改变国家。当然，国家会代表政治共同体的人口和领土作决策，因此它是国际交往（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直接行为体。国家既不是单一的，又不是最终的行为体，但是作为权威决策者在管理国际关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我们将使用“国家”（state）指代负责外交事务的权威决策制定的政治领导地位和结构（leadership and structure），“政府”则作为一般术语指代内政和外交中的政治权威系统。“国”（country）用来指代包括其政府在内的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在本书中就用来区分某一政治共同体及其政府。

国际关系与国际交往

如果“国”都有其定位，那么国际交往现实的基本层面就是国与国之间具体关系的结构。各国都在一系列有限的特定国际关系中根据自身的参数环境采取行动和作出反应。国家是构建出来的，但是并非用物质材料构建，而是根据其环境确定的突出目标而构建的。每个国家所处的环境中都有一部分是它对不同国际关系的认知，并且其中最重要的关系都是屈指可数的。国际关系中几乎不存在不受约束的主观性，更很少有无名者的存在。

因为各国及其关系都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国际关系中的每次互动最宜被视为某一交往链条中的一颗珠子，而不是一笔孤立的交易。国际关系的线性发展有两个维度。其一是在国际关系中，已知的行为体可以预期彼此互动进入未知的将来。因此，理性的行为体不仅要考虑它在交易中的当前收益，还要顾及该交易对未来互动的影响。既然未

来不可知而伙伴可知，深谋远虑的做法就是把交易纳入与自己暴露给伙伴的底牌保持一致的模式。不过，并非所有的国家行为体都是理性的，政治家都是活一天算一天的生物（the creatures of a day），不会关心其祖国能存续多久。然而，即使是最自私的、拿钱就跑的行为体也不能摆脱第二个维度的阴影，那就是关系的历史。国际关系的以往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某一既定关系中关于可能的行动和结果的集体预期。历史有时可以被操纵，但是国家几乎没有创造历史的选择权。如果国与国之间的交易植根于历史，同时又面向未来，它们最宜作为国际关系的组成部分被加以研究。

因此，国际关系的结构可以被视为现实的一个层面，既不能被简化成由假定为无数不知名的行为体从事市场清算交易（market-clearing transactions）的一种微观核算，又不能被等同于由大国数量决定的宏观系统模式。即使这种微观逻辑和宏观系统本身都是国际分析的合理层面，作为特定国际关系的国际交往也值得专门研究。罗伯特·杰维斯就在其研究中强调了把国际体系视为一个生态系统的重要性，以及考虑非对称只会增加其复杂性的基本观点。[3]总之，国际关系是一个有形世界的现实并不会过于暗淡而让社会科学无从研究。诚如生物学没有因为所有的生物都由原子组成而蜕化为物理学，也不会因为它们都在宇宙中而蜕化为宇宙哲学一样。

A 国与 B 国

一国的实力是它维持、深化和保护自身利益的资源，各国实力千差万别。当实力存在重大差距时，国与国之间就构成非对称关系。即使关系中的利害往来是平等的，大国 A 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少，小国 B 受到的影响则相对较多。因为受关系的影响更大，B 国就有理由对双方的关系更为关注。相反，A 国可能还有更多平等或者更为重要的其他关系，它就没有更多理由关注与 B 国的特定关系。图 1.1 说明了这种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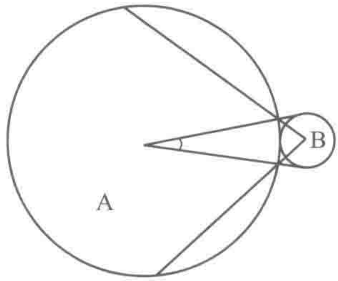


图 1.1　非对称关注

如图 1.1 所示，A 国对 B 国来说是一个更强大的存在。事实上，外部世界总体上可能对 B 国来说更重要，因为其国内总量相对于国际表面的占比率更大。从接触就能带来收益的角度讲，对 B 国来说，A 国的实力优势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如果 B 国有机会打开 A 国市场，它的销售量将是国内市场的数倍。如果 A 国打开 B 国的市场，它却仅仅能扩大一点国内市场的范围。脆弱性也同样是非对称的。如果 B 国能卖一辆车给 A 国，B 国不会冲击 A 国的汽车生产商。但是反过来，如果 A 国的某一商品卖到 B 国，B 国生产商受到冲击的可能性就很大。因为 A 国的生产商具备可观的国内市场规模优势。而且，A 国国内的激烈竞争也会自然产生更加高效的生产商，它们的产品占领 B 国市场就相对更容易。当然，B 国的消费者会因此而受益，但是 B 国的制造业基础会被廉价的进口商品击垮。

即使是在 AB 两国最简单的等值交易中，交易对 B 国的影响也会大于对 A 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关系的非对称影响会导致未知的前景，并且决定两国关系的结构。B 国比 A 国更关心潜在的风险、对脆弱性的掌控，以及对机遇的追求，因为这些对它来说都举足轻重。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明确断言，一个人更关心自己是否会失去已经拥有的东西，而不是增加收益，[4]杰米里・边沁(Jeremy Bentham)通过长期观察也发现，风险是由其所涉及的数量占其全部所有的比重决定的。[5]因此，B 国可能比 A 国对双方的关系更敏感，也更可能比较谨慎。两国都会规避风险，但是 B 国面临的风险更大。当然，无论是寻求利益还是规避风险，由于利益决定了关注度，B 国都会更加关注双方的关系。

非对称与安全

且不论彼此自愿和在双赢世界里的经济关系，A 国的实力优势的确赋予了它威胁 B 国的能力，并且 B 国无力还击。即使在经济冲突中，A 国抵制和报复的能力也超过 B 国。如果 B 国试图选择一个它可能有优势的特定议题与 A 国对抗，A 国也可能将之与其他议题联系起来，从而增强 A 国的相对实力。就安全而言，B 国在正常情况下不能对 A 国造成致命威胁，但是 A 国发起的任何使用武力的威胁都在刺激 B 国担忧 A 国的超强实力。B 国既会合理关心自己相对于 A 国的脆弱性，也可能紧张过度。

事实上，B 国相对于 A 国的脆弱性并不像双方实力差距所显示的那样脆弱。假设 A 国实力是 B 国的 10 倍，并不意味着 A 国就等于 10 个 B 国。实力规模的增长意味着 A 国国内的复杂性也会相应增加。与此同时，A 国的实力优势也可能并非简单可用的过剩资源。A 国的实力可能很大比例已经预支给了国内的维护或者其他的国际关系。最关键的是，正因为与 B 国的关系重要性低，A 国在资源分配中并不会优先考虑与 B 国的关系。

总的来说，非对称关系中的利益的位置性和受影响程度的差距造成这样的形势：A 国对待 B 国与 B 国对待 A 国的方式大不相同。AB 两国之间表面看起来是同一对关系，实则是两组行动及其解读，它们源于完全不同的环境，也都以完全不同条件下的某一国家作为目标。诚然，B 国对 A 国的关系会引发 A 国对 B 国的关系（互动是相互的），但是 B 国对 A 国行动评判的直接焦点是该行动对 B 国利益的影响，而不是 A 国的内在意图。反之，亦然。因此，AB 两国的关系其实是两组次关系的和，即 A 国对 B 国的关系加 B 国对 A 国的关系，无论两国关系是正常还是敌对，双方对关系的认识主要都是评估对方行动对自身利益的影响，而不是去理解对方的意图。本书下一章将揭示，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系统的相互误解的可能性其实非常大。

缓和非对称的因素

有些因素能够降低 AB 两国关系中的非对称影响。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双方的距离。如果我们可以无限放大 AB 两国之间的距离，图 1.1 中

AB之间关注度的角度就彼此接近了。图1.1背后的现实当然要复杂得多,但是这样的假设的确有用。相邻的国家通常比那些距离远的国家彼此之间关系更复杂。[6]斯里兰卡与印度的关系不及斯里兰卡与中国的关系那样符合非对称的特征,但是哪对关系更重要和更复杂又显而易见。即使是在过去的200年间,由于交通、通信和信息技术的若干革命已经大大降低了距离的影响,邻国之间还是会拥有共同的边界以及紧张关系的历史。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对美加关系和美澳关系的详细对比中准确揭示了"邻国效应"。[7]另外,本书在导论中也提到了遥远的关系对小国来说往往更有意义。

与非对称关系相关的另一个因素是双方互动是密集还是稀疏。互动越密集,越接近于本书所描述的AB两国关系模式。当然,如果互动对双方来说都至关重要,也就不存在某一方特别关注关系的情况了。如果一对关系既重要又狭窄,则是一种特例。在双方关系的不确定性被限制在特定议题时,B国是有可能控制该议题的不确定性的。如果两国关系主要集中在某一议题领域,比如某一商品的买卖,那么双方在其他议题上的非对称实力也就没有太大意义,或者说非对称的总体感觉会变得更加复杂。例如,伊朗的实力比几个欧洲国家都要小,但是因为它出售的石油对欧洲至关重要,双方的关系就比前文描述的AB两国模式要复杂得多。

还有的关系虽然并不对称,但是也不能适用于一个实力强国与一个实力弱国互动的简单模式。以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为例,印度尼西亚的地理规模和总体生产率与新加坡的先进技术和人均生产率形成鲜明对比。两国实力各有长短,双方的关系并不对称。然而,它们的非对称关系最适合被描述为一系列相互抵消的非对称。两国的整体关系复杂,涉及各自相对优势的诸多平衡。中日关系其实也属于这种情况,尤其是随着中国实力的相对增长,特别是2010年以后中国的国民总收入(GNI)超过日本,导致两国关系愈加复杂。如果将来中国超过美国的国民总收入,而人均生产率却仅及美国的四分之一时,那恐怕就是相互抵消非对称关系的终极案例了。

非对称关注的政治学

如果国际交往中的关注是直接指向对方的内心的，这种关系就可以被认定是对称的，因为即使是国家，其内心也遥不可及。朝鲜比德国或者巴西小，但是并不因此就更容易理解，国家无论大小，难题都在于如何充实领导者的时间。如果一个国家对另一国行为的主要关注点都集中在它们对本国利益的影响，双方受关系的非对称影响就会产生两种迥异的关注模式。A 国的国内关注可能占据其政治现实的大部分，它也会较多关注其他对等或者更重要的国际关系而不是与 B 国的关系。即使 B 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其他国家，也仅仅意味着世界对 A 国来说不如对 B 国更重要。这些观点上的差异导致认知的差异。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形容这种情况，“就类似于盲人摸象，人们只希望抓住对其各自目标最有用的部分”[8]。

A 国对 B 国

鉴于 A 国的实力优势，它可能也具有 B 国望尘莫及的信息优势。在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致力于推翻尼加拉瓜的桑地诺（Sandinista）政府期间，一位美国情报分析员就宣称“我们可以听到来自马那瓜（Managua）的马桶冲水声”[9]。不仅是美国政府对尼加拉瓜的了解远超过尼加拉瓜政府对美国的了解，甚至有可能美国政府掌握的尼加拉瓜相关资料比尼加拉瓜政府对本国的了解都多。美国对尼加拉瓜的关注并非因为尼加拉瓜本身对美国利益的影响，而是因为它被假定为与古巴和苏联的威胁有关系。这种被夸大的外部联系，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所掌握情报对这种假定的支撑，导致中情局拉美问题高级专家以辞职表示抗议。[10]

上述例子证明来自 A 国“关注政治学”的一个极端情况。如果关注是基于潜在的影响，那么 A 国更为关注 B 国就是一种反常，无论在字面还是象征意义上，都会是一场危机。如果 B 国看起来对 A 国如此重要，它

一定是被联系上其他更为重要的外部大国，或者是牵扯到 B 国必将影响 A 国的重要国内价值观的某些事件。尼加拉瓜本身不足以引起美国的关注，然而它作为共产主义威胁的前锋就颇有意思了。不幸的是，这种建立在外部联系前提下的关注本质上是扭曲的，因为它强调外部联系而贬低 B 国现实的其他方面。正如理查德·伊默曼（Richard Immerman）对 1954 年中情局干涉危地马拉的评价：“两国冲突的根本不过是：无论美国政府还是民众都不了解危地马拉人。”[11] 如果对 B 国的关注是源于 A 国国内价值观的某些积极或者消极反应，比如，因自然灾害而产生的同情，或者是因 A 国民众的误解而产生的反感，这种关注就可能是狭隘而短视的。可以说，危机时 A 国对 B 国的关注犹如是黑暗中照亮了目标的探照灯。有些方面被点亮了，而另一些方面还在漆黑一片中，A 国探照灯的定位决定了哪些地方会被点亮，因为它指引着光束的方向。

朱利奥·加拉罗蒂（Giulio Gallarotti）也谈及了 A 国对自身的这种错误认知，及其在非对称关系中的权力。[12] 他认为，权力优势会引诱国家踌躇满志地使用权力而对其实际局限性置若罔闻。它们往往忽视自身行动的间接后果。它们的行为面临有限脆弱性的道德风险，会导致它们产生“大到不能倒”的假象。它们进行单边行动，不屑与小国合作，过度使用资源。于是，主导国往往是根据权力的假象而非其实际局限性来采取行动。“权力诅咒”，犹如盛产石油国家的“能源诅咒”一样，产生了功能失调效应并且可能在危机中造成出乎意料的损失。权力假象在霸权国身上表现最极端，在双边关系中也有所呈现。大卫和歌利亚的相遇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与“危机失真”（crisis distortion）相反，A 国对 B 国的关注政治学的另一个极端情况可以称为“不关注的政治学”（politics of inattention）。由于 A 国的政府、媒体和大多数民众都需要关心与其相关的更重要的事情，它们对 B 国的常规关注是有限的、断点式的。如果 B 国是邻国，有可能 A 国与其接壤的地区有一些相对重要的利益，因此也会对 A 国的政策有较大的影响。然而无论如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A 国内有些集团的关键利益会涉及 A 国对 B 国的态度，它们未必与 B 国有直接联系，但是它们的某些利益取决于 A 国与 B 国的关系，比如，工业保护主义或者提高

军事预算。[13]政府部门之间可能利益不同。例如，外交部可能希望促进与邻国的关系，与此同时陆军和海军却强调潜在的威胁。政党或者个别政治家之间可能在特定利益上实现联合。这些集团、政府和民众各不相同，他们可能只对A国与B国关系的某些方面感兴趣，而他们彼此之间又有利益冲突，因此也就对A国的态度产生了相互矛盾的影响。

在总体上不关心而特定利益上存在矛盾的通常情况下，A国对B国的关注和政策可能表现出两点特征。第一，由于对B国的实际行动相对不敏感，A国的总体态度可能随着两国关系的大环境而呈现模式化。如果B国被认定为"友好"，A国的态度就是慷慨和在大多数时候是宽容的，宽容当然比对每个行动都作出反应要容易一些。一般来说，A国会强调两国关系的机遇，因为对它来说几乎没有大的风险。如果B国被认定为"不友好"，A国可能会对B国造成危害，它还会指责B国对其邪恶领导层无所作为，形容B国"人民善良，领导邪恶"对A国来说特别实用。上述关系态度不容易改变，因为它们能帮A国把相对不重要的关系模式化为熟悉的类型。

第二，与日常态度相反，A国对B国的政策可能与特定信号彼此矛盾地共同出现。A国因为与B国相关特定利益密不可分，它会关注B国的某些方面，并且这会影响A国对B国的某些具体政策。但是，A国又不可能保持对B国的连续和完整立场，因为这需要A国的最高层领导坚持高效的协调工作。A国的最高层领导事实上并不屑于反复斟酌与B国的关系，或者调试其实际政策以保持一致的立场。如赫希曼所说，这会给B国带来机会："负责（A国）日常政策的较低层外交官深受国内的影响，这些政策通常短视而且合理地可预测……他们并非B国这种坚定敌人的对手。"[14]于是在B国看来，日常关系中的A国可能就是一种友好或者敌对关系的一般伞形模式，但是在这个伞下面又存在着一些各不相同，甚至自相矛盾的行为体、动机以及政策。

在危机情况与日常情况两个极端中间存在一些偶然情况，B国的有些行为或者特定议题需要A国作出最高层反应。A国的反应可能不仅仅是出于维护利益的需要，也是因为希望尽快了结问题。此类小型危机（mini-crises）在AB两国之间造成一种有趣的非对称讨价还价形势。一

方面,B 国掌握主动,其最高层领导的关注度相对而言不太“昂贵”。另外,它也可能给 A 国想要的表面“了结”,却事实上继续为本国利益而斗争。另一方面,A 国可能拿出庞大实力对 B 国施压,以与冲突本身的内在价值并不相称的方式催生一个有利的结果。这是一种施压逻辑,A 国以其实力优势迫使 B 国退回底线,不仅使问题的解决有利于 A 国,而且确保 A 国能抽身去关注更重要的事务。

施压可以通过“胡萝卜”和“大棒”一起完成,并且是以对 B 国有利的名义实现。发展项目中常见的挫折和失败往往被归因于执行的难题,或者是被援助对象的固执本性。但是在我看来,深层的难题其实是 B 国试图平衡 A 国的资源以解决问题的努力并没有简单增加 B 国的实力,反而调整了 B 国行为体的机遇范围,使其适应了外部的财富资源。如果捐赠者不屑于理解被援助对象的本土利益,又对自身动机的纯洁性绝对自恋的话,“趋金性”(aurotropism)(犹如植物的趋光性,只不过不是趋向太阳而是趋向金钱而生)难题就格外突出。1991 年以来柬埔寨援助项目的多重失败就证明了“胡萝卜”可能是与“大棒”同样生硬的工具。[15]

B 国对 A 国

从 B 国的视角来看双方的关系就截然不同了。A 国吸引其关注度不仅因为它对 B 国的影响覆盖面大,而且因为 A 国对 B 国总体立场的模式化氛围与其在某些特定政策上的矛盾做法形成的鲜明对比让 B 国陷入了困惑。如果 A 国表现出友好氛围而又采取损害 B 国利益的政策,甚至偶尔还欺侮 B 国,是不是就说明 A 国是伪善的?还是说 A 国实际上协调性差?抑或是他们暴露了隐藏在友好面具后面的一种深层次的恶毒战略?屈服于 A 国的欺侮是否会成为危险的先例?反抗对双方关系造成的损失会不会高于当前问题的价值?A 国国内政治的进程将如何影响其与 B 国的关系?从更积极的一面来看,B 国能从 A 国表现出的不关注和缺乏协调性中获得多少机遇?B 国能借助他们在 A 国的“朋友”影响 A 国的政策吗?

即使 B 国拥有的“A 国问题专家”可能不如 A 国拥有的“B 国问题专家”多,A 国的事务也是 B 国日常关心的问题。事实上,B 国的高层领导

人都是“A 国问题专家”。然而,A 国难题并不是仅靠知识多就能解决的。管控与 A 国的关系犹如驾驭一匹难以驯服的烈马,需要的是持续的关注,以及如何在马鞍上而非理论上掌控它的知识。A 国的实力优势带来了真实的风险和机遇。如果 B 国从 A 国复杂的行为模式中推断最佳和最差情况的出现,前景当然是未知的。

尽管 B 国会在恰当的时机强调其与 A 国的友谊,它却无力决定双方关系的总体模式或气候。可挑战的政治气候对 B 国来说更重要。如果是晴天,B 国会警惕乌云。如果是多云,B 国担忧的则是暴风雨。除非 B 国完全把命运交由 A 国,否则它会始终保持对 A 国的警觉。结果 B 国就会对预测到的威胁和机遇都作出更快的反应。

B 国国内的政府、国内政治、媒体以及公民社会将形成与 A 国特定利益或者预先承诺相关的不同利益集团,但是又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它们都在国家范围内运行。于是,它们不会像 A 国的相应集团一样能够在总体环境缺乏关注度的情况下安静地诉求特定利益,它们必须极力争取塑造一种更加协调的国家立场,以及一个更多参与管控双方关系的最高领导层。因此,只要国内政治系统许可,B 国有关对 A 国政策的政治争论就会比 A 国国内有关对 B 国政策的讨论要活跃。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就注意到,美加关系中的议题在加拿大更容易被政治化,加拿大的政治敏感度是随着其独立水平的增长而增长的。[16] 即使 B 国的政治系统不允许争论,其领导层内部和社会内部关于 A 国的派系分裂也可能更为严峻。

自主权、顺从和尊重

上述非对称关注的政治学与其说是非对称的一种异常情况,不如说是此类关系中相对利益分歧的系统效应。非对称关注的确会产生一些特殊异常情况,这在下一章会谈及,然而即使是正常的非对称关系也必须持续应对关注度差异和实力悬殊造成的影响。能够区分正常非对称关系与异常非对称关系的标志是,在正常关系中,各方都假定收益大于成本和风

险。基于这个共同的假定,双方都承诺尽最大努力和平处理彼此的不和与危机,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就让位于持续收益的可能性。但是在非对称关系中,各方是出于不同的考虑而认可这一共同假定的。

B 国的自主权

对 B 国而言,正常关系并不意味着有一方能不承担风险或者没有难题,因为 B 国受双方关系的影响更大。“正常”也不是类似友好的模式化氛围,而是一种可操作的假设,认为持续不断的麻烦可以通过和平谈判来管控。如果 B 国确信双方的不一致是可协商解决的,本国利益和身份的关键边界必须得到 A 国的尊重,B 国就预期对双方关系的正常管理会是有益的。而且,非对称关系也符合 B 国的利益,B 国没有更好的替代选择。当然,B 国必须确信 A 国会尊重其自主权。如果 B 国不能预期 A 国会避免单边施压和尊重 B 国的关键利益,B 国就会通过制约双方关系并与其他关系之间维持平衡,从而更审慎地限制本国受到的影响。当然,A 国承认 B 国自主权的可信度并不仅仅取决于口头承诺。只有当 A 国在最近的一次敌对中试图但却没能成功对 B 国施压,抑或是两国有很长的和平往来的历史,双方的共识才能支持其外交承诺。

对 A 国的顺从

对 A 国而言,承认 B 国的自主权和对谈判关系的最终承诺是有不同前提的。A 国并不受 B 国实力的致命威胁,但却可能受到 B 国野心的威胁。A 国就必须确信 B 国不会利用自主权索取超出其应得的条件,或者像在对称关系中那样与 A 国竞争。顺从不等于投降,而是 B 国关于在现有非对称实力范围内谈判双方关系的预先承诺。如果不能确信 B 国会顺从,A 国对谈判关系作出预先承诺就是愚蠢的。确信 B 国顺从对 A 国来说同样重要,因为如此一来 A 国就可以转而关注其他更重要的事务。有秩序的关系符合 A 国的利益,既是由于它融合了 AB 两国的利益,也是因为它使 A 国外部关系的某一方面得以稳定。有了 B 国的顺从,A 国才能对其不加关注。

彼此尊重

B国要求自主权和A国要求顺从的基础是两国对彼此尊重的预期。为使非对称关系得以正常化，也就是说以双方关系结构保持不变的方式加以管控，双方都必须尊重对方的立场。否则，双方关系对B国来说就不能容忍，对A国来说也不合理。因为不得不在确保本国利益与对方相反的情况下维持两国关系，出现上述任何一种情况都会导致动态的失衡。

当然，自主权与顺从之间的联系是微妙的。一方面，两者之间有内在矛盾。绝对的自主权排斥顺从，绝对的顺从也排斥自主权。关系的正常化要求双方的承诺，也需要持续地管控两国之间实际的边界。另一方面，任何承诺都不能强迫产生。如果A国试图强迫B国顺从，B国就会关注其自主权。如果B国单边要求自主权，A国就会关注自己的利益。所以关系的正常化不容易实现。

对非对称互动的估算

一方面利益有定位，另一方面相对实力塑造非对称关系，这两个同时存在的事实决定了非对称互动的范围之广。

如图1.2所示，非对称互动的范围横向上是由利益的重合或者分歧决定的，纵向上是由关系中分歧的水平决定的。在四条边上，非对称谈判既无必要，又不可能。首先在水平轴上，在和谐关系的极端点上，双方的利益如此团结以至于分歧不会产生影响。典型案例出现在两国都面临足以让其忽略分歧的共同威胁时，例如，美苏共同对抗希特勒的同盟，抑或是出现在双方关系的收益明显大于其利益分歧时，例如，美英的特殊关系。在分歧关系的极端点上，任何一方都无法想象有一种妥协会比坚持自己的利益更有吸引力。典型的案例就是那种“你活/我死”的关系，其中至少一方的身份会受到威胁。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双方根本无法进行有信用的沟通的关系。美国与伊朗之间就表现出这样的显著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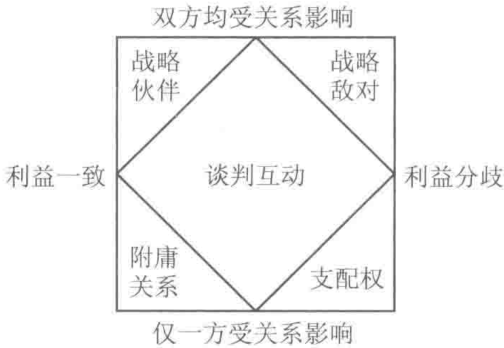


图 1.2　非对称互动的范围

图中垂直轴代表的是关系中的非对称程度。如果双方受关系的影响程度一样，可以假定它们的互动是具有交互性的交易关系，而不是非对称关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两个实力相称国家之间的关系，然而它们的关系也同样具有其他的可能性。比如，两国可能实力不同，但是双方都控制着对方的一种关键资源。再比如，两国可能相距甚远或者对彼此来说无足轻重，任何一方都有能力切断与对方的联系。如果关系中仅有一方受影响，图中最下方那条边就是极端非对称的情况。不仅 B 国不能对 A 国还以颜色，A 国用来制服 B 国的资源也微不足道。如果出现这种极端，B 国几乎没有谈判余地。相反，对 A 国来说，关系中的任何成本都无足轻重，A 国也不介意对 B 国慷慨。于是，A 国也不需要谈判。

边与边相交的区域

如图 1.2 中的四个角所示，那是一些边与边相交的区域，是一些特殊的模式化情境。双方受关系的影响均等且利益一致，往往会成为战略伙伴，双方受关系的影响均等而利益分歧，则会导致战略敌对。[17]仅一方受影响且双方利益一致的情境属于附庸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仅一方受影响却双方利益分歧的情境则会赋予另一方支配权。图中这四个角上的情境之所以产生模式化结果，是因为每种互动的实力都会作用于结果的产生。

值得注意的是，有定位的利益和非对称在图中的四个角和四条边上

仍然重要。极端情况并不是否定两条轴线的存在，它们仅仅用于限制结果，以规定所有可能性的范围。另外，即使某一具体的国际关系可能大体位于图中的某一个角上，它也可能在特定的议题或者危机中并不适用于该模式。

谈判与收益

位于图 1.2 中心位置的钻石型是非对称互动塑造两国关系的区域，这里面积最大，水平方向代表利益一致和分歧的某种组合，垂直方向代表 B 国不能挑战 A 国，同时 A 国也不能统治 B 国。此处只存在偏好的分歧而非矛盾，任何一方都不能如愿强加自己的意志给对方。因此，双方的共同利益其实是找到两者都能接受的方案。于是，无论是以达成协议之前的正式沟通的形式，还是作为各方安排的努力争取可接受的共处方式的系列活动，谈判都有了必要性。

对非对称谈判的估算完全不同于在对称前提下的互动。典型的非对称关系中几乎没有 A 国被 B 国挑战，或者 B 国被 A 国统治的可能性。因此，完全没必要在现实中偏好相对收益（比对方获益更多）而非绝对收益（只要有收益，并不管对方获益多少），双方的交易并不会影响实力平衡的全局。绝对收益和彼此互惠可以成为目标。彼此互惠、双赢，以及关系的稳定对双方来说都有吸引力。

A 国和 B 国的立场

虽然互惠在原则上是可取的，但是双方受关系影响的程度差异还是会导致谈判立场的特殊分歧。如上文所述，前景理论已经宣称“风险规避”较之“收益最大化”更符合行为体的现实考虑。也就是说，正是由于 B 国受双方关系的影响更大，它才倾向于对任何涉及可能的负面后果的交易更加谨慎。另一方面，如果负面后果不是影响因素，B 国则会更多倾向于偏好和诉求关系中的绝对收益。于是，只有在能够降低表面风险的情况下，A 国在某一共同项目中与 B 国互动的意图才是最高效的。

AB 两国在互动中都有特殊的地位优势。A 国的明显优势是更强的实力。这种实力优势不仅决定它能把什么带到某项交易中，而且增加了

它把当前交易与其他行为相关联的可选项。因为双方的交易对B国来说相对更加重要,B国的优势就来自其更高的关注度。它可能比A国更容易协商或者更加执着。A国可能希望尽快了事,B国则对有利可图的转变更感兴趣。[18]

既然AB两国各自的态度都受到非对称的影响,我们可以预期A国因其实力优势会容易自负,禁不住使用实力强迫B国接受协议。由于B国更灵活,它可能诉求边缘政策,试图逼近但是并不超越A国能够接受的成交点。抑或是B国可能阴险狡诈、口是心非,也可能试图用拖延策略,在协议的实施中偷工减料,以及扮演受害者,借此将当前交易的不公之处与A国的其他暴行联系起来。扮演受害者对B国来说其实是徒劳的。很多例子表明,A国可能过度使用原始权力,对抗行为很难实现妥协,B国的激烈反抗也很常见。在施压与抗争的竞赛中,尽管双方彼此排斥,却很难断定哪一方能占优。

各方的"天然"偏好(A国就是"非常A",B国就是"非常B")削弱了两国关系中的潜在互惠性。既然成功的谈判需要来自对方的认可,A国更宜降低B国的疑虑而不是对其施以恫吓,B国更宜塑造自己作为可信赖和有价值的伙伴的声誉,而不是以哀怨和不可靠的形象示人。

缓冲关系

B国可能通过加强与他国的联系,以及依靠多边场合中的彼此束缚来努力缓冲本国在双边关系中受到的A国的影响。由于可以与他国联合,B国就减弱了自己对可能受AB两国双边关系发生突变影响的敏感度。多边组织提供了对国家自主权的舒适承认以及特定领域的互动规则,前者以联合国为典型例证,后者则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这些缓冲途径并不意味着B国有抗衡或者匹及A国实力优势的企图。相反,却可以缓解B国独自面对与A国的双边差距,甚至是在互动的各个方面都可能产生的担忧(和现实)。缓冲对A国来说也有益处,它确保了双方关系的有序,减少了危机的发生。然而,缓冲是一种多边选择,本书第三章拟将其作为多边战略选项之一进行讨论。

非对称与统治关系

哪一类国际关系属于非对称关系？即使A国是大国，B国理论上不能挑战A国，非对称关系也不是大国关系。根据肯尼思·华尔兹对（国内）等级制与（国际）无政府体系的宏观分类，非对称关系应当属于无政府状态一类，因为并不存在一个全面的合法权威强迫各国服从。[19]但是，康灿雄也指出："华尔兹把研究对象限制在大国，排除了国际体系中存在的无数多样性，以便自圆其说。"[20]康灿雄则提出不同观点，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东亚体系是一种等级制，并不会产生华尔兹以及其他新现实主义者预测的两极对抗（counterbalancing）。[21]康灿雄由此断定新现实主义关于等级制的假定是有文化局限性的，前现代时期的亚洲曾经有过彼此认可的等级制模式，并且可能再现这种模式。

我认为康灿雄的观点在理论和经验上是可信的，但是并不赞成用"等级制"概括所有的非对称关系，该术语具有模糊性。等级制文化是否就承认了统治权或者正常化的非对称关系？诚然，实力的重大差距意味着权力的重大差距，非对称关系具有可再生性则是因为事实上相对权力并不能简单转化为持续的统治权。B国对A国的实力优势表示顺从的前提是，A国承认了B国的谈判权利，以及B国的关键边界。

关于顺从的误区

如果假定B国的顺从就是简单地对A国的权力优势唯命是从，会产生三重谬误。第一，把A国实力优势的作用简化为A国制裁B国的能力。然而，非对称的影响是从A国存在就产生了，并不是随着A国采取行动而来的。B国受A国影响是因其市场优势、生产率优势、旅游者等，而不仅仅是因为A国实施制裁的可能性。同样，A国对双方的关系相对不敏感是由于B国总体上偏小，而不仅仅是因为"B国的威胁"量。比如，即使是两者都没有武器，并且都在自由的教派统治下，美国与加拿大或者

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也是非对称关系。第二，如果我们用权力的一般概念界定A国要求B国按照自己的偏好采取行动的能力，权力关系就是排他的。[22]B国不能同时效忠两个主人。[23]然而，本书第二部分关于非对称体系的研究表明，非对称关系的复杂结构的确存在。事实上，当B国用三方关系缓冲双边关系时，AB两国之间的原始互动会结束，因为B国的风险由此降低了。第三，如果顺从仅仅意味着屈服于冲突的预料结果，B国会在所有事务中屈服，顺从就成了无条件投降。然而我们已经论证，顺从的前提是A国承认B国的自主权，基础是一种谈判关系。如果A国试图统治B国，换言之，使B国屈服于A国的单边偏好，B国就会选择投降抑或是反抗。康灿雄和其他学者[24]都已经说明，把小国逼到墙角既不是典型的非对称情境，也不是东亚国际政治的传统模式。

亚洲之外的非对称

非对称理论不是一种文化观点而是结构观点，这与康灿雄的观点也不同。诚然，东亚或许是当今世界上持续最久的正常化非对称关系最恢宏的案例。但是，其他地区并不是没有相同原理的互动。

即使是在马基雅维利现实主义的发源地——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佛罗伦萨与其两个弱小的城邦国家锡耶纳（相当于佛罗伦萨的一半）和卢卡（相当于佛罗伦萨的四分之一）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非对称谈判和协商，而不是简单地由佛罗伦萨实施统治。[25]佛罗伦萨人直到1559年才征服锡耶纳，并且从未征服卢卡，尽管他们在1325年和那之后的一个世纪也有过尝试。[26]这两个城邦小国在与佛罗伦萨的关系中是顺从的，却并非简单的附庸者。[27]马基雅维利是从强国的痛苦经历中作出判断的："如果一个人成为业已习惯自由的城市的主人，而且不去破坏自由，他就有可能被自由摧毁，因为在反抗中总是存在字面上的自由及其古老的特权作为号召力，无论时间还是福利都不允许它被遗忘。"[28]

非对称关系是一种有序的关系。AB两国的位置不能互换，两国的观点是由其相对地位决定的。这既不是一种暂时失衡的对称关系，又不是由大国一方强加的非对称结构中的关系。尽管是非对称的，关系双方都可以寻求互惠。一方面，互惠至少能够确保双方在现有参数范围内追求

最优的可实现关系，当然双方都是基于自己的利益充分解读“最优的可实现”的含义的。另一方面，互惠甚至能够获取那些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得到的商品。既然双方都能接受非对称结构的关系，并且努力在各自的参数范围内寻求利益的最大化和互惠，这就是一种正常化的非对称关系。

国际主动权

尽管B国可能更为积极，也更愿意协调其对A国的政策，但是关系中有效的主动权往往是在A国一边。

除了权力，A国比B国更可能拥有领导权的两个结构性优势是：关注度和惯性。因为受关系的影响更大，B国往往对A国的偏好更为警惕，也比A国更愿意调整自己的反应。B国有可能获得超越常规的关注度但却难以保持它，甚至更难维持本国已经被承认的利益。托马斯·马萨里克(Tomas Massaryk)和爱德华·贝奈斯(Edward Benes)两人的例子就是可以证明该规律的一个例外。他们孜孜不倦的国际工作和个人威望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立国至关重要，然而贝奈斯却无力阻止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或者是1947年捷克斯洛伐克在苏联控制下的统一。

A国的庞大也意味着它具有更大的惯性，并且塑造了其潜在的领导权。[29]如果B国试图调动A国，即使是在双方有共同兴趣的事务比如全球变暖问题上，它需要采取很多行动，却没有多少来自A国的关注可以利用。相反，一旦A国采取行动，它就是关系中的强者一方。B国有权选择不追随，但是A国在某一特定国际议题上的路线会改变B国制定决策的环境，并且导致B国在该议题上出现政治分裂：一派是“支持A国”，另一派是“反对A国”。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全球反响可以说是惯性效应的最新典型案例。

权力与劝说

双边关系中的领导权有两种基本模式：权力与劝说。使用或者承诺

使用制裁、奖励，抑或是单边支付(side payments)以确保B国服从的所有手段都运用了A国的实力优势。运用权力对A国来说很便利，因为它可以确定国内的偏好，进而强取或者收买国际服从。然而，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有效性还是会受制于B国的自身偏好与A国的预期服从之间的差距，权力能产生疏远对方的后续影响(aftereffect of alienation)。基于权力的领导权还有最重要的弊端就是扩大或者承认了A国的非对称领导地位所赖以存在的实力差距。权力的使用事实上耗尽了实力，即使权力是被用于征服以扩张实力的，它与此同时也是在消耗更多的实力。在这方面，恐怕无人能及拿破仑帝国的辉煌与短暂。正是其无休止的野心导致那些原本顺从的邻国走向了反抗。[30]

劝说模式，即无需有条件的制裁或奖励而获得了对方的服从。如果是最充分的表现形式，劝说行为几乎没有必要，因为AB两国之间观点主张和实际利益都是和谐的。两国诉求相同，A成为天然的领导者。但是，爱德华·卡尔很久以前就提出，“利益和谐”往往是强国用来拉拢弱国的口号。[31]尽管卡尔的观点有些愤世嫉俗，B国对自身利益是会得到加强还是受到损害的估算，的确是决定它对A国的倡议表现出热情、观望还是反对立场的核心问题。正如德克·内伯斯(Dirk Nabers)所言：“领导权与追随者的诉求和需要密不可分。”[32]如果A国正在领导一场真正的民众活动，它在将来发起倡议的声望和权威性就会得到提升。如果B国在当前的议题中不够支持A国，只要B国的服从有助于维持双方的关系，A国还是会对其实施劝说。以维持关系为目的的服从说明B国还是将双方关系视为正常和有益的。如果B国断定双方的关系仅仅有利于A国，并且也不对B国造成威胁，它就可能选择规避。一旦B国断定双方关系对自身构成威胁，B国选择服从就是权力作用的结果，即使它并不清楚从中能获得什么补偿。

软实力

劝说模式的关键之处在于无论是出于共同利益，抑或是维持一种有益关系的需要，AB两国之间的偏好要保持互动。劝说式领导权要求A国审慎地重视本国与B国之间的共同基础，并且这种重视既要体现在当

前的事务中，也要在总体上得到 B 国的信任。为此，A 国必须通过协商抑或是单边调试的方式兼顾 B 国的偏好。

具备劝说式国际领导权的潜力当然是一国的重要资产。约瑟夫·奈在研究劝说实力和提出著名的“软实力”概念方面功不可没。[33]“软实力”是指一国无需使用奖惩就能够影响他国行为的实力。“软实力”通常是被视为多边而非双边实力，因此本书将在讨论非对称的地区和世界模式的章节详细论述。但是，双边背景下的“软实力”也非常值得强调，因为劝说意味着他国的自愿服从，“软实力”实质上是具有互动性的。有人可能会说，“软实力”主要是对旁观者起作用，而不仅仅是强国的财富。

非对称关系的变化与深层结构

维持或者改变任何非对称关系的直接理由都可以概括为成本-收益的核算，每个国家对其利益的认知以及对变化的预期又都取决于更深层的结构。非对称关系的深层结构包含四个要素：实力、身份、外交和环境。任何一个要素都可能发生相对变化，进而影响对关系的估算。这些要素彼此之间会发生互动，也会在关系模式上互动。

实力

相对实力是非对称关系中最基础的要素。诚然，非对称是根据相对实力界定的，本书中对 AB 两国的观点差异分析则是基于非对称实力造成的它们受双方关系的影响程度的不同。实力差距未必是既定不变的。即使不是发生在大国及其挑战者之间，实力变化还是会影响关系中的地位。以次国家的非对称为例，比利时的弗兰德和瓦龙地区在现代历史上就经历过数次相对实力地位的反转，第一次是由于弗兰德纺织业的兴起，随后就是工业革命和瓦龙的煤钢能源被发现，继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工业的衰落和弗兰德商业的复兴。每一个阶段，这两个地区之间的紧张关系都反映了当前的非对称模式以及往日辉煌和冲突的痕迹。

全面相对实力的重要性自不必说，某种关键资源的开发，抑或是稀缺方找到了某种可依赖的重要外部资源，都能够塑造那些相距更远或者说范围更窄的非对称关系。目前最明显的此类案例是食物和能源，再就是历史上资源变迁带来的影响。例如，汉代中华帝国随着气候变暖而向北方的扩张并非偶然，而是由于定居的农业地区扩大，继而气候变冷后又失去土地，并被游牧民族征服。[34]

与国际关系最直接相关的实力变化就是军事实力的变化。中越关系中两个最著名的案例是弓弩的发明和现代欧洲海军的入侵。弓弩是北方越南人在占领红河，建立奥拉（Au Lac）王国时使用的。它让越南人刻骨铭心到将那个奉为神物的发射器（也即弓弩的关键部件）当成了民族神话的一部分。[35]欧洲海军的到来则导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从而导致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变得不值一提。

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扩散又给非对称关系提出了格外复杂同时也充满吸引力的难题。一方面，如那位鼎鼎大名的英国将军鲁珀特·史密斯（Rupert Smith）所言，核武器淘汰了“工业战争”，也就是大国之间基于工业实力的对抗。[36]他认为，战争作为“大多数非战斗人员都清楚的、人和机器之间的战斗，抑或是在国际事务中有关争端的大众决策结果”将不复存在。[37]另一方面，无核国家依然脆弱，不仅受到核武器的赤裸威胁，而且对发达国家绝对占优的常规武力束手无策。核扩散因此成为一个强大诱惑，它能让一些国家迅速摆脱常规武力的长期劣势，一步跨入后工业化的核平衡“安全区”。然而，追求核扩散就意味着拒绝对某一反对国的顺从，同时也拒绝了对整个核集团的顺从。现有核大国的集体意图当然是否定那个试图觊觎的无核国家的自主权。

身份

毋庸讳言，国家身份是一个复杂的要素，相对国家身份（relative national identity）的概念也无益于将其化繁为简。身份是国家根据其行为形成的自我认知。国家身份可以分解为领土、人民和意识形态。领土是国家的实体存在，人民是其政治共同体，意识形态则是国家身份能被接受的意义体系。任何被视为对这些方面构成致命威胁的问题都是不可协

商的。

当然,一个国家民族主体的边缘是根据他国的存在及其实力的局限性而确定的,也就是说身份是在互动中彼此确认产生的。即使是民族主义也并非单纯的自我表达,而是要以他国作为参考。南美洲民族主义与美国民族主义的区别就完全不同于阿根廷与巴西之间的南美民族主义差异。

领土、人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自然会影响非对称关系的特征。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都巩固了它们的实力,同时也改变了它们相对于邻国的国家身份。尽管印度并未支持西藏独立,中国 1957 年之后解放西藏还是加剧了印度对其边界的担忧*。假如西藏仍然是一个半自治的缓冲地区,那些边界对印度来说重要性就会降低。最具戏剧性的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变迁往往会颠覆现有的关系。在西班牙人到来前的半个世纪,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是美洲最大的帝国,信奉无尽扩张的新宗教。[38] 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和 1919 年共产国际的出现则形成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的全球意识形态身份对抗。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身份很重要,身份的变迁未必改变现有的非对称模式。欧洲后共产主义国家与中国和越南的关系就是即使在身份变化的情况下也保持着连续性最著名的当代案例。另外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平稳过渡到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例子。然而,这些其实都是能够证明该规律的例外情况。确定无疑的和平延续还是要取决于对各个方面的外交管理。

外交

在非对称的深层结构中,两国政府的互动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要素。有些人不得不作决定以维持或者改变现有的关系。有技巧的外交能够创造或者发掘机会,相反,不称职的外交也能制造或者加剧危机。20 世纪 70 年代中越关系的危机就是因两国领导人的个性冲突而恶化的,邓小平不够宽容,黎笋(Le Duan)又不肯顺从。诺罗敦·西哈努克王子在调解 1987—1991 年的柬埔寨僵局中发挥的作用则是有效领导权的一个乐观

---

* 西藏是 1951 年和平解放的。——译者注

例子。1987 年西哈努克从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临时辞职为双方的对话创造了可能。

尽管外交行为是非对称关系中大多数变化的最可能原因,领导人并非在真空中采取行动的。西哈努克辞职其实是个人主动权的一个极端案例,他不受政治结构或者国内宪法的约束,其行为对相关方来说完全是个意外。况且,他的做法还需要两个并不受其掌控的前提条件。一是 1985 年越南宣布将于 1990 年之前单方面撤出柬埔寨,这就为谈判提供了可能。二是西哈努克的中国朋友尊重了他的自主权,即使他的倡议与中国的反越政策直接对立但也并未推翻其决定。或许西哈努克会在中国威胁收回对他的支持及其在北京的居所时选择坚持,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会表现出从反越立场向支持越南立场的转变,而不会扮演中间人的角色。西哈努克的决定并非这两个前提条件的必然结果,不过,缺少了这两个条件也不可能有他的决定。

大多数国家领导人面临一种基本的两难:是维护其国内权力基础?还是追求外交政策中的战略理性?两者其实并非绝对矛盾,战略正确的外交政策获得的成功能够增强其国内支持率。然而,国家认知的地缘性导致的结果是,政治共同体们往往更迫切地关心一己私利而非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加之谈判往往是所得低于所需,这就造成预期的一己私利与谈判成果之间总是存在明显的差距。与此同时,政治家又会利用内政与外交之间的空隙,为激发国内的团结而挑起或者夸大外交危险。他们会宣称是外国导致了本国外交的失败,甚至带来了国内的困难。任何政府,即使是独裁政府,也都在玩罗伯特·帕特南所谓的内政与外交关切的“双层游戏”。[39] 于是,国内民众最终将面对不想要的外交政策结果,进而随着挫败的增加而迫使改变原来的政策。民主国家从“小战争”的僵局中抽身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40]

环境

环境作为非对称关系深层结构中的最后一个要素,可以简单理解为是该双边关系中两国所处的同一国际环境。但是,如果集中观察特定时期两个行为体所处的环境,如图 1.3 所示,问题就复杂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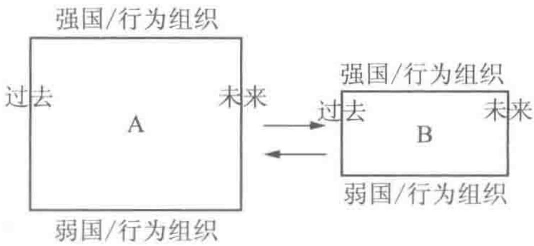


图 1.3　双边非对称的背景

本书第二部分将论及非对称的多边维度。当然，即使是多边互动，外部环境也影响着双边的决策制定，这也是我们的兴趣所在。

关于环境还有另外一个迥异的观点，主要是强调即使是同一环境也可能对 AB 两国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在美国与伊朗的关系中，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全无必要担忧更强的国家或者更大的行为组织。相反，如果把美国换成德国，它就不得不瞻前顾后了。比伊朗强的国家不仅有美国，还包括欧盟、俄罗斯和中国。这些国家在其各自的双边关系中都比伊朗有更多筹码。图 1.3 中的“弱国/行为组织”是指所处双边关系以及多边环境中的相关行为体是一个更弱或者是平等的国家。对美国而言，所有他国都属于这一类。美国仍然不得不关注弱国对其行为的反馈，但是可以运用筹码在其他议题上施压以增强本国的说服力。伊朗与邻国之间就没有足够遥远的距离和足够大的实力差距。这种外部环境的差别加剧了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双边悬殊，导致美国缺乏耐心等待结果，而伊朗又过于关注本国可能因让步而遭到的致命削弱。

我们需要给每个行为体加上“过去”和“未来”的定语修饰，即使这并不一定与每一次具体行动有关系。因其与身份和外交相互作用，我们把这类问题归结为行为体的“内在局限”(inside box)。任何行为体都会根据不同的“过去”，以及对相同“过去”的不同记忆，作出当前的决策。比如，当美国和伊朗想到它们过去的关系时，美国想到的是伊朗的敌意，而伊朗回忆起了美国对其国王的压迫。对“未来”的预期同样会表现出差距，既包括对某一具体行为的预计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也包括对未来的总体预期都会成为关键环境的一部分。

图 1.4 概括了所有情况下全部非对称关系深层结构的四个要素。我

并不认为根据这些要素就能推断某一特定非对称关系，而是说能够更好地理解它。同理，鉴于领导权和环境都容易变化，尽管某一特定模式的稳定性并不可知，但是其紧张关系、优势和弱点都可能被准确发现。这就为判断双边非对称关系提供了方案。

这些深层结构要素对双边非对称关系而言是普遍和全面的，它们是非对称关系一般逻辑的补充。这些要素可以被视为从解释模式的差异和变化的角度对"有定位的关系"概念的详尽阐述。因此，在所有双边关系中都应该说明这四个要素，我们希望对特定关系中这四个要素的具体分析有助于理解关系的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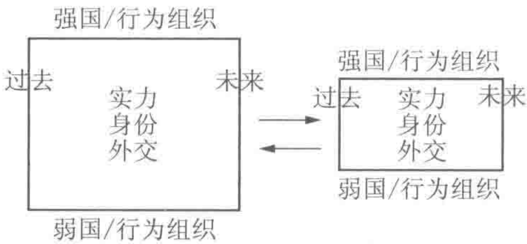


图 1.4　双边非对称的深层结构

本章分析了作为正常双边关系的非对称关系。即使很多此类关系并非理想化的，我们还是将其视为一种理想类型。非对称关系正常化的基本要求并非双方相爱或者相互理解，而是双方都确信和平管理关系意味着可谈判。当发生危机时，也可能使用施压手段和造成伤害，但是还有希望控制分歧和维持关系。确保这种希望的常见原因是出于对关系的共识，即过去总是能化解危机。如果 AB 两国的认知差异引发相互误解的恶性循环，进而打破了对未来关系正常化的预期，非对称关系就会发生病变，这也是本书第二章讨论的主题。

注　释

1. 尽管我们即将探讨的是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互动，本书一开始还是要说明，非对称关系的逻辑适用于任何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和实力差距会影响其关系结构的情况，而且双方的地位并非随时可以互换的。这方面最基本的例证就是家庭，因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中发生的任何事都受到彼此不同并且不可互换的角

色影响。即使角色和实力不同,正常的父母-子女关系都是建立在双方的相互适应基础上的。

2. 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 chapters 2 and 3.

3.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4. 前景理论宣称风险的突出地位高于收益的最大化。非对称关系中受影响的程度差异也就因此带来了效用功能的不同,即 A 国更多是受机遇的驱动,而 B 国更多是受风险的驱动。参见 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XLVII(1979), pp.263—291。

5. "财富的损失给损失者全部幸福感带来的伤害大小取决于失去部分占剩余部分的比重大小。"参见 Jeremy Bentham, *The Theory of Legislation* 5th edn. (London: Trubner, 1887), p.106。

6. 距离的作用已经在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对美加关系和美澳关系的对比中证明了。参见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pp.165—220。

7.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chapter 7.

8. Keohane and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p.182.

9. 的确,因为尼加拉瓜太小了,美国情报系统对它的监听远比对苏联的密集。参见 Leslie Gelb, "U.S. Aides See Need for Big Effort to Avert Rebel Victory in Salvador," *New York Times*, April 22, 1983。

10. Philip Taubman, "Analyst Said to have Quit CIA in Disput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8, 1984.

11. Richard Immerman, *The CIA in Guatemala: The Foreign Policy of Interventio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2), p.ix.

12. Giulio Gallarotti, *The Power Curse: Influence and Illusion in World Politic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10); Giulio Gallarotti, *Cosmopolitan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3.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14. Albert O. Hirschman,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xpanded edn. 1980; orig. 1945), p.x.

15. 个人注解。1986 年我第一次访问柬埔寨时,该国被禁运,极端贫困,但是我接触到的援助工作者都告诉我,官员们并不贪腐。1992 年等我再次访问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一个臭名昭著的非对称欺诈的案例参见 Sophie Richardson, "World Bank Shares Blames for Demob Failure," *Phnom Penh Post*, March 11 2005。后来的项目还可以参见 Adam Forde and Katrin Seidel, "Cambodia—Donor Playground: Defeat and Doctrinal Dysfunction in a Hoped-for Client State," *Southeast Asia Research* 23:1(February 2015), pp.79—99。

16. Keohane and Nye, pp.206, 210.

17. 在某种意义上,"敌对"意味着双方为同一个目标而竞争,因此我认同约翰·瓦斯克斯(John Vasquez)的观点,即"敌对"意味着关系对称。然而,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的微妙想法是认为"敌对"可以扩大开来包括持续的非对称冲突。参见 John Vasquez, *The War Puzzl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William Thompson, "Principal Rivalrie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9:2(June 1995), pp.195—223。

18. 参见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对美加关系的研究。

19.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McGraw Hill, 1979).

20. David Kang, "Hierarchy, Balancing, and Empirical Puzzles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8:3(Winter 2003—4), p.170.

21.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22. 在政治学中,这样的定义通常与罗伯特·达尔有关。参见 Dahl, "The Concept of Power," pp.201—215. Dahl, *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23. 更准确地说,B 国只可能在一种情况下同时效忠于两个主人,那就是其中一个主人也从属于另一个。

24. James Anderson and John Whitmore, eds., *China's Encounters in the South and Southwest: Reforming the Fiery Frontier*(Leiden: Brill, 2014).

25. 关于卢卡的背景,参见 Duane Osheim, *An Italian Lordship: The Bishopric of Lucca in the Late Middle Age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26. Louis Green, *Castruccio Castracani*.(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27. 威廉·博夫斯基(William Bowski)认为,"锡耶纳既不是大国(如佛罗伦萨)的工具,也不是它们的盲目追随者。锡耶纳并不总是处于防御状态,抑或是参与大国之间那样的游戏。锡耶纳的统治者逐渐明白了外交政策对于这样一个渺小、甚至脆弱,但却自主的公社的全部政治生活有多么重要。"参见 William Bowski, *A Medieval Italian Commune: Siena Under the Nine, 1287—1355*(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183。

28. Niccolo Machiavelli, *The Prince, tr. W. K. Marriott*(London: Dent, 1908), chapter 5. Available online at www.constitution.org/mac/princeoo.htm.

29. 需要指出的是,强国一方的更大惯性并不是说它不易发动战争。对 A 国来说决定使用武力的门槛更低,因为它并不会受到致命威胁。事实上,它可能认为战争并不是一种军事行动,而是一种警察行为。相反,只有 B 国才会誓死发动一场它不可能获胜的战争。

30. Paul Schroeder, "Napoleon's Foreign Policy: A Criminal Enterprise," in

System, *Stability*, *and Statecraft*(New York: Palgrave 2004), pp.23—36.

31. Edward Hallett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4, orig. 1939), especially pp.41—62.

32. Dirk Nabers, "Power, Leadership and Hegemon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6*(2010), p.943.

33. 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导》(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一书中提出这一术语,并将其用于研究"9·11"后的美国形势。参见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34. Mark Elvin,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5—7.

35. Keith Taylor, *Birth of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21—23.

36. Rupert Smith, *The Utility of Force*: *The Art of War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Knopf, 2005).

37. Ibid., p.3.

38. Jeffery Conrad and Arthur Demarest, *Religion and Empire*: *The Dynamic of Aztec and Inca Expansio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39. 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Summer 1988), pp.427—460.

40. Gil Merom, *How Democracies Lose Small War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第二章
非对称与冲突

鉴于非对称关系中固有的相互误解的可能，以及两国间的实力差距，有人可能认为只有弱国的献媚外交和强国的自我克制才能让非对称关系得以存续。事实上从1800年到1999年，在实力差距大于十比一的国家之间，据统计发生过198次战争。[1]鉴于过去两个世纪里这种几乎每年一场战争的比率，似乎弱国要么已经被消灭殆尽，要么已经汲取教训变得温顺。

然而事与愿违，众多的学者已经发现，非对称冲突的难题在20世纪更加严峻。过去60年间的大部分，甚至是全部战争都是以交战双方的谈判调解，而不是某一方的单方面投降终结的。[2]而且，弱国往往获胜。[3]于是，强国的意外失败就成为很多学者的理论研究兴趣所在，同样有趣的敌对非对称关系的正常化过程却被忽略了。[4]本章我们将考察从敌意出现到僵局及其解决的完整周期。

非对称理论建立在实力悬殊的现实基础上，拳头大当然有用。因此，弱国能生生不息，还有在非对称冲突中偶尔获胜的能力，乍一看就有些不合常理。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弱国的胜利是因为强国自满和傲慢导致的失误。[5]然而无论如何，同样存在的认知分歧也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错误知觉同样会导致僵局。对B国而言，与A国敌对是一种致命威胁，而A国并不面临来自B国的同样威胁。当A国试图发动一场B国无法承受失败的有限战争时，僵局就形成了。陷入非对称冲突比摆脱非对称僵局并走向正常化容易得多，但是，A国的挫败和B国的蒙难给了双方充分的理由选择后者。

革新的危害

正常非对称关系的最佳伙伴是习惯，最糟糕的敌人则是革新。如果存在关于双方关系的共同认知，任何新互动都是与类似的“过去”和预期不会有很大差别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革新则给非对称关系带来难题，非对称固有的对错误认知的结构倾向会夸大不确定性。当出现一对新关系，或者无论是何原因造成关系的更新时，今天互动的意义都会被夸大和歪曲，因为它一方面受历史因素影响，历史因素又是由各方的不同记忆而非过去的普遍共识所塑造的，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未来漫无边际的投机欲望和担忧。革新不是产生错误知觉和冲突的必要或者充分条件。某些革新的情况也能得到顺利的掌控，而另外一些长远的关系却可能由于危机失控而陷入混乱。但是，革新仍然是非对称关系产生问题最重要的原因。

新共同体

非对称革新最基础的也是最困难的形式是出现新的政治共同体。典型案例是在发生分裂主义和独立运动之后，或者是那些因大规模移民而受到威胁的政治共同体产生。也有因民族统一而聚集的运动，比如德国和意大利国家的形成，抑或是那些扩张国家变身成为多民族帝国的情况。

针对现有国家内出现新政治共同体的情况，问题在于强者与弱者之间对合法差距的诉求会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潜在的)A 国没有理由立即承认(潜在的)B 国的自主权，B 国也不可能在放弃追求自主身份的前提下对 A 国主张的领导地位表示顺从。然而，对冲突的估算往往沿着相似的非对称轨迹发展。如果 A 国仅仅试图压制群众运动，它就会疏远潜在的政治共同体而刺激运动对领导权的诉求。1916 年英国对都柏林复活节起义的高压反应就是压迫导致群众运动的经典例证，其他例子也有很多。挑战政府的运动面临双倍的风险，因为镇压的力量可能强于反抗

的力量，更危险的是，政府的手段势必要夺回反抗者的群众基础，进而孤立那些激进分子。当然，事情也可能朝着另一方向发展，如果弱小一方不是认为自己在失去权利和地位，而是在获得安全，非对称政治共同体是最容易被合并的。[6]总之，即使没有处于争斗中的国家，非对称关系的逻辑也存在于政治共同体的分裂与合并中。

几乎没有哪些新生国家经历过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或者是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时的那种和平，然而即使新生相对来说是无痛的，也有很多新的关系需要谈判。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一直在佐证这种情况。即使各个国家的合法性都不成问题，这些国家也没有关于共同预期的旧模式，可以用来管控它们的新关系。当然，即使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新的，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互动往往又有更深层的历史记忆。对各方而言，漫长记忆的最清晰部分也不可能完全相同。或许一方铭记的是历史辉煌，另一方却是过去的苦难。更糟糕的是，双方回忆起的辉煌都是以对方的牺牲为代价，而过去的苦难又都是由对方造成的。巴尔干半岛就是此类记忆的宝库。不同于对连续关系形成的共识，历史可能夸大恐惧和野心，给想象添油加醋从而加剧当前的危机。即使没有对历史的刻意渲染，各国的领导层也会发现在被证明不切实际之前是很难克制其需求的，于是争执的过程很可能就演化成敌对状态。

实力的变化

革新的另一种途径——发生相对实力的重大变化，不如形成新国家那样富有戏剧性。如果新的战争形式、技术、贸易模式，或者人口发展导致 AB 两国原有的差距消失甚至是逆转，双方的关系就必须重新谈判，至少是它们熟悉的行为习惯已经发生变化。历史当然会产生抵触作用，促使 A 国不愿屈服于衰落的新现实。1813—1826 年波斯与俄罗斯之间的领土收复战争就是一例。受困于自己辉煌历史的波斯每次都被日益崛起的俄罗斯人夺走更多土地，而不是收回失地。[7]对崛起的 B 国而言，双方关系的内容发生了有利于自己的变化，改变了 B 国原来的服从地位，创造了对 A 国形成竞争性挑战的机遇。对衰落的 A 国而言，未来与辉煌的过去同样危险。如戴尔·科普兰所言，即使 A 国可能决定使用其仅有的武力

优势，形势的发展还是会像受到诅咒一样把计划引向胜利的反面。[8]总之，实力变化带来的相对地位模糊会使AB之间的关系更容易受到误解的影响，进而增加冲突的概率。

领导层变动

任何一国的领导层变动都可能引发革新。新领导的实际权威、他关于前任政权对外政策的态度、对外交事务的不熟悉，以及国内压力都可能导致其在实施领导权过程中的偏差和对未来的关注增加。反对派都是凭着要改变政策的承诺掌权的，尽管他们在面对外交现实后也常常会调整计划。非民主国家掌控领导层变动的困难可能带来更剧烈的动荡。最好的情况是，领导层变动仅仅经历中国人说的“磨合期”（类似于新车部件之间的磨合），彼此调试的互动把危机最小化后就回到关系双方熟悉的轨道。最差的情况是，新领导层将自身置于旧领导层的完全对立面，从而危及双方关系的当前基调。

政治体制

AB两国政治体制的差异也对革新有类似的影响。双方意识形态的分歧会产生解释的鸿沟，进而加深彼此的疑虑和误解。约翰·欧文提出，如果双方有确信无疑的充分政治差距，这将影响它们争论的国内领域，并且赋予其更多的行动自由能够把双方的不一致从挑战转化成冲突。[9]由于其外交政策的公开性，这种情况特别适用于自由国家。民主和平的不光彩一面或许就是偏好正义战争，包括那些被想象成正义的恩惠行为的小型战争。

非对称的边缘政策

尽管双方都可能设法革新而避免灾难，革新往往还是夸大了各方用以实现收益最大化和保护其脆弱性的特殊手段。

管理得当的革新

对革新情况的有效管理能预防和控制危机，因此通常不会受到广泛关注。当然，1993 年哈维尔平稳处理了捷克共和国与斯洛伐克的分裂，并受到世界的认可是个例外。

成功管理新关系的一个更典型案例是 1994 年比尔·克林顿和纳尔逊·曼德拉以曼德拉首次访美为契机创立的“美国-南非双边国家委员会”(U. S.-South Africa Bi-National Commission，BNC)。委员会的预期功能是促进合作，但其美誉来自授予了两国的副总统艾伯特·戈尔(Al Gore)和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并且开辟了每两年一次会议的补充平台。委员会为始终存在不容忽视的分歧和猜忌的美国与废除种族隔离的南非两国之间关系提供了机制保障。[10]

另一个更有名的管理得当的革新是 1948—1952 年美国在欧洲实施的马歇尔计划。[11]该计划对欧洲经济复兴的经济贡献无疑很重要，我这里希望强调其两点政治贡献。其一，该计划的参与权是面向所有欧洲国家的，包括苏联和前轴心国国家。尽管苏联及其控制下的国家拒绝了马歇尔计划的邀请，计划的包容性还是把拒绝参加的压力推给了苏联。与此同时，它对昔日敌人的宽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承受的不切实际的赔偿负担形成了鲜明对比。[12]其二，该计划尊重接受国的领导层及其自主权。与 1945—1952 年对日本的占领不同，美国认为战后欧洲各国政府是管理其本国事务的主人。美国有时会被问及为什么后来的援助项目在政治或者经济上都不如马歇尔计划成功，原因就是大多数此类项目都是为了强化排外的同盟，抑或是为了支持资助方提出的政策。

管理不当的革新

新形势往往不能处理得如此好。更典型的情况是，各方都希望在互动中获得最大化的收益，于是对历史共识和有限未来预期的正常约束都被弃之不顾，只有强大的欲望驱动其直至发生危机，抑或是各方坚持以己方的需求作为谈判的前提。在非对称关系中这些需求又各不相同。

B 国能在两个方向上诉求边缘政策。一是可以在对 A 国权力作出任何让步之前，坚持要求 A 国承认 B 国的自主权。二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军

事建设或者加强与其他强国的关系来对抗A国的权力。对大多数B国而言,即使是某些情况下相对实力的变化可能成为一种选择,B国也不可能在可见的将来追赶上A国的军事实力。然而,核武器提供了一条匹及A国军事实力的捷径。通过与第三方发展关系是一个在心理上有很大吸引力的选择,但是有重大缺陷。在形成防御性联盟之前往往有很多外交步骤,它们会刺激A国在B国获得安全保障之前就对其实施制裁。而且,如果发生危机,第三方就会重新评估自己的利益,不会简单把自己束缚在对B国的承诺上。理论上A国是比B国更靠得住的国家,所以根本不能指望第三方对利益的重新评估会有利于B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B国对抗A国权力的行为可能引发危机以及A国的全面关注,并且是对B国威胁的关注,而不会关注B国对自主权的需求。鉴于A国的实力优势,这种关注很可能是危险的。

与B国一样,A国也会首先要求B国顺从,并将其作为谈判的前提条件。它可能贬低甚至拒不承认B国的自主权及其存在的权利。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有很多这样的案例,最著名的就是1949—1972年对中国和1960—2014年对古巴的孤立。由于A国的实力优势,它可能用各种途径欺侮B国,强迫其服从A国的意愿,也可能采取超出其本意和能力的制裁措施威胁B国。A国的直接(也是国内主流的)心理反应是以其傲慢制服B国的鲁莽。然而,无论A国对实力优势的炫耀多么自我感觉良好,其结果都可能适得其反。B国当然会察觉并且的确可能夸大A国的蓄谋威胁,但是B国的主要考虑不是如何让A国满意,而是如何保护自己的自主权。在新形势下,A国的施压更可能加剧而不是消除危机。

2002年以来美国与朝鲜之间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僵持就是对抗边缘政策的一个很好例证。朝鲜在接连遭受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垮台和俄罗斯及中国对韩国的承认两次打击后,加快了独立拥有核武器的步伐。1994年朝鲜的钚浓缩尝试几乎造成武装冲突,在前总统吉米·卡特访问(含蓄承认了朝鲜的自主权)和金正日回应(含蓄表达了对美国权力的认可)后才得以缓和。乔治·W.布什总统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讲话中却将朝鲜与伊拉克和伊朗共同列为“邪恶轴心”国家,寓意美国不再承认其自主权。巴基斯坦方面透露曾向朝鲜提供铀浓缩设备后,美国于2002年9月23

日向朝鲜公布消息并且要求其立刻停止活动。从此以后，美国不愿再通过外交承认确保朝鲜的自主权，朝鲜也转而继续追求拥有核武器的可能性。美国视朝鲜为“亡命之徒”，朝鲜又我行我素，于是双方陷入僵局。由于相邻国家都不愿意支持任何一方的激进行为，危机会维持在非暴力但是僵持的状态。

错误知觉与消极互补性

革新并不会导致非对称关系中特别的错误知觉问题，它只是会加剧这些问题的影响。错误知觉即使在没有非对称的情况下也会发生。罗伯特·杰维斯关于国际关系错误知觉的经典分析提出了基于个体心理而不是关系特征或模式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模型。[13]非对称理论在杰维斯的分析上增加了两点想法。第一，接下来讨论的错误知觉的补充模式源自上一章探讨的关注模式。第二，与基于个体的错误知觉具有随机性并可能导致无果而终不同，[14]基于结构的非对称错误知觉往往因为消极互补性而夸大对方。如图 2.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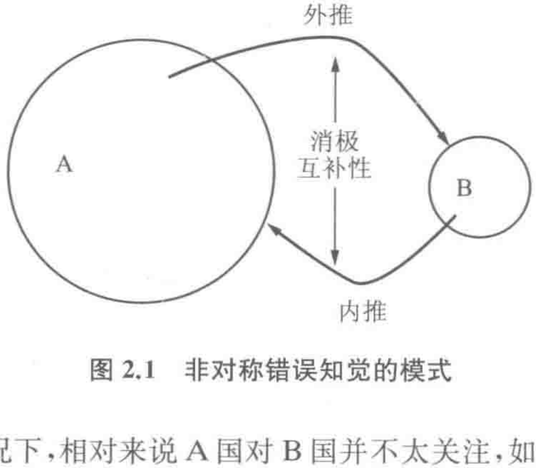


图 2.1　非对称错误知觉的模式

在正常情况下，相对来说 A 国对 B 国并不太关注，如第一章所述，在危机时期，A 国对 B 国的过度关注又集中在 B 国对 A 国造成麻烦的方面，而不是 B 国不同于 A 国的总体状况。比如，B 国可能与其他敌对大国结盟，可能发展核武器，可能有一位野心勃勃的领导者，也可能正集结一

场叛乱。这些都会给 A 国带来“B 国麻烦”，于是成为 A 国关注的焦点和行动的目标，并且麻烦不在于理解 B 国为什么可能感到压力而抗衡 A 国，而在于如何迫使 B 国收手。有了这样的具体关注，几乎不可避免的就是那些支持判定威胁的信息会被夸大，支持根据 B 国所处地位的具体情境来解释威胁现象的信息又被忽视。承诺决定性行为能够立竿见影的预测受欢迎，比较复杂或者悲观的预测就不受欢迎。关于这种“外推”(extrapolation)做法，最近发生的最极端案例或许就是布什政府执意将萨达姆·侯赛因与基地组织扯上关系。在这个例子中，两者之间的联系不仅被与其复杂的背景隔离开来，而且事实上也是杜撰的。据美国 2000—2005 年的中东高级情报官员保罗·皮拉尔所言：“情报部门从未作出任何能够证明萨达姆与基地组织之间有同盟的分析。”[15]

对 B 国而言，认知错误是在相反的方向上发生的。因为始终保持对 A 国的脆弱性，B 国往往关心 A 国可能产生威胁的所有活动，然后再把这些活动都视为 A 国全力以赴针对 B 国的恶意安排。A 国的欺侮行为不会被理解为一系列有限度和不可协调的姿态，而是一项大阴谋的开始。出于对 A 国可能行为的担忧，B 国会把 A 国那些断续的不协调行动都联系起来，并且假定 A 国对 B 国感兴趣的程度与 B 国对 A 国的程度一样，进而可能全力以赴针对 B 国。这种“内推”(interpolation)错误的最极端案例可以从描写红色高棉的《黑文件》中找到，写于 1978 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前夕的该文件提道：“对越南领导人来说，解放南越的难题不是他们最大的考虑，控制柬埔寨的难题相比而言重要得多。”[16]

“外推”和“内推”的错误有共同点就是往往把自己的观点安放到对方的行为上。A 国把 B 国视为小型的 A 国，与 A 国有相似的战略考虑，只是资源更少些。于是，B 国与第三国结盟的行为就不被视为防御措施，而是某个地区或者全球计划的一部分。反过来，B 国又把 A 国想象成一个超大的 B 国——一个可怕的幽灵，B 国很清楚如果可以的话，它会对 A 国做什么。B 国认为 A 国在关系中的地位是一样的，只不过权力更大而脆弱性更小。错误知觉的来源并非单纯是错误信息的一种，而是取决于该信息是如何被嵌入了业已形成的观点中。在这个过程中，A 国的“B 国问题专家”和 B 国的“A 国问题专家”既可能是政策压力的牺牲品，也可能是

政策错误的制造者。非对称知觉和互动的根本困难在于双方对关系的界定不同，因此很难跳出自己的局限而从对方的角度认识该关系。

“外推”和“内推”的错误刺激了进一步的相互误解，它们的消极互补性会引发恶性循环并以敌对告终。A 国对“B 国难题”的关注很容易使 B 国认为只有自己消失才能让 A 国满意。于是，B 国努力集结防御性抵抗 A 国的行为又很容易被 A 国理解为挑战其权力的战略行为。并且，在每一方的决策制定循环里，鹰派的观点往往被双方关系的持续恶化佐证。鉴于 A 国的实力优势，也就难以抗拒诉诸一场“小战争”的诱惑。

非 对 称 敌 对

最广义的“敌对”是关系中的下倾面，始于互动被重塑为零和游戏，终于僵局或者是一方被毁灭抑或是被统治的底点。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关系可能在冷对抗的层面形成僵局，比如美国和古巴，也可能是危机造成的敌对，比如 1960—1983 年间的中国与苏联。战争则是为实现目的或者维护利益而使用权力的最后选择。

小型战争

A 国不必担心 B 国入侵领土和击败军队，经历那些一般来说都是 A 国才能向 B 国施加的苦难。因为不会受到 B 国的致命威胁，A 国可以通过战争或者诸如禁运和封锁之类的敌对行为来实现有限的目标，比如变更 B 国的领导层或者政策。这种战争被 A 国视为“小型战争”或者“有限战争”，首先因为它针对的是一个弱小对手，另外也是因为战争的目的不是保护 A 国，而是促进某些特定的利益。它实际上根本不能被视为战争，只不过是“换个方式的欺侮”。例如，1989 年美国入侵巴拿马仅仅是为了驱赶统治者曼努加尔·诺列加将军。这种行动的前提是假定 B 国无力报复甚至是阻止入侵。A 国的“外科手术式打击”其实就意味着医生与病人之间关系的非对称。

致命威胁

相反,B国很清楚自己无力对A国还以颜色。最多,B国能对抗A国的统治,但是若要结束冲突而无需投降,B国必须促使A国放弃战争。A国战争的目标是获胜,也就是把偏好单边强加给B国。B国的战争目标是避免失败,也就是自主权和身份不受A国支配。维持冲突是B国获胜的一种手段,但是B国无力单方面结束冲突。[17]

不难理解B国可能把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的"外科医生"仅仅看作一个拥有锋利尖刀的巨人。然而,在望远镜一端看似一场"小型战争"恐怕从另一端看就恰恰相反,是一场与超大对手的战争。A国的军事存在强于B国的相应实力。屈服于A国的要求诚然是一种选择,但却可能刺激A国提出更多要求,而且B国还不得不基于被削弱了的地位面对这些新要求。[18]迫于威胁的服从意味着将B国的自主权让渡给A国的权力。A国眼中的"有限战争",在B国看来就是无条件投降,投降的理由则是在无论什么议题中都存在的实力差距。

如果A国的"小型战争"对B国来说没有那么可怕,为什么小国有时会挑起非对称冲突?如果B国认为与A国的冲突不可避免,奇袭(珍珠港)就可能造成平局,抑或是推动此前的僵局。无论哪种情况,B国都可以考虑以相对小的代价削弱A国的军事实力,并且都优于在有利于A国的条件和时机上与A国开战。这种思维的难题在于B国发起的进攻可能被A国视为威胁。于是,与B国开战就成了一场致命斗争而不是"小型战争",B国的无条件投降也就成了A国的目标。谈判之后的僵局就难以出现了,因为A国很可能获胜。

更仔细观察可以发现,A国的目标是"小型战争",敌意可能针对的是B国的领土,因为A国有望制服B国的有组织抵抗。然而,杰弗里·雷斯在美国的越南战争案例中发现过,[19]安德斯·博赛拉普和安德鲁·麦克也总结了,A国的武力可能产生反作用,增加人民的受威胁感。[20]为了追求结束冲突的有限目标和于己有利的结果,A国表明了本国目标与B国关键利益之间的差距,同时也确认了对B国形成的威胁。在A国看来,B国可能是某种更大致命威胁的一部分,抑或是如果不能统治B国就会造成一连串威胁性后果。这两种考虑在美国的越南战争中都有体现,占领越南

的必要性既是由于世界共产主义的威胁，也是因为美国在亚洲遭受失败的“多米诺效应”。然而，这些后果通常都是更多存在于假设意义上的，并且比 B 国对 A 国致命威胁的担忧遥远得多。没人会设想胡志明能出现在华盛顿，甚至是夏威夷，但是越南人的确在达南和西贡看到了约翰逊（LBJ）。最终，对 A 国来说，总体安全受制于“B 国战争”比谈判撤军的风险还大。

对 B 国来说形势迥异，A 国威胁的现实紧迫性远比那些间接的后果重要。事实上，为了应对来自 A 国的威胁，B 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它原本不会考虑的第三方。对政治共同体中的任何成员来说，A 国都显而易见是紧迫且致命的威胁。特别是在如果 A 国成为占领者的情况下，B 国的有些居民可能勾结 A 国，那些敌后反抗者则会宣扬爱国主义和道德的高尚境界。如此一来，B 国就像被逼到角落的军队，除了开战，别无退路。

由于双方截然不同的战争目标，非对称冲突中的严重判断错误就是假定对手和自己一样。A 国试图向 B 国展示权力进而占据优势，但是这就假定了 B 国（和 A 国一样）选择发生冲突并且追求有限目标。A 国针对具体对象的镇压或许有用，但是也会向 B 国证明 A 国的存在就是致命威胁。B 国可能试图通过结盟抑或是参与针对 A 国公民的恐怖主义活动抗衡 A 国的权力，但是如果 A 国可能受到（与 B 国一样的）致命威胁，它就会重新考虑是否参与。这些做法都会加剧 A 国对总体危机和威胁的判断，从而认定持续的冲突很有必要。[21] 如果 B 国仅仅通过奇袭或者恐怖主义造成彼此致命威胁的形势，它就将自己在双方不平等的无休止冲突中宣判了死刑。B 国不会获胜，A 国也不能承受失败。A 国缓解对 B 国造成威胁的表象，B 国消除自主权看似可能给 A 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对 AB 两国来说都是更为深谋远虑的做法。然而，这些建议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非对称战争

在发生于本国境内的战争中，B 国有地形和后勤的最初优势，但是 A 国对此都有预见。即使 B 国可以维持防御地位，A 国的围攻最终还是会

切断B国的防御与持续的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总体上，B国几乎不可能获胜，甚至不能延续本国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与其强敌之间的对抗。

然而，B国的选择不只是与A国激战。A国的存在威胁到B国政治共同体的身份，有时政治共同体可以被动员成民众的反抗，AB两国间的斗争就可能在B国的军队战败后仍然继续。事实上，在大多数民族自由运动中，B国的“军队”仅仅出现在冲突的后期。第一阶段的反抗都是那些多如牛毛的地方游击队武装力量，它们只有在后来才能发展成移动的正规军，以至于最终成为军队。[22]非对称战争已经被普遍用于描述弱者一方不是正面对抗，而是通过躲避、阻挠和干扰对付强敌的技巧。

B国在非对称战争中的策略胜利若要奏效，就只能通过不断增加A国对继续战争的挫败感，直到A国对自身所追求的目标产生怀疑。非对称战争中通常被定义为游击战的很多技巧，都依赖于B国政治共同体的广泛非公开支持。A国人民不比B国人民贪婪或者懦弱，仅仅是因为并未受到致命威胁才支持战争。

非对称冲突模式也不只是20世纪的现象，在那之前就已经常见。[23]仍然以越南的历史为例，1407—1427年中国对越南的入侵和占领就是被越南的持续反抗击败的。逐渐出现的反抗运动增加了中国占领越南的成本，并最终打败了在越南的中国军队。越南领导人黎利(Le Loi)随后向中国道歉，并送回了俘虏的中国将军和战马，以及他本人的雕像代为受罚。此后，中国就放弃了吞并越南的诉求。[24]由此可见，如果在古代蛮族与帝国的黄金时期，小国很容易灭亡，就不会有那么多小国留存下来了。

一般来说，认识到整个政治共同体受威胁是B国在非对称冲突中的主要政治资源。以19世纪越南对法国的反抗为例，越南本土政权认识到来自民众运动的威胁，于是将国内萌发的爱国主义运动视为即将削弱自身力量及合法性的危险风潮。[25]随后，该政权就只剩下军队可以对抗A国，这样也就只能失败。另一种选择是灵活机动的民众组织。这种冲突类似于赫拉克勒斯与大地女神盖亚的儿子安泰俄斯的决斗，如果安泰俄斯被扔到地上，他就变得更强大，于是赫拉克勒斯的取胜之道就是把安泰俄斯举起来，让他脱离大地。

定居者、掠袭者、教育者、资助者和毁灭者

在有些情况下，A 国能利用其权力优势在非对称敌对中造成相对稳定的结果。如果所发生的战争对 A 国来说并非一场“小型战争”，而是一种来自弱敌的持续致命威胁局面，那么 B 国的动机优势就被抵消了。典型情况就是游牧定居者入侵 B 国的领土，在这方面，挪威征服英格兰和满族入主中原是两个宏伟的例证。第二种可能情况是 A 国无意持续控制 B 国，只是偶尔从 B 国掠夺资源。第三种可能情况是 A 国旨在通过临时的、有限的入侵给 B 国以教训。第四种可能情况是 A 国在 B 国安插或者扶植一个效忠于 A 国的当地统治者。第五种可能情况是 B 国实际毁灭，不再具备反抗实力。

定居者

“定居者”这个选项在重塑政治共同体及其身份方面目前是最成功的。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已经敏锐地发现，

> 蛮族(前现代的游牧民族)大多不是从固定基地长途跋涉对外使用权力，而是一种真正移动着的权力，能够并且也确实从一处土地来到另一处。只有撇开那些通常适用于领土固定不变的军事政治单位的假定，才能理解蛮族，要把蛮族……视为他们入侵的地方和区域体系的一部分。[26]

如果 A 国迁移到 B 国，对 AB 两国的政治共同体来说，斗争其实是同样紧迫和致命的。但是如果 A 国已经在 B 国定居，它就失去了此前游牧方式的机动性，同时也受制于从 B 国获得的资源。突厥历史的长期扩张充分印证了这一过程。卡特·芬德利比较了突厥人从蒙古到小亚细亚的漫长迁移，犹如一辆长途汽车，每一站都有人上车和下车。[27]而在诺曼人的例子中，定居者成了英国社会(以及中世纪英语词汇)中的上等阶级。在满族人的例子中，他们与汉族人的差别及其民族排外政策甚至在他们几

乎实施了三百年的统治后，仍然成为 1911 年革命反抗清王朝的口号之一。

“游牧民族”非对称敌对的两个现代例证分别是欧洲/美洲定居点在北美的扩张，以及以色列国家在中东的建立。这两个例子中，外来者与其对手感受到同样的危险，并且他们都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经济形式，为持久的统治创造了物质基础。在北美的例子中，土著部落被驱逐，最终被划定到特定区域并边缘化。在以色列的例子中，其本土相对稳定，但是因其存在而受到威胁的地区面积远远大于以色列占领的地区。彼此构成致命威胁的形势无论是否为非对称，都将造成无休止的国际敌对。[28]

掠袭者

掠袭追求的是短期的临时收益而非持续的占领。掠袭者与典型的非对称有诡异的关系。如果假定掠袭者与其目标之间的地位不可互换（并不总是如此，尤其在游牧地区），他们就符合非对称的一个基本标准。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掠袭者能够选择在其武力占优势的时间和地点发动进攻，并且有安全的撤退区，那么无论整体的实力平衡怎样，掠袭者都是处于 A 国的地位。尽管我们把掠袭者视为 A，或许也只能称作“虚假的 A”。B 国的防御可能增加掠袭的不便与成本，A 国又会克服那些障碍获得比付出代价更有价值的目标。如果 A 国掠袭后撤回而无意于进一步控制 B 国，就不可能立即受到报复。B 国在反击强国（如果 A 的确是个“国家”并且更强大）中处于劣势，它的目标是复仇而非生存。对 A 国来说，掠袭是很有吸引力的选择，因为一旦成功，权力的使用就会带来资源的激增。事实上，掠袭者国家无需比受害国各方面都强大，只要有充足的实力突破受害国对其目标资源的保护，同时又能逃脱或者抵挡追兵就够了。一群强盗也可以被视为一个掠袭的纳米国家。中国的长城就见证了他们几千年来为保护农耕土地资源免遭游牧掠袭者涂炭而伤痕累累的抗争。即使 A 国是一伙掠袭的强盗，也很难将其擒获。比如，罗马墙的建造既是为了拘押掠袭者，又是为了防范掠袭者入侵。[29]然而，持续的掠袭会引发敌对受害国的包围，最终形成敌对行动的包围圈并得以不断强化。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强盗们的通常命运。

教育者

在当今世界，掠袭者国家的逍遥日子基本已经终结，但是A国发起自我约束的战争的潜在可能性仍然很大。A国可以通过预先设定范围和时间的军事行动给B国以“教训”。A国是老师而非警察，因为发动一场有限的战争在维持世界秩序的整体任务中并非必不可少。1991年的海湾战争仅限于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目标完成，战争即停止而非蔓延到巴格达。与2002年占领伊拉克不同，那次的任务是受到制约的，撤军也不成问题。

中国在1962年与印度和1979年与越南分别有两场有限战争，可以用作区分“有限度的教训”和“小型战争”的教材。在与印度的战争中，中国的目标是控制本国主张的领土，获胜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撤回(并且原地不动了)。这场战争点燃了印度的恐惧和热情，导致它一直视中国为敌，但却再无机会挑起新的冲突。假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过德里，局面就远非如此了。1979年中国与越南的战争非常接近“小型战争”的情况。边界争端是中国对越南总体敌对态度的原因之一，占领随后又撤出越南的边界省份其实是中国经过设计而对越南实施的有限度，但非全面的“教训”，不是要强行占领特定的目标。于是，这也不是一场胜利，而仅仅是一场敌对冲突的开端，并且很快陷入了僵局。这种有限教训即使失败也远比大规模征服越南的代价低廉。

资助者

如果A国通过资助甘愿效力的地方政府而建立对B国的直接统治关系，它就降低了统治B国的成本和风险，同时也减少了B国政治共同体将其视为外部威胁的认知。B国作为附庸政府还会调适可能对直接统治造成不便和干扰的当地条件。但是，B国的地方政府为了依附于A国，会与本国的政治共同体产生裂痕。B国的传统政治共同体可能认为效忠于A国没有更好的下场，最终只能自取其辱和走投无路。在现代历史上，1947—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对苏联的依附就证明了国际附庸关系(international clientelism)的可能性和弊病。

并非所有的臣服国家都是附庸国，关键看B国是否有充分的自主权

可以反抗A国的意见及其授权的政策。例如，1954—1975年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依赖中国的支持并且臣服于中国，同时也抵制中国强加的意见。北越就是臣服于中国，但却不是中国的附庸。相反，美国政府绝不允许越南共和国(南越)追求自主政策。美国甚至容忍了1963年暗杀吴庭艳总统的行动，就因为他当时无法遏制共产主义。南越政府或许是一个“糟糕的傀儡”，但至少是傀儡。[30]任何做傀儡的政治共同体都清楚主人的附加条件，同时也会努力证明自己的自主权。

毁灭者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开篇即提到，对A国来说，B国难题的终极解决办法就是彻底将其摧毁。这一选项有一定的逻辑上的满足感——如果B国不存在了，又何来“B国难题”？如果A国与B国的难题是由一些并非致命的威胁构成，摧毁B国就是一种极端做法。如果A国还指望从压迫B国人民服从其意志中获益，摧毁B国对A国来说也是代价不菲的。灭亡的B国不再惹麻烦，但也不再有价值。犹如迦太基的灭亡对罗马来说毫无价值一样。

在现代的敌对斗争中，终结B国难题的诱人选择大多是以更为有限的形式表达的。无需摧毁整个B国，而只是消灭那些麻烦的人或者地区即可。常见的做法是：对待麻烦的人，就无情地打击那些反对者和疑似反对者；对待麻烦的地区，就实行焦土政策，使其寸草不生。这样的政策其实恰恰表明了A国的军队和政治家在对待一个弱小但是“阴魂不散”的敌人时的挫败感。它们的逻辑是“消灭敌人”，但前提是“敌人”只是B国的一部分。

有目标的毁灭存在的问题是，B国其实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毁灭政策表明A国成了B国所有人的致命威胁。有些人可能被恐吓，有些人则会团结起来，但是即使这些人都认同自己是B国的一分子，也会在是否与A国存在共同利益这一点上出现根本的分歧。并且，赞成反抗的B国人与其他B国人之间的界限既模糊又会不断变化。为了确保擒获所有的敌人，同时也是为了恐吓其他人，A国会努力扩大摧毁的范围。常见的典型做法是处死随机挑选的当地居民，以报复那些反抗占领军的行动。然而，

一旦A国选择彻底摧毁B国，它也不再可能换取B国民众有条件的个人顺从。如果一次暴动能招致整个村庄的毁灭，暴动者就会对发动袭击更为谨慎，其他村民则会支持暴动者。因为只有A国战败，他们才能获得安全。

占　领

“占领”的概念特征是指外来国家试图通过在当地的民用以及(或者)军事存在维持对另一政治共同体的控制。任何占领行为都包括民用和军事手段的综合运用，但是还是有必要对殖民者和占领军加以区别分析。

保罗·麦克唐纳在对英国殖民扩张的分析中指出，征服并不只是军事优势的一个因素。[31]当地精英集团的分裂，以及发动袭击的军队的技巧和足够慎重都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如果征服依赖于机会的社会土壤(societal *terroir* of opportunity)，占领就会给民用和军事手段的综合运用加入至关重要的能动元素，进而决定征服后的形势。

殖民者

殖民者和定居者两个概念的区别在于，定居者是自己的决策制定者，而殖民者仍然效忠于母国。两者之间的界限很容易模糊，本书前文提到的美洲定居者就是一例。但是无论如何，还是有必要将两者区分开来。游牧征服者，在掠夺和控制领土方面战功赫赫，他们也因进入被征服地区而身处各种反抗的致命威胁中。事实上，占领者会在被占领的共同体内形成装备精良且经过调试的新共同体。殖民的问题则复杂得多，殖民者自身处于致命危险中，母国拥有决定权，他们只是母国关心的众多事务之一。殖民者的关键利益与帝国的有限利益之间不可避免存在分歧。例如，美洲殖民者既成功驱逐了土著居民，又成功维持了与英国的非对称冲突。在任何殖民行为中，定居者都是其帝国鹰犬中最强大的分支，然而他们往往也会将母国的更大利益从属于自我生存和对当地统治的关键事

务。1965年津巴布韦的白人少数殖民者单方面宣布独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但是，殖民者却要听命于母国，因为他们要依赖母国的支持和保护。

殖民管理的困难导致20世纪以来维持和扩大对外国的统治越来越不受欢迎。19世纪后期势头正劲的中产阶级帝国主义不是被日益增长的启蒙运动或者民主化的发展，而是被维持占领的成本和困难引发的各种不和谐声音抑制住的。1919年，雷吉纳德·戴尔将军在阿姆利则屠杀印度平民时最初还受到了议会和英国公民的表彰，直到引发印度抵抗力量的激烈反应后，此类行为才被普遍认为不明智。[32]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在1916年的成立旨在为不列颠帝国提供更好的地区培训。学院的座右铭是"知识就是力量"，则是对不列颠帝国主义的早期信念，即"权力就是力量"的一种清醒替换。这在英国学派看来就是国际社会关于殖民主义的文明进步，只不过教育者反过来被难以驯服的反抗者教育了。[33]

当然，民主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去殖民化"的早期决定能够实现有序的撤离，也会在新独立的政权留下有意义的后续影响。渐进的"去殖民化"与苏联的解体之间形成富有启发意义的对比。斯大林强化民族身份而打压反对者的政策不仅恶化了帝国轰然倒塌的后果，而且为那些难以驾驭的地方专制政权创造了条件。[34]一旦殖民地建立民主制度，不仅会引发独立斗争，而且会影响以后的政权。类似地，如果可以将胡志明和甘地互换出生地的话，身处法国人和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威胁下，甘地就不会成为印度支那的少数温和名人，胡志明则可能成为印度的少数激进分子。甘地依赖英国的制度发挥影响，而法国并没有给越南温和的民族主义反动派留下空间。

占领军

现代占领军几乎没有机会发展对领导大城市以外的兴趣，他们通常都比殖民者有更严密的纪律和人员结构。特别是，士兵都有服役期，能够期盼复员。而且全面战争的目标通常是内化和强加给他们的，占领军直接面对的就是战场上的敌人，他们与母国军队的观点不同。因此，占领军

似乎是解决与弱国反对者的冲突并且持续安抚被占领民众的一种有效方式，当然也代价不菲。

与此同时，军事占领有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它意味着要维持在可能敌对地区的稳定存在。二是无论占领军实施多少民用工程以赢得“民心”，他们占领B国土地的根本目的都是要形成致命的压力以强迫推行A国的偏好。

第一，作为外国军队，占领军就必须确保其最小单位都能独立于当地的支持和资源而运行。为了实现自卫，保障供给、通信和交通成为军队的基本日常任务。在与B国常规军的对抗中，A国的实力优势能够弥补它在后勤和当地情报方面的劣势。但是，A国占领军的长期存在成为B国非正规武装的攻击目标，从而给A国造成持续增加的压力，迫使它降低占领的成本。A国几乎不可能简单用军队消灭B国，因此占领军的边界既多变又脆弱。毛泽东形容突破这种边界的战争有“十六字方针”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35] 随着减少边界暴露的愿望增强，A国占领军使用全面正式战术行动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占领军的目标当然并非自卫，而是实现和解，这其实也需要暴露边界。

第二，对于B国政治共同体的某些成员来说，占领军无论如何都是致命威胁。它们不是强加国内合法秩序的警察部队，无论它们号称多么有利于B国的利益，也不能被假设为受控于B国的政治共同体。由于不清楚B国国内究竟谁是朋友谁是敌人，A国占领军往往还会伤及无辜，从而扩大了对B国致命威胁的实际范围。如果A国主动采取故意伤害全体民众的手段，这种暂时恐吓的代价将是B国的彻底抵抗。即使粗暴的控制手段能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比如日本对朝鲜长达半个世纪的侵占，A国很可能也要付出长期被排斥的代价。

弱国的战争

大多数关于“小型战争”的国际关系文献都是采用强国的视角，否则战争也就不会看起来“小”，因此有必要强调的是，与A国从“小型战争”中遭遇的挫败一样，“小型战争”存在的现实对B国来说更是无比严峻。[36] 不仅战争的破坏直接危及当地地方和人民，B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身

份也会受到威胁。如果B国动员妇女儿童,并且暗中对抗,A国虽然能察觉这些手段,却也无力有效还以颜色。

如果我们假定最广义的"民主"是指人民的权力,那么民主对非对称敌对状态最重要的影响就体现在B国一边。国家(或者立志成为国家的类似存在)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对弱国发生持续且成功的反抗的可能性至关重要。强大的占领者接触不到民众、随意实施制裁,并且对其前景和使命完全陌生,这就造成民众对反抗占领者的默认同情,从而降低了(尽管并未消除)有组织的反抗与人民之间形成有效政治机制的必然性。威廉·匡特在阿尔及利亚革命的例子中证明,阿尔及利亚的革命集团从未形成一个协调的整体,斗争不断催生新的革命家,而他们都有各自的追随者。[37]

在胡志明反抗法国人,以及"民族解放阵线"反抗美国人和越南的西贡政府的例子中,动员农民和形成统一阵线的政治任务对越南共产党取得胜利就至关重要。越南共产党在内部拥有权威性,但是要动员群众获得支持来对抗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它还必须依靠受欢迎的政策。这就意味着除了民族主义教育以外,还需要草根、大众的组织结构,以及土地改革之类的动员措施。这就是一种准民主体制了。[38]正如在竞争环境中做生意的明智做法是关注顾客(尽管顾客只能"用脚投票")一样,与更强大但是并不受欢迎的对手竞争的革命政党也应该在其政策中关注民众。当然,随着革命胜利,该政党也可能垄断国家权力,它对民众的承诺也不再是新政权存续的前提条件。

僵　局

任何冲突都包含风险以及对结果的不确定性。随着冲突的发展,或许一方能赢,也可能另一方会无条件投降。"赢"是指按照赢者一方的意愿单边解决冲突。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双方都不能用自己想要(比如A国)或者能够(比如B国)投入冲突的资源实现自己的目标。战胜敌人有组织

的军队通常并非对冲突的单边解决，美国占领伊拉克已经清楚证明了这一点。形成僵局的可能性往往在冲突之初无法预见，而是在起初的希望受挫、但是并未出现担忧的情况时才会产生。如果双方都认为自己的挫败可能永无尽头，而获胜无望时，僵局就形成了。

非对称僵局的界定

如果非对称冲突中的 B 国无力摧毁实力更强的对手，A 国也因为用于冲突的资源有限而不能确保 B 国始终顺从，也就是说双方都不能了结冲突，这就是非对称僵局。与非对称敌对相似，僵局可"热"可"冷"。"热"僵局意味着持续冲突，但是双方会逐渐明白取得军事突破几乎是不可能的。"冷"僵局则意味着 AB 两国关系敌对但是并不在交战中，任何一方都不能指望自己的敌对姿态能够改变对方的敌意。自 1980 年伊朗扣押美国人质以来的美伊关系就是证明。

从反对者的主观认知看，因为不存在单边解决冲突的希望，僵局似乎没有尽头。然而，并非所有僵局都了无希望。首先，即使在非对称僵局中各方损失的性质和规模不同，僵局也是双输的局面。其次，可能获胜的幻想已经消失。如果任何一方都不能制服对手，也都不掌握主动，那么即使是与敌人，谈判也成为合理的选择。

B 国面临的僵局

非对称僵局对双方来说是不同的局面。对 B 国而言，战争的持续存在可能带来国内的政治团结，代价则是惊人的苦难和毁灭。一方面相信战斗是唯一的选择，另一方面又急迫、有时甚至是拼死想要结束战争。拼死的做法就会导致军事失误，比如 1968 年对越南的新年攻势，抑或是错误地发动针对 A 国平民的恐怖主义。结束战争的愿望也可能产生和平的倡议，并且努力动员所有人，甚至是最大限度的世界人民尤其是 A 国人民来反对战争。无论是否经历创伤以及领导层关于战略问题的严重观点分歧，B 国在获胜后的国内政治难题恐怕还是会恶化，因为致命危险已经不存在，同时国内团结的理由也盛极而衰。1962 年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39]

A 国面临的僵局

僵局对 A 国来说不是紧急情况。较之 B 国遭受的更多困难，A 国则很享受这种不断向敌人施压的幸灾乐祸。获胜的幻想似乎触手可及，因为总是能想象再前进一步就会转过那道弯，就能出现结果。与充满希望的鹰派相反，也会有心存疑虑的鸽派质疑冲突的重要性、具体做法，及其很快就能解决的承诺。即使政治和军事领导层关于冲突的私下判断变得现实主义，无功而返将在国内和国际上损失颜面的后果看起来也比维持战争大大增加的成本重要。A 国国内可能希望降低战争成本，但却不希望最终承认失败。于是，有限却无休止的冲突带来的挫败感也只能无情地增加了。

无论 A 国是不是民主国家，其国内政治中的三种力量——鹰派、鸽派和拒绝转向的领导层——都会存在于非对称僵局中。如安德鲁·麦克所言："如果战争被视为'有限的'，诉诸战争就不会超过其他目标自动成为政府内分裂力量的优先考虑。"[40]民主体制被设计用于公众的政治优先权斗争的，然而即使是独裁政权也会发现，非对称冲突的持续成本不堪重负。麦克在论文最后对 1975 年的葡萄牙革命作出了富有预见性的分析，他指出，萨拉查的继承者——斯皮诺拉将军会被迫放弃非洲的"领土"。这个决定（以及麦克的分析）也导致斯皮诺拉政权提前被葡萄牙陆军军官推翻，这些军官正是因为胜利无望的残酷战争经历而变得极端化的。麦克对此总结道："无论什么历史时期，无论外部权力的整体性质如何，什么利益被视为生死攸关，以及冲突发生的国际背景如何，非对称冲突中大城市权力产生内部分歧的可能性都存在。"[41]

民主能带来起初倾向于支持小型战争的社会和公众，但是接下来随着挫败感的增加，它最终还是会改变政治的平衡。根据吉尔·梅伦的观点，转变机制包括批判主义的媒体、中产阶级负担的战争成本，以及领导层对公众舆论的脆弱性。[42]独立的媒体能够把不利于战争的信息和那些反对的声音暴露给公众。暴行被揭露，公众就会退缩。民主国家的中产阶级对他们的孩子处于战争中格外敏感，对战争行为及其他成本也敏感。民主体制的关键特征就是领导层受制于公众舆论，由此产生的国内威胁迫使领导层要么作出关于冲突的艰难决策，要么就会被因为承诺采取不

同方式而获得公众支持的反对者取代。

A 国的这些国内因素很明显对 B 国非常有利，于是 B 国可能试图施加直接影响。然而，有时直接影响会适得其反，巴勒斯坦对以色列实施的平民恐怖主义就是证明。而且，除非公众舆论开始摒弃战争，否则任何看似同情敌人的人们都会被视为不爱国。“河内的珍”在美国也不是表示爱慕的说法。[43]更何况，即使对 A 国民众产生了深刻影响的 B 国行为也可能有其他意图。比如，1968 年对越南的新年攻势原意是要占领城市，美国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么轰炸南部城市，要么结束战争。根据这样的标准，那就是一场意料之外的大规模失败，但却让美国民众彻底明白了威斯特摩兰将军所谓“胜利即将到来”的安慰完全是空话。美国舆论的趋向不是被“胡志明 T 恤”，而是被延长了的胜利之路扭转过来的。

或许存在再多升级一步、再多冲突一天，或者再多让步一点战争规则，僵局实际上就可以成功化解的情况。但是在那具体的一步被尝试之前，不可能确定地知道那一步究竟是什么。可以确定的是，典型的非对称僵局包括全部小的冲突升级的全部步骤，并且可能随着“再多一步”就被延长，而不是得到解决。阿尔及利亚、黎巴嫩和越南的无数战争都是这类例证。民主机制的价值在于因为允许不断重新评估公众承诺和政治领导层，它们才可能对承认僵局和发起谈判的困难决策作出更快的调试。

当然，承认僵局和原则上愿意谈判还远不足以实现成功的正常化。A 国并非败给 B 国，最终结果必须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因此正常化过程的难题及其最低门槛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

从僵局到正常化

谈判不是终结非对称僵局的唯一可能途径。A 国可以诉求迎合 B 国基本利益的单方面政策转变，从而使双方冷静而非敌对共处。[44]这种选择的最终形式就是佛蒙特州参议员乔治·艾肯 1966 年对美国越南战争提出的建议——“宣布胜利然后就撤离”。[45]另一种选择是重新界定冲突，将

其假定为更可控难题的一部分。尼克松将美国的越南战争扩大到柬埔寨和老挝就是例证。该例子表明，重新界定冲突能够简单转移最初的难题。最后，一个僵局，尤其是像美国与古巴之间那样的"冷僵局"就会被无限期拖延。如果对A国来说冲突的直接成本不高，同时在内政和外交中都包含敌对立场，那么公众舆论和国家的理性都不可能迫使其决策重新考虑是否选择敌对。

当然，谈判是结束僵局的基本方式。[46]非对称僵局的前提是任何一方都无法强迫对方接受单边解决冲突。承认僵局的必然结果就是B国不能战胜A国，A国也不得不与自己控制不了的B国共处。既然任何一方都不能占上风，再追加战争成本也是徒劳，接受能够满足各自最低利益的解决方案才符合双方的利益。

顺从与自主权

海因·戈曼在对结束冲突的一般性分析中指出，实现和平需要满足各方的最低诉求。[47]在非对称正常化中对各方的最低要求是什么？A国接受谈判是为了解决不能靠武力解决的难题。因为A国并未战败，自愿结束小型战争及其后果必须比持续的冲突明显具有更多吸引力。A国还必须确信B国既不会破坏又不会挑战其权力和威望。这也是B国顺从的底线。对B国来说，顺从意味着不去挑战现有的实力非对称。顺从不等于投降，也不排除在某些议题上出现公开的对抗，而只是说B国绝对不会挑战A国的身份或者声望。B国的实质要求是希望A国承认其自主权，彻底终结对其身份的致命威胁。

顺从与自主权并不相互矛盾，但是它们的脆弱关系会被冲突打乱。如果A国要求顺从，它就是在否定自主权。如果B国要求自主权，它就是在否定顺从。然而，作为谈判的结果，这两种诉求可以共存。A国不是处于主导地位，其权力也并未受到挑战。B国顺从，但是并非投降。在前现代时期，这是一种宗主与下属的关系，宗主国在仪式上承认下属国的合法自主权。以中国与越南的关系为例，越南的朝贡任务和被授予官印明确了中国的优越地位和越南的自主权。西方也有类似的朝贡体系。1183年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皇帝(Emperor Frederick Barbarossa)授予伦巴

第同盟（Lombard League）自主权的《君士坦茨和约》（Peace of Constance）就是一个著名例子。[48]根据现代的主权平等假定，当然需要更多的外交管理，然而与此同时，假定的平等也就使更大范围和强度的国际关系成为可能。

艰难的开始

原则上谈判可能看似合理，事实上却很难实施。B 国的身份和 A 国的威望似乎都面临风险。谈判的礼仪和场地也可能看起来损害一方或者另一方的优势地位。如皮勒（Pillar）所说，任何一方都不想先开始。[49]当年美国和越南之间最初的谈判就是因为桌子的形状问题而搁浅。不出意外的是，第三方及幕后调停、建立信任的措施，以及调节性信号往往都是正式谈判的序曲。

正常化谈判的直接目标是为双方关系确立和平的框架。然而，刚刚经历的敌对和业已形成的以零和方式看待关系的习惯往往妨碍双方关系立刻回暖。B 国通常对质疑其身份的行为十分敏感，A 国对 B 国的不满也会一直存在。敌对状态排除了贸易和旅游往来的可能，和平的模式和习惯又难以形成。正常化并未改变双方关系的非对称，小国面对大国的经济实力优势也仍然是脆弱的。因此，正常化通常都有一个冷开端（has a cold start）。

从"冷"正常化到正常状态

最终，正常化提供的和平环境还是会促进贸易、投资和旅游业的发展。甚至战争带来的亲近也能被转化成一种特殊的和平关系。弗朗西斯·密特朗是 20 世纪 90 年代首位到访越南的西方领导人，美国的退伍军人集团也在促进美越关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正常化过程的最终阶段就是正常状态，届时双方都忽略分歧而希望难题在友好谈判的框架内得到管理。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就在 1999 年到达了这一阶段，两国承诺遵循十六字国际原则："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的睦邻及全面合作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有互惠的真诚预期，实现正常化的深层基础还是最近双方共同经历的受挫的敌对状态。"永远和平"就是"不再战争"的积极说法。

结语

本章论述的从革新、错误知觉，到敌对、僵局，再到正常化的双边循环在非对称关系中并非不可避免。国家可以从观察到的一次发人深省的经验中总结教训从而避免在其他地方遭遇类似的情况。美国政治学中常见的"不再有越南!"口号就是指这类教训。除了这些明确的经验总结，还有众所周知的常识，即使对手不能反击，战争也会像雷默斯大叔著名的柏油孩子一样难以应付和令人沮丧。这完全符合世界各地的经验，所以任何一段历史都不能被确认不变。即使有实力差距和认知分歧，大部分非对称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也都是正常的，尽管不安定，但也不脆弱。除非革新行为要求涉及的国家都重新学习异常状态的教训，否则双方都会努力在即使非对称但也彼此尊重的基础上管理两者的关系。

本书第一部分这两章已经集中探讨双边关系，双边关系不仅本身重要，而且是更复杂的国际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跳过双边分析阶段，只是研究多边或者更大的体系层面的国际交往，这种分析就遗漏了国际现实的一个主要层面，相当于假定所有的国家都像一群鱼一样对同样的刺激因素作出相同的反应，或者是假定只有大国及其潜在的挑战者值得关注。事实上，研究不同的双边关系需要更具探索性的方法论，既要对特定关系的本质保持敏感，又要考虑关系间的结构。

当然，双边关系也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虽然它们通常并不源自多边条件，但是的确受到多边因素的影响。而且，大多数现代国家都是地区体系的成员，它们越来越受到共同的全球形势和因素的影响。本书接下来将要讨论的问题就是，非对称在多边条件下的重要性是不是与在双边情况下同样重要。

注 释

1. Ivan Areguin-Toft,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4.

2. Paul Pillar, *Negotiating Peac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3. 参见 Areguin-Toft, *How the Weak Win Wars*, and also Mack, "Why Big Nations Lose Small Wars"; Merom, *How Democracies Lose Small Wars*; and

Paul，*Asymmetric Conflicts*。

4. 皮勒在《谈判和平》一书中全面描述了终结战争的谈判，但是没有将非对称视为冲突的结构特征之一。

5. Giulio Gallarotti，*The Power Curse*.

6. 戴维·富特对1354年奥维托加入教皇国的研究充分证明了这种情况，参见"In Search of the Quiet City：Civic Identity and Papal State Building in Fourteenth-Century Or Vieto，"in Paula Findlen，Michelle Fontaine，and Duane Osheim，eds.，*Beyond Florence*：*The Contours of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Ital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190—204。

7. Rouhollah Ramazani，*The Foreign Policy of Iran*，*1500—1941*（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66），pp.44—47.

8. Dale Copeland，*The Origins of Major Wa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

9. John M. Owen，*Liberal Peace*，*Liberal War*：*America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

10. Scott Firsing，"Asymmetry as Context：The Rollercoaster of South Africa-US Relations Post 1994，"*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1（April 2012），pp.105—133.

11. 正式名称是"欧洲复兴计划"，参见Tony Judt，*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New York：Penguin，2005）。

12. Edward Hallett Carr，*The 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9*，pp.61；221.

13. 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

14. 亚瑟·斯坦认为杰维斯发现的很多错误知觉可能彼此抵消。参见他的文章"When Misperception Matters，"*World Politics* 34：4（July 1982），pp.506—526。

15. Paul Pillar，"Intelligence，Policy，and the War in Iraq，"*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06）.

16. *Black Paper*：*Facts and Evidence of the Acts of Aggregation and Annexation of Vietnam against Kampuchea*（Phnom Penh：Department of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Democratic Kampuchea，September 1978），p.51.

17. 除非A国在占领B国的过程中耗尽实力优势进而变脆弱，经不住B国获胜的罕见情况发生。

18. Todd Sechser，"Goliath's Curse：Coercive Threats and Asymmetric Pow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4：4（2010），pp.627—660.

19. Jeffery Race，*War Comes to Long A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隆安省（位于湄公河三角洲的西贡南面）的例子特别重要，由于地形

的原因，北越的常规军队不能对这里的反抗发挥有效作用。

20. Anders Boserup and Andrew Mack, *War Without Weapons: Non-Violence in National Defense*(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5), pp.82—91.

21. 这一点在吉尔关于巴勒斯坦在以色列境内实施恐怖主义的负面作用研究中有很好的说明。参见 Merom, *Why Democracies Lose Small Wars*, pp.258—259。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则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的自杀式恐怖主义在对付民主政权方面很有效，当然，他并没有区分针对平民和针对军队的行动。参见 Robert Pape, "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3*(August 2003), pp.343—361。

22. Mao Zedong, "Problems of Strategy in Guerilla War against Japan, (1938)". In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vol. 2*(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65), pp.79—112.

23. Mack, "Why Big Nations Lose," p.175. 不得不指出，在这一点上麦克自相矛盾了。参见 ibid., p.184。

24.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 pp.129—138.

25. Truong Buu Lam, *Patterns of Vietnamese Response to Foreign Intervention, 1858—1900*(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No. 11, 1967).

26.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30.

27. Carter Vaughn Findley, *The Turks in World Histor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8. 齐韦·毛兹和本·摩尔(Zeev Maoz and Ben Mor)提出，"无休止的国际对抗"要求双方对称，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对形势判断的不准确，进而导致案例选择的失真。参见 Maoz and Mor, *Bound by Struggle: The Strategic Evolution of Enduring International Rivalries*(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esp.p.19。

29. Edward 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30. 参见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的经典描述。Frances Fitzgerald, *Fire in the Lake*(Boston: Little, Brown, 1972), pp.404—430.

31. Paul Macdonald, *Networks of Domination: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Peripheral Conques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Oxford, 2014).

32. 值得一提的是，温斯顿·丘吉尔的美誉之一就是曾在下议院谴责戴尔。参见 William Manchester, *The Last Lion*(London: Sphere Books, 1984), pp.568—570。

33.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7:3(1993), pp.327—352.从客观上讲，对自由主义良知

的发展而言，殖民的挫败为这些价值观的彰显提供了时机，进而也促进了国际情感的发展和传播。但是如果暴力有用的话，殖民地的“人类尘埃”(法语对阿尔及利亚人的称呼)就不会成为政治行为体，国际社会也不会转移注意力，持续的反思也就无从谈起。

34. Allen Lynch and Reneo Lukics, *European from the Balkans to the Urals: The Disintegration of Yugoslavia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5. Mao Zedong, "Problems of Strategy in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 (December 1936)," in Stuart Schram, ed.,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vol. V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2), p.499.

36. 越南战争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生动的案例，任何认为越南战争对越南人来说不够痛苦难忘的美国人都应该读一下 Bao Ninh, *The Sorrow of War*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3)。

37. William Quandt,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Leadership: Algeria 1954—1968*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69).

38. “准民主体制”的观点详见 Brantly Womack,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Revolutionary and Post-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China and Vietnam," *World Politics* 39:4 (July 1987), pp.479—507。

39. William Quandt, *Between Ballots and Bullets: Algeria's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ism* (*Washington: Brookings*, 1998).

40. Mack, "Why Big Nations Lose," p.184.

41. Ibid., p.194(原文为斜体).

42. Merom, *How Democracies Lose*.

43. 1972 年 7 月著名的女演员珍・方达到访河内并且接受了河内电台的采访。尽管当时美国已经接近撤出越南的最后阶段(亨利・基辛格在 10 月发表了“和平触手可及”的著名演说)，珍还是被普遍指责为不爱国。

44. 例如，尽管埃米利奥・萨帕塔反抗墨西哥国家的起义失败了，他的莫雷洛斯地区还是留在了萨帕塔主义者手中。参见 John Womack, *Zapata and the Mex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Knopf, 1969)。

45. 艾肯参议员的建议还有一个更长但是较少被引用的版本更为切中要害：“鉴于日子一天天过去的事实，美国武装力量的完整性和坚不可摧进一步受到质疑，因为没有军事目标，美国仅有两种选择：要么我们能把战争升级到新维度，即出现一个新的所谓‘进攻者’，从而摆脱困境；要么我们能从根本上降级战争，目前清楚存在的军事失败风险从此消失，也就是说为了避免美国武装力量置于妥协境地面临的任何风险，降级是必然选择。针对上述选择，美国最好单方面宣布越南战争的目前阶段已经结束，美国武装力量控制了大部分地区因此已经取得‘胜利’，没有任何潜在的敌人可能在南越建立政权。”发表于 1996 年 10 月 19 日美国参议院。

46. 参见 Pillar，*Negotiating Peace*。

47. H. E. Goemans，*War and Punishm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48.《君士坦茨和约》参见 www.fordhanm.edu/halsall/source/barbarossa-lombards.asp。

49. Pillar，*Negotiating Peace*，pp.78—80.

第二部分

非对称体系

第三章
多边非对称

双边关系可以说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组成单位。在多数情况下，双边关系会受到第三方互动的影响，但是并不由其决定。然而，还有些情况实质上是多边关系。19 世纪意大利的统一，即意大利复兴运动（*Risorgimento*）则是意大利内外多重行为体互动的一个复杂案例。[1]而且，即使行为体最初关注的行为是双边的，随后也常常要面对同时发生诸多重要反应的多边非对称战略形势。一般而言，每组现代双边关系都受到地区和全球环境的影响。

双边关系不容易预测，多边互动又增加了一层复杂性，将对不确定性的掌控提高为首要关切。在双边背景下，由于互动中包含选择，行为结果就是不确定的，预测也因为错误知觉而变得更加复杂。但是双边互动是连续发生的，涉及的行为体数量也最少。多边关系则增加了与不止一个伙伴同时互动的难题，关系的复杂性取决于其他方。[2]多边关系中复杂性的剧增改变了决策制定的背景，非对称则使其更加复杂。本书旨在建立非对称关系的模型，因此必须明确多边不确定性对各国估算的影响与地区内非对称难题（下一章的主题）的差异。本章我们讨论彼此相关影响的逻辑，第四章再研究特定地区的互动体系。

本章探讨的是多边非对称关系与降低同时发生互动的不确定性面临的挑战。首先看一看三角关系及其成员如何受到非对称的影响。再分析降低不确定性的单边途径，包括缓冲政策、围堵政策和平衡政策。最后考察国际联盟的模式，看一看它们如何使双边关系中的预期结构保持稳定。

多边互动、混沌与不确定性

即使在物理学中，互动同时发生也会带来不确定性的变化。如果两个互动物体的动量已知，比如地球与太阳引力互动，那么它们的作用轨迹是可以精确预测出来的。但是如果增加第三个物体，比如月亮，“三体问题”就产生了，它们的作用轨迹也不能以同样的方式预测出来。[3]如何计算最初人们所了解的引力问题曾经是牛顿最头痛的难题。这个问题被认为既难解又对天文学至关重要，于是瑞典国王奥斯卡还专门为破解它设了一个奖。当然，具体轨迹的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结果绝对不可知。亨利·庞加莱没有解决预测线性轨迹的难题，却通过用公式表示线性不可预测现象的参数奠定了混沌理论的基础。不必清楚在多体互动中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混沌理论却能够预测结果的大致范围。

当然，行星运动是宇宙中所有有质量的物体引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任何特定轨道都是一个无解的复杂“N 体问题”。但是，大部分的影响都微不足道，很多影响还可能抵消其他影响。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象在一个双方具有对等的扭曲作用的无限范围内有一组两个物体间的互动，我们就能给任何一次扭曲找到相反的作用力，它们就会彼此抵消，网变形就不会出现，线性的“双边”预测就是准确无误的。然而，国际关系中没有这种理想状态。即使只观察为数不多、规模各异且位置固定的几个重要行为体，同步互动的难题也足以把我们的注意力从预测个体的路径转移到关注各种可能结果的模式和参数上来。

国家都厌恶不确定性。只需看一眼 1815 年维也纳会议到 1919 年《凡尔赛条约》之间的欧洲大战略就能明白集体反应的纷繁复杂性。拿破仑的经验促使维也纳的政治家在欧洲协调的新基础上恢复了革命前的模式，并且第一次将维持普遍秩序的共同利益放在首要位置。[4]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拿破仑创造了各方都会畏惧的“绝对战争”新经验。[5]然而到了 19 世纪下半叶，欧洲的思想发生转向，特赖奇克[6]概括为更强调民族主义，并

且追求既定结构中的收益最大化。“刀剑更加嘎嘎作响，是因为人们更加相信它们不会派上用场。”[7]俾斯麦通过掌控联盟推动了普鲁士的事业，也是维持体系的主宰者，但却不能一直摆弄他国。[8]从这种相互竞争的民族主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将这段从相互竞争的民族主义到一战爆发的历史比喻为被自己的选择所束缚的行人，他们没有选择所发生的一切，却也无力逃避各自在灾难中的角色。[9]1919 年的《凡尔赛条约》一方面惩罚了战败方，另一方面也用国际联盟确立了集体安全制度，造成了新战争前的二十年危机。然而无论是通过合作、增强自身力量，还是削弱假想的敌人，这些努力其实都是为了控制不确定性。

那么，在多边形势中的非对称又有什么特殊作用呢？欧洲的各个大国之间就是彼此牵制，同时也相互有所诉求的，因为它们往往直接受到来自他国的最大威胁。比如，德国、法国、俄国、英国、奥匈、土耳其、意大利，对它们来说外交舞台一开始就是强国林立的。再有小国加入的话，要么是麻烦，要么是棋子。然而，只需看一眼 1914 年萨拉热窝的暗杀斐迪南大公事件，以及随后发生的一连串非对称结盟行为，就能明白小国的重要性。大战的升级源于小国。反抗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毕竟是国内的反抗削弱了土耳其和奥匈两个帝国。即使在和平时期，无论小国、中等国家，还是大国都是根据它们各自的实力及其被认定的脆弱性来决定立场的。

是将国家间互动视为一系列二元的关系，还是一种更复杂的多边模式完全取决于研究者。不同的选择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关注双边关系就侧重于互动的先后顺序，并且假定下一次行为是对前一次行为的反应。关注多边互动就会侧重于同时互动引起的不确定性问题，以及国家为应对不确定性作出的努力。由于该问题从根本上比线性顺序的行为复杂得多，一国的行为就必须被视为一种立场，也即一种对待被认定的多边模式的态度。

选择双边还是多边分析的结果虽然不同，但是并非相互排斥。事实上，多边分析也需要关注其中包含的双边关系，双边分析只有放在地区和全球背景下才会更加全面。当然，如果针对的是具体案例，可能比较清楚更适合选择双边还是多边分析。因为多边分析需要侧重于制约不确定性的模式，我们接下来就探讨一下三角关系模式和非对称对这些模式的影响。

三角非对称模式

三角关系是多边关系中最简单的形式，并且对于三角关系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体而言，由于受到自己对另外两方的态度之间的联系，以及另外两方之间互动的可能性影响，管理不确定性是一个比取得任何具体结果都更为现实的目标。更不用说，任何行为体都必须采取行动，它们或许能够忽略多边互动的不确定性，但是与此同时会面对未知后果的风险。

犹如任何多边形都能被分割为一系列三角形，对复杂多边国际关系的分析也可以简化为多种三角关系。在有些情况下，这种简化非常有用。例如，美国与巴西以及其他南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被视为一系列彼此重叠的三角关系：美国-巴西-第三方。此类分析强调的是巴西与邻国的关系中有很多是整体地区模式的类似典型代表。但是如果在美国与比如说东北亚的国家——中国、日本、朝鲜、韩国之间，对多边三角关系的分析就只能作为试图了解复杂的整体地区模式的一个步骤。

硬三角、软三角和内含的三角关系

三角关系分析的难题在于往往把双边关系从属于多边模式。多边环境几乎都对双边关系有重要影响，然而并非决定性因素。因此我们有必要区分硬三角关系与软三角关系的不同，前者是任何行为体的选择都由三角同时互动的结构决定的情况，后者是双边关系受影响但是并不由三角关系决定的情况。如果一个或者更多参与者可以选择另外的三角关系，内含的三角关系就会出现在更大的关系结构中。[10]硬三角与软三角的逻辑相同，但突出特征各异。所以，对内含三角关系的估算更为复杂，并增加了不确定性。在此，我们就着重分析一下效果突出时逻辑也更明显的硬三角关系。

对称的三角关系

图 3.1 展示了洛厄尔·迪特默(或称罗德明,Lowell Dittmer)对三角国际关系的最经典分析。[11]假定"朋友"(+)/敌人(-)是"关系中的选择",三角关系中的可能性就包括:三角家庭(+ + +)、浪漫三角(+ + -)、婚姻关系(+ - -)和单位否决关系(- - -)四种情况。任何一种三角关系的稳定性都取决于三方角色作用的总和。三角家庭(三个朋友,总和为 3)的稳定性就超过了浪漫三角(一轴两翼,总和为 1)、婚姻关系(两者为伙伴,一方被抛弃,总和是 -1),以及单位否决关系(三者互为敌人,总和为 -3)。与人们的直觉相反,人们往往认为婚姻关系最为稳定,事实却是三角家庭关系的稳定性高于婚姻关系,因为三角家庭关系中的三者都是接受次优选择的"朋友",不存在输家。而婚姻关系只能让两者基本满意(得分为 1),被抛弃的第三方得分最低(-3),这就造成极其不稳定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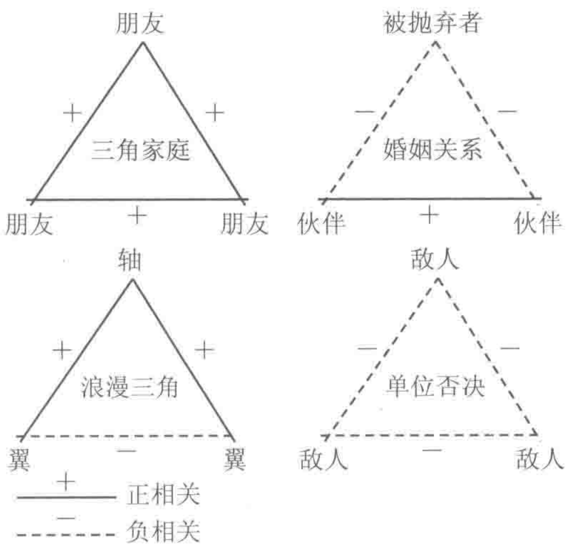


图 3.1 战略三角关系及其角色组成

迪特默的三角关系是一种假定为对称的关系。如果我们分析非对称的三角关系,各种可能性就会剧增,结果的模式也会发生变化。每个行为体的认知由此也都转变为取决于它们与其他行为体的实力关系。迪特默的模型中谁占据哪个角原本并不重要,但是如果在非对称三角关系中则变得不容忽视。[12]

非对称三角关系

三角关系中的行为体有四种权力排序方式：X = Y = Z，X＞Y = Z，X = Y＞Z，X＞Y＞Z。我们将其分别界定为："对称三角"（X = Y = Z）、"单极双边非对称三角"（X＞Y = Z）、"两极双边非对称三角"（X = Y＞Z）和"三边非对称三角"（X＞Y＞Z）。每种方式都值得研究，因为很容易就能找到每种方式相应的例子。[13]但是，"三边非对称三角"中的每一组双边关系都是非对称的，所以也是非对称效应的最佳代表，接下来我们将集中分析这种方式。

假定 X＞Y＞Z，婚姻关系和浪漫三角关系就会有一些子类型。在婚姻关系中，可以是最强大的 X 被抛弃，实力中等的 Y 和最弱的 Z 也可能是同样处境。与之类似，浪漫三角关系中的 X、Y、Z 都可以成为轴心。三角关系这样扩展开来就出现了 8 种模型，分别是 X、Y、Z 都是朋友的三角家庭关系，X、Y、Z 各自成为被抛弃者的 3 种婚姻关系，X、Y、Z 各自成为轴心的 3 种浪漫三角关系，以及 X、Y、Z 三者同为敌人的单位否决关系。

权力悬殊会产生以下两种方式的三角估算。一是预期与强国建立积极关系比与弱国建立积极关系的价值更大是合情合理的。也就是说，从 X 的角度来看，如果 Y 的实力比 Z 强大两倍，与 Y 保持和睦的价值就是与 Z 保持和睦价值的两倍。二是 X 如果与 Y 发生敌对也会消耗其相当于与 Z 敌对两倍的代价。当然，这些简单的假定都仅仅适用于证明下面的非对称三角关系的根本逻辑。

非对称稳定

根据上述假定，最稳定的三角关系就是 X 作为轴心的浪漫三角关系，其次是 Z 作为被抛弃者的"三边非对称三角"和婚姻关系。与对称关系中的稳定略有不同，非对称稳定中的降序排列依次是"三边非对称三角"、"浪漫三角"和"婚姻关系"。可以认为，XYZ 三者之间的实力差距越小，越接近于迪特默的战略三角。如果我们将实力差距最大化，最稳定的三角就是实力最弱的 Z 扮演被抛弃者的情况，这也是对于三角关系中的行为体来说最糟糕的可能。出现这种结果几乎毫无意外，非对称模型导致行为体的实力因素对战略三角关系整体稳定的决定性影响多出来一个附

加条件。与强国的关系被认为对于决定任何三角行为体的个体能力都至关重要,强国的个体能力对于决定战略三角的整体稳定也十分关键。毋庸置疑,实力极端悬殊情况下的稳定与强国的偏好之间关系密切。

然而,本书研究的非对称排除了极端情况。我们已经把非对称界定为处于对称和极端悬殊两者之间的情形,实力悬殊虽然决定非对称中的关系结构,大国却不能简单压倒小国。如果非对称正常化是以自主权换取服从,以 X 为轴心的"浪漫三角"就会成为表现出 X＞Y＞Z 特殊稳定性的三角关系。

由于获得 YZ 两国的顺服,X 可以设定 YZ 被允许的行动范围。一旦任何一方"破坏规则",X 有能力惩罚那个"罪犯"并将其拉回正轨。X 以这种方式维持现状,确保了 YZ 两国不可能根据其相对实力和意愿处理双边分歧。X 只是和平的守护者而非缔造者。YZ 两国也不能单独实现双方关系的正常化,因为 X 对于两国中的任何一方而言都比对方重要得多。XY 两国关系与 XZ 两国关系形成的对称恰恰是 YZ 两国不能发展出成熟正常关系的原因。事实上,XY 关系和 XZ 关系越是稳定,YZ 两国彼此承认自主权和顺从关系的可能性越小。X 凭借其实力优势足以维持整体三角关系的稳定性。然而,这种表面的平静下面潜藏着严重的不满。三角关系的维持是依靠 XY 之间以及 XZ 之间的实力悬殊,但是 YZ 之间的悬殊与此同时也在催生紧张关系,一旦 X 的实力优势受到破坏,那种紧张就会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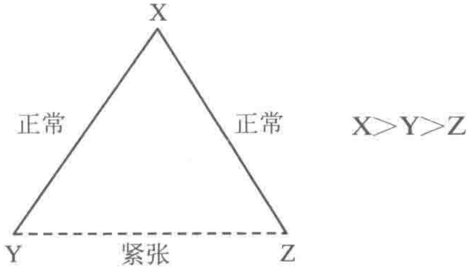


图 3.2　以 X 为轴心的非对称三角

图 3.3 呈现了非对称三角关系的一组实例,依据的是 2012 年的名义国民总收入和人口统计数据。[14]美国的国民总收入大约是阿根廷的 34 倍,

巴西的国民总收入仅相当于美国的15%。阿根廷的人口和国民总收入大约相当于巴西的五分之一。三角形中的每个角都与其受到三角关系的影响程度相关。显然，美国对这组三角关系关心更少，预期收益也更少。表中的数据没有太多意义，与第一章的AB双边关系图表一样，这组三角是想说明受到关系的相对影响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关注和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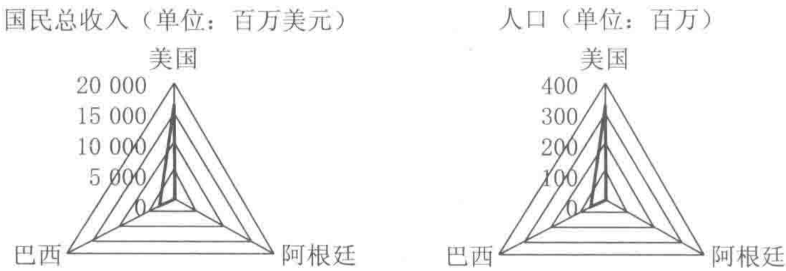


图3.3　非对称三角：以2012年美国、巴西、阿根廷的国民总收入和人口数据为例

资料来源：美国中情局世界概况（CIA World Factbook）。

被困扰的轴心X

尽管X在以其为轴心的三角关系中占据最有利的地位，并不意味着X总是对现状满意。就收益而言，很容易就能测算出"浪漫三角"中占据轴心地位的最强国其实是获益最少的，因为它的收益是根据其他弱国的实力来衡量的。X是从其他两国为了取悦自己而作出的让步中获益的，而这些让步都受制于两个伙伴国的实力。[15] X可能因缺乏收益，同时又考虑到成本核算而对维持轴心地位失去兴趣。X只是和平的维护者而非缔造者，所以它总是处于随时要作出承诺的不变地位。X不是要促成YZ的和解，而是要确保其紧张关系的稳定性。只要双方关系紧张但是可控，X就能轻松负担维持现状的成本。事实上，X的整体威望是靠这种轴心地位而得到提升的，对它来说成本微不足道。然而，一旦YZ之间的紧张关系由于一方或者双方的国内或者国际原因而被认为不可遏制地升温，X就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在YZ两国上，并且表现出更强的决心来维持现状，不得已时也要施加更多权力去平息危机，但却不能在重大冲突中使用武力。以X为轴心的浪漫三角显然对X来说不是没有成本的，相反还会随着YZ两国关系紧张程度的升级而成本增加。

备受挫折的中间力量 Y

如果 Y 仅仅需要处理与 Z 的双边关系，它会选择用自主权换取顺从。但是，由于 X 的存在以及 X 与 YZ 两国的关系，Y 的选择就受到了制约。它不能不考虑 X 的反应而直接对 Z 采取行动，如果 X 决定通过支持 Z 来维持三角关系，Y 就会陷入麻烦。况且，Y 重视与 X 的关系，即使 X 不积极支持 Y，疏远 X 对于 Y 来说也是一种重大损失。因此，Y 其实是被绑定在三角关系中的，即使具有讽刺意味的现实绑定会导致 Y 时常幻想如果不被绑定，它与 Z 的关系会如何。如果说 X 从三角关系中获益甚微，Z 对于三角关系妨碍其可能选择的负担则是最为心知肚明的。

焦虑又爱冒险的最弱者 Z

Z 如果处于轴心位置将获益最多，因为它的收益是根据更强大的 XY 两国的权力来衡量的。你可能凭直觉认为 X 通过分离 XY 和 XZ 两组关系就能轻松实现其诉求，因为 X 在这两组关系中都是强者一方。事实上，Z 却拥有最强的动机把 XZ 和 YZ 两组关系联系在一起，使自己成为轴心，这样可以获得在任何单独的 XZ 或者 YZ 关系中都无法实现的收益。这说明小国的冒险不仅是因为更大脆弱性造成的恐惧，也可能是出于梦想获得大国间的杠杆地位。2008 年夏天，格鲁吉亚对南奥塞梯的行动就是小国冒险的后一种例证。格鲁吉亚希望在对抗俄罗斯中获得美国和北约的支持。[16]托马斯·德瓦尔指出："在这种地区强国与全球强国的联合行动中，小国往往高估自己的重要性，大国也可能预期过高。"[17]

非对称三角中的地位与选择

这里我们回到最初的论断，即同时发生的多边互动将给国际关系带来更多有实质影响的不确定因素。这在"非对称浪漫三角关系"的例子中表现尤其突出，每个行为体都对三角关系中各自选择的实时效应愤愤不平。即使作为强大轴心的 X 也不会因其地位而有利可图，相反却有被卷

入冲突而损失更大的风险。在真实的外交世界里几乎无一例外的是，每个行为体都不仅要考虑如何在现有三角关系中谈判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包括如何通过改变甚至拒绝游戏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和失败的可能。既然规则如此的话，违反规则就会有后果，况且三角关系的法则不同于重力法则，也不存在三角关系警察可以把违规者绳之以法，只是会形成一张由非故意后果组成的密实网络。

尽管非对称三角关系中每个角上的行为体摆脱三角关系的途径各不相同，迫切需要消除不确定性而不是反复处理多边关系的确在各个行为体的国内政治中都是极其强烈的诉求。审慎处理三角关系要求每一组在双边维度上都要相互包容不满，彼此协调政策。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某一特定行为体的国内环境与三角关系完全矛盾，因此不存在对消除不确定性的统一国内压力，一般来说也很难让国内公众舆论接受为了与另一双边关系互动而不得不在某一双边关系中容忍失败的必要性。威廉皇帝辞退俾斯麦与其说是对某项具体行动不满，不如说是对俾斯麦整个平衡政策的谨小慎微表达的反抗。威廉的鲁莽冲动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关键在于国内民众和媒体也呼吁更坚定的国家形象。[18]如果某一行为体的国内政策存在矛盾，反动派就可能鼓吹失败的危险并且暗示"应该做什么"，即使这些人自己掌权后也会被战略谨慎派的游说所征服。

本书的研究不仅局限于非对称三角关系的一种结构，即 X>Y>Z，而且是一种不受成员国的替代选择影响的三角关系。三角关系中的其他结构形式可能也会产生非对称，比如 X>Y=Z 或者 X=Y>Z，但是情况会完全不同。三角关系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中的。某一行为体可能通过借助其他的关系来终结自己在当前三角关系中的挫败。[19]然而，单一三角关系对我们的研究来说已经具备充分的不确定性了，所以我们的研究做了上述限定。

维持和平的替代选择

鉴于 X 作为"浪漫三角关系"中的轴心，不难想象其国内民众不会在乎这种地位的些许优势，而是更多考虑卷入 YZ 两方冲突的可能性，以及自身"缔造和平"的身份缺乏成效带来的挫败感。于是，X 会努力调解 YZ

的关系或者干脆选择支持某一方，从而解决这种三角关系。无论哪种做法都可能奏效，毕竟不是所有的三角关系都能永久维持。因为Y和Z都可能顺从X，YZ就可能和解并且最后双方都仅保持与X的关系。同理，如果X选择支持Y，就会事先秘密运作针对Z的筹码。如果设想Z会简单屈服显然是轻率之举，Z一定会有更多理由来应对Y为寻求关系正常化提出的条件。[20]如果X选择支持Z，其效果就取决于X与Y之间的实力差距，并且即使X的相对优势非常明显，这种选择的风险也很大，因为对于Y来说是突然失去了稳定而面对一个变强了的Z。这就意味着X需要更复杂的战略才能运用其权威获得YZ两方避免危机的承诺，当然也能降低X作出承诺的风险而维持其权威。除了上述解除三角关系的选择，X也可以选择对YZ的冲突袖手旁观和保持中立，因为它并不会受到其中任何一方的致命威胁。

中间力量Y的选择

Y处于"浪漫三角关系"中最容易受挫的顶点上，它明白只有在X不介入的情况下才能解决与Z的冲突。尽管也顺从X，Y的国内民众可能既清楚本国相对X的强大实力是脆弱的，同时又厌恶X的存在。Y的选择包括：与X妥协；拉拢X支持自己；抬高X保护Z的可能成本直至超出X的承受范围。抑或是Y可以孤注一掷地判断X会更重视与自己的长远关系，从而放弃拯救Z以及当前三角关系的英雄主义行为。前两种选择都是支持X的，对Y来说不会没有代价。由X出面调解就承认了X即使在YZ的关系中也处于领导地位。同理，与X谈判结盟也限制了Y的单边偏好。然而，对抗X的选择代价更大。X可能将Y为挫败X对Z的保护而进行的军事准备视为Y对自己的不完全顺从，从而将XY的关系置于危险中，甚至可能促使X与Z结盟。如果Y简单判断X不会干预危机，Y就错了。即使不会冒险干预危机，X也会想办法惩罚Y对三角关系的破坏以及对X的不敬。

焦虑弱者Z的选择

如果说Y在三角关系中最容易挫败，Z就有最大的不确定性和焦虑。

Y比自己强大还不承认自己的自主权，X虽然是强大的友国，但是也同时是Y的朋友。由于对三角关系最软弱无力，Z的合理选择就是谨慎并且现实的，然而它还是会在必须使风险最小化与迫切需要降低焦虑之间犹豫不决，后者需要逃避而不是解决不确定性。X充当中间人的调解能消除不确定性，但是Z获得自主权的代价是成为X的附庸。除非X在新的YZ正常关系中是完全中立的媒介，否则Z都要担忧其保留多少自主权是由X决定的。X终究要离开，一旦X撤出调解，Z还有多少影响力？因为对X的支持以及与Y敌对带来的焦虑，Z破坏三角关系从而降低不确定性的最可能选择就是与X结盟，并且（或者）挑起X与Y的矛盾。最极端的做法则是引发与Y的危机，同时断定X会支持自己。与Y可能冒险作出的类似选择一样，这条路的最大问题在于X因此质疑Z的顺从，进而也就不会支持Z。当然，Z也可以选择与Y开战，不必猜测X会保持中立，还是支持Y，只不过考虑到与XY实力总和的巨大悬殊，这种选择就是孤注一掷。相比其他两种选择，最后一种选择对Z来说比对其他两方都更有吸引力的，即与可能支持其对抗Y的第四方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上述降低不确定性的选择要么是把三角关系化解为双边关系，要么是将三角关系变得更温和或者更安全。多边模式的优点无论在转变三角关系的不极端后果，还是在解除三角关系的极端后果中都得到了证明。在成熟的强三角关系中，作出选择的前提是各方都清楚历史和业已建立的沟通网络预示的后果。即便如此，因担忧第三方影响双边关系而产生的长期挫败感还是可能导致国内舆论要求消除不确定性的主张甚嚣尘上，并且完全不顾及实际执行的也是审慎外交。

非对称三角在动荡和革新的形势中表现最突出，新生的行为体迫切需要发展新的关系。我们的理论会预测俄罗斯在科索沃问题上试图扮演美国/北约与塞尔维亚之间的浪漫轴心角色注定失败，相反，美国与新生的后苏联国家发展直接关系则有助于维持俄罗斯与原苏联成员的紧张局面。同理，不足为奇的是格鲁吉亚也不能如愿让欧洲和美国承诺支持其对抗俄罗斯。在这些例证中，三角分析都比强调均势和追随强者的二元方法更贴切，因为最弱者不会在敌对的两强之间选边站队，而双边敌对的

化解又取决于Y和Z各自与另一强国的彼此关系。比如在科索沃的问题上，俄罗斯的沉痛教训就在于，其实力不足以要求北约管控与塞尔维亚的矛盾而不是一劳永逸地消除它。

多边形势下的虚假确定性

与混沌理论的参数化推论对等的另一种国际关系主张是审慎地管理关系，这就要求消除具体的不确定性，寻求合作和双赢的互动，以及组建有条件的同盟以提高集体可预测性。杰维斯关于复杂互动系统的描述就是这样的观点，系统中任何的行为都可能引发各种令人迷惑的意外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后果。[21]这是国际关系中的普遍问题。管理非对称关系是我们接下来谈论的主题，在此之前有必要分析一些忽视或者否认不确定性的做法。

多边关系重视不确定性，否则无法产生决策。决策制定的结束阶段不需要回避不确定性，很多决策者，比如哈姆雷特都会考虑自己是否作出了正确的决策，然而实际行动就需要“恰当猜测”该决策的效果如何。决策者的自信和确保外界也相信决策的正确性就要求把猜测描述成事实，这就是一种虚假确定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面对不确定性最好的做法恐怕是更要信心十足地采取行动。如果一个人把行动视为走向黑暗，他就不可能充满活力地开展行动，也不可能动员别人追随自己。

作为错误知觉的确定性

虚假确定性可以被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错误知觉。错误知觉最常表现为对现实的错误理解引发的困惑。比如，一片落叶被当作一只青蛙。然而，对一方的行为预计会发生平行反应的情况下，现实往往是不确定的，而不是可能被误解的业已发生的具体事物。因此，任何关于多边行为结果的确定性都是一种虚假确定性。虚假确定性可以被视为杰维斯理论中两条主线的组合，即错误知觉与意外结果的问题。[22]任何行为都是一种

冒险的话，也就没有什么行为可言了。追求结果产生了两种虚假确定性，一种是制造焦点的虚假确定性，一种是简单猜测一个行为体反应的虚假确定性。第三种形式则是自我实现预言的虚假确定性。

制造焦点的虚假确定性

界定国际关系中的具体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假定了不是分析焦点的那些因素对结果没有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造焦点的虚假确定性在所难免。即使一只蝴蝶翅膀的振动最终影响了宇宙的其他事务，我们也不可能对造成某一结果的所有因素加以分析。蝴蝶太多，时间却太少。对一组因素作出“需要注意的”和“无需分析的”区分是一种必要的信念取舍而非认知取舍。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意外结果其实是焦点问题的意外影响导致的，并不是所关注问题之外的其他因素的连锁反应。

猜测引发的虚假确定性

第二种虚假确定性是由将多边互动简化为线性互动引起的，具体说就是假定第三方（以及可能存在的第四方、第五方，等等）会以特定的方式作出回应。如果假定对方的反应，事实上就把多边行为变成了双边行为。如果行为被假定为意在影响一方，另一方就不会反思自己的地位，双方的行为-反应互动就被设定在固定的背景中。

自我实现的虚假确定性

自我实现的预言是一种甚至可能影响双边关系的特殊虚假确定性。自我实现的预言颇具讽刺意味。它起始于假定形势与行为体的决策无关，随后行为体的决策又造就了（原本被误解的）形势。最常见的负面例子就是银行发生挤兑时起初还有偿付能力，后来就受到恐慌驱使了。另一个正面的例子则是著名的庞氏骗局，由于吸引了持续投资而使原本是虚假的投资变得有利可图。罗伯特·杰维斯也把自我实现的预言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指出：

> 对国际关系而言，关键问题是建立在虚假印象基础上的一国行为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另一国的意图。如果是一种关于敌意的自我

实现预言，对高度冲突的确信无疑就会导致一场如假包换的冲突。原本可以缓解紧张局面和澄清误解的冒险也会随之被视为软弱的表现。[23]

消极的自我实现预言存在的逻辑异常之处是不能被关于结果的描述证伪，却可以被关于形势的结构分析质疑。杰维斯认为，直接的双边代价就是损失了彼此互利的互动机会。在多边形势中，消极的自我实现预言则是将持怀疑态度的行为体孤立起来，使其行为变得可预测。孤立和可预测制约了该行为体的互动，从而给其他行为体创造了通过结盟获取相对收益的机会。

积极的自我实现预言情况如何呢？如果因为自我实现预言而在毫无依据的合作假定基础上采取行动有没有危害？在双边情况下，答案可能是没有危害。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的著名例子就是在无休止的博弈中，最佳战略是以合作开始的，然后作出回应。如果对方的回应是合作，持续的合作对双方来说都是最佳选择。[24]在多边情况下，关于合作的结构脆弱的描述存在易受外部冲击的风险，外部冲击能让各方退回到原来的疑虑中，继而中止合作的行为。希腊债务引发的欧洲危机可以被视为关于财政统一的积极自我实现预言的结果。

对无休止的可能互动的虚假确定性反应可以被简单看作人为因素的影响，但只是部分而非完全的人为因素。消极自我实现预言的过度谨慎剥夺了根据对方行为开展互动的机会。假定固定第三方的行为往往导致对预计结果的直接盲目支持。通过制造焦点来界定具体问题，也可能被更大环境中的意外变化破坏。正因如此，面对复杂互动世界里的虚假确定性，我们的选择不是追求确定性，而是恰当管理不确定性。

管理不确定性

管理不确定性比应对威胁或者追求经济收益作为国际互动的源动力更具有普遍意义，因此也可能形成关于国际战略和结盟的完整理论。鉴

于主题宽泛,并且相关历史经验太多,我们在这里只能简单概括一下。本章的最后两部分拟从两个维度分析管理非对称不确定性的问题:一是应对个体行为体的战略;二是联盟模式。我们讨论的不确定性不仅包括安全,而且涉及机会问题、威胁问题,所以比关于战略和联盟的大多数研究范围都更宽。

所有国家都身处普遍的国际不确定性中,而非对称影响的是国家的紧急事务和战略。管理非对称对小国来说无疑是更紧急的关切,因为它们更易受影响而对总体形势缺乏控制能力,甚至可以说,除了一个超级大国之外的所有国家都在至少一种国际环境中处于弱者的地位。接下来,我们首先分析更适合小国的应对战略,然后再看大国面临的具体形势。

选择的范围

平衡和追随强者这两种常见类型虽然不足以代表全部的管理战略,但是的确说明了面对不确定性时的基本两难。[25]与人结盟更好,还是追求自己的独立利益更好?抑或是合作还是竞争更为有利?不仅安全问题存在这种两难,所有涉及机会和风险的国际关系领域无一例外。这也不是可以一劳永逸解决的两难。是应该更多选择合作,与别国联合来降低不确定性以及通过实力相加来减少脆弱性?还是应该避免合作的束缚,维护并促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按照霍布斯的观点,自由与安全是矛盾的。然而在多边国际关系中,这种两难塑造了多种可能而不是二元选择。外交官和学者对那些他们使用和描述过的选择进行了不同的界定,我们在研究中将其简化为四个节点组成的范围。

表 3.1 中列举的管理多边不确定性的战略适用于所有的国际关系议题。此表显示的战略选择范围与本书第一章中图 1.2 呈现的非对称互动之间的差别在于,第一章假定的是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双边关系。无论双边还是多边战略,两图中左右维度都是表示利益的一致和分歧。只不过双边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仅仅是线性的。多边关系中的基本问题不是“X 会做什么”,而是“明天可能发生什么影响到我”。此外,缓冲和围堵两种战略通常都与第三方有关,不会出现在双边情况下。

表 3.1 多边管理战略的范围

合作	缓冲	围堵	竞争

合作

合作包括参与多边制度和机制、地区组织，或者追随强者，都要服从于另一强国的政策。[26]当面对显然是共同难题，比如流行病时，即使国家想关注自我保护以及避免为共同事业奉献自己的资源，合作也会成为降低不确定性的唯一途径。合作因国家对某一行为模式的联合承诺而减少不确定性。承诺也促使资源聚集，增加了处于防御地位的目标相对于敌人的规模和复杂性，但是合作的根本贡献在于铺设了通往未知将来的道路，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每个国家都被绑定在道路上，依赖于伙伴的忠诚度。

缓冲

缓冲是一种通过拓宽或者加强与其他方的关系，从而减少受特定问题或者行为体的相对影响程度的战略。需要注意的是，它减少的只是具体受影响的程度，并非限制了关系。事实上，缓冲战略带来的双重保险增加了非对称关系，因为弱者一方原本仅受双边关系的影响，现在双边关系却成为全面关系中的一小部分。缓冲战略可以通过参与包含相关行为体并且决定其行为的某一重要国际机制来实现。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缓冲不同于合作战略的国际机制层面的特征就是，合作机制旨在为集体行动提供跨国途径，缓冲机制的主要目标则是为成员国制定规则并提供平台。另一种缓冲战略则是将小国的相似问题集合起来。比如，东盟的每个成员国都因东盟的集体存在而缓冲了与强大的非东盟成员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每个成员国也在继续发展与大国的双边关系。[27]

围堵

围堵战略是指预计双边关系可能恶化，从而相应调整其他关系的做法。围堵与缓冲战略的相似之处是，其目标都是要减少受双边关系影响的程度。不同之处在于围堵战略是在可能的双边利益冲突中保护自身的

利益，而不是仅仅把双边关系纳入规则或者与其他关系的框架中。合作与竞争战略的分界线就发生在缓冲与围堵战略之间，并且由于两者都旨在应对不确定性，相同的行为常常被解释为要么是缓冲战略，要么是围堵战略。例如，新加坡向美国海军提供舰队服务是围堵其邻国？还是单纯为了拓展地区外关系？不允许外国武装力量存在的地区协定当然是地区内的缓冲战略，防御性地区协定相反就是针对邻国的围堵战略了。

竞争

竞争的最一般含义是指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获取自身利益的努力。鉴于本书第一章中所述利益的位置性，即使在合作中也是存在竞争的。在牺牲自我利益换取公共产品的极端合作中，牺牲的痛苦和英雄主义就是对有定位的利益的证明。作为范围表格中与合作相反一端的管理选择，竞争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绝对收益。竞争行为也可以在他者的收益被假定为对未来选择没有负面影响的情况下追求最大化的（绝对）收益。合作的估算通常指向长远关系，竞争则倾向于关注交易收益的最大化。竞争者局限于相对（零和）收益，是因为当前收益被假定为会影响未来的相对地位。于是就出现了追求即使比敌人损失小一些也比获得与其同等的收益要好的极端情况，这也是大部分战争发生的逻辑。

大国与小国的交往之道

对于小国以及处于多边对称形势中的国家而言，管理不确定性是更加紧急的事务。后面的章节我们会详细分析单一地区和全球强国，这里不妨先说明它们的区别。大国理论上并不易受到个别双边关系的影响，但是它们都希望鼓励小国顺从自己。多边伙伴带来的两难是对一国采取的行动会影响到其他伙伴在类似情境中的预期。保罗·斯蒂芬提出，全球非对称因此就产生了国际法中更多的统一性，而对称则鼓励多样性和例外论。[28]他将冷战和后冷战时期的两组国际法机制作对比证明了这一点。一般来说，大国更愿意维护国际关系模式，不仅是因为它们会从中获益，也是因为这些模式减少了同时互动调整的成本和风险。

强国的模式偏好有时也会产生相反效果，将某一小国置于核心战略

地位,从而夸大其本身的重要性。小国要么是大国整体计划的触发器,要么是瓶颈,总之它正常的双边地位就被其多边影响夸大了。如果某一行为体的同意对一项具体计划至关重要,它也就因此对计划本身具有了重要性。但是,这种战略影响与更大实力带来的普遍地位不同。它的重要性是由强国的日程决定的,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且,强国可能反感任何的反抗或者犹豫,一旦时过境迁,小国就可能因这种反感而付出代价。

大国和小国在管理不确定性时偏好不同。大国可能强调利益的自然和谐,原因正如爱德华·卡尔所言,是由"特权集团的压倒性权力造成的"[29]。小国讨价还价的资本则取决于:一是它们是否认为和谐可信,二是它们有没有替代的关系选择。事实上有两种极端情况。比如在殖民地的轴辐式体系中,殖民地的唯一替代选择是要么投降,要么反抗。即使对于将来的世界治理来说,反抗都是更好的选择,然而可能性更大、同时风险也更小的选择却是在宗主国设定的规则内进行最优博弈。

另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小国在整体的关系结构——比如全球化——中有其他替代选择,不取决于任何具体的关系。它能将外部关系的重要性转化到不同的非对称关系或者一组关系中。它在每组非对称关系中讨价还价的地位就因此获得提高。小国承受不确定性的风险更大,因为任何互动对于主导国来说都是低风险的。本书第六章就认为,霸权之后的全球化世界不一定陷入混乱,但却因为行为体更多、更自主且更拥挤而变得更加不太平。

国际联盟的模式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个体国家管理不确定性的战略可能产生哪些国际联盟的模式。本书下一章再分析地区地缘政治形成的其他模式。不同之处在于,这里的"联盟"是从选择性亲缘关系(elective affinities)的角度界定的,[30]是指参与者为应对多边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模式。在地区形势中,邻国是不能选择的,地区关系的环境从根本上是由邻国之间的非对称

引发的关注模式决定的。

国际联盟的可能性取决于两条原则。与个体管理战略形成的合作/竞争范围类似,表 3.2 的水平维度是这样设计的:左边一栏代表合作,中间一栏代表竞争大环境中的合作,右边一栏代表利益有分歧。表中的垂直维度代表的是成员国对联盟的承诺水平。高水平的合作承诺意味着每种类型的联盟都最大程度地实现了降低不确定性,以及个体决策随意性的最小化。中等水平的合作承诺构建了协调的制度和程序,也允许成员国参与集体行动的多样性存在。低水平的合作承诺只形成了共同立场,并没有将国家绑定在共同行动上。尽管联盟的范围通过二维图而不是这种三三分格的表就能清楚呈现,列出表格还是更便于证明可能选择的多样性。

表 3.2 联盟的模式

	共同体	同　盟	等级制
高水平合作	超国家	协调性军事同盟	帝国
中水平合作	无强迫、有制度	临时的联合	宗主国
低水平合作	协商/全体一致	协约国	不受挑战的领导权

共同体

合作一栏主要关注成员的共同利益。成员间的不确定性得以降低,集团的外部地位也因为成员的联合而得到协调和提升。最高水平的合作形式即超国家(meta-state),它有能力作出即使对持异议的成员也具有约束力的决策。欧盟就是这类合作的典型例子。中等水平的合作能够借助机制产生普遍性政策,但是显然不能在没有得到相关成员同意的情况下强制执行政策。最典型的代表是有组织的国际法律机制,比如世界贸易组织,或者各种联合国专门机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也算是一个地区代表。在最低水平的合作中,国家承认共同利益的存在,并且鼓励协商,但是缺乏共同行动需要的一致性。这种联盟只有一个软弱的协调官僚机构,以及临时或者是非正式的协调渠道。东盟最初就是这样的共同基础组织,若干年后才比原来发展强大了。除了协商渠道,东盟的例子还表明这类组织能够在消除成员间的不确定性,同时在提高其整体国际地

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同盟

在中间一栏的联盟形式中，成员的共同利益是根据实际或者潜在的外部竞争而界定的。格伦·斯奈德将同盟定义为“国家间为对抗非成员而具体决定使用或者不使用军事力量的正式联合”。[31]该定义对于我把“协约国”也作为最不正式联盟类型的研究来说有点儿苛刻，它的要点在于强调要控制有关“他者的共同预期”。乔治·利斯卡认为：“同盟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反对某人或某事。共同体意识能巩固同盟，但是不能产生同盟。”[32]希特勒说得更直白：“不以战争为目标的同盟是毫无意义并且无用的。”[33]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可以说是协调性军事同盟的例子，也是个体成员的实力都承诺给共同行动和防务的强同盟形式。1887—1890年俾斯麦德国与俄国签订的《再保险条约》也是一种正式但是最小化的同盟，仅仅承诺了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如果陷入与第三方的战争，另一方都会保持“善意的中立”。它不是为了建立同盟，而是旨在防止出现一个对立的同盟。

临时的多边联合建立在成员的正式承诺基础上，但是行动的焦点需要以协商为前提，并且实际的联合行动可能很难协调。在海湾战争，以及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行动中出现的联合代表了这一类型的多种可能性。另一种并列的弱联盟形式是协约国，国家间共同利益的前提是面临威胁但是并不承诺采取共同行动。协约国的存在减少了因某一特定威胁或者危机事件带来可能后果的不确定性，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各国也可能退出联盟。1936—1941年的希特勒德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恰恰证明了协约国的好处与问题所在。

等级制

右边一栏的等级制代表强国的利益占主导，联盟内部有利益的分歧。然而，等级制能减少不确定性，并且至少使强国的行为可预测，以及同时/或者也可接受。“等级制”概念的模糊性很适合在这里讨论，因为权力既可以适用于强等级制，又适用于在弱等级制中指代软实力。强等级制形式就是帝国。政治共同体仍然存在，但是失去了主权。苏联就是一个典

型代表。中等水平的等级制是宗主国。成员国的自主权获得承认，但是要顺从中心大国。传统的中华朝贡体系是这类代表。最弱也最常见的依附形式是联盟的领导权丝毫不受挑战，这是一种等级制，每个成员国又都能根据自身利益调节其服从行为。

结语

我们关于联盟和依附的讨论可能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结盟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实际上结盟的基本原则是要控制不确定性，任何政治活动领域都存在不确定性。然而，我们在此必须放弃对结盟的丰富图景进行的详细描述，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管理多边不确定性是如何能够解释和形成广泛的国际联盟的。除了因同时互动引发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还有其他形式。我们可以称之为事件不确定性，而不是互动不确定性。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事件不确定性往往增强了国家位置性的重要意义，因为未知将来中唯一的确定性就是国家的利益和国家的邻国不可能变化。国家的位置性因此就影响着议题以及联盟的选择，下一章我们也随之研究地区特征对非对称关系结构的影响。

注　释

1. Denis Mack Smith, *Modern Italy: A Political Histo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2. Jervis, *System Effects*.

3. 对该问题的精确描述看似简单，其实不然。三种微粒在空间中受到其重力的相互吸引而移动时，假定其他条件不变，重力才决定它们接下来的运动。参见 June Barrow-Green, *Poincaré and the Three Body Problem* (History of Mathematics no. 11,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1997), esp. pp.7, 15。

4. Paul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London: Clarendon Press, 1994).

5. Carl Von Clausewitz, *Vom Kriege*, book 8, chapter 2: "Absolute und wirklicher Krieg"(Berlin: Dümmers Verlag, 1832).

6. Heinrich von Treitschke, *Politik* 2 vols. (Leipzig: Hirtzel, 1897—1898); Paul 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0), pp.68—169.

7. 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London:

Clarendon, 1954), p.156.

8. David Calleo, *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10—13.

9. Margaret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3).

10. Timothy Crawford, *Pivotal Deterrence: Third-Party Statecraft and the Pursuit of Pea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11. 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33:4 (July 1981), pp.485—516.

12. 以下观点详见 Brantly Womack and Yu-Shan Wu, "Asymmetric Triangles and the Washington-Beijing-Taipei Relationship," in Womack, *China among Unequals*, chapter 15。

13. 例如，在东南亚政治领域，中国-泰国-越南的关系就是一种"单极三角"，泰国-越南-柬埔寨的关系则是一种"两极三角"。

14. 此类三角形是通过测量从中心点到最顶端的数据确定每个 120 度分区，然后连接各个端点形成的。借助微软的 Excel 软件的径向图功能(radial graph function)。在此，我要感谢我课堂上一些学生的帮助，他们是：丹尼尔·史密斯、伊丽莎白·米勒、约瑟夫·布赖恩、约瑟夫·吉尔伯特。

15. Timothy Crawford, *Pivotal Deterrence*, pp.20—24.

16. Niklas Nillson, "Georgia's Conflicts: Abkhazia and South Ossetia," in Svante Cornell and Michael Johnson, eds., *Conflict, Crime, and the State in Post-Communist Euras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4), pp.103—128.

17. Thomas de Waal, *The Caucasus: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4.

18.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 pp.56—79.

19. 参见克劳福德(Crawford)在《轴心威慑》(*Pivotal Deterrence*)中关于其他选择对三角关系影响的分析。

20. 也有可能 Z 会因命运的变动而精神受挫，被迫选择殊死反抗。

21. Jervis, *System Effects*.

22.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and System Effects*.

23.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p.77.

24. 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25. Stephen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26. 沃尔特将追随强者定义为"与危险的来源结盟"(ibid., p.17)。这种定义将追随强者的行为(即倾向于服从)与追随强者的动机(即消除威胁)就混为一谈

了。加上他对均势的补充定义,即"与他者结盟反抗威胁的来源"(ibid., p.17),这就大大缩小了服从的范围,形成对联盟起源理论的同义反复论证。

27. Alice Ba, [*Re*] *Negotiating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8. Paul Stephan, "Asymmetry and Selectivity: What Happens in International Law When the World Changes,"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9. Edward Hallett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London: MacMillan, 1939), p.80.

30. 按照歌德和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就是 *Wahlverwandtschafen*。

31. Glenn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4.

32. George Lyska, *Nations in Alliance*: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2.

33. 引自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p.109。

第四章
地区非对称关系

前面几章关注的是同时互动对多边非对称的影响，这一章重点是多边环境中位置的作用。同时互动和位置都是多边互动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些要素在研究中可以被分开，是因为减少不确定性的估算是个体国家的行为，而相对稳定的邻国结构中每个国家的位置往往形成了固定的关系和互动模式。然而，政治共同体却只能在它们生根发芽的地方寻求发展，地区关系模式的产生因此就离不开反复的互动、有定位的历史，以及各个邻国对未知前景的预期。

"地区"一词在世界政治中得到广泛应用，也应该如此。它既可以专门指代有组织的地区，比如欧盟或东盟，也能够用于讨论中东、东北亚或者南美洲的问题。即使存在地区组织，它也不一定与该地区完全一致（比如，瑞士当然是欧洲国家，但却不是欧盟的一员），并且地区组织的政策也不能完全取代成员的地区政策。因此，世界政治也并没有被分割成一系列稳定却相互排斥的地区。比如，你既可以用"苏联的继承国"，也可以用"中亚国家"指代同一地区。接下来，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地区概念含义的多样性。

然后，我们再给出地区的定义。本书的观点是，地区概念的效用源于它们作为互动结构的位置性，地区概念在经验事实层面千差万别则是因为它们仅仅是一些子体系而非自主的体系。存在于个体主权国家与全球互动之间的地区决定了地区关系的典型问题。地区大国可能既非邻国也非全球大国，地区外的更大范围实际影响着地区内的关系。

非对称创造了一种地区关注模式，该模式决定着地区的政治互动。如果我们把双边非对称关注的模式应用于多边形势中，地区大国就成为该地区受关注的中心，因为地区内的小国会更容易受到其影响。成为地区关注的中心并不意味着成为主导国，其他国家的集体力量可能更强，而且地区外的行为体和大国也可能卷入冲突。在存在多个地区强国的情况下，地区关注的范围会扩大，并且集中于地区强国之间的关系。所有地区强国面临的基本两难是它们处于默认的地区领导地位，地区却没有限制成员的替代选择。

地区性创造了关注的中心，也给软实力创造了机会，即那种无需奖惩就能换取国际服从的实力。软实力是一种复杂现象，它需要围观者的关注，得益于吸引力，最终又要借助劝说的力量。因为中心国家拥有地区关注度，软实力实质上是互动性的，并且合作又要取决于他国的选择，软实力实际上是互动实力。

既然地区都处于中间地位，考察地区外的关系就非常重要。首先是全球大国和全球大国体系的影响，其次是各类国际机制对地区大国和地区成员的具体影响，最后通过界定地区的范围，任何地区的边缘也具有不容忽视的潜在影响。

本章的结论回归地区性的原始难题及其对世界政治的重要意义。尽管地区的价值在过去也经常被全球殖民模式和两极化推翻，我还是认为全球化创造了一种国家间都有日益直接的地区外联系的环境。轴辐式的全球结构已经被“多节”世界取代，国家间实力差距仍然重要，但是全球关系不一定是由中心国家控制的。2008 年开启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时代可能加剧世界政治的“多节”特征。本书第六章将回归世界秩序中的这一主题。

地区的模糊性

如果没有“中东”一词很难适应，但是要给这一地区下定义或者列出

其成员也很难。规避争议的一个办法可以是使用“大中东”[1]的概念，然后在其框架下讨论一些具体问题，比如地中海东部或者阿拉伯世界的问题。“中东”这个概念因著名的美国海权论提出者、海军上将马汉而广为人知，马汉用它向英国说明波斯湾对于控制印度的重要性。[2]即使在使用初期，“中东”概念也是模糊的。时任《泰晤士报》国际部负责人的瓦伦丁·凯洛尔很快就把它扩大到中国西藏地区。[3]关于地区的一般思想甚至比某个单一概念（比如中东）更模糊。如果我们增加地理显微镜的放大倍数，我们可以把有些国家，比如黎巴嫩或者阿富汗，看作拥有名义上国家主权的一些微型地区。抑或是我们也可以不看细节，而把亚洲或者东亚看作地区。

与成员模糊性互补的是中东政治的可渗透性，以及缺乏持久或者全面的地区组织。几乎没有任何地区问题可以在完全不考虑地区外影响的情况下得到有效的研究。尽管外部干涉者可能既没有得到其所求，也不想持有其所得，他们还是会不断尝试，并且的确影响了地区行为体的行为和结果。至于地区组织，事实上任何努力都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常见中东国家，无论如何也只能以失败告终。[4]如果从相反方向看地区互动的话，就不难理解齐韦·毛兹和本·摩尔是从中东的例子中研究“持续的国际敌对”的。他们的书名《被斗争束缚》可以被视为反向定义地区的一种方式，当然，该书并不是说所有地区成员都被同一场斗争束缚。[5]

中东作为一个地区的难题可以通过两个同样经典的国际形势分析加以说明。在 1958 年，伦纳德·宾德提出全球两极格局并没有影响中东政治，美国试图在全球框架下解读中东政治只会导致错位的政策和意料之外的结果。相反，中东应该被视为一个“附属体系”，不是说它服从全球体系的规则，而是说它的政治自主权处于全球冷战格局之下。即使有人认为中东的局势对全球两极对抗意义重大，对于全球大国来说最有效的战略都是尽可能保持低调。同理，域外大国维持体系的行为比试图修正体系的干预行为成功的可能性也要大。[6]

相反，1997 年伊恩·拉斯提克提出，由于全球强国在中东的存在排斥了地区核心大国出现的可能性，中东尚未并且也不能实现有意义的一体化。全球大国及其在 20 世纪对边界和主权的承诺决定了它们不会允

许中东出现遵循欧洲大国、俄罗斯和美国历史道路的修正主义地区强国。因此，中东就陷入了与世界其他地区一体化趋势相反的“政治落后”境地。中东也可能有自主的地区互动，但是只能发生在由域外大国维持的当前关系框架内，而这些大国彼此都支持地区的维持现状利益。[7]海湾战争恢复科威特的主权或许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

如果我们将其视为地区两难的两个极端，上述两种对立局面其实是可以调和的。一方面，位置性是有影响的。一个全球大国在某一地区的利益是由其全球利益衍生出来的，如果认为同样的全球利益下不同的地区行为体可以自主决定其各自行为，那当然是错误的。全球与地区利益之间会有联系，成功的协调却需要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利益链可以从共同利益中产生，但是不能强加给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某一地区并非仅仅是全球地区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地区成员身份并非自愿选择的，各国都有寻求地区外联系和联盟的各自选择，并且全球大国能够无视地区成员而干预地区事务。拉斯提克认为，即使地区的“自然”排序也可以由地区外大国设定。简言之，地区性是地区内外各种力量协商的结果，只不过是基于恰当位置上的协商。

界定地区

尽管中东为界定地区性的困难提供了一个具有警示性的例子，但是能证明地区一致性的积极例子更多。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欧洲作为一个地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发展成欧盟这样的超国家制度的过程。[8]地区互动模式的范围相对比较宽。中东展示的是一种复杂的意识形态和身份互动的图景，其他地区则更多是沟通和贸易的高度密集模式。而且，是否存在地区组织、地区组织的全面性，以及它们的包容性或者排他性都会产生重大差别。地区特征的这些巨大差异同时提出了定义地区的挑战和进行分类的必要性。

地区的定义

地区，即由自主的互动行为体组成的有定位的子体系。“有定位”意味着地理的一致性很重要。联邦国家，即著名的英联邦就因为地理上太分散而不能被视为一个地区。虽然不能明确究竟多远的距离才能组成一个地区，但是关于地区性的主张都隐含着地理上接近的主张。“子体系”是地区定义中最重要的要素。任何一种体系都必须是其中各部分保持一致的互动，而子体系是依托于大体系的，并且无需包含所有的部分。在纵向上，地区是全球体系的一部分，在横向上，地区外还有国家。地区因其各部分的自主性而不同于帝国。地区内的互动涵盖了从敌视对抗到经济一体化的全部可能，但是互动必须是持续的，互动模式的一致性源于地区，否则它就不是一个体系。定义使用“自主的互动行为体”而不是国家，是因为的确存在着一些能自主发挥作用的非主权、有定位行为体。自主性是必不可少的。作为殖民地的南亚不足以成为一个地区就是因为殖民地要效忠于不同的主人。任何符合定义标准的政治共同体集团都能被称为一个地区。非对称不是地区定义的一部分，然而的确很难找得到，甚至很难想象出一个由完全对等行为体组成的地区。

地区的定位

从地区的一般定义到一般形象，可以发现地区占据着国际舞台上自主行为体与全球体系之间的中间位置，这也带来了地区的边界问题——谁在地区内？谁在地区外？地区性因此也取决于多个方面，模糊性是不可避免的。“子体系”本身是一个矛盾概念。越是“子”意味着越受到外部力量或者成员间彼此差异的影响，于是也就不成其为“体系”。越是“体系”就越具有相对于外部世界的自主性，并且形成了行为体之间的帝国秩序，于是也就无所谓“子”。因为并不存在某一地区的典型或者原型例证，只能找到具备共同形势特征的诸多例子。尽管存在中间地带的模糊性，一个地区还是必须符合格特鲁德·斯泰因笔下的“奥克兰”门槛——它就真实地存在于那里。

地区大国处于中间地位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中等强国。“中等强国”这个概念通常是指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那样的，虽然不是超级大国却对全

球政治有一定外交影响力的国家。马丁·怀特对其有非常简明的定义：

> 中等强国具备一定的军事实力、资源和战略地位，以至于大国在和平时期需要它们的支持，战争时期虽然它们也不可能战胜大国，但是如果大国选择攻击它们，它们能够让大国付出远远大于攻击收益的巨大代价。[9]

怀特是根据与大国的敌对关系定义中等强国的。事实上，他还提到中等强国的数量会因大国数量的不同而不同。它们可以被视为“并非无足轻重的小国”，不一定是地区大国，比如加拿大，却具备仅次于全球敌对大国的重要性。因此地区大国可能是中等强国，但它们特殊的“中等”地位是由它们在地区的力量而非全球大国决定的。

地区名称的模糊性

为了说明地区大国的定义，我们再回到导言中对中东的讨论。马汉关于中东的命名明显是不成熟的。他认为，中东仅仅是全球利益的一个舞台，唯一特征是其位置，该位置的重要性也仅仅是因为处于大英帝国与其远东利益中间。尽管彼此互动边界的模糊性带来了扩大地区概念的持续诱惑，所谓“大中东”的说法也往往是根据全球利益而非子体系的中心进行命名的。比如，如果南亚包括巴基斯坦，怎么能不包括阿富汗？因为阿富汗对巴基斯坦的对外关系来说至关重要。或许应当包括，但只是对较小的地区来说更为合理。迈克尔·巴尼特就准确描述了阿拉伯国家联盟中七个核心成员间阿拉伯政治的兴起、全盛和衰落。[10]这些国家构成一个子体系，并且把以色列作为推动地区政治的持续因素，以色列犹如是放在牡蛎中的沙粒。巴尼特的研究也提出了地区的持久性问题，地区的兴衰是否取决于互动的强度和一致性？即使一些小的集团，比如以色列、约旦和黎巴嫩，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地区三角”并且因此成为一个“微型地区”。也可以把一些弱小、多共同体的国家政治——比如黎巴嫩、也门和阿富汗——视为一个“微型地区”，即使这些行为体通常并不能被认为具有自主权。

我的研究含蓄地放弃了对地区进行具体化和二分法的定义。我们也不赞同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将世界分成二元的“地区安全复合体”。[11]

或许对于每个地区来说他们的划分都有合理依据，但是试图将笛卡儿式的清晰运用到地区性上是一种根本的误导。尽管布赞和维夫是为了修补“子复合体”和“超复合体”这样的概念，因为清楚的定义往往会由于地区政治纷乱多变的现实而变得模糊。地区中可能还存在地区，“子”总是代表某地区体系中的一部分。即使是欧盟这样拥有最大组织形式并且内在统一的地区，也难以确定其“天然”边界。

表 4.1 地区性的维度

	自主性	定 义	多节性
强	几乎不受外部干预	排外的成员身份和组织	一个地区强国
中	与外部集体互动	包容的成员身份，部分组织	两个地区强国
弱	共同的外部脆弱性	竞争性互动，无组织	超过两个地区强国

表 4.1 展示了地区性在由强及弱的范围内的一些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是彼此相关的，尤其是自主性和定义两项特征，与此同时它们具有充分的差异性能够被单独衡量。某一地区如果在所有三种特征方面都强，就属于“全体系而无子体系”的地区性极限，反之，如果某一地区在三种特征方面都弱，就很可能属于“无体系”而全部是“子”属性的地区。

自主性

自主性与地区内外关系之间的平衡有关，同时也与全球大国和周边的地区外行为体有关。强自主性意味着地区的内部互动就是其成员国的主要外部利益。中自主性意味着外部行为的影响取决于地区集体互动（当然不一定是合作）。弱自主性则意味着即使没有多少集体影响，个体也受制于外部互动。

定义

定义是指地区相对于成员国的地位及其对地区的集体认同。如果成员身份明确，并且有制度成果，就属于强定义。彼得・卡赞斯坦就对欧洲正式和排他的地区结构与亚洲非正式和包容的地区结构进行了有益的区分，这对我们的研究非常适用。[12]欧盟是前者的典型例证。强联盟不同于强地区组织，因为联盟的发展方向不同，并且成员国不必被定位在一起。

但是,坚固的强联盟有明确的成员,也会为共同目标而协调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与地区相似。中定义意味着某一地区内有协调行动,但是并非成员个体行动的前提,并且能够包容地区外伙伴。东盟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它遵循协商一致原则运行,还有一套"东盟 + X"的设计。弱定义则意味着没有地区组织,成员对重要的地区互动也没有很高的共识,甚至只有竞争性互动。

多节性

多节性是指地区内行为体的数量,强国能够阻止弱国的挑战。由于接下来将要讨论的原因,某一地区强国会成为日常地区关注的核心。如果有两个强国具备挑战彼此的实力,它们的关系就成为核心,但是如果有超过两个强国,日常的地区关注就会被分散,可能影响平衡的危机则成为关注的核心。

例证

尽管上述特征是强强相关、弱弱相关的,还是有些例子表明它们并非仅仅是分析上的差异。战国时期的中国就是一个有自主性但是被定义为竞争的地区,类似于谢茨施耐德的酒吧斗殴比喻,[13]当时的中国成为一个吸引周边融入的大漩涡,虽然自主性强,但是定义和多节性特征很弱。[14]南亚可以作为强多节性、中自主性、弱定义的例子。欧盟则属于强自主性、强定义、弱多节性的代表。然而,上述维度分类的主要作用不是清楚归类地区,而是表明它们之间的差异及其发展的维度。例如,南亚由于其弱自主性发展成东盟那样的地区定义,南亚已经在利用其地区定义获得自己严重缺乏的地区外集体存在。[15]

中国是地区性模糊和地区大国的最佳例证。鉴于其规模和地理条件的多样性,我们将中国界定为"地区国家"而非民族国家。[16]尽管不是联邦体制,中国的中央政策也和联邦制在实施国家政策时一样需要管理地方属性。西藏[17]、香港、澳门、台湾这些特殊组成部分也加剧了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国家的复杂性。在自身边界之外,中国还是东北亚、东南亚和中亚这三个不同地区的地区大国。这三个地区加在一起可以被视为亚洲,事实

上各自地区内的一致性又都足以构成三个独立地区，每个地区在自主性、定义和多节性方面都有很大差异，对三个地区中组织程度最高的东南亚而言，中国还是一个外来者（当然是相邻的外来者）。另外，中国的多重地区性也影响了它与每个地区的关系，正如其日益增长的全球存在一样。且不论中国不可避免的模糊性，忽略中国或者印度的地区性而将其视为一个单一的全球行为体，就会遗漏关于其外部形势的很多现实。[18]

地区关注模式

如果地区内包括一个或者多个地区强国，其他成员都不是地区强国，就会出现本书第一章描述的地区关注的双边非对称模式。地区内每个小国都比其他大国伙伴相对而言更多地受到关系的影响，因而对关系更为关注。另外两个影响地区关注的因素是地区大国可能有不止一组非对称关系，以及地区外强国可能与各方都有关系。

图 4.1 展示的是一个地区强国与四个小国成员之间的地区关注模式。每组双边关系的关注焦点都是强国 A。各国面临的基本问题都是与 A 的关系如何影响自己，通常小国都比大国受到双方关系更多的影响。在某一地区有定位的多边环境中，这些双边关系会将 A 国置于地区关注的中心，并且这种中心地位的影响力要超过各组双边关系的总和。本书第三章中描述的多边关系固有的同步性和不确定性增强了 A 国相比较 B、C、D、E 之间的直接关系的地位。而且，既然各国的关注都指向 A，它往往也就成为地区沟通的中心。

C

A>B, A>C, A>D, A>E, → B　A　D

E

图 4.1　地区关注的模式：一个地区强国

因成为地区关注的中心而重要性得以提升尤其有趣，因为这是 A 国

卷入与邻国的多重非对称关系的结果，邻国的物质实力之和其实也很可能已经超过 A 国。即使 $A<B+C+D+E$，A 国作为地区关注中心的模式仍然能维持。A 国的中心地位不是由于邻国不能团结起来而获得的，而是几组双边关注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使邻国组成了对抗 A 国的联盟，A 国仍是地区关注的焦点。

图 4.2 展示的是地区内有两个强国的情况。A 和 A′同为地区强国，它们一定有一组对称关系，或者至少一组相互矛盾的非对称关系。于是，两国互为对方地区关注的主要焦点。我们可以将 A 和 A′称为非等级制关系中一般意义上的互动行为体式的“对手”。[19] 这是一组利益不同的关系，可能是合作、竞争，或是冲突。无论如何，这都是地区内最重要的关系，既增加了两者实力优势的中心性，也作为一个整体给该地区提供了又一个焦点。如果这一关系是敌对的，地区联盟会分化邻国对 A 和 A′两国各自的关注度，同时又增强邻国对这一关系的关注度。

C

$A>B, A>C, A>D, A>E,$ B　　A, A′　　D

$A=A'$ →

E

图 4.2　地区关注的模式：两个敌对的地区强国

图 4.3 表明，地区强国的增多通常就排斥了对非强国的特别关注，而是将地区关注集中于多个强国的互动上。典型的案例就是欧洲。因为地区强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们彼此斗争和联合的结果是整个地区最重要的不确定性，从而也是地区关注的焦点。多个强国的存在增加了大国权力平衡的重要性，因为作为地区强国，它们有可能改变总体的平衡。即使是非强国之间的关系可能也要取决于它们对地区内权力平衡的影响。因为有太多强国，怀特关于地区内中等强国并非无足轻重的想法就与地区内非强国的预期关注度基本相似。富勒姆斯和维纳描述的当今南美洲的地区主义类似于这种情况，巴西是毫无疑问的地区强国，阿根廷、委内瑞拉、智利和哥伦比亚都是次强国家，四国对巴西和全球体系采取不同的战略。[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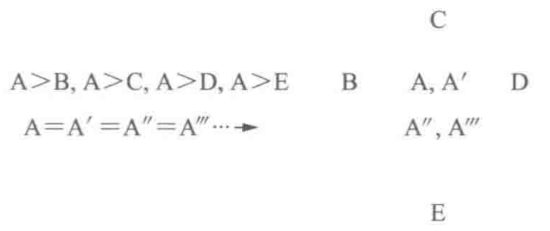


图 4.3 地区关注的模式：多个地区强国

上述三种模式的假定前提是关系的非对称影响会产生关注的差异。非对称往往是相对稳定的，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关注的正常模式。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也常出现某一危机导致某一具体问题的利益和不确定性成为关注焦点的情况。例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首先是斯洛文尼亚，之后克罗地亚、波斯尼亚、科索沃依次成为危机关注的中心，当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是最强国，而是危机中这些国家成为地区不确定性的中心。另外，地区强国之间也发生危机，届时关注的正常模式就会因危机利益的扭曲而强化。危机时期与正常时期一样，各国的首要关注都是自身可能受到什么影响。

软 实 力

“软实力”或许是当今国际关系理论最成功的概念创新了。自 1992 年约瑟夫·奈提出此概念以来，它就被全世界的主要政治家和媒体广泛使用。[21]约瑟夫·奈也由此发起了关于美国外交领导地位及其无需使用奖惩措施（硬实力）就能获得其他国家顺从的探讨。尽管地区软实力不如全球软实力那样显著有效，但是，我认为软实力源自国际关注的中心，因此是发端于地区层面的。

软实力其实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松散概念，更受政客们追捧而被学者们摒弃。当然，软实力并非没有意义。与地区性类似，软实力介于国家形象与硬实力之间的模糊地带。塔希提也有形象，却难以称之为“软实力”。香格里拉也有形象，却根本不存在。[22]另一方面，软实力通常被等同于权

威、威望、地位，仅仅是对一国硬实力的承认。如罗伯特·吉尔平所言："国际体系中最有威望的成员拥有触手可及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优势，能够将意志强加于别国。"[23]由此可见，软实力仅仅是硬实力的可信度。

当然，软实力也并非仅仅是利剑的锋芒。斯大林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调侃就是讽刺"教皇得有多少分歧(divisions)?"，结果1947年被他强制归顺的东欧后来却大面积背离苏联。最终还是1979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访问促使波兰由原来消极的抵抗变成了积极的抵抗(苏联)。"斯大林的硬实力又能造成多少分歧(divisions)?"也因此成了一个双关语。

软实力的组成

尽管约瑟夫·奈将软实力定义为无需使用奖惩就能获得顺从的能力非常有用，软实力仍然是一个软概念，介于国家形象与硬实力中间，没有清晰的边界。然而，软实力的组成和结构还是可以分析的。软实力的最基本组成部分是关注，如果不予以关注，任何国家都不会受到影响。其次是吸引，软实力的实质组成部分是吸引，这部分比较复杂。最后是劝说，用以论证"软"与"实力"的合法联系。劝说促使其他国家无需奖惩就能顺从。关注、吸引和劝说分析起来各不相同，它们在不同的软实力构成中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关注

关注是软实力的前提，正常的地区关注模式都将关注聚焦于一个或多个地区(或全球)强国。这也是软实力为什么看起来像利剑的锋芒的原因之一，因为实力会引起关注。人们都看得到利剑。但是，关注并不总是对地区强国有利。正如我们在前面讨论双边关注时看到的，聪明的老鼠和笨重的大象是常见的现象。其次，中心强国也可能被更为活跃的邻国牵制和维护。并且小国可能更容易塑造其形象，因为外来者对实际形势的兴趣更低。弱小的邻国则对不引人注目的事情都非常敏感。2005年美国国务卿即康多莉扎·赖斯没能出席东盟部长级会议就是一个地区外例证，该决定被东南亚国家普遍视为是怠慢的表现。另一个例证是泰国王室在日本遭遇的愤怒，当时的国王车队因一名司机辞职而被迫滞留机

场。该事件也被视为日本对亚洲邻国高傲态度的表现。[24]小国有时会对在中心强国看来似乎无足轻重的礼仪事务表现出过分关注。但是，真正困扰小国的是其中可能暗示的关系贬值。

危机关注也可能产生软实力，只不过是问题导向型的软实力。一个站在悬崖边的人可能引起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他也可能无需奖惩便实现某些目的，然而一旦渡过危机，关注也就消失了。如果危机持续，可能怨恨就产生了，进而引发催促其跳崖的呼喊。如果发生在国家之间，中心强国就可能对为了自身利益而吸引关注的小国(特别是其领导者)心存怨恨。大象也是有记忆的。不管怎样，危机关注的焦点都是危机本身而非行为体，这就限制了关注的作用。

吸引

从赞赏到憎恶之间的广泛区间都可以被视为是作为软实力组成部分的吸引。20 世纪 50 年代纳塞尔的泛阿拉伯主义受到的地区追捧与实现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受到的地区排斥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两种极端情况下，另一地区国家的观点可能趋于一致，但是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主张就比较多样。积极的一方，朱里奥·格拉瑞蒂将软实力描述为“亲近”，促进竞争，使国家趋同并选择合作。[25]亚历山大·维温还提出吸引包括三个部分：美貌(beauty)、智慧(brightness)和仁慈(benevolence)。[26]美貌是指审美上的吸引，既包括高雅文化又包括大众文化。智慧是指精英和政府都称职，既包括科学技术又包括最佳实践。仁慈是指中心大国对小国慷慨并提供公共产品。除了这三个 B，我们认为还应该增加第四种品质即“持久”(consistency)，因为前三个 B 的可信度都要取决于预期的稳定性。诚然，中心强国都是自认为拥有美貌、智慧和仁慈的，但软实力的吸引力不是孤芳自赏，而要依他国之见。仅仅因为存在大国就自暴自弃是对一国自主权和身份的自我伤害，即使是在顺从中心强国的最佳关系中通常也夹杂着非官方的怀疑论。查尔斯·金德尔伯就在英语中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贬损荷兰的表达，比如“荷兰勇气”(即酒后之勇)、“荷兰叔叔”(即过分严苛的人)、“荷兰式请客”(即 AA 制)，它们出现在荷兰拥有海军优势的相对短暂时期。[27]与之类似，普法战争后，法语中称什么为“普鲁士

的”也是一种辱骂。[28]更肯定的例子是伯特兰·罗素提到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法国人是吃青蛙的，并且也被称作‘青蛙’。可是等到1904年我国与法国缔结了协约后，似乎他们就放弃这种做法了，至少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听说过那样的说法”。[29]显然，强国的吸引力只有在符合弱国的国内利益时才能达到最强。[30]

劝说

劝说是软实力的关键部分。毕竟，如果不能在无需制裁或者损失补贴的情况下获得顺从，软实力就不称其为“实力”。劝说显然需要关注度和吸引力的支撑，但这两者的重心都不在决策制定上。关注和吸引即使不是在政治共同体如何认识彼此的外围起作用，也并没有特别集中于作为行为体的国家间的关系。劝说则意味着两种不同意愿的协调。

劝说概念中存在一种固有的紧张关系。一方面，成功的劝说意味着发起者完成了一项本来不会注定发生的合作行为，因此劝说是一种权力。另一方面，服从者并非被迫作出合作的决定。因此，劝说中的关键决定取决于服从者的思想，由服从者决定自己是否已经被劝说。

劝说的三种模式分别为：议题驱动型、关系型和环境型。议题驱动型的劝说是指必须产生某一具体反应的情况。比如天气预报员可能没有任何硬实力，却能让所有人都带伞出门。劝说的主题往往都必须宣称是基于议题的（当然不可能推荐一种被认定不是应对形势的最佳选择的行为），但是是否接受劝说还是取决于关系和环境利益。即使接受者不相信被推荐行为的好处，也可能出于同推荐者全面关系的重要性而加以接受。如果对关系的考量仅仅建立在未来奖惩的可能性基础上，关系劝说就是介于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的类型。只不过，判断自身利益是否因维持前景不明的某一关系而得到最好满足，实质上就是一种软实力决策。至于第三种类型的环境劝说，是指中心强国塑造国际制度和国家间互动的准则，其他国家的行为基本是遵照强国的意愿进行的。[31]

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区别

尽管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边界可能不是特别清楚，两者还是有原则上

的深刻区别。硬实力是基于强国与服从者的利益分歧产生的，软实力的劝说作用则是基于双方的某些共同利益。制裁的威胁也是强调强国与弱国的实力分歧，并且利用分歧引诱或者强迫弱国服从。使用奖励并无特别之处，但是单边支付则意味着议题的价值、关系的力量，以及各种选择的环境塑造都不够充分。软硬实力的边界之所以模糊是因为"搭便车"的前景会让国家不愿对已经被认可为互惠的行为作出承诺，只有在奖惩的推动下它们才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即使如此，推动者与被推动者之间的角色划分也意味着利益的结构性分歧。而软实力劝说则是建立在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无需附加激励条件的服从要求合作是基于一系列假定，即议题有价值、关系合理，同时双方都接受的规则也需要合作。

由于硬实力是基于利益分歧，而软实力基于利益的共同性，两者之间关系复杂。一方面，使硬实力生效的实力确保了关注的中心性，同时也有助于产生吸引。另一方面，单边施压中包含的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又排斥了基于利益共性而合作的可能。于是合作的基础逐渐消退，会被支配关系取代。产生支配并非仅仅是从软实力的拳击手套里露出了铁拳，而是一种急转直下的剧变，需要越来越多的硬实力资源，同时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排斥和抵触。最终，硬实力的实施会耗尽其优势，由此引发的利益冲突也威胁着日益增加的反抗。与之相反，尽管软实力不能再推进，但它的成功增加的是合作而不是反抗。

地区强国的困境

对一个有定位的多边强国来说，核心战略利益就是维持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无论地区强国还是全球强国皆是如此。我这里的论断不是基于古典现实主义所谓国家对权力的普遍追求，而是对本书第一章中双边非对称论述的扩展。如果我们把 A 国在某个相对较低重要性的单一关系中的战略性"因时制宜"利益扩展到许多这样的关系中，A 国的整体利益就会是将这些关系的管理常规化，以及避免发生分散精力的危机。[32]

正常双边关系中自主权与顺从之间的交换就被普遍化成为一种国际秩序，该秩序以确保成员国的自主权换取它们对秩序的认可。当然，将非对称正常化并非唯一选择。在多个强国存在的情况下形势更为复杂，但是至少每个强国都希望在自己周边形成一种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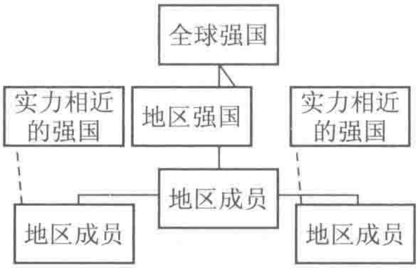


图 4.4　地区强国所处的形势

如图 4.4 所示，国际秩序问题对地区强国而言尤其复杂。它们在地区秩序中有战略利益，但其所在的地区又仅仅是更大的全球体系中的一部分，体系中至少还有一个更强的大国，而且相邻地区还会有一些与其实力接近的强国。因此，无论在国家间实力的横向还是纵向维度上，都有地区强国不可控的可能性。如果有不止一个地区强国，比如东北亚地区的中国和日本，形势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即使是仅存在一个地区强国的当代案例，比如印度、巴西和南非，其实也是非常复杂的情况。

全球、地区与实力相近强国的互动

地区强国中间地位的直接忧虑是与一系列附属难题结合在一起的。地区强国不仅不得不关心自己与全球强国的关系，而且它们的处境要受到每个地区强国与全球强国关系的影响。全球强国或许在与某一地区小国的关系中很少有固定利益诉求，但是如果它认定某一地区强国在其地区内的行为违背了全球规范，它就有了加以干预的理由。对于地区强国来说，试图强迫邻国服从于自己的地区统治也是有风险的，因为它的强迫行为可能被全球强国视为缺少全球服从的表现。我们在前面章节中讨论的 X>Y>Z 的三角关系蕴含在任何地区关系中，地区强国很可能就是那个受挫的 Y。类似的，位于地区前列又受到实力相近国家影响的地区强

国也可能处于 X=Y>Z 的三角中，既可能引发地区间敌对关系，又可能成为中立的缓冲国。

对于全球体系，地区强国的基本选择应该是与全球强国结盟，避免挑战，但是要追求自主的地区政治，抑或是挑战全球强国对地区的影响。这些选择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对地区子体系发生作用。与全球强国的结盟消除了对抗性干预的风险，但是也牺牲了地区利益的自主权。地区强国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在追求自身地区利益的同时避免表现出挑战全球强国的特征。这种地位可以称作一种原则（例如不结盟运动中尼赫鲁的角色），或者仅仅是采取的一种谨慎政策。全球强国允许地区自主权的意愿与地区强国表现出的对全球体系的顺从程度之间，要么公开，要么暗地里，是存在一种持续互动的。追求自主权的极端情况是，地区强国可以挑战全球强国干预地区事务的合法性。乌戈·查韦斯向南美洲推广玻利瓦尔地区性就是近期的例子。地区强国若要成为成功的挑战者必须依赖地区团结，借助硬实力或者软实力都可以。

对于实力接近的强国，地区强国的选择可以根据相似的标准分为几类。制度化的合作关系降低了地区间麻烦的可能性，但是需要地区强国的预先承诺并且增加了地区间的联系。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就是一个有趣的地区强国正式联合，包括遥远的地区强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却排除了所有相邻的强国，比如中国、尼日利亚、墨西哥。[33]广大的中间选择是将避免不必要的敌意和竞争与寻求地区政治的不受妨碍的自由相结合。极端的竞争选择则是实力接近的强国可能挑战地区划分，抑或是扩张并征服地区。

如果存在不止一个地区强国，它们对地区秩序的共同利益与彼此围绕相对地位的竞争利益之间会产生矛盾。地区共管国对地区秩序和地区外关系而言都是最可靠的选择。共管国是地区制度化的前提，有助于确立地区结构，并且鼓励地区保持对于外来影响的自主权。然而，相对地区地位的难题以及外部联盟和内部结盟的可能性还是会产生有时候不能避免的诱惑。尤其是，权力转移在地区环境中更可能发生，重新确立地区权力关系的谈判又让人望而却步。过去三十年间中国与日本的外交角力已经证明合作与竞争利益并存的关系模式及其矛盾。

中间地带：从地区看世界

尽管有上述不确定性，地区仍然是一种有定位的互动框架，即邻国关系。互动的构成密集，非对称创造了地区关注的集中化以及地区软实力的可能性。地区内的非对称对于较小的地区国家来说特别重要，尽管它们的顺从选择是由更大的全球结构以及可能是由实力接近的地区关系决定的。对地区强国而言，形势就更为复杂。鉴于其中间地位，它们与邻国相比是“A”，与全球强国相比是“B”。它们既有维持以自我为中心（或者以共管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的战略利益，又要确保自己无力控制的全球环境具有可预测性。因此，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各种制度框架最有力、最持久的支持都来自地区强国也就不足为奇了。全球制度的条款其实是在权力不对称条件下由全球强国设定的，但是各国对可预测规范的遵守对地区强国而言尤其有价值。

全球化带来的信息、通信和经济互动的大范围扩展已经改变全球的地区环境。生活的边界也扩大到无形。地球另一端发生的地震可以呈现在一个人的客厅里，一国政府的财政不规范可能引发全球经济震荡。尽管如此，政治共同体及其利益还是有定位的，并且这些利益的邻国关系也仍然重要。其他地方的危机和灾难不会成为自己的，但是却与自己的利益相关。事实上，地区已经作为全球化的结果之一而获得更突出的地位。首先，地区如今因其受到地区外发展的影响而具有更活跃的意义。感知到集体面临的外部风险能激发地区组织的更大利益。其次，全球体系不再仅仅是由全球强国主导。互联互通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全球联系。很多地区强国，比如欧盟、中国、印度、巴西、南非都可以不必成为全球强国就能产生全球影响力。本书第六章将要详述的观点是，全球化没有使国家平等化，而是创造了非对称的互动结构，亦即一种“多节”的国际环境。

注　释

1. Mehdi Parvizi Amineh, ed.,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in Global Politics*: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s on the Changing Geography of World Politics* (Leiden: Brill, 2007).

2. A. T. Mahan, "The Persian Gulf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Review* (London), September 1902, pp.27—28.

3. Roger Adelson, *London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Middle Ea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22—26.

4. 迈克尔·巴尼特对阿拉伯国家组织的研究认为:"事实上,那些用来界定阿拉伯政治和阿拉伯主义的特征——比如与以色列对抗,避免与西方战略结盟,以及地区联合——已经不那么突出,甚至成为质疑阿拉伯政治独特性的因素。" *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3.

5. Zeev Maoz and Ben D. Mor, *Bound by Struggle*: *The Strategic Evolution of Enduring International Rivalr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6. Leonard Binder, "The Middle East as a Subordinate International System," *World Politics* 10:3 (April 1958), pp.408—429.

7. Ian Lustick, "The Absence of Middle Eastern Great Powers: Political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1:4 (Autumn 1997), pp.653—683.

8. Tony Judt,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New York: Penguin, 2005).

9. Martin Wight, *Power Poli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8), p.65.

10. 这七个国家是: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伊拉克、也门,以及沙特阿拉伯。Barnett, *Dialogues*.

11.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2. Peter Katzenstein, "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31:2 (1996), pp.123—159.

13. E. E. Schattschneider,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0).

14. 简要概括可参见 Victoria Tin-bor Hui, "The Triumph of Domination in the Ancient Chinese System," in Kaufman, Little, and Wohlforth, eds.,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2007), pp.122—147。

15. Alice Ba, *[Re]Negotiating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16. Brantly Womack, "China between Region and World," *China Journal* 61 (January 2009), pp.1—20.

17. 参见 Melvyn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2: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 1950—1955*.(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18. William Antholis, *Inside Out China and India*(Washington: Brookings, 2013).

19. 长篇大论关于“对手”的文献就偏离主题了,威廉·汤普森研究的原则对手非常接近于这里的 A 和 A′两国。参见 William Thompson, “Principal Rivalrie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9:2(June 1995), pp.195—223。

20. Daniel Flemes and Leslie Wehner, “Strategien. Südamerikaner Sekundärmächte” [Strategies of South American secondary powers], *GIGA Focus* 2012:4.

21. Joseph Nye, *Bound to Lead*(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和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22. 香格里拉是威廉·希尔顿在 1933 年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虚构的山顶乌托邦,的确产生了足够的软实力让云南省的中甸村(意为“中央牧场”)借用这个名声吸引游客。

23.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32.

24. 该观点来自(并非与司机本人的)私人谈话。

25. Gallarotti, *Cosmopolitan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20—32.

26. Alexander Vuving, “How Soft Power Work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PSA annual meeting, September 2009.

27. Charles Kindleberger, *World Economic Primacy, 1500—199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44.

28.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 p.149.

29. 引自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p.70。

30. 莱昂纳德·朔帕关于美国对日本施压中的成败研究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证,参见 *Bargaining with Japan: What American Pressure Can and Cannot D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31. 这一点参见 Nye, *Bound to Lead*,深入研究参见 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 (Winter 2005), pp.39—75。

32. Paul Stephan, “Symmetry and Selectivity: What Happens in International Law When the World Changes,”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0:1(2009), pp.91—123.

33. 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于 2003 年在巴西利亚成立,广泛表达了对很多共同地区问题的关注。

第三部分

世界体系

第五章
霸权循环及其可持续性

在这章中我们终于谈到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的起点：大国和大战。但是，我们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的。我们并非一开始就站在权力山峰的顶端看问题，而是从双边对称关系的微观结构出发，经过对多边和地区关系的“攀登”而来的。从这点上来看，“大国”仅仅是一些实力稍强的国家，并且它们实力的局限性制约着它们之间的非对称关系。大国的外交选择主要在规模上不同于其他的非对称关系。对于大国的居民来说，从全球层面重视非对称关系其实就太虚伪了。大国真正关心的问题都是由它们关于自身利益及其受到的威胁的自我认知决定的，大国对这些问题都锱铢必较，并且理论上都是弱国不能挑战的。因此，有关大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直接关注的都是对敌人和出现挑战者的担忧。但是，在非对称关系中，一方观点的活跃性会产生误导作用，世界大国的认知最具有非对称性，大国的决定性失败往往发生在与小国的交往中。

本章的首要任务是区分世界体系和地区子体系。在世界体系中，无论是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的“在四个都城范围内”，中国的“普天之下”，还是后冷战时代的美国，都意味着不再有超出其上的大国体系了。定义地区大国形势的中等强国地位困境被克服了，但是又出现了新的麻烦。由于世界体系不受外部制约，世界大国就很容易认定自己能在毫无风险的情况下实现利益最大化。然而，事实上支配地位已经将世界大国的利益与他国的利益分割开来，尽管很难组织起来对付世界大国，对反抗的刺激还是会增加。

所谓霸权循环,即一个霸主被另一个霸主取代,是霸权国狂妄自大的必然结果。然而,循环并非自动进行的,循环的节奏明显是受全球关系质量的影响。而且,全球大国的局限性往往不是由挑战者决定。古代中国作为中央大国并不能支配周边国家的情况,为我们展示了一种管理中心地位的完全不同路径。本章最后讨论国际政权和世界秩序。世界大国、地区大国和其他国家在形成全球互动中具有各不相同但彼此相关的利益,它们要管理各种模式的不确定性。尽管如此,塑造所有多边关系结构的合作还是竞争选择之间的矛盾也决定着全球模式的结构。

终 极 地 区

世界体系是行为体的一种多边集合,这些行为体没有因特定子体系中的位置性而产生的标志性地区制约因素。世界体系中没有更强的国家(尽管也和地区体系一样可能存在不止一个大国),体系不是由特定邻国所定义的,也没有实力接近的外来者能够挑战该体系。鉴于这些制约因素给地区大国造成的两难,它们可能追求全球地位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在世界体系顶端的生活并不轻松。即使只存在一个世界大国,它也不得不应对所有的地区大国和其他小国,它的外交利益范围更广,需要体系维护的不安因素更多,甚至还会发展成对体系的挑战。制约地区领导权的那些问题在这里变成确保可持续的全面领导权的难题。如果说位置的空间维度界定了地区的两难,可持续的时间维度则导致了世界体系的忧虑。

位于世界的顶端

世界体系最显著和最重要的特征是没有更高一级的体系。如果只有一个世界大国,那它就存在于独一无二的外交世界里。它就是自己世界的中心。如果存在不止一个世界大国,它们彼此互动的舞台就界定了世界体系。体系中对世界大国的关注规律与前一章论述的地区大国一样:各国都更为关注自己受到最大影响的关系。但是与地区大国的周边形势

不同的是，地区大国的邻国能够越过地区大国看到全球或者地区外的行为体，而世界大国则是体系默认的各国关注的中心。

尤其是在单极世界，世界大国处于独一无二的谈判地位，是由许多B国组成的世界里唯一的"A大国"。本书第一章中描述的个别非对称关系变得突出，并不仅仅因为A国与B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同时也因为B国没有相应的替代关系，A国却有大量的替代选择而变得格外尖锐。B国的谈判难题在于实力的巨大悬殊，A要考虑的却只是关注经济。因此对于一个世界大国而言，很容易会将国际谈判视为一系列收益最大化的交易，而不是可能延伸到未知将来的一组有定位的、相对永久的关系。然而，即使是世界大国也受制于其能力范围和持久性。缺少对他国自主权和利益的尊重会增加对他国寻求反抗的刺激，因此也会增加大国获得顺从的成本。可持续的世界大国最终还是一个对关系的管理问题。

多极世界更为复杂，但外交估算是相似的。多极世界事实上是诸多竞争地区的集合，但是世界竞争的阵营（如果存在阵营的话）与地区不同。世界竞争对手间的矛盾创造了一个诸多联盟的竞技场，非常像是磁铁两极间的铁屑。一些国家根本无力选择阵营，对它们来说倒戈就意味着无能，同时也预示着它们当前的资助国即将失败。东欧的后共产主义坍塌就是苏联作为世界竞争对手终结的标志。对于另一些国家来说，可能存在换一个资助国的选择，它们也会因此成为敌对双方之间的杠杆。再有一些国家，身处敌对双方的紧张关系之外，看似谨慎其实行动非常困难。冷战时期不结盟运动和印度的经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印度的例子表明，地区大国的行动范围在两极世界甚至比在单极世界更受限。在多极世界中，竞争性世界大国由追求交易最大化转而追求各国关系的效用最大化，以服务于全球对抗。然而，这只能是一种追求而不是理性的战略选择。与盟友保持和谐关系在对抗形势中更为重要，因为每次对抗的前景都更加不确定。冷战的一大教训就是苏联疏远自己的被胁迫盟友，最终导致其陷入自我孤立的窘境。

后院而非邻国

世界体系的第二个标志性特征是不再局限于邻国。与邻国间的密切

互动相反，全球关系更淡薄、更特殊而且表现出关系时断时续的特征。做世界大国的邻国与作为地区大国的邻国不同，因为不再有“走向世界”和在地区外寻找朋友的选择。世界大国的邻国会直接成为其“后院”，完全不同于正常的地区关系。顺从仍有可谈判的余地，但是现实的选择受到更多限制。当然，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和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是证明此规律的两个例外。与世界大国的地区邻国功能相似的是中等强国。[1]中等强国与世界大国在很多议题上都有关系，而且在谈判中有更多的自主权。

优势领域

世界体系的最后一个标志性特征是不存在身处体系外却能影响体系内选择的国家。对于地区大国来说，来自世界大国施加的垂直制约与地区外大国的水平制约是相辅相成的。对印度来说，地区外大国可能是伊朗或中国。对中东国家来说，可能是法国或德国。世界大国不得不应对中等强国，但是它们并不在体系之外。无论是中国人提及的“天下”，还是居鲁士大帝宣称自己是“世界四方的王”，他们都声称其所在体系之外再无重要的大国。

传统的“世界体系”显然有权力的地理范围，真正的全球体系却没有。所有世界体系的一个共同难题就是，虽然它们的权力占据优势地位，但都不是绝对权力。没有不在其控制范围之内的“重要他国”并不会消除权力局限性的内在问题。如果一个世界大国疏远其他弱国，它们不需要奖励或者惩罚就实现合作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体系中心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犹如物体表面的摩擦力：如果参与者对体系满意，摩擦力可以忽略不计，很少的权力就能建立广泛、简单，但是稳定的合作面。如果参与者不满意，维持同样的合作面就需要更多的权力。如果参与者感到受威胁并发起反抗，则必须采取特殊措施来渡过难关。硬实力的运用证明了全球管理和军队结构的有效性，扩展了资源，而且通过对特定冲突的预先承诺削减了应对其他挑战的当前实力。于是在很大程度上，世界大国是因为宣称利益与他国不同而使自己的资源受到挑战，也因此增加了它不得不去管控的体系摩擦。

成为终极地区里的终极大国当然很有吸引力，但是诱惑可能会被证明是致命的。每个国家都希望安全隐患更小，而谈判地位更强。然而，即使拥有上述特征——既无垂直也无水平的挑战者，而且优势领域不受限——的世界大国也会受到中心强国利益最大化以对抗他国的诱惑。因为利用实力悬殊挤占他国的利益，世界大国也就给了他国自卫的理由，它们要么温和地逃避、不合作，要么激烈地反抗。“权力诅咒”与盛产石油国家的“能源诅咒”一样物极必反。[2]因为不存在外部的、有定位的制约因素，世界大国被放在了需要从实现交易优势最大化的短期便利与正常、可持续的非对称中获取长期利益之间作选择的地位上。

最明亮的房子：全球认知的问题

短期优势与长期可持续性的理性两难被全球非对称的认知效应夸大和扭曲。全球非对称是第一章描述的不关注和过度关注两种对立模式的终极案例。而且，全球大国在所有关系中都处于“A 地位”。即使不止有一个超级大国，它们之间也是要么对称、要么截然非对称的关系。因此，其他国家面临的基本国际现实都是存在一个非常强的大国，而这种现实对超级大国而言却从未经历过。如此一来就大大提高了发生非对称错误知觉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会因为超级大国间的竞争而降低。

有一个比喻能帮助理解这种认知差异。想象一下，一个全都是玻璃房屋的村庄到了夜晚，各家的房子大小和照明不尽相同，唯独村中央的一所高档房屋尤其明亮。每所房子都有自己的家装和风格，各家的住户也对清晰可见的邻家生活，特别是最明亮房子里的生活，感到好奇并受其影响。最明亮房子里的生活毕竟是陌生人的行为，不一定有吸引力，但是因为清晰可见并且代表了遥远的另一种生活，也会同样影响到整个村子。他们的生活是村民的谈资，好奇心诱使着其他房子里的年轻人渴望一种不同于他们父母的精彩生活。最明亮的房子正如其照明那样强大，这也使其他房子要么被其力量震慑，要么对其领导地位深信不疑。

住在最明亮的房子里的住户清楚他们在村里的相对地位，而且他们也对邻居很好奇。然而，在最明亮的房子内很难看清其他的房子，所以只有在危机时刻，邻居们的行动才会吸引他们的注意。例如发生了火灾，每位住在最明亮房子里的住户都立刻冲到窗户前去观察未曾谋面的邻居的行动。在非危机时刻，最明亮的房子会向其他房子点亮聚光灯，但想要调查的事情也是由最亮的房子决定的，而且也会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住在最明亮的房子里的人们平时会从窗户向外看，但只能看见其他房子发出的微弱的光和自己房子反射的光。他们通过对比自己房间熟悉的反光和邻居昏暗又奇怪的光亮来判断和揣测邻居。结果，观察其他房子往往只是确认了自身的地位，而不会寻求其他的选择。住在最明亮房子里的有些人可能通过旅行和学习产生了对他国文化的敏感。其他人作为游客或者移民也带来了外部世界的经验。作为个人的旅行者和外国人可能对他们同伴的认知产生一些影响，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可能像柏拉图洞穴的逃犯一样，因为忽视其他人看待世界的常见方式而失去可信度。

在上帝眼中，这个村里的一切都是平等的，村民却不像上帝一样看待彼此。亮光、权力和财富不同于美德和品质；亮光可能刺眼，音乐也会太吵。但是，最明亮的灯光也可能像最吵闹的音乐一样成为流行。仅仅这一现实就会促使最明亮房子里的居民确信自己文明的合法性和领导地位。与此同时，也意味着对邻国文明的一种外来替代选择并且形成了潜在的挑战。

这个最明亮房子的比喻很有用，它代表的是全球层面而非正常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非对称知觉的一般情境。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多地受到全球大国的影响，因此它们也会更多地关注全球大国，世界体系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创造了每一个其他国家都同舟共济的环境。墨西哥可以想象自己比危地马拉强大，但绝对不可能比世界的其他国家都强大。在那个时代，中国能宣称是自己世界的美德顶峰；在当今世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也是如此。既然中心大国都是评判他国的标准，弱国的差异就难免被认为是缺陷，弱国的服从就是对强国优越性的承认，弱国的反抗就是对文明本身的拒绝。

世界大国的关注模式

鉴于世界大国的关系之广，每一种关系本身又不具有成比例的重要性，世界大国的对外关注往往是危机驱动、议程驱动和不连续的。首先，危机涉及的事件范围很宽，既有威胁到体系的危机，又有仅具新闻价值的危机。因为发生在大国的世界里，世界大国自认为有责任终止危机。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危机的结构性原因却在世界大国的关注范围之外。古老的哲学问题是森林中的大树在无人注意时倒下是否发出响声。而在世界大国的危机关注中，问题却是在“倒下”这种危机发生之前到底有没有大树。其次，世界大国的日常国际关注点也都是由其国内议程相关的全球问题设定的，因此只会随着大国国内政治的变化而变化，其他国家都是应对世界大国的议程，而不能协商它们自己的议程。最后，无论危机驱动还是议程驱动的关注，世界大国的承诺通常都是不连续的。危机会失去新鲜感，国际议题也会成为旧闻，在世界大国的关注中，大国要求的都是了结它们，哪怕只是眼不见心不烦。

文牍主义与推诿

当然，世界大国的真实世界并没有这么简单，它们必须维持全面强大的优越性和正确性形象，既包括自身形象，又包括体系的公众形象。公众形象与时而遭非议的调试现实之间存在差距，需要用文牍主义来掩饰，把事情描述成与恰当模式相符。例如，1793 年马戛尔尼拜见乾隆皇帝，他向乔治三世汇报时说的当然是他拒绝了行三跪九叩礼，而中国的官方记载自然也会说马戛尔尼按照规矩行礼了。[3]我用“文牍主义”一词表示中心大国宣称的体系具有的公众正统性，当然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虚伪性。[4]文牍主义不一定消极被动。否认秘密行动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维持美德的表象。可否认性其实是文牍主义的最基础形式，因此也最容易被揭穿。为了霸权的正统性，文牍主义也会否认妥协的形象，从而使看上去不够全面强大的声誉损失降到最低。文牍主义也从不会道歉，其虚伪性在伙伴国面前最是无处遁形。

与中心大国的文牍主义相对应的是周边国家的各种推诿行为。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称其为“弱者的武器”，包括拖延、装糊涂、蓄意

破坏、保持沉默，这些既适用于国家行为体又适用于个人。[5]弱国很清楚公开对抗中心大国的危险性，因为对关系的关注更多，弱国在持续反抗中心大国的不连续关注方面就具有了优势。B国可能在A国专注于谈判时作出些承诺，但是在A国认为问题已经解决后却不履行承诺。B国可能在A国的花言巧语中掩饰自己的利益。B国可能蓄意破坏A国的某个行动，特别是需要多边配合的行动，但是并不公开质疑A国的计划。这些在A国看来都是"花招"的做法存在于所有的双边非对称关系中。因为只有一个A国与众多的B国共处，各种阴谋诡计就有的是机会实施。世界大国的所有对外关系都是非对称的，被视为是他国的怯懦和推诿的不承诺也会强化大国自身的道德优越感。近年来，这种咄咄逼人的优越感在美国入侵伊拉克时对待"老欧洲"的态度中就有所体现。

世界体系的认知效应在单极体系里最常见，同时对多极体系也有影响。多极体系里的世界大国彼此之间是对称关系，另外也都身处非对称关系中，但是无论如何都不是非对称关系中的B国。多极体系中每个大国都受到另一大国或者几个大国的外部制约，它们关注大国竞争，除此以外的关系仍然是从世界大国的角度进行衡量的。例如，冷战期间大国可能更多关注古巴或者安哥拉，但是它们都是作为世界棋盘中的小卒，而非因其国内现实而受到的关注。"小型战争"变成"代理人战争"。世界大国之间争夺对小国的说服力和控制力，小国争取支持也是为了获得大国对其需求的关注。然而归根结底，任何国家的善意都出于私心，世界大国最关心的还是世界层面的利益。

霸 权 循 环

在世界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学家看来，没有什么是比霸权的出现、辉煌、衰落，以及被另一个霸权取代更有意思的研究问题了。罗伯特·吉尔平和保罗·肯尼迪从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政治学和历史学出发，都写过关于霸权循环的经典著作。[6]不足为奇的是，这些研究的焦点

往往集中在对大国的描述上，因为大国的兴衰即霸权的循环。但是本书认为，在大国关注它们的挑战者的同时，它们脚下被忽视的非对称基础可能也在发生变化。

肯尼迪和吉尔平都对霸权循环进行了丰富且复杂的分析，同时也都提出了简明的观点。肯尼迪的观点反映在《大国的兴衰》这本书的副标题上：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大国相对于他国的经济实力最终决定其军事统治权。霸权循环是经济实力不平衡发展，以及成熟霸主往往入不敷出地追求军事实力和过度扩张霸权范围的结果。肯尼迪并不主张经济决定论，他认为相对经济实力设置了发生决定性大战的历史阶梯，处于上风的国家自然占据优势。

吉尔平的观点更有分析性，但是与肯尼迪的观点基本一致。他的循环理论也建立在实力不平衡发展的基础上，但他提出了在国际关系思想上超越“西方偏见”的一般理论。[7]他描述了各国追求以领土控制为主要形式的相对实力最大化的基本情境。竞争消灭了实力较弱的国家，产生了因其相对实力而拥有统治地位的霸主。霸主的权威最终取决于硬军事实力，威望仅仅是实力的声名远扬。并且，即使是成功的霸主也难以逃脱一旦霸权扩张的成本超过其收益，霸权势必衰落的命运。收益达到停滞点并不意味着失败，而是产生了爆发霸权战争的可能性，霸主与崛起的挑战者会因国际体系的性质和控制权而开战。霸权战争并非必然结果，因为成熟大国可能选择接受可信赖的挑战者，但是挑战是不可避免的。

对传统霸权循环论的批判

关于霸权循环研究的文献很多，这些简化版本都没有恰到好处地说明肯尼迪和吉尔平观点的细微差别。但是，它们的确为我们将非对称理论的某些推论与关于霸权循环的国际关系历史和理论的某些基本假定进行比较分析提供了可能。

肯尼迪和吉尔平的第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在论证霸权循环的原因时，存在历史和逻辑上的同义反复。[8]同义反复对阐释和说明隐含的假定有用，却不能验证这些假定。如果霸权循环的定义就是一个霸主被另一个取代，那么关注的焦点只是霸权挑战，因此也就只发生在大国之间。终极

大国竞争之外的互动就不会影响世界体系的持久性。这些理论虽然承认了扭转乾坤的技术变革,比如在肯尼迪的研究中强调通过领土征服之外的手段获得的经济实力,但却忽略了决定某一体系结构的非对称关系世界,这样的体系中其实才有霸权的最终挑战者。非对称的伙伴不会成为挑战者。正如肯尼迪所言:"它[这本书]既未论及小国,(通常)又不研究小型的双边战争。"[9]

传统霸权循环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双重省略。把"权力"(Power)等同于"相对实力"(relative power),进而也等同于"大国"(great power)。这个问题在《大国的兴衰》一书开篇语中就明显存在:

> 这是一本关于"现代"——也就是后文艺复兴时代的国家和国际权力的书。本书力图追溯和解释不同的大国是如何,相对于彼此,已经崛起和衰落的……[10]

从"权力"变成"大国"并不意外。肯尼迪后来也解释:"只要提到国际体系,都是指相对财富和权力,就应该被视为如此。"[11]吉尔平和肯尼迪都认为对权力的唯一制约就是成功的挑战者持有的更大权力。对大国来说,除了另一个敌对大国之外也没有什么可以对其形成制约。只要霸权国没有被成功地挑战,它无论实施何种统治都不影响霸权的持久性。只要提及霸权的可持续性,"相对实力"就等于"绝对实力"。如果强国可以简单地制服弱国,弱国的和平顺从就仅仅是因为畏惧强国的惩罚。因此,唯一有结果的关系只发生在实力均等的大国之间,实力均等就一定是对手,因为它们彼此实力接近并互为致命威胁。如果实力发展不均衡,在总体社会实力的基础上产生了军事优势,就会出现今天的霸主被明天的霸主取代的霸权循环。

传统霸权循环论的第三个问题是通过劝说(用吉尔平的话说就是软实力或威望)把强国的领导权简化成了利剑上的锋芒。吉尔平直言:"威望就是强国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的声誉。"[12]"国家间讨价还价和谈判的结果主要是由相关国家的威望决定的。"[13]吉尔平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还在脚注中提及亨利·基辛格,但是他显然没有想到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因此,软实力也仅仅是指其他国家已经习惯了硬实力的潜在威胁。

不要将相对实力绝对化

这类研究的根本问题在于假定“相对实力就是一切”。实际上，即使是在非对称关系中，实力在使用中也会受到制约（或者得到增强）。如果一个霸权国不顾一切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它就在自己与其他国家之间制造了分裂。如果一个霸权国以承诺自主权换取他国的顺从，则是创造了一个各国都愿意维持的体系。当然，若要承诺可信，霸权国必须自我约束，防止独断。由于对管理非对称关系并不敏感，霸权国往往不会考虑霸权的可持续性。

从古至今不乏印证非对称关系对于霸权持续性重要价值的案例。罗马共和国在意大利的扩张当然离不开军队，与此同时也是因为它善待归顺地区的精英和人民。与希腊城邦相反，罗马在其领地里允许外来移民、自由城市公民，以及城市自主权。[14]当汉尼拔把战象带到阿尔卑斯山时，他原本指望非罗马人能够和他一起反抗统治者。然而汉尼拔在伊比利亚和伦巴第的坏名声，加上罗马人的怀柔政策，使得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成功实施了拖垮汉尼拔的战争。如果相对实力决定一切，霸权是不会再生的。一旦衰落，必遭淘汰。丹尼尔·德德尼（Daniel Deudney）作出了非常有趣的观察评论，认为最大规模的意大利人反抗罗马“并非旨在从罗马统治下独立出来，而是为了更进一步融入罗马政体”[15]。在东方战线上，罗马人习惯于卷入希腊人自相残杀的战争然后再自行撤出，这使得罗马的威胁似乎还不如各个城邦的直接邻国更大。[16]

在现代例证中，很难将16世纪60年代到1648年间荷兰对西班牙的长期反抗归因于实力均等。16世纪90年代，荷兰仅有相当于西班牙十分之一的军队。[17]正如肯尼迪所言，荷兰的叛乱是因为菲利普二世的宗教迫害和课税，[18]而且持续反抗是因为面临着致命威胁。荷兰不能对西班牙还以颜色，却能阻止西班牙获胜。西班牙撤退是因为还面临其他的欧洲难题，但是荷兰人长达80年的反抗也使西班牙的统治成为自己的负担而不是财富。这正是肯尼迪所说的那种无休止冲突，强制要求“关注物质和长期因素，而不是千奇百怪的个性以及瞬息万变的外交和政治”[19]。然而，问题的关键不是出现了支持挑战大国的大型经济体或者新技术，而是反抗威胁的非对称抵抗。

回到更近的历史，希特勒在东方战线的失败与他出于种族主义傲慢而拒绝联合斯拉夫人反抗斯大林有很大关系。希特勒最著名的抵消成绩则是在斯大林对乌克兰实施残忍的农业“国内殖民”政策之后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又让乌克兰用步兵给斯大林投了赞成票。肯尼迪在书中介绍了最初德军入侵后俄军让人印象深刻的残留力量数字，十分有趣，但是并没有解释他们为什么开战？是热爱斯大林？还是畏惧希特勒？

可持续性与非对称

以上例证说明了非对称理论有助于理解霸权循环的三点贡献中的两点。第一点强调统治往往引发反抗。小国在关乎生死的斗争中不能获胜，也不能承受失败，于是反抗就会持续。相对弱势可能产生顺从，也可能选择使用推脱的“弱者武器”，并最终导致武装反抗。第二点关键问题在于霸权国是利用权力优势追求私利最大化，还是对他国的关键利益表示尊重。如果是根据霸权国的利益划分得失，其他国家就会群起而攻之，霸权国就陷入了自我孤立。由此引发的反抗与孤立就是泰坦之战中流动的沙地。*

第三点是关注管理非对称关系对霸权循环的两大支柱——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直接影响。尽管肯尼迪强调现代早期欧洲的竞争关系推动了武器的开发和部署，技术其实是军事实力中的未知因素，并且技术也不是导致过度扩张的唯一因素。霸权国在实施统治中要严格约束对军事实力的使用。培养殖民附庸不难，难的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值得信赖？法国殖民者在越南遭遇的第一次现代反抗就来自安沛省的加尔德印第安人兵营，此后法国人在当地就只接受征兵而不再欢迎志愿军。更著名的则是在 1857 年塞波叛乱（Sepoy Mutiny）中，当地印度军队的反抗直接导致了东印度公司的解体以及英国驻印军队的重组。异常非对称关系对军事实力最明显的制约就是增加了实施霸权统治的必要性。过度的军事扩张不仅关系到军事力量的适用范围，而且涉及与当地及其人民的关系。完成征服后帝国就要面临如何管理的难题，持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则是管

---

* 泰坦（titans），即希腊神话中曾统治世界的古老神族，是奥林匹斯众神统治前的世界主宰者。——译者注

理失败的标志。

非对称与经济

非对称与经济实力的关系更微妙。长远来说，国家的经济实力并不取决于掌握现有资源的百分比，而是取决于经济生产力的优化组合。惧怕税收员的人们更有可能积聚和隐藏财富而非投资。在多国背景下，只为宗主国利益服务的经济体制可能获得掠夺的最初收益和服务于本国需要的经济重建产生的中间收益，但是插手殖民地干预了企业家和本土化机遇的无形之手。急于瓜分蛋糕就失去了做大蛋糕的机会。根据吉尔平的回报递减定律，统治收入的增加就意味着总量百分比的下降，与此同时维持帝国的成本也相应增加。[20]当然，出现这个结果是因为帝国的统治地位，也就是整体服务于局部的系统安排，而不仅仅是因为体系的规模。比如在美国的国内经济中，规模经济为增长提供了新的可能，如果分裂为50个独立的国家，美国不可能更高效或者更强大。如果有可能建立"双赢"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话，吉尔平的回报递减难题就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规模经济效应。

我们能用马克斯·韦伯关于罗马帝国没落的分析来证实非对称理论对理解经济回报递减定律作出的贡献。[21]韦伯认为，罗马帝国是一种奴隶在大庄园的简陋棚屋里生产适销产品的奴隶经济。这些庄园通过自给自足来降低成本，因此也降低对市场的刺激，同时军队又在不断吸收自由的农民阶级。随着负担的加重，帝国经济势必衰落。帝国解体后，这些庄园发现有必要用农奴制取代奴隶制，允许农奴拥有财产和家庭对其产生了更大的个体激励。在这一点上，罗马符合肯尼迪和吉尔平的分析，是用一个更高效的经济体系取代了原来低效的体系。但是，如何解释奴隶帝国的回报递减现象？就内部而言，是因为强制劳动力，"劳动力不自由导致一旦没有强制力就不可能为市场生产产品"[22]。外部原因则是罗马帝国在意大利以外的战争成为"猎取奴隶行动"。[23]猎取奴隶不能结交远方的朋友，在提比略*统治期间，罗马其实已经走到可管理的统治尽头。接收大

* Tiberius，公元14—37年在位。——译者注

量涌入的奴隶导致成本增加，于是庄园开始萎缩，市场、城市地区和军事实力也相继衰落。因此，罗马的命运不是由挑战者，而是被不能与邻国建立正常关系的扩张模式终结的。

维持霸权循环

非对称理论改变了对帝国之间固定临界点以及霸权可持续性的关注。理论上，帝国或者霸权国还是位于非对称关系结构的中心，但是它们不再被动等待挑战者出现，而是应该关心如何使非对称关系正常化，如何管理关系以使现有的实力非对称能够被接受，甚至对各方都有利。果真如此，来自外部的威胁就会成为对体系的威胁。否则，霸权国贪心不足而疏远他国，其统治期限必然缩短。这里可以借用吉尔平转引修昔底德向斯巴达人描述雅典帝国教训的悲壮总结：

> 事件的本质首先驱使我们[雅典人]将我们的帝国提升到现在的高度，尽管荣誉和利益随后出现，但恐惧是我们的主要动机。最终，当几乎所有国家都憎恨我们、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反抗并被镇压，曾经的朋友离我们而去并且成为被怀疑和憎恨的对象，甚至所有背弃我们的人都投靠了对方，此时我们再放弃帝国显然已不再安全。[24]

然而，这是所有非对称体系的共同命运？还是霸权统治的病症？国际关系理论不应该区分二者的不同吗？

大国的盲目

当然，大国及其谋士们把关注点仅仅放在挑战者及其霸权战争上也不足为奇。大国只会明确地对其他大国构成威胁，因此非对称理论只能预期它们关注大国的世界以及出现挑战者的可能性。自地中海时代以来，战争与挑战者的难题就主导着西方外交思想。现代欧洲政治中重要行为体的多元性也使得判断挑战者的形势既复杂又生死攸关。改变欧洲经济的殖民地只是值得争夺的重要领地，而不是行为体本身。毕竟，印度不会威胁到英国，越南也不会威胁到法国。欧洲大国博弈的舞台就在欧洲，外交家们为获取资源可能把手伸出袖口或者隐藏起来，但是眼睛不会离开牌桌。统治回报递减现象在西方世界以外特别突出。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随着去殖民化浪潮的出现，帝国的终结也大规模地悄然而至了。

冷战期间的美苏对抗似乎是霸权对峙的完美例证。竞争减少到只有两个超级大国，而风险升级为热核战争。国际关系理论的关注点固定在两极对抗，而不是任何一方对非对称关系的管理，或者是对抗大国实际卷入的大量“小型战争”。苏联的意外解体被解读为美国的胜利，以及美国双边外交正确性的证明。然而，胜利在理论上也是一种尴尬，因为现代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唯一的超级大国，既没有竞争对手，又不存在明显的即将到来的挑战者。美国获得的权力是不受他国制约的权力，也就是无限的权力。与此同时，尽管不是受到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挑战，“9·11”还是暴露了美国的脆弱性，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创造了新的国际环境，美国仍然是其中最强大的国家，但已经不是无所不能的强国。如果将中国视为潜在挑战者，不仅会使其成为苏联作为两极竞争对手的替代品，也会偏离如何管理单极权力的问题。

来自东方的经验

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前景都建立在根深蒂固的欧洲国家间竞争经验的基础上，然而这并非与现有世界秩序相关的唯一传统。我在另一本书里还研究了地中海沿岸（后来转移到大西洋沿岸）的帝国混战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表现出的相对稳定和可再生性之间存在的根本区别。[25]这种区别是基于地缘政治现实的。正如约翰·达德思（John Dardess）所言，从公元150年到1850年的1700年间，“中国的主营业务就是中国”，即使在不统一时期和征服王朝（conquest dynasties）统治阶段也是如此。[26]中国占有亚洲最好的土地，具有非同寻常的生产率，也养育着最多的人口。邻国在与中国的贸易和掠夺中获益远超过中国扩张帝国的所得。于是，中国也就把边疆问题视为防御性难题而不是无限扩张的机遇，并因此而修建了长城。[27]自汉朝以来，中国大部分的领土扩张其实都是征服王朝将自己的边境领土并入中华帝国的结果。

传统中国的基本外交任务就是管理与诸多共同体和国家的关系，这些关系在正常时期都不是致命威胁，也不是具有吸引力的征服对象。中国的兴趣不是扩张边疆，而是边疆和平。因此，传统中国面临的挑战是管

理非对称关系，朝贡体系就是其管理模式的终极体现。[28]外国使臣会来中国首都向皇帝以及中国式的国际关系文化表达敬意。他们的顺从会得到帝国馈赠的回报，以及更重要的是对其官职的册封和领地的认可。中国的承认往往对邻国统治者的国内合法性至关重要，尽管被中国认可的统治者有时也会被推翻，而且中国很少替他们出面，但却代表了中国本身不会干涉邻国自主权的一种承诺。朝贡体系的礼仪赋予了邻国以顺从换取中国承认其自主权的合法性。朝贡体系不是东亚非对称关系的最终解决方案，但是为管理非对称关系提供了合理框架。正如康灿雄所言，这种管理模式发展成为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东亚国际关系文化，表现为更高的可再生性和更低的军事化水平。[29]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面临与传统中国相似的境遇，却保留着西方竞争帝国的思维习惯。[30]诚然，现代世界形式上平等的主权国家与朝贡体系中不平等的仪式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是美国处于全球中心位置，"其他国家"都更多受到中心的影响，期望获得对其自主权和利益的保障。美国担忧自己处在霸权循环的下坡路上是正常的，因为竞争性思维习惯忽略对非对称关系的管理，而只关心下一个挑战者。这就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遏制未来的挑战者其实是一种自我孤立的心理，而不是要维持领导权。为简化和适用于后冷战时期的目的，本书在此只集中分析单一世界大国的情况。

管理全球非对称

如果世界霸主的相对实力等同于统治地位，那么在战术层面，全球互动就由霸主的偏好塑造，并且得到霸主在奖励和惩罚方面的声誉支持。但是在战略层面，其他弱国可能密谋反抗霸主，通过人口和技术的突破或者权力平衡者的联合也可能最终出现一个挑战者。如果我们假定非对称关系是可再生的，即使霸权国也会面临更复杂的管理非对称关系的任务。战术上，霸权国必须在合理分配关注度和资源的环境中应对事件的不确

定性,战略上,又必须降低影响霸权可持续性的不确定因素。与此同时,他国——包括地区大国的利益——虽然与霸权国不同,但是未必冲突。非对称不确定性的全球环境是一种终极非对称环境,与前面几章分析的双边、多边和地区环境有区别也有联系。

回到第一章中对双边非对称关系的讨论,全球体系显然不能否认有定位的利益和参与者之间有认知分歧的观点。普通国家与世界大国间的地位差别因其实力悬殊和地理距离而被放大。"最明亮房子"的比喻已经说明了霸权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认知分歧。但是,共同体系还是可能形成共同利益。尽管全球霸主比典型非对称关系中的大国更容易恃强凌弱,全球体系中仍然可能产生正常的非对称关系,倘若真是如此,其中必须有至少是含蓄的顺从与自主权之间的交换。在全球层面,正常非对称关系的常规化要求所有行为体依据符合全球体系的逻辑行动。每个行为体都是从自身地位出发,同时也要牢记作为元关系的正常全球体系。

全球常规化对世界大国的作用

全球双边关系与本书第一章分析的抽象双边关系的最主要区别是,在世界大国看来是关系的数量和多样性不同,在其他国家看来大家则都是与同一个全球 A 国共处的 B 国。非对称关系中所有 A 国都具有的不关注倾向在全球双边关系中更为突出,所有 B 国对 A 国意图的普遍关心又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世界大国的关注经济不可能囊括对每组关系特殊性的持续关注。因此,一个世界大国需要将其互动都常规化。最起码,它需要形成行为规范和外交实力以降低维护领导权的关注负担。现代化,尤其是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则要求更大范围的常规化,比如形成各种国际机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

建立并管理有序互动的国际体系不仅仅是世界大国慷慨提供的公共产品。常规化原则上是一种共同但有差别的利益。如果将世界秩序界定为国际治理的模式和对所有各方的指令行为,模式和指令就相当于硬币的两面。国际常规化对世界大国的效用就是它根据可接受的非对称模式塑造了互动,而大国在模式的形成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国际机制掌控行为的能力对世界大国来说没有太多吸引力。大国本身具备影响他国行为

的能力,同时又不可能受到他国的致命威胁。更重要的是,大国也不希望被哪怕是自己指定的国际准则束缚。于是,即使美国并不承认国际法庭的合法性,法庭上也总是有一位美国法官。世界大国只对自己作裁判的世界秩序而不是世界政府感兴趣。

对地区大国的作用

对地区大国以及同时存在多个世界大国的情况来说,上述硬币的两面都很重要。世界秩序有用是因为它能帮助安排地区内的关系,同时也让地区外的环境更加可预测。指令与其说是在地区内有用,不妨说是有助于应对地区大国无法控制的诸多地区外国家。如果能让世界大国的行为具体化就更有用了,因此,地区大国就能普遍被认为是国际制度的支持者,它们比世界大国更强调制度的执行力。

多个世界大国与地区大国处在相似的地位中,它们可能都有各自的影响范围,但是都无力控制全球环境。尽管它们每一个都想赢得这场大国游戏,或者至少不输掉游戏,它们也关心游戏规则。对抗使合作很难实现。但是,正如国际红十字会成功制定了最初的《日内瓦公约》以保护医护人员和伤员的中立地位这个例子表明的,即使是竞争者也能让共同利益制度化。[31]

对非大国的作用

世界上很多非大国的利益仅仅与当今世界秩序的内容有非常偶然的关系,因为它们对世界秩序的建立或者管理几乎没有影响。如果它们的利益碰巧与世界大国相符,它们可能认同世界秩序,否则它们就不得不在与自身利益背离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另一方面,指令性命令有用是因为事实上任何情况下小国都无力依靠自身的奖惩来控制伙伴国的行为。于是,世界政府对小国而言就有了吸引力,即使它强加了不属于小国的世界秩序,这些国家也因此有了目标。

对跨国组织的作用

上述例子表明,跨国组织是全球国家间关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包含

跨国规范的制度可以成为共同利益承诺的创造者和实施者。如果是以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政府间国际组织(IGOs),它们可以被视为国家间互动常规化的组成部分,但是并非被动的遗产。如果是非政府组织(NGOs),它们会利用结构化的国际体系追求具体目标。如果是跨国意识形态网络(TINs)[32],它们往往会对现有国际秩序发起激烈挑战,并且无论如何都是对常规化的批判,因为常规化是对各方利益的实用主义调和,完全不体现跨国意识形态网络的理想。最臭名昭著的跨国意识形态网络就是那些革命和恐怖主义组织。

鉴于全球常规化的不同作用,全球互动模式被视为基础 AB 关系的一种宏观形势就不足为奇了。如果它仅仅代表全球统治地位,就嵌入了小国的脆弱性,同时鼓励其反抗或者至少是逃避。如果是另一种极端情况,全球模式要求即使是最强国的重要行为也必须符合大多数国家的意志(甚至更糟糕地要求全体一致),这就不能充分尊重各国实力的真实差距了。"正常的"全球秩序犹如正常的非对称关系,应该体现小国顺从与大国承认自主权的交换。而且,与正常非对称关系一样,全球正常化是一个互动过程而非一种黄金定律。共同利益可能发生变化,但是利益仍然有定位,各国利益和认知的分歧也仍然真实存在。

管理全球不确定性

与双边的 AB 关系模式一样,本书第三章讨论的多边不确定性问题对全球关系估算也具有重要且具体的适用性。

在两种情况中,同步反应都增加了不确定性。前面分析的三角关系与全球政治的主要区别在于,全球政治中难以预见下一个热点问题。下一场全球危机在哪里爆发?谁能影响危机的管理或者结局?我们必须把全球关系中因行为体的数量而产生的事件不确定性与任何三角关系中的互动不确定性相加。在世界政治中,意外改变游戏规则的"黑天鹅"并不

是濒临灭绝的物种。[33]尽管所有国家都希望自己的不确定性最小化，但是相对实力的悬殊让它们产生了不同的认知。

全球元三角关系

我认为，有必要将全球不确定性的一般形势做一个有用的简化，即世界大国、地区大国与弱国构成的非对称元三角关系，或者 X> Y > Z 的三角。与第三章分析的小三角关系一样，世界大国 X 也是和平的维护者，因为它可以决定地区大国 Y 与弱国 Z 之间的权力平衡。与此同时，X 从互动中获益却是最少的，维护和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负担，无论摆脱与 YZ 的互动还是只保留一方而“解决”三角关系都面临国内压力。全球元三角关系将 X 置于普遍和平维护者的地位，它就不止存在于一个三角关系中，而是在与其偏好背道而驰的任何互动中。多边不确定性会因为事件不确定性而倍增。世界大国的可能地位既可以是作为运行中不受干预的全球秩序（或失序）的神圣钟表匠而象征性存在，也可以扮演积极实施其偏好的全球警察角色。现实往往位于中间地带，同时又不断受到减少受关系的影响程度与积极决定关系的结果两种矛盾诉求的相反张力牵制。

地区大国的地位相当于受挫的 Y，地区大国的全球脆弱性甚至影响它的地区内关系，因为弱小的伙伴国可以寻求地区外的帮助。这些小国是否顺从不仅取决于 Y 对其自主权的承认，还取决于它们的地区外选择。因此 Y 在双边关系中是处于弱势地位，不符合其实力优势。如果选择贴近世界大国以减少受其干预的可能性，就束缚了自己相对于 Z 的选择；如果与 X 的偏好相左，就等于和强国为敌。即使 X 不代表 Z 方利益进行积极干预，Y 也要承受它在关系的其他领域并不顺从的后果。地区大国中间地位的这种两难恰好符合非对称战略三角中的中间地位。

世界体系中大多数国家的地位相当于 X>Y>Z 三角中的 Z，面临最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它们是 Y 受挫的原因，从 X 获得的支持也不可靠。世界大国遥不可及，心不在焉，往往还与 Y 有关系。于是，小国的选择既可以是对地区大国表示顺从和前面提到寻求地区外帮助的地区“忠实朋友”，又可以是紧跟世界大国步伐、希望从中获益的“走向全球”类型。在后一种选择中，小国在决定性后果中的极端利益，加上它对世界大国全

权委托的信任往往会导致危机。

还有一种复杂的全球元三角是X实力最强，但是并不具备（或者可能失去了）在YZ关系中的决定性实力，因此YZ实际上成了双边关系。X的偏好仍然重要，因为Y和Z都受到X实力优势的影响，只不过世界大国X的可能干预不再是决定性的。

下一章我们会超越安全问题并指出，世界经济自2008年全球金融不确定性引发危机以来已经进入新的时期，其中美国仍然是最大的经济体，但是不再对双边或者地区的全球经济活动具有决定性影响。随着全球不确定性的增加，可能产生更强的双边和地区协定。例如，当地货币相对于美元的浮动，以及对美国赤字影响美元市值的担忧会降低美元作为贸易值稳定储备的可靠性。在可见的未来，不可能出现另一种货币取代美元成为唯一全球通用货币。但是，很可能商人和国家会越来越多地在交易中使用地区货币，从而避免受到不确定性的又一维度影响。

这个元三角的比喻虽然有助于概括全球形势下高、中、低三种国家间的总体地位，但是还是太过于简化了。中东地区的动荡表明，现实中当然不止三个行为体，往往也不止三个层面的互动。全球常规化催生了政府间国际组织，它们形成了自己的国际特征。尽管未来尚不可知，小国、中等强国和大国还是要以不同的实力，以及不同的预期和担忧去面对未来。它们的不确定性也因其分类的意义而有所不同。

全球联盟

面对不确定性时是选择合作还是竞争的基本两难在全球层面与在社会互动的更私密领域是一样真实存在的。对个体国家而言，全球层面是决定其选择合作、缓冲、围堵还是竞争战略的终极环境。但是，既然这是管理不确定性的终极框架，并且也只是有一个或者很少几个世界大国，大国（们）的联盟选择尽可能产生一种比第三章中描述的多边选择更持久的安排。因此有必要在全球环境下重新审视第三章中的联盟选择。

与在多边联盟中一样，基本选择仍然是包容性合作、与被排斥方竞争的排他性合作，以及非对称竞争三种，每种选择又进一步分为强、中、弱三种联盟模式。全球层面的不同在于世界大国的选择设定了默认的框架，更多的本土选择只能在框架中进行。这只是关于全球联盟模式的一种启发性图谱，并非清晰明确的分类。我希望该图谱有助于复杂的案例和模式变化方向的分析，而不是否认边缘案例或者矛盾因素存在的可能性。

表 5.1　全球联盟模式

	共同体	同　盟	附属关系
强	世界政府	大国阵营	单边帝国
中	宪法化	临时的联合	霸　权
弱	双赢模式	我们与他们	输赢模式

包容性合作

因为全球现实是非对称的，包容性合作并不意味着平等，但是的确要求一种基于所有各方利益的模式。包容即不排他。任何未加入联盟的国家都是可选择的联盟对象。在现代世界中，最强形式的全球合作是世界政府，它会要求某些全球形式的治理参与。如果我们把色诺芬对居鲁士大帝的理想化描述作为一个典型，就可以想象一个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实施统治的世界君主（换言之，不受任何更强大国或者地区外大国制约）。[34]所谓跨国的世界政府都是我们想象的，因为所有必须实施有效领导的世界大国如果成立了在本国之上的政府，它们都要担心遭遇格列佛游记的命运。虽然世界政府都承诺现有的秩序是永恒的，从而摆脱了霸权循环，但是与此同时也就意味着牺牲了本国的诉求，事实上很少有霸权国做好了进入天堂的准备。

全球共同体更现实的存在形式是通过对某种互动模式的普遍预先承诺实现秩序的宪法化。宪法化的关键因素是约翰·伊肯伯里所说的世界大国的战略克制。[35]他恰当地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的持久性归功于美国在建立秩序中的领导地位，该秩序将美国与他国的关系纳入了各方可接受互动的整体模式中。伊肯伯里把宪法秩序定义为“旨在分配权利和制约权力使用，并围绕着一致同意的法律和政治制度运行的政治秩

序”[36]。国际制度本身不会成为治理的实体，它们形成的制度约束使国家间互动常规化，以确保弱国消除顾虑。

全球共同体的最弱形式是国际互动中非制度化的互惠模式。尽管存在实力非对称，所有参与方还是希望成为不受控制的伙伴，因此也称其为“双赢模式”。“双赢”环境类似于英国学派主张的“国际社会”，但是在我的分类中主要是将其区别于更强形式的全球共同体，因此“双赢模式”不一定是共享文化的产物。

所有形式的全球共同体都起源于意识到冲突的危险，以及理想的胜利。正如伊肯伯里所说，胜利为重建国际秩序提供了机会，之前的战争则成为统治权有局限性的“反面教材”。战略克制只不过是开明的利己主义，但之前的战火往往带来了光明。

排他性共同体

作为中间类型的同盟是一种与圈外国家并存的排他性共同体。最强形式的合作是世界分裂为大国领导的阵营，冷战两极格局是最典型的代表。在大同盟中，合作的好处会被共同敌人的威胁放大。[37]重要的是，同盟的成员是被吸引而非强迫加入的，否则同盟就只是一种分裂形式的统治权，反而更脆弱。这种类型也包括同盟与不受挑战国领导的敌对力量并存的情况，这些敌对力量就是一种长期威胁。

仅次于大同盟的合作形式是临时同盟，是一种目标有限的联合。防御性同盟就属于这一类型，同盟的目标是某一共同威胁，同时又认定了威胁能够消除。当意识到威胁发生变化时，同盟的成员也可能改变承诺。另一种更典型的临时同盟是由大国为某一具体目标组织的同盟，比如美国入侵伊拉克时的“自愿联合”。当时大部分参与国都是为了讨好美国，一旦成本（包括国内政治成本）剧增之后又都选择了退出。

最弱形式的合作是“我们与他们”，这也代表了所有同盟产生时的原始区分。“我们”的共同感受需要与对立的“他们”保持距离，由此产生的共同体就建立在差异性基础上。当然，“我们-他们”的区分几乎囊括了从个体到一个物种的无限差别，但是在全球层面，它通常是指具有不同文化和政治共性的群体。欧文把跨国意识形态极化与全球冲突相关联证明了

最极端形式的"我们-他们"分歧,但意识形态并非唯一可能的区分标准。[38]

附属关系

如果世界大国在所有的交易中都以实现相对实力优势最大化来定义自己的利益,全球秩序就是一种非对称竞争。这里使用"附属关系"比第三章用的模糊辞令"等级制"更好,因为潜在原则是世界大国利益的优先性。既然强国在任何非对称交易中都占优,秩序就是服务于强国的利益,而将弱国的不同利益置于风险中的。竞争性思维的最终表现就是世界大国不受制约的单边主义。正如保罗·施罗德所言,帝国无论直接还是非正式地实施控制权都与自主国家组成的体系不协调。[39]但是,可以存在多个全球帝国控制它们各自的阵营。

中等水平的竞争是一种霸权秩序,世界大国将其偏好融入统治机制中,而不是简单地独断专行。对少数国家而言,霸权秩序的好处在于具有了更高的可预测性,但是仍然服务于霸权国而非全球共同利益。霸权秩序可能随着单边主义的常规化而出现,也可能由比较精明的大国直接通过制度建立。霸权秩序的"屈从"特征与宪法秩序的"全体一致"特征截然相反。换言之,宪法秩序是各方认可具有合法性的,而霸权秩序不是。一国可能屈从于霸权国,但是不会授权委托于霸权国。

最弱同时也是最基础的竞争类型是输赢模式的交易。国际互动的胜利都是根据较之于伙伴的相对收益来判断的,互动也是在认定冲突的利益间发生,互动的习惯、模式和结构会反映实力的差别,由此产生的就是附属关系,而非共同利益和共同体。

乔治·W.布什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在与另一个国家的谈判结束后发表的一个胜利讲话形象地证明了输赢思维:"我们得到了所有我们想要的,但他们什么都没得到!"[40]如果这是与对方的唯一一次或者最后一次交易,成果最大化可能会看似合理。如果交易发生在对称伙伴之间,一方仅仅是在讨价还价中赢了对方,交易也会看似公平,因为双方机会均等。然而,如果这是霸权国通常遇到的持续非对称关系中的一次交易,那就是一场有战略代价的交易胜利。把别人踩在脚下的快感可不是相互的。

如果a)世界大国的关系是不变的,b)小国不能反抗或者有效地联合起来反抗霸权国,c)将来的承诺也不受当前的勒索影响,那么附属关系而非合作就是对大国的最高回报。当然,以上三点都是一种长远假定。因为把弱国的利益置于持续的危险中,附属关系其实是推动霸权循环的力量。

冷战模式

如果将全球联盟的图谱应用于冷战,主要模式显然是对抗性同盟。其中苏联阵营是建立在附属关系的基础上,并且从1948年的南斯拉夫开始直到1989年,不断有国家"不顺从"。1956年镇压匈牙利和1968年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成功虽然延迟了苏联阵营的衰落,但是也造成了更深层次的分裂。与之相反,美国的同盟更加开放,大多数国家都是在彼此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加入的,具有更高的稳固性与合法性。苏联阵营的统治方式生动证明了相反做法的危险。伊朗则是印证该规则的另一个重要例外。1953年,中央情报局策划推翻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sadegh)并转而支持沙阿(Shah)后造成了伊朗与美国之间与东欧和苏联之间一样深刻的分裂。接下来貌似成功的附属关系也在1979年随着反抗美国恶魔(Satan)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国民革命而被倾覆了。

冷战最适合检验非对称理论在全球层面的适用性,因为现代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比冷战中对大国对手的排他性关注看起来更合理了。美国和苏联都拥有摧毁自己和整个世界的热核实力,都是各自同盟中无可置疑的领导者;同时也都参与了遍布世界的代理人战争。或许没有什么比观看两个全能型对手在全球竞赛中按照末日时钟(Doomsday Clock)格斗更吸引人的,但是这场竞赛的结局并非输赢,或者第三方挑战者的崛起。

更重要的是,正如艾伦·林奇所说,两个超级大国在欧洲的关系已经于1956年随着美国决定不干预匈牙利而稳定下来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它们开始控制核威胁。[41]在越南和阿富汗的两场重要代理人战争也证明了世界大国的局限性,以及两极认知可能引起弄巧成拙的曲解。全球棋局思维的根本问题在于棋子都是有生命的。

霸权循环不可避免可能恰恰是因为实力差异带来的认知曲解,而不

是因为霸权国的理性。循环的动机以及全球模式的稳定性则可能是安全程度或者是大量政治共同体因无力挑战大国而感受到的受孤立程度累积的结果。附属关系是一种能动关系，所需的动力要与附属关系的程度相称。如果世界大国自认为只受制于挑战者，它们势必遭遇——却不能理解——与日俱增的统治困难。历史就像是一位魔术师，露出来的手都是用来干扰视线的，看不见的手才真正起作用。

注 释

1. Martin Wight, *Power Politics*(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8).

2. Giulio Gallarotti, *The Power Curse: Influence and Illusion in World Politics*(Boulder: Lynne Rienner, 2010).

3. Joseph Esherick, "China and the World: From Tribute to Treaties to Popular Nationalism," in Brantly Womack, ed., *China's Ris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Boulder: Rowman & Littlefield, 2010), p.24.

4. Martha Finnemore's discussion of unipolar hypocrisy fits closely. "Legitimacy, Hypocris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Unipolarity: Why Being a Unipole Is Not All It Is Cracked Up to Be," in John Ikenberry, Michael Mastanduno, and William Wohlfor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Unipolarit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67—98.

5. Scott, *The Weapons of the Weak*.

6.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7.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5.

8. 历史上的同义反复是指"故事就是如此"，怎么讲述都是指向固定结局的。逻辑上的同义反复是指结论都包含在前提中。修辞上的同义反复是指两个用词都是同一个意思。

9.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p.xxi.

10. Ibid., p.xv.

11. Ibid., p.xxii，原文强调。

12.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31.

13. Ibid.

14. Alexander Eckstein, *Mediterranean Anarchy: Interstate War and the Rise of Rom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chapter 7, pp.244—316.

15. David Deudney, "A Republic for Expansion: The Roman Constitution and Empire and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in Stuart Kaufman, Richard Little,

and William Wohlforth, eds.,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World History*(New York: Palgrave, 2007), pp.148—175, here p.153.

16. Alexander Eckstein, *Rome Enters the Greek East* (Oxford: Blackwell, 2008).

17.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p.56.

18. Ibid., p.38.

19. Ibid., p.17.

20.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hapter 3.

21. Max Weber, "Die sozialen Gründ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Kultur (1896)," in Johannes Winckelmann, ed., Max Weber: *Soziologie*, *Weltgeschichtliche Analysen*, *Politik*(Stuttgart: Kröner, 1968), pp.1—26.

22. Ibid., p.11.

23. Ibid., p.6.

24. *The Peloponesian War*, quoted in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207.

25. 更多细节参见"Traditional China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Brantly Womack, China among Unequals: Asymmetric Foreign Relations in Asia, pp.153—182。当然,尽管是这样详细的研究也只是对中华帝国历史的曲折、翻转、细枝末节的一种简单概括。

26. John Dardess, *Governing China 150—1850* (Indianapolis: Hackett, 2010), p.xi.

27. Alexander Woodside, "The Center and the Borderlands in Chinese Political Theory,"in Diana Lary, ed., *The Chinese State at the Borders* (Vancouver: UBC Press, 2007).

28. 关于朝贡体系演变的概况详见 Brantly Womack, "Structure and Culture 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Southern Neighbors," in James Anderson and John Whitmore, eds., *China's Encounters in the South and Southwest*: *Reforming the Fiery Frontier*(Leiden: Brill, 2014), pp.395—405。

29.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30. Yuen Foong Khong, "The American Tributary Sytem,"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itonal Politics* 6:1(Spring 2013), pp.1—47.

31. Mars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Cornell, 1996), pp.69—88.

32. I borrow this term from John Owen, *The Clash of Ideas in World Politics*: *Transnational Networks*, *States*, *and Regime Change*, *1510—201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33. Nicolas Taleb, *Black Swan*, 2nd edn.(New York: Penguin, 2010)."黑天鹅"即是以打乱预期发展过程的意外事件。

34. Xenophon, *Cyropaedia*, 2 vols, tr. Walter Miller(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14), especially vol.2.

35.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主线相似,但是在更宽框架下的研究可参见 Elizabeth Hoffman, *American U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36.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p.29.

37. 北约是在敌人消失后仍然存在联盟的一个有趣例证,而且似乎现在它的唯一活跃角色就是临时安排的。参见"Group of Experts on a New Strategic Concept for NATO," *NATO 2020: Assured Security; Dynamic Engagement*, (May 2010)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pdf/20100517_100517_expertsreport.pdf。

38. Owen, *The Clash of Ideas*.

39. Paul Schroeder, "The Mirage of Empire versus the Promise of Hegemony," in *Systems, Stability, and Statecraft*(New York: Palgrave 2004), pp.297—306.

40. 与我参加一个会议时的情形一样。

41. Allen Lynch, *The Cold War is Over-Agai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第六章
多节性与当今世界

任何年龄段的人都对自己和前途感到好奇。人类跋涉的途中经历着不同的风景变化,可能让乐观者失望,也可能让悲观者受挫。地形的变化不能决定道路的选择,但是的确影响选择的可行性及其结果。第五章已经分析了现有世界体系的结构,第六章的任务是进一步说明变化的全球条件对未来前景的间接影响。本章的目标是发现塑造国际政治新局面的因素,描述多节世界秩序的可能特征,以及超越霸权循环的可持续性需要哪些前提条件。

第五章认为,对非对称关系的管理是霸权力量或者霸权体系可持续性的关键。霸权衰落的过程是由其暴行招致的反抗和对霸权顺从的软弱无力引发的,同时又因大国自满造成的疏漏而被加剧。如果一个现状大国通过实施统治表现出自身利益对其他任何一国利益的排斥,该大国就树立了自己的修正主义挑战。多极形势不仅是由大国平衡的兴衰,也是由对国内政治和小国同盟的管理决定的。实施统治还是暴政的差别对实力、可再生性和霸权持久性都有实际影响。

在本章中,我将指出,自 2008 年以来当今时代的社会基础把非对称关系带到了世界政治的中心舞台。[1]积极影响是大大扩展了舞台的范围、替代选择和相互间关系。全球社会结构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孤立在事实上不可能实现,统治也越来越自我束缚,这就是后霸权时代。消极影响在于尽管人人相互牵制并非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但是的确意味着各国的利益乃至身份都受到外部力量的威胁。在这个多种偶然性

交织存在的时代，说世界已经失控并不能让人感到欣慰。本书第三章关于最简单三角关系中固有的不确定性如何处理的问题，现在已经蔓延成全球问题。

尽管不存在霸权秩序的特征，多节世界里相对实力和实力仍然至关重要。本书第一章至第四章关于非对称关系的分析都适用于多节世界。行为能力既吸引关注，也决定认知。多节世界中既有吸引全球关注的首要“节”，又有如地区大国和中等强国一样的次要“节”，还包括更小的联系和关注“点”。多节思想的好处之一是能够对国际结构进行更多的分层。世界政治并非平等国家间的游戏，而是每个参与者都有更多替代选择的多节形势。国际替代选择的增加是美中两国的对抗不可能发展成冷战的主要原因。

在后霸权的世界中必须超越对现状和修正主义大国的关注，因为旧现状已经成为历史且不能重建。于是，互惠的非霸权秩序如何确保可持续性成为关键问题，这也就是我所说的“进展于此”（status ad quem 即拉丁语“发展到现在”的意思）。与出现了并存的霸权挑战者不同，“进展于此”的多节性在各个层面都更强调互动。然而现有行为体与新兴行为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存在，尽管有定位的利益存在分歧，但是它们都希望降低不确定性。

日益呈现的多节性

2008 年开启了国际历史新的一页，也可以说是新的一章。美国是引发金融危机的核心角色，却无力带来全球复苏，也不能重建美国作为决定性超级大国的信用，这标志着全球不确定性进入了新时期。与“华盛顿共识”的表面胜利和后冷战时期（1989—2008 年）想象中的美国无所不能相反，新时期最大的不确定性恰恰位于全球中心。尽管在这个新的时期没有什么像在过去一样是确定的，新兴中等收入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相对增长似乎还是比美国和欧洲的复兴更可能出现。

我们应当把2008年的危机与其长期意义区分开来。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来说,世界经济中心的崩溃都会引发从追求边际收益到担忧资产价值的心理剧变。政治上,美国从布什政府的桀骜不驯转变为奥巴马政府的和颜悦色,并因此而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仍然对前景更加清醒,经济内爆(economic implosion)最终还是见到了底线,美国内外政策的惯性也使其重整旗鼓。如果忽略前景突变带来的不和谐声音,2008年在很多领域还是可以被视为分水岭的,因为当前的变化方向可能持续下去。这些趋势可以产生新的世界政治环境,其中的实力差距仍然存在,但是互动更加多样化。

没有边界的身份

如果我们把边界定义为以固定位置为中心的互动界限,那么边界就不存在了。全球化和连通性革命使所有人都相互关联起来。信息仍然具有的局限性就是利益和关注经济的局限性,那都是可变化的,一定程度上也只是选择问题。而且电子化参与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拥有无限的潜在受众和即时的传输。与之前的运输革命一起,连通性革命创造了一个本质上全新的全球互动环境。

失去边界并不会使身份和利益同质化。身份和利益不仅仍然有固定位置,而且会因为其他国家及其不同利益的活跃存在而变得更加界定严格。"我们"的身份因相反的"他们"而得到强化,"他们"的世界也因此更加生动和直接。例如,高加索山脉是民族主义身份冲突的著名温床,但是并不总能清楚分界。1900年,埃里温(亚美尼亚首都)的多数民族是穆斯林;第比利斯(格鲁吉亚首都)的多数人口是亚美尼亚人;巴库(阿塞拜疆首都)则是国际化的,以俄语为通用语言。[2] 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增加了一国利益承受的风险,不仅是因为处于利益冲突的零和博弈中,而且更根本地也来自因军事投入超过其预期和可控范围而日益增加的意外性。不可否认,边界的扩展同时也是机会的增加,然而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对损失的担忧比对收益的渴望更强烈。[3]

身份和利益的强化也会强化本土化认知。正如阿尔让·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所说:"值得注意的是,对伊里安查亚人来说,印度尼西

亚化或许比美国化更糟糕，相当于韩国人的日本化，斯里兰卡人的印度化，柬埔寨人的越南化，苏联时期亚美尼亚和波罗的海诸国居民的俄罗斯化。”[4]这些例子说明，民族主义不是简单的统一和自我取向，而要针对具体的“他者”。委内瑞拉对美国的民族主义就截然不同于对哥伦比亚的民族主义。

上述问题并不是源起于全球化，全球影响仍然是地方化的，只不过“地方”的含义受到了影响。菲律宾成了一个遍布亚洲和美国的服务移民社群，同时也成为解决美国消费者外包技术援助难题的繁荣产业。韩国仍然是最具民族同质性的国家之一，但是其文化已经因强有力的国家支持移民，以及对外部市场包括文化市场的关注而得到了充分融合。美国和欧洲的国内政治也因移民人口中常驻居民与临时居民在政治共同体内的矛盾而受到冲击。甚至随着柏林、开普敦、上海、奥斯汀这些城市居民之间的物质文化差异消失而信息接触增加，“什么是德国人、南非人、中国人、得克萨斯人？”的问题都变得尖锐起来。

连通性革命还改变了政治行为和态度的可能性。那些各式各样的鲜花革命和运动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破坏官方的信息控制而增强集体行动的迅速组织能力的最极端例子。相反，政治行为体则通过传播信息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就是近期最极端的例证。

边界的消失给所有国家造成网格化强度的形势。网格化强度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全球社会性。内部与外部的分界线变得不太严格也不太安全，连通性革命放大并政治化了各种担忧。位置和实力仍然都重要，但是连通性使得至少在信息和关注度方面是人人相关的。智利能看到叙利亚发生的危机，并对其持有观点和诉求。但是，鉴于它的整个关系网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不计后果地仅仅与叙利亚互动。叙利亚的位置和实力才是其国际关系的核心基础，每个与叙利亚交往的国家也都要从自己的定位利益和实力出发。智利可能观察叙利亚的事件，土耳其却必须采取行动，当然在行动之前还必须考虑自身的地区和全球环境。国家间关系仍然是非对称的，只不过要在一个任何风吹草动都能被各方感受到的更大网络中讨价还价。

中等收入国家的崛起

除了互动模式和强度的变化，国家的相对地位也在改变。中国就是发展中国家中相对增长率超过发达国家的典型代表。这反映了增长模式的根本变化。直到21世纪的头十年，发达国家还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但是从2008年开始形势就翻转了。[5]

尽管趋同不可能改变富有国家的人均排名顺序，表6.1还是说明了世界人口份额的重大变化。发达国家已经接近城市化的边缘，新增的儿童成为经济负担而不是社会保障，它们的世界人口份额正在下降。与此同时，人均生产率的提高却在2010年把中国带入了世界前五大经济体的行列，并且可能到2050年再加上印度。至此，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将要生活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国家。排名前30的经济体中有19个国家属于发展中世界。[6]

表6.1 每40年间的全球人口份额

	1970年	2010年	2050年
发达国家	27.3%	17.9%	13.6%
国民总收入排名前五的国家	13.5%	27.8%	37.6%

来源：根据凯伦·沃德：《2050年的世界》与联合国：《2012年世界人口展望》计算所得。

当然，还有很多理由要求我们谨慎对待上述预测。领导人的作用不容忽视，而2050年的领导人现在还在上大学。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积极变化也不可能被无数的继承者代代相传。或许更重要的是，不可预测事件对结果的影响，即"黑天鹅"效应才是唯一可预测的，其讽刺性在于预测的时段越长，"黑天鹅"出现的概率越高。[7]这些预测并不仅仅是对现有趋势的推论。发展中经济体的相对进步也是基于创造了发达世界的那些相同增长因素的扩散，包括技术变革、教育和卫生的改善、城市化，以及专注于制造业。它们会缩短垂滴增长(trickle-down growth)的阴影，因为技术转移比创新容易得多，发展中国家在教育、卫生、消费和城市化方面都有更多的增长空间。这些拉动因素会随着中等收入国家日益接近发达国家的现状(和问题)而消失，但是根据人均值衡量它们还需要相当一段距离才能实现。因此，世界银行[8]、中央情报局[9]和亚洲开发银行[10]的主要研究都预计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世界会在规模和时机上实现相对增长。

中国的增长应该被视为这种更大的趋同模式的组成部分。因为中国显然避免了 2008 年的危机，世界往往将中国视为新的领导大国，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作为发展中国家崛起集团成员的身份才是持续的相对增长的最好证明。随着发展中世界卫生、教育和人均生产率的趋同，人口大国重新变得重要，而中国就拥有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即使中国经济接近美国的规模，它也只是世界经济谱系中人口数量占前四分之三的中等收入国家。当然，整体实力本身就很重要，中国的长期中等收入地位意味着它还有继续实现相对增长的空间。

人口大国的历史回归

经济不确定性的新时期当然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的一个深刻变化，但是就其规模而言仍然是一种更大转变的一部分。从 18 世纪末到 20 世纪，人类历史的现代时期日益受到国家间人均生产能力差异的影响。任何汽车的马力等级都可以被视为人类和动物能量如何被其他原料取代的标志。科学与大规模生产取代了传统技艺。扩大的甚至是全球市场社会的劳动分工取代了自给自足的生存社区。在上述变化首先发生的西方国家，产生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巨大个人和社会实力差距。人口中等规模国家的健康、教育、城市化、军队和政治先进水平率先达到新高度。这种差距被用来在其主宰者的形象和需求上塑造世界秩序。

当然，人口因素在西方世界的领导权竞争中曾是重要因素。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威尼斯、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和美国，只有英国没有人口增长，但是它有更大的殖民地人口资源。美国的主要和持久优势也在于拥有二十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如果德国拥有中国的人口规模，其经济就能不止超过美国三倍。[11]然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生产人口的重要性远超过总人口，否则中国不会失去 19 世纪的经济领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其他地区也慢慢走出了殖民统治、贫困和本土化生存的阴影。

人口偏少却能实力超强的时代正在远去。这不是向更早世界的倒退，而是实力的扩散超越了其原始创造者。非西方世界因为日益学会了利用现代实力和结构服务于自身利益而正在崛起，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中

国和印度两个人口大国。实力扩散也在改变着国际互动的结构。随着西方以外的世界发展出自己的资本并且变得更加文明与科学，它们与发达世界的人均差距也在消失。现在美国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平均寿命差就超过了美国与中国人口之间的平均寿命差。[12]当然，发展并不平衡。阿富汗的平均寿命仅是中国的三分之二，中国国内西藏的平均寿命仅是上海的百分之八十五。[13]一方面，世界最贫困的三分之一国家与前三分之二国家的差距仍在扩大，另一方面，发展中世界向发达世界过渡的方式会从根本上影响国家间实力的分布。

人口大国对世界秩序的意义不同于技术大国。2014 年，中国的国民总收入（GNI）在购买力平价（PPP）上开始超过美国。[14]但是中国的财政馅饼要养活更多人。与美国经济持平，中国需要治理的人口是美国的 4 倍，而且这些人口还要有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人均分配需求。持有 100 美元的一个人当然比每人 25 美元的四个人拥有更多的预算自由裁量权。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一群富人当然也比那些生活在人人拥有大体等量财富的世界里的更大一群人更可能从邻居那里获益或者受损。与此同时，财富的全球扩散也给全球资源带来了日益增长的压力。人口帝国主义比资本帝国主义更可能借助市场运行，只不过竞争是围绕着对现代生活和生产力至关重要的资源而展开，失败者有落入竞争力下降旋涡的危险。

中等收入国家增长的国内难题

大到足以在以经济为中心的预测中取得进展的那些“黑天鹅”也隐藏在它们的政治挑战中。事实上，一个一个“黑天鹅”已经变成现实。不可避免的“黑天鹅”存在于城市化的人口影响中。移居城市的农民提高了收入和生产率，通常在乡村被视为财富的儿童在城市里成了昂贵的负担。城市化是通过提高生产率并减少供养对象而使人均收入增长的。但是，降低生育率就会造成未来的人口危机。这些城市潮的一代人退休后，远没有足够的工人供养他们，工人都已经生活在城市里了。人口结构的力量不容忽视。1990 年至 2005 年间，俄罗斯的年龄中位数（median age）提高了 4 岁而平均寿命下降了 4 岁。[15]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经济崩溃了，人口增长的趋势却没有动摇。大多数发达地区，特别是新发展起来的韩

国和中国台湾都面临着低于置换生育率（below-replacement birth rates）的挑战，全球的年龄中位数预计会从2010年的28.5岁提高到2050年的36.1岁。[16]

中国尤其可能遭遇人口逆转。直到改革前，中国都严格控制城市化，20世纪70年代初还实施了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高峰时期执行了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以来，中国的增长是得益于放开了被压制的城市化，以及严格控制的家庭规模带来了超高比例的劳动力人口。但是从1980年到2010年间，中国的年龄中位数已经由22.1岁上升到34.6岁，并且会持续增加到2050年的46.3岁。有效劳动力的黄金时期正在远去。随着农村外流人口的减少，沿海地区已经首先受到劳动力成本增长的影响。[17]中国正在失去最廉价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因此必须通过提高每个工人的生产力从而实现生产率的密集增长。接着还有一个日益迫近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城市退休者需要照料，估计到2050年会有大约9 000万人口超过80岁。2010年中国有8%的人口达到或者超过了65岁，到2050年该比例会翻两番至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按照美国的生活标准，中国将是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

对人口革命的悲观预测将推翻马尔萨斯的警告。不是世界发展到人口和贫困的极限，而是老龄化人口日益增长的消费催生了可持续性的问题。坦率地说，如果每人都想要像美国人那样生活，就没人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了，而现在更多的人梦想可以争取那样的生活。如果货币需求超过了资源供给，收入固定的退休者或者政府供养负担的日益增加就会特别脆弱。只有可用资源与需求相称，各种发现才能变成现实。“白天鹅”与“黑天鹅”是共同存在的：以前化学肥料通过使世界粮食产量翻番改变了马尔萨斯的预测，现在页岩油气占到可开采世界石油储备的三分之一。[18]当然，消费压力还是加剧了资源和环境可持续性的紧迫程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诸如页岩开采之类的发现作出贡献是以温室气体对气候和海岸线造成压力为代价的。

其他“天鹅”的飞行模式可预测性不高，但是仍然重要。接受更好教育的城市人口富有经验并且善于表达政治需求，连通性革命又大大增加了他们对信息和自发组织的选择。城市化其实是将人们聚集在了政治系

统最敏感的压力点上。

生产生态学

除了观念和社会变革，基本经济进程的发展趋势也在影响世界政治的结构。因为国际价值链取代了最终产品贸易，有关经济相互依赖是造成还是减少国际摩擦的观点已经需要更新。将当今的全球化与过去活跃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对比会造成误解。国家商品的标签正在失去意义。比如，一部苹果手机在中国组装会给中国的出口总额增加 179 美元，但是其中 172 美元是用于进口零部件的。[19]产品上的“中国制造”标签实际只表明“在中国最后完成”。而且，现在的全球相关性并不局限于国家层面或者经济关系。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形成了联系、规则和资源的网络。随处可见的集装箱证明了全球标准化的总体趋势。或许最重要的是，意义重大的关系并不局限于霸权的政治和安全政权之间。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的盟友，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两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不仅生产过程变得国际化，生产中的问题也日益国际化了。全球市场已经改变了旧的帝国前提，即可靠的资源获取离不开政治控制。轴辐式国际关系的经济合理性大大降低。定价与可用资源的不确定性取代了对资源获取的政治控制。

比生产投入更成问题的是环境影响。污染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制造业经济体遇到的最突出问题，全球变暖的总体效应给温室气体排放与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问题同样造成了压力。

社会经济变化的分配效应并不明显，却仍然难处理。中等收入国家尤其突出的生活机会增加当然是一种积极发展，后生产人口（postproductive population）的普遍增长却带来了福利和分配的挑战。如果单个工人的生产力增长超过整体生产力的增长，人口变革的整体压力会得以缓解，但是分配难题则相应尖锐化。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认为如果正如他预计的那样，尤其是在发达国家，资本收益率超过增长速度的话，收入不平等会加剧现有的财富不平等。[20]尽管直接政策压力和分配难题都是国内事务，上述问题却是普遍存在的，并且世界任何地区的系统变化都会影响其他地区。

稳定的国家，不稳定的政府

尽管相对实力发生变化，现代化过程中也会发生国内政治混乱和调整，基于国家主权的现有国际结构仍然可能延续下来。国家不再设定居民联系和交往的边界，但其国内治理和国际代表的功能仍然必要，已经习惯了当前国际结构的国家主权事实上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默认选择。无论是由于战争成本的升高，建立在谈判基础上的国际社会出现，抑或是由于弱国显示出的反抗实力，新的帝国都不再可能出现。地区组织尽管越来越重要，也不能取代国家主权。欧盟最恰当地证明了跨国一体化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尽管全球化发展，抑或正是由于全球化的不确定性，固定和彼此互动的国家结构可能仍然是核心的全球结构。国家也还保有特定的位置、身份和历史记忆，全球化不会带来透明化和相互理解。国家间人口、实力和资源也还是不平等，因此它们日益紧密的关系也仍然是非对称的。即使发生大战的可能性正在消失，国家间矛盾诉求的争吵却会增加。主权国家的集合及其相关的国际治理制度可能仍然是国际互动的基本机制。[21]

在没有边界的多节世界里，“小型战争”的概率和可能范围都缩小了。大国不太可能再有美国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时的那种单边主义无所不能的妄想，它们也不可能忽视统治地位带来的附加成本。任何强制行为都会对其他伙伴的态度产生负面影响，试图统治的强度和持久性越高，成本也就越高。大国可能会不计后果，但是每一次小型战争都会刷新之前的教训。

大国会忍不住卷入隐秘和有限的战争。中国 1962 年对印度和 1979 年对越南的自我克制式袭击就是以简短和克制确保后续影响最小化的军事冲突战略案例。这两次袭击都无意变更对方的政权。另外，禁运、无人机袭击，以及针对政策变化或者非主权行为体的秘密行动也都是如此。除了军事袭击，大国也常常忍不住将某一政策争端与可能使小国损失更多的其他政策领域相关联。因此，我们并不预期会出现一个更和谐的世界，冲突仍可能在现有国家的结构内发生，稳定的伙伴之间也会越来越多地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尽管国家被战争消灭的可能性降低了，它们的政府却越来越多地受到公众舆论和国内政治的压力。人人都更真实地感受到全球化带来的机

遇和脆弱性，加之连通性革命的影响，公众舆论越来越反复无常且有力量。与此同时，国家也会为了深化共同利益和避免危机而探索合作与监管制度。主权因此越来越受到国内公众舆论和国际承诺的外部制约。一方面公众要求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主权自由又受到各种协定和冲动行为负面效应的束缚，国家可能还比较稳定，政府则越来越不稳定。

共同利益与相同利益

全球化创造了国家间管理类似互动的相同利益，以及能够组织化和制度化的共同利益。相同利益能够在即使没有全面权威或者协调的情况下产生共同的解决方案。交通灯的推广和标准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交通信号灯在底特律被发明出来，当初选择红、绿、黄三种颜色也非常随机，如今却在没有任何全球权威要求其被采用的情况下成了一种全球标准。当全球“交通”变得越来越拥挤时，无论作为国内还是跨国问题，对管理、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的需求都日益紧迫。[22]再比如，对食品安全的要求可能来自贸易伙伴，但食品安全的压力则始于国内。另外，很多非政府组织也会追求跨越国界的特定使命，加速标准的扩散。

各国在共享全球和地区机制方面有共同利益，同时国家间的相对实力又影响它们对这些利益实现制度化的态度。有些共同利益——比如预防流行性疾病或者应对全球变暖——会随着全球接触的日益密切而变得更加紧迫，另一些共同利益——比如保护野生动物——则要得益于全球关注和行动主义。在“多节”世界中，破坏共同利益而有利可图的行为选择减少了，常规化的共同利益增强了规避冲突的动机。然而，大国往往不希望被那些由一国管理或者实行一票制的多边机制束缚，很小的国家也愿意保持自由，因为它们的负面影响并不足以引发危机。守成大国需要维护那些体现其控制权的国际安排，崛起大国则强烈要求对其重新评估。承认共同利益可以打开合作对话的新领域，当然，达成有效的协定还需要漫长的风雨历程。

简单概括多节性

那么，初期的全球秩序有哪些基本特征呢？这是一个由实力悬殊国

家组成的相当稳定的世界。国家间既和平地互动，又吵闹地竞争优势和共享资源，同时也越来越认识到共同问题的存在。当前，全球金融不确定性还进一步增强了多边关系的日常不确定性。

这是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每个国家都处在与所有其他国家联系的某一层次上，但是联系的复杂性和深度取决于彼此的距离、资源和实力。借助互联网的虚拟联系以及移民人口的经历越来越有助于文化融合，融合却不等于全球同质化，本土反应将持续存在。没有边界的世界促进了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跨国活动。作为非对称实力组成的世界，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程度及认知也仍然存在差异。由于世界中间力量的加速发展，人均实力的分布会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并没有取代目前的领先国家。加之国家间人口的悬殊，国家整体实力的排序也会发生明显变动。因此，正在形成的“多节”世界中，国家单元仍然稳定并且固定在非对称关系的地理结构中，只不过它们面临着更加多元的外部影响和更多的相对实力变化。

简言之，“多节”世界由没有边界、彼此互动但是有定位的利益组成，其中的国家在实力和受关系影响程度上不平等，却是活跃的主权单位；其中的政府一方面被全球结构束缚行为，另一方面也被日益活跃的公众对所察觉危机的担忧和对有利结果的渴望所羁绊。尽管国家主权不容忽视，地区、全球机制以及非政府组织可能变得更重要。

多节性结构

传统理论存在的问题

日益呈现的多节性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和非对称理论都提出了重大挑战，但是非对称理论更适合应对挑战。强现实主义则尤其难以适应。如果征服不再是可行的目标，现实主义关注的大国和大战就无从谈起。罗伯特·吉尔平所强调的领土扩张是霸权循环的关键显然属于上一个时代。[23]克里米亚问题更复杂，它说明解体的国家（比如苏联）可能给继承者

带来领土冲突。问题的根本也是领土变动而并非扩张。

在“多节”世界中，现实主义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它假定了大国、大战和霸权循环不可避免，即使不是自我实现的预言，也属于无视其他可能性的自我失明（self-inflicted blindness）。国家仍然可能幻想自己是深陷霸权致命争夺的大国。对它们来说，只要有军事实力就仍有大战甚至是热核战争的可能性。具体情景可以是现有的霸权国被新挑战者取代，霸权循环生生不息。上述可能性的证据和代言人在任何国家都能找到。然而，如果执迷于这些可能性就忽略了多节性固有的战略机遇和逻辑。大战的可能的确存在于各种非对称互动的广阔领域的最边缘。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政治中主要的“节”点，却不是控制各自阵营的“极”。鉴于任何循环变化中都有内在的风险，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任务就应该是恰当管理当前的结构，而不是像希腊神话中的凶事预言家卡桑德拉（Cassandra）一样等待结局。

建构主义因为强调互动以及强化和约束国际模式的可能性，所以更适用于“多节”世界。但是，建构主义低估了结构对塑造认知的重要性，它提出的国际关系文化序列——分别基于敌对、竞争和朋友的霍布斯、洛克和康德文化——也忽视了全球化固有的矛盾。例如自 2007 年以来，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一直是中国，日本也成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但是 2013 年 8 月的民调显示，93%的日本人对中国持不利观点，同样有 90%的中国人也不喜欢日本。[24]事实上自 2006 年以来，双方的彼此反感就在稳步增长，因为不能继续走高，该趋势很快也将转变。非对称理论并不认为这是向霍布斯黑暗的一种倒退，而是将其解释为中国基于日本入侵的记忆及其侵略性民族主义罪责而质疑日本的身份和脆弱性，日本对此却不反省才作出的一种反应。彼此的反感可能引发战争或者经济关系的倒退，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结果也是接触增加和期待更多接触的产物。一旦发生敌对，冲突的附加成本会让双方都感到意外。因此，中日之间更可能继续以康德式的论调相互发表官方的、缓和的声明，在洛克式的语境中讨价还价，同时也以霍布斯式的生动性担忧彼此。

“多节”趋势与非对称理论

如果“多节”世界在结构上不同于之前的世界，这就对那些必须管理一种新环境的国家和非对称理论同时都提出了挑战。非对称理论的前提是非对称关系是常态，但是我们也预计有两大趋同发生，一个是中等收入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趋同，另一个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趋同。对趋同的预测影响了国家的前景，并且这些都是非对称减弱的趋势。另外，全球化带来的边界消失貌似也降低了双边，甚至地区关系的重要性，这也是非对称理论的组成部分。

中等收入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趋同带来的国内政治挑战或许比其外交影响更意义重大。各国都不得不应对老龄化人口的需求，发展中国家则面临教育改善、富有起来的城市公民提出更高政治诉求的挑战。这些结果对国际关系仍然重要。尽管国家的人均排名不可能发生大变化，各国的经济都在增长，国家实力的全球分布图还是会改变。随着全球生活机会差距的缩小和国际交往密度的增加，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应当提升。由此产生的将是一个更加结构化的国际社会，个体政府的自由则进一步受限。国家仍然是国际活动的基本单位，国家间的非对称必须体现在全球治理的各种制度中。世界也将不得不应对和美国“康涅狄格妥协”同样规模的困境，那次妥协留给了美国一个基于公民人数的众议院和一个各州平等代表数的参议院。

中美两国国民总收入的接近可以说是对非对称理论的终极挑战。但是，这种接近代表的是抵消型非对称，而不是对实力和野心的一种镜像反映。经合组织预测，中国经济会在 2030 年达到美国的 1.6 倍，2060 年达到差不多两倍。[25] 美国和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明显超过排名其后的国家。它们是全球结构的主要“节”点。与此同时，经合组织也预测，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到 2030 年仅占美国的 41%，2060 年只能达到 55%。老龄化人口带来的日益加重的福利负担对中国而言尤其沉重，而美国却可能保持其全面的技术优势。尽管国民总收入基本对称，中美两国有定位的认知、利益和实力还是截然不同，因此大国生死决战对任何一方来说都没有必要，也不明智。

双边敌对及其局限性

美国和中国在可见的未来都要管理着一组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且双方关系会趋于紧张。2014 年，两国的国民总收入（实际上基本相等）之和占到全世界生产力的三分之一。两国受彼此关系的影响都是最大，同时也因为政治体制的差异和两国实力性质的不同而更难相处。当一个维持现状大国遇上一个崛起大国时，双方都难免彼此担忧。维持现状大国担心自身的优势受到挑战，崛起大国担心自己受到制约。文化和政治体制的差异会进一步加剧误解，因此中美之间的敌对在所难免。

敌对的可能领域、程度和结果涉及范围很广，双边敌对也受到更大国际环境的影响。“敌对”一词源自拉丁语，意思是占据河对面的人，对美国和中国来说，“河”就是指太平洋。事实上一条河既把两岸的人口分隔开来，与此同时也让他们彼此面对，“敌对”的词源既表明了双方身份的明确差别，也揭示了两者始终不变的双边利益。当然，文献学的解释比“敌对”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通常用法宽泛和空洞许多。如果“敌对”是指对抗关系或者涉及军事冲突，[26]用来形容当前的美中关系就过于刺耳了，也没有理由认定两国关系会在将来恶化成敌对状态。因为美中两国任何一方的安全都不受到对方的直接威胁，来自对方实力的影响只会产生长远的担忧，于是就必须考虑错误知觉导致恶性循环的可能性。

没有新冷战

世界政治中这两个主要“节”点的敌对前景不禁让人想起冷战的两极，但是又在几个基本层面不同于美苏对峙。第一，美中两国在国际社会经济的各个维度都紧密相联。如果不能实现双赢，结果只能是双输，而不会是零和游戏。相互依赖虽然不能阻止冲突，却会提高其代价，美中之间无疑是既复杂又广泛地交织在一起的。第二，冷战对抗建立在美苏之间以武器和空间竞赛为标志的对称假定基础上。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美国

作为技术大国的本质不同则使双方更可能是持续的非对称竞争关系。军事上，中国的目标是确保周边的直接安全，而不是追平美国的全球影响。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引发了对美国在空间、网络战和西太平洋地区无坚不摧的质疑，但是中国并不寻求取代美国的全球军事存在。[27]而且，即使作为人口大国貌似已经平等，而事实上中国仍然在人均生产力和技术实力方面落后于美国。人口大国意味着对内有更多的生命需要供养，对外则会束手束脚。

第三，最重要的是冷战时期的阵营和阵营纪律都已不复存在。虽然美国仍然维持着遍布世界的同盟和军事基地，冷战世界的分裂却是由美国的遏制战略配合上苏联（以及 1971 年之前的中国）的自我孤立造成的。苏联靠武力强化阵营纪律，苏联的咄咄逼人导致欧洲和美国必须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称：北约）。当前俄罗斯的行为仍然是北约关注的焦点，亚洲的形势却与此不同。美国的亚洲盟友都以中国为主要贸易伙伴，中国的地区关系不是类似于华沙条约的“北京条约”，而是建立在彼此承诺和经济发展基础上的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除了执行联合国的任务，中国在海外没有驻军。

虽然美中两国实力的内涵不同，两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主要“节”点，再无其他国家可以在经济总量上接近两国。因此，两国不可避免地成为对方攀比和关注的主要目标，双方的差异会导致误解和疑虑。在关系的和平一端，敌对会增加大国对小国的关注，因为两个主要“节”点都要争取获得支持。例如，继 2002 年中国加入《东盟友好条约》后，美国也于 2009 年签署了条约。这是东南亚小国从大国敌对中获益的典型案例。与此同时，孔子学院则暴露了中国在文化软实力方面的相对不足。诚然，如果双方的敌对从相对稳定转向零和冲突，两国就会失去双边关系的收益，以及合作实现全球领导权的机会。但是，李侃如和王缉思提到的美中战略互疑仍可能持续存在，不仅妨碍合作，而且可能导致对抗。[28]

“节”点以下的其他国家

不存在极化的阵营仅仅是“多节”世界中小国可能有不同选择范围的最明显标志。非对称实力仍然重要，但是不平等的国际结构不会形成权

力的等级制。小国不能对大国还以颜色，但是能与他国直接互动而不必借助全球或者地区霸权国。在非对称的双边关系中，小国并非毫无退路，它们有很多选择而不仅是简单对抗。无论通过改变地理还是实力，小国都不能重新定位，但却可以向其他方面发展。所有其他国家在整体经济实力方面都不及美国和中国，它们几乎不可能一致。不仅两个主要“节”点大国下面还有技术和人口实力的巨大差异存在，另外也有很多地区大国和地区组织，它们都在国际和跨国联系的密集结构中运行。

小国选择范围的扩大对全球政治的潜在动力机制具有深刻意义。与在两极环境中一样，主要“节”点大国及其相互关系仍然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与两个主要“节”点的关系是小国最重要的非对称关系，因此也最受关注。世界关注的利益中心会因其成为全球交往的中心而被夸大。每个小国都会优先关注自己与两个主要“节”点大国的两组直接关系，同时也会关心美中关系对其利益的间接影响。在敌对的两极结构中，旁观者若要回避选择只能付出被边缘化的代价。然而，考虑到与不被选择一方的关系削弱带来的机会成本，“多节”世界中的小国更愿意回避选择。

鉴于主要“节”点大国的持续敌对竞争，小国的明智选择是通过发展与其他非“节”点国家的关系以减少自身受到的影响。如果世界中心的政治经济成了陷阱，聪明的做法当然是绕道而行。主要“节”点加在一起也只是全球实力的少数，小国完全有绕道而行的空间。由于世界其他国家选择绕开主要“节”点的冲突，主要“节”点大国的重要性和实力就被削弱了，次要“节”点和地区“节”点的重要性和实力则相应增强。两极大国没有领导两个敌对阵营，反而成为全球交通的威胁。

多节性也增加了小国在其地区内的选择。即使是在世界大国的“后院”里，小国也面临更多元的选择。如果我们仍然在没有其他大国可以挑战美国的意义上把拉美称作美国的“后院”的话，如表 6.2 所示，拉美国家同时也广泛拥有美国无法控制的全球关系选择。美国是巴西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但是更重要的是巴西的贸易非常多元化。巴西并非美中经济的一个竞技场，而是直接全球贸易模式的组成部分。如果中国试图在东南亚建立一个相对安全的后院，它也不得不适应无法逆转该地区开放的国际化趋势的事实。而且，任何后院都不再有围墙。无论拥有大后院还是

小邻国，世界大国都要面对这样的现实。

表 6.2 2012 年巴西的贸易伙伴

	出口	（%）	进口	（%）
1	欧盟	20.1	欧盟	21.4
2	中国	17	中国	15.4
3	美国	11	美国	14.6
4	阿根廷	7.4	阿根廷	7.4
5	日本	3.3	韩国	4.1
	其他国家	41.2	其他国家	37.1

数据来源：世界贸易组织，http://stat.wto.org/CountryProfiles/BR_e.htm。

如果只有霸权国可能提供国际秩序，多节世界的前景就可能是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确有人担心出现无政府的未来[29]，或者希望美中联合能创建一种新的等级制。但是，这只不过是又一次证明了爱因斯坦的名言："你不能用产生问题的思维来解决问题。"在这个网格化强度的时代，无论个人还是政府都以减少不确定性为主要任务，支配每一组关系并不能解决问题。挑战在于你不可能赢得每一次可能发生的小鸡博弈，而是要安排所有的互动，使其最好能实现互利，最差也是可预测的。对现有国际秩序结构的习惯化使这些结构的存续成为后霸权世界秩序的最强默认选择。而且，各国都有利害关系：老牌强国制定规则，新兴强国遵守规则，中等强国因更可预测的秩序而获益，较弱的大国又不能提供替代秩序。尽管在不存在霸主（如果假定霸主本身是支持规则的）的情况下就规则进行博弈的机会更大，随心所欲的行为最终还是会因孤立和危机而作茧自缚。不管怎样，资源分配和受关系影响程度的不平等，加之位置和长期互动的既定条件，给所有各方将重复互动的管理制度化提供各不相同但是非常有力的刺激动机。

多节性的纷扰

战略性国家，战术性领导者

以上对多节世界秩序的描述或许暗示了过于乐观的后霸权国际政治

图景。尽管可能描述其根本的理性结构，世界却不会陷入对自身和谐的沉思中。多节结构犹如小学操场上的攀爬架，含蓄地安排着冲突与机遇，同时也吸引着刚刚还热衷于霸权跷跷板的同一批人。并且，攀爬架是由织网而不是硬管组成的，互动及其结果都是不可避免和多方向的。

除了人类社会的正常网络，战略合作的长期、全面逻辑与政治领导层的短期、具体议题估算之间也存在根本矛盾。我们不禁想起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的观点：如果在无限次的系列博弈中是选择合作还是背叛，最佳选择是第一次互动先合作，如果对方亦是如此就继续合作。[30]全球化世界的国家不仅面临彼此互动的无限前景，其行为还有广泛的影响范围。事实上，国家间博弈更像是一种无限的领域，而不仅仅是序列。国家决策者——即政治领导层——也处于根本不同的形势中。他们在要求短期解决的具体问题上与其他领导者存在矛盾，他们的个人权力边界又不可能不受限制。因此，领导者既有具体议题层面，也有个人层面的理由选择背叛，即使背叛会给国家带来负面战略结果。

以短期收益指导外交政策的冲动会被国家的政治观众放大。全球化增加了民众面临的国际压力的生动性，以及国家舆论的音量。连通性又通过降低进入媒体的门槛而提高了舆论的多样性。另外，在竞争性的政治体制中，除了有利于国家收益最大化以外，任何其他结果都会作为现任官员的把柄而被揪住不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目前并不掌权的反对派只能渴望将来执政，但是当更为长期的后果可能出现时，他们的迫切任务就是努力获得支持率，实际不承担责任的处境也使他们仅关注当下毫无负担的机会主义，而不是他们设想的替代方案的后果。并且一旦掌权后就改变论调，这样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或许还是战略需要。

如果一组国际关系中每次交易的行为体都旨在实现短期利益最大化，这组关系的战略逻辑还存在吗？关系是不是只是一系列交易结果的历史，每次结果都是在几乎不考虑未来的情况下决定的？关系不是一连串的交易事件，而只是没有联系的事件的随机排列？结构逻辑的力量不是它能支配决策制定中的取舍，而在于它规定了决策制定者在其中操作的可能性的范围。说白了，如果一个战术上聪明的决策在战略上是愚蠢的，下一个决策点多少也是由前一决策的不良后果决定的。尽管历史几

乎不可能有“回放”的机会，并且更麻烦的处境可能导致更愚蠢的决定，但是忽视后果不等于否认后果。即使交易事件都不“向前看”，它们还是持续决定了下一个将要发生事件的轨迹。好的领导层关注事件间的联系，无论如何每个事件都是与前一事件相关的。

多节非对称的特有症状

新时期可能对非对称结构性错误知觉和互动模式产生什么影响？首先，后霸权全球结构的创新使得很多关系都要被重新认识。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中国不确定自己新的局限性有哪些，其邻国也不清楚各自脆弱性的程度。即使中国的基本政策并无变化，其外交政策的惯性也会看起来更强硬和缺少变化，相反其邻国则貌似过度焦虑和不认可中国的安抚辞令。[31]如果说中国崛起是明显的创新案例，那么美国全球霸权的衰落则对其地区角色提出了质疑。美国可能将南美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多元化视为对其“后院”的威胁，其南美邻国却认为既然美国的制裁影响可能降低，减少对美国的顺从就是合理选择。[32]在稳定的非对称关系中，习惯发挥着重要作用，创新就质疑习惯。新习惯随着经验的积累而出现，但是国际关系成熟的过程会漫长并且多变。

随着全球化发展和主权受到制约，非对称互动的范围也进一步拓宽。国家间联系更容易实现，而不必局限于在邻国中作选择。它们不仅可能摆脱长期存在的非对称矛盾，同时也可以借助与他国的关系抗衡顽固不化的伙伴。地区组织则带来了更复杂的局面。例如，欧盟一方面与土耳其保持着非对称关系，另一方面土耳其又与欧盟的各成员国具有多种多样的关系。在欧盟内部，希腊与德国的关系因其欧盟成员身份而呈现三角化。由于国家主权越来越受到对国际组织和机制承诺的制约，承诺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国家间互动更加稳定和可预测。然而，承诺本身也可以成为争夺的目标和大国的工具。

“多节”秩序中霸权制裁能力的下降给小国追求边缘政策提供了更多机会。朝鲜的例子表明，大国制裁的协调难题给小国的强硬立场创造了新的外交空间。在 1994 年的核危机中，美国已经处于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边缘，仅仅因为前总统吉米·卡特访问平壤就扭转了局面。2002 年

核僵局重现后，美国政府已经退缩。或许也可以说，大国能借助更具针对性和隐秘性的措施对付小国。

“多节”世界秩序的最典型重大问题，并且与非对称只有间接关系的，可能是政府甚至是国家的解体。连通性和国际干预引发国内动荡给国家和非国家造成的综合压力使各国政府都处于更紧张的形势中，因此也更容易垮台。在很多情况下，国内政治共同体似乎并不具有可再生性，反动派并不能成功建立一个更高效的政府，或者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缔造一个基于强社会的有限政府。外来干预通常会加剧国内混乱而不是代之以外国的统治。仰仗外国支持的本土政权往往被证明既不是资助人的好傀儡，又不是国内共同体的好长官。事实上，全球化引诱着大国更愿意干涉同时却回避着接管难题的现象，这与其说是“多节”世界，不如说是后殖民时代的产物。

当今世界：超越霸权循环的可持续性

在充满非对称偶然性的新时期，关键问题不是怎样才能退回熟悉的旧时代，而是如何作出适应新形势的决策。因为是非暴力并且渐进式过渡到后霸权阶段，现有的整套全球组织和行为预期构成了未来的默认模式。但是，全球社会的可持续性要求比旧时代更具互动性和动态的社会化概念。全球体系的核心是各方预期组成的活跃结构。世界秩序不是新兴霸权取代衰落霸权的问题，而是国家间的此起彼伏过程，这些国家都使用并维护彼此信任以及有效的管理和制度模式。

各国都难免将旧霸权的现状作为默认的参照点。对“西方国家”（包括日本）来说，可能会一直怀念旧时光和旧方式，并且往往把变化视为衰落。对美国来说，向后霸权思维的转变尤其困难。这不仅是因为舒适又熟悉的旧现状和居高临下的美好回忆，更是因为由此带来的重大损失，以及对那些损失可能意味着什么的不确定性。在那个现在可能已经被遗忘的前超级大国时代，美国事实上孤立于全球化程度很低的世界。成为后

霸权世界秩序中的一个主要"节"点，对美国来说是向昏暗国际环境中的弱权力地位的一步倒退。与之相反，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来说，却有望在全球机制中发挥更大影响。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这种矛盾看似接近于现状国家与修正国家之间的冲突，但是不能偏离互惠的后霸权秩序这个基本前提。

于是，构思一个新现状，亦即"进展于此"的现状就成为特别重要的学术任务。[33]我在上一章强调了非对称对于维持霸权体系可持续性的作用，可持续性的问题其实对于后霸权秩序更重要。如果秩序等同于霸权，新时期的意外都将被视为混乱。然而，减少不确定性是各国的共同诉求，国家间的非对称关系结构也是可再生的。

后霸权秩序的根本问题在于非对称偶然性是一种稳定因素还是不稳定因素。这种困境类似于另一个问题，即经济相互依赖是自由主义者宣称的稳定因素，还是现实主义宣称的不稳定因素。但是目前双方的观点都面临压力。一方面，国家身份受到挑战，各方都要积极关注外部事件。另一方面，偶然性的发生都非常紧急，没有清晰可见的替代选择。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表明，复杂同盟中的偶然事件能够导致突发的意外混乱。但是在后霸权时代，决策者都是分散的，各国都根据各自降低不确定性的需要对整体形势作出反应，因此不太可能被同盟义务的枷锁拖进意外的、不情愿的冲突中。

定义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通常被视为持续存在的现状或者现有发展趋势。如果社会体系不是静态的，变化的频率通常也不固定，我认为更有用的体系可持续性定义应该是指维持应对危机的能力。倘若体系的可再生性足以对各种危机作出反应，同时又能维持其身份和功能，这就是可持续的体系。这种可持续性思想强调适应可持续的路径，而不是既定的形势或轨迹。

应对危机的能力似乎是一个对可持续性要求较低的概念。然而，它对持续性提出了不同的政策目标，并且可能带来更多的挑战。举个例子证明该定义的现实意义，如果一个经济体拥有 10%的增长率，可持续性就意味着要维持该增长率。但是，如果 10%的增长率随着时间的推移会给

增长带来巨大阻碍，体系的可持续性就要求不再强调最大化增长，而是追求有助于预防未来危机的增长率。在“多节”世界体系中，可持续性可以根据个体国家的形势、非对称关系结构的排序，以及预料中的全球问题综合予以界定。

全球社会化

霸权体系中社会化的过程可以分为社会化者与被社会化者两方。一方制定规则，另一方发现规则。规则制定者通常在自己的体系内拥有超主权的豁免行动权。一旦体系确立后，上述分野就转移到了既得利益方与新成员之间。创造体系的社会化者自认为肩负着文明化的使命，现有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也自视为世界秩序的教育家。霸权世界秩序化的实际过程其实更具互动性，后霸权时代的教育家们本身也能吸取一些教训，但是秩序化的基本组成是单向的。

“多节”世界更复杂。它是非对称而非等级制的世界，没有大国或者大国的联合处于控制地位，国际互动受到实力悬殊、位置和不同历史记忆的影响。互动的基本机制是正式的或者姿态-响应式的谈判。如果双方接受一个结果，谈判就算完成了，但是双方接受的理由和作出承诺的水平各不相同。大国承受的风险低，因此更愿意结束谈判。小国面临更大风险，如果结束谈判的决定权在大国一方，小国不会相信这是最终决定。另外，双方都会希望有具体双边结果的其他关系维持最低的成本。

“多节”体系中的国家不太关心制裁，但是它们关心结果，因此它们对世界秩序拥有差别化的共同利益。主要“节”点大国的战略利益是降低危机的频率和严重性，因此会对世界秩序结构的坚固性感兴趣。小国最关心自身受不确定的国际环境影响的程度，它们的战略利益是体系确保其自主权和利益。中等强国希望主要“节”点的行为可预测，小国伙伴的行为能够尊重现有的秩序以及中等强国的地区实力优势。这里的整体模式基本符合第五章提到的霸权国-中等强国-小国的元三角关系，只不过关系中的三方更灵活。

超越霸权循环

因为不存在冷战阵营，中国也不可能取代美国，“多节”世界秩序中可持续结构的基本难题就从霸权控制变成了维持全球领导权。作为主要世界“节”点，美国和中国仍然是全球关注的中心，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或者国家的联合能够对两国的突出地位形成严重的挑战。其他国家不仅需要与两个主要“节”点维持友好关系，而且需要可预测的世界秩序。如果没有主要“节”点的领导，世界秩序就不会是可预测的。

这种局面不同于吉尔平和肯尼迪描述的霸权循环，但是在两方面具有深层的相似性。第一点是实力的相对排序并非静态的。从表面上看，中国正在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更具长远意义的是，世界生产力总量的重心正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缔造现代霸权世界的生活机会差距已经缩小，但是对地位变化的期望和担忧仍然真实存在。第二点相似性是我在上一章提出的，霸权的生命周期不仅取决于技术和挑战者的出现，也取决于霸权统治的负担。军事过度扩张不仅是指统治范围过大。对主要“节”点来说，如果将利益定义为相对于他国特别是小国的自身优势最大化，只会削弱其领导能力。领导权其实是基于共同利益的假定，并且判断共同利益是否充分的决定权还在对方。公共外交不能说服愤世嫉俗的民众。

在非对称关系中，领导权也是双向的。大国处于默认的领导地位，但是小国有权选择反抗还是服从。因为面临更大风险，小国往往比大国实力允许的反抗更谨慎。鉴于美中两国长期对抗的可能性，它们争夺全球支持的领域应该是为共同目标宣称的领导权，而不是各自阵营的纪律。与追求统治权不同，追求领导权的可信性不一定是排他的。即使双方都在意谁会领先，全球领导权也可以是双赢的。

相同的领导权原则不仅适用于地区大国，而且适用于地区组织，是否顺从都取决于共同利益。追求权力优势最大化的地区大国其实在自身利益与同伴利益之间划清了界限，并且这条界限对同伴国来说更加清楚。全球化增加了次强地区大国的替代选择，也因此提高了有效地区领导权的门槛。

结论

把后霸权的“多节”世界想象成和平与和谐的世界就过于乐观了。和平与和谐当然是可能的，但是这个时代的规定性特征是国际关系如此复杂，以至于单边实施一方的偏好不具有可持续性。利益仍然有定位，非对称产生的结构性错误知觉会更活跃。正如有些俄罗斯人怀念斯大林的统治一样，将来也会有人伤感地回忆大国的强硬手段。世界政治可能变得更喧嚣。

即使不能实现大同世界，形成可预测的结构也符合各方的利益，一旦国际结构和机制都不符合共同利益时，它们就要被改变。被“多节”生态社会化是一种互动而不是被强加的过程，所以，制度化现状的存在也不是其延续的充分理由。可持续性需要适应。

多节性前景是由全球化和人口革命提出的挑战创造的，因此也必须继续应对这些挑战。对于深陷全球复杂关系与国内要求有利结果的压力之间进退两难的国家政府而言，明智的做法是通过加强对全球治理的预先承诺来降低受危机影响的风险。国内政治压力可能支持短期目标和表面的胜利，然而最棘手的国际政治问题或许并不来自进攻性国家，而是来自失败国家。

注　释

1. 2008 年由于很多原因值得纪念，不仅因为那次全球金融危机，而且可以被视为一些趋势的分水岭，以及另外一些趋势的有效标志。

2. de Waal，*The Caucasus*：*An Introduction*，pp.15—17.

3. 前景理论确信风险越突出，越背离收益最大化。参见 Kahneman and Tversky，“Prospect Theory.”

4. Arjun Appadurai，“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in Meenakshi Gigi Durham and Douglas Kellner，eds.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Key Works*，rev. edn.，(Oxford：Blackwell，2006) pp.584—603，p.586.这个参考资料我要感谢陈玉华。

5. Karen Ward，*The World in 2050*（London：HSBC Global Research，January 2011）.

6. Ward，*The World in 2050*，p.23.

7. Nicolas Taleb，*Black Swan*，2nd edn.

8. *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Harmonious*，*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Conference Edition. Washington：World Bank，2012).

9.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e Worlds*(Washinton：NIC，December 2012).

10. Asia Development Bank，*Asia 2050：Realizing the Asian Century*(Singapore：ADB，2011).

11. 根据 *CIA World Factbook* 2012 年的数据计算。

12. 根据 2013 年的估算，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总体是 78.62，男性是 76.19，女性是 81.17，中国人是 74.99，阿富汗人是 50.11。参见 *CIA World Factbook*，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accessed August 5，2013。

13. 2010 年的数据来自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2*，订购可得电子版。

14. Keith Fray，"China's Leap Forward：Overtaking the US as World's Biggest Economy，"*Financial Times*，October 8，2014.

15. 根据 *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2 Revision* 计算，参见 http://esa.un.org/wpp/Excel-Data/morality，htm；http://esa.un.org/wpp/Excel-Data/population.htm。

16. Ibid.所有人口数据同上，我现在使用的是基于中等生育率的联合国 2050 预测。

17. Barry Naughton，"The Dynamics of China's Reform-Era Economy，" in Brantly Womack，ed.，*China's Ris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2010)，pp.141—143.

18.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iministration，*Techically Recoerable Shale Oil and Shale Gas Resources：An Assessment of 137 Shale Formations in 41 Countries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US Department of Energy，June 2013).

19. Claire Jones and Chris Giles，"WTO and OECD Add Value to Trade Debate，" *Financial Times*，January 16，2013.

20. Thomas Piketty，*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

21. Miles Kahler，"Rising Powers and Global Governmance：Negotiating Change in a Resilient Status Quo，" *International Affairs*，May 2013.

22. Craig Murphy，*The Internait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Global Governance through Voluntary Consensus*(Milton Park：Routledge，2009).

23.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24. *Ninth Japan-China Public Option Poll：Analysis Report on the Comparative Data*(Tokyo：Genron NPO and China Daily，August 12，2013)，p.4.

25. A. Johansson，et al.，"Long-Term Growth Scenarios，"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No.1000*，*OECD Publishing*，2013，p.75，http://dx.doi.org/10.1787/5k4ddxpr2fmr-en.

26. 对于可操性的表述，参见 Gary Goertz and Paul F. Diehl, "Enduring Rivalries: Theoretical Constructs and Empirical Patter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7:2(June 1993), pp.147—171, or Thompson, "Principal Rivalries."

27. Michael Swaine, *America's Challenge: Engaging Rising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Washingt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1), p.49.

28. 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Washington: Brookings, 2012).

29. Niall Ferguson, "A World Without Power," *Foreign Policy* 143(July-August 2004).

30.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31. Alastair Iain Johnston,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7:4(Spring 2013), pp.7—48.

32. Robert Russell and Juan Tokatlian, "Implications of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Changes for Argentina's Foreign Relations," *Journal of Iberian and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19:2(2013), pp.251—267.

33. Brantly Womack, "China Beyond the Status Quo,"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8:2(Summer 2015).

第四部分

政 策 意 义

第七章
非对称的解决方案

本书前几章介绍了非对称的一般理论，这一章则要探讨非对称的国际行为意义。与社会现实中的所有模型一样，非对称理论宣称有意义是指该模型对依据它行事的行为有现实意义，对不遵循该模型的行为就没有现实意义。[1]因为非对称理论呈现了一个包括实力悬殊、认知差异和多边模式的复杂局面，所以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它对于国家情报、国内机制、双边互动、国际规范和关系结构的不同意义。

为了解决国家恰当行动的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把国家看作一个行为体。正如在第一章中讨论的，国家既不是单一行为体又不是最终行为体，而是对外事务中的权威决策者。鉴于在非对称关系中相互认知的结构性问题，国家作为行为体的首要问题就是其认知能力。非对称理论认为，实力悬殊是国家间错误知觉的结构性基础，因此对国家情报机构具有复杂的意义。错误知觉不是简单的事实错误，还可能是无法理解不同的决策制定环境。那种"有只苍蝇在墙上"收集别国的秘密谈话的理想情报机构只有在苍蝇既关注墙也关注谈话的时候才能获得可靠的战略图片。[2]虽然"我们"对"他们"的兴趣来自"他们"可能如何影响"我们"的利益，基于"他们"自己的环境认识"他们"还是一个有困难的认识论飞跃。孙子的名言"知己知彼"至今仍然适用。各国都面临上述问题，双边非对称关系中大国往往不关注和小国的过度关注也都需要专门的情报对抗。

除此之外，非对称还影响整个政治共同体、媒体和政府。国家虽然是对外事务的权威行为体，却不是拥有无限自由裁量权的单一行为体。在

多党政治体制中，国家行为受到的国内制约尤其明显，即使是独裁统治者也必须从长远考虑民众对国家行为的认知及其对国内政治力量的影响。

考虑到国家间相互认知的问题及其国内复杂性，管理非对称关系中的国家间互动模式就很有价值。基于第一章对双边关系的分析，我认为正常非对称关系的维护得益于大国一方(A)因为仅关注针对小国一方(B)的行为的政策响应性而受关系影响更小的相互平衡。大国A希望结束互动，特别是在制裁行为中它就应该留给B国一个可以解除制裁的政策选择。对B国来说，相互平衡的美德是即使受到不断调整对A政策的诱惑也要保持行为的一致性。在一般情况下，公平性是互动的最重要美德，但是在非对称关系中关于公平的估算不是简单的平等交换。

分析非对称互动就要求提出一个管理正常非对称关系的规范模式。双边关系中的基本任务是构建维护各方共同利益和通过消除错误知觉的影响来确保稳定的模式。外交礼节——比如国家间的互访——作为对彼此尊重的一种公开承认就发挥着重要作用。借助强调共同基础的外交以及使用联合专家委员会实现可能分歧议题的中立化也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在2008年以来的“多节”世界形势中，管理非对称的多边模式也变得格外重要。我们假定各国利益和实力千差万别，国家间关系也不能靠强加产生，因此协商利益的地区和世界模式就应该建立在对参与各方和共同利益有效性都予以尊重的基础上。日益频繁的互动并没有把有定位的利益融合成共同利益，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之间的关系都应该基于对当地政治共同体的尊重，并且使用权力自主原则在最起码可行的层面形成解决方案。

本章最后讨论的是外交学习过程的便利化。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观点是当国家间矛盾形成对峙时，如果国家又公开将民族尊严与其关于某一议题的立场联系起来，谈判过程就格外复杂。并且，要么会削弱获胜的可能，要么就是以损害关系为代价在某一具体议题上取得胜利。当然，问题或许在于国家是否真能学习到规范的经验，事实往往发人深省。国家间互动是由其经历决定的，非对称理论中的强者得到的不是“要善待弱者”的道德经验，而是“不要招惹柏油孩子”的实际教训。如果教训很难理解，更直白地说“不要再碰柏油孩子”就简单易行了。除了双边层面，“多

节”世界的现实也将最终决定国家的成功行为，国家只有明白其环境才能减少试错的痛苦。

国家情报与非对称知觉

“隐藏者与发现者”[3]的艰难竞赛以及间谍对抗间谍的惊心动魄都是最吸引关注的情报挑战，它们当然也存在于非对称关系中。鉴于利益的位置性，领会对方观点的困难就存在于所有的国际互动中，杰维斯称其为“罗生门问题”[4]。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非对称关系固有的结构性错误知觉提出的情报挑战。既然非对称是在双方实力悬殊情况下的互动，我们先来看参与互动的认知问题，再来看悬殊引发的其他问题。

我们一般会认为错误知觉的解决办法就是完善信息，然而下面的例子证明并非如此。假如有一对舞伴相隔一段距离跳舞，其中一人头上戴着一个摄像机。摄像机只显示舞伴的动作。如果有人想从视频中分析舞伴的行为，就只能看到舞伴的一系列动作，每个姿势都是根据前一个姿势加以解释，而不能视为舞蹈中的互动。而且，摄像机的活动看起来就是另一个舞伴的活动。如果舞伴的行为只在舞蹈的意境中有意义，在视频中就可能被看成不规则的动作。不仅下一个动作无法预测，每个动作蕴含的意图也难以捉摸。图像的真实性不是问题，仔细研究视频也不能得出不同的解释。如果有人在场外观看了舞蹈，目睹了两位舞者的互动，他们并没有获得更多的细节信息，却会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作出完全不同，并且更准确的解读。参与者观点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事件的真实性，而是观点的局限性。事实就是事实，关键在于它们如何受到观点的影响？

观点决定认知

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行为和意图的主要兴趣在于对方如何影响自己。本国的政治共同体全都是从相同的角度看待对方国家，专家往往在观察的前排就座，媒体面对公众并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政府则努力谋划

对策。虽然问题的重点“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不会改变,答案却不可避免都会把所有相关的变化归咎于对方。与此同时,另一个国家的所有人都会对歪曲自己立场的言论非常警觉,也会把双方关系的失调归咎于对方。双方都有对己方来说既完美合理,同时又让对方显然似是而非的事实描述。

尽管所有行为体都有定位,因此观点总是重要的(上述例子中的舞伴毕竟是对称的),非对称还起到强化观点分歧的作用。不仅相对变化被归因于对方造成的,关系中相对地位的影响也常常被忽视。强国一方往往将弱国 B 仅仅视为缩小的 A 国来解释其行为。事实上 B 国受关系的影响更大,因此也承受更多风险。B 国可能与另一强国结盟以缓冲其受到 A 国的影响,A 国却可能将 B 国的举动理解为与本国一样的全球战略。一旦 A 国对 B 国的结盟行为予以制裁,B 国可能感受到更大的威胁,进而更紧密地依附于外部盟友。A 国则把这种孤注一掷的做法视为盲目的野心,或者仅仅是单纯的罪行。另一方面,如果 B 国按照放大的自己来理解 A 国的行为,它就容易认定 A 国与自己同样受关系的影响。A 国的不协调行为就会被视为神秘莫测的邪恶计划,A 国的施压行为也会被理解为战争计划的前奏,而不是以特定结果为目标的有限制裁。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方的错误理解都不是因为信息不足或者失实,而是因为没有意识到与另一方观点有分歧。

参与者的观点和专业知识

上述信息和观点的问题在情报和外交共同体中尤为突出。因为需要回答己方的疑问或者促进己方的政策,他们通常关心相对运动,并且可能把变化归咎于对方。这种倾向在关注日常发展和领导者个性时更明显。有经验的分析者和外交家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对其他国家的内部动力机制形成更好的认识,但他们的智慧通常在于对问题有更好的解读而不是更好的信息。如果作出重视对方观点的解读就要冒险被认为是受到了对方宣传的迷惑,抑或是已经“入乡随俗”。

而且,非对称也影响了专家们面临的问题。对 A 国的 B 国问题专家而言,根本问题是“B 国的这件事为什么值得我们注意”? 如果 B 国的行

为能与某些更大的利益产生联系，A 国的兴趣就会增加；否则 A 国受双方关系的影响微乎其微，也没有特别的理由关注 B 国。这就造成对 B 国行为解读的偏见。宣称 B 国是全球阴谋一分子的专家会引人注意，宣称 B 国行为只是源于国内原因，并无后续影响的专家则听起来完全乏味、陌生，缺少有趣的细节。

对 B 国的 A 国问题专家来说，基本问题是“A 国的这种发展会影响我们相对于 A 国的脆弱性吗”？毫无疑问，A 国对 B 国而言很重要，问题在于之后 A 国会怎么做？B 国的 A 国问题专家在领导权问题上面临与 A 国同行相反的难题。他们不会被视为(抑或无视为)神秘领域的专家，他们研究的就是细致观察 A 国的领导权。只有从 A 国看似无关的行为中发现阴谋计划，或者是从某一具体姿态中外推出更大威胁的专家才会引人注意。如果某专家说 A 国有更大的利益，并不会像 B 国一样关心双方的关系则很难引人注意。在 A、B 两国中，专家解读的层次都是有偏见的，在相反的方向加剧了导致错误解读的可能性。

信息和观点问题不存在制度化的解决方案，但是制度安排很重要。受自身政策执行力推动的情报界可能对进展报告收集的信息产生偏见。[5]情报必须脱离现行政策，否则就无从发现现行政策的替代选择。正如在体育活动中，运动员不能是比赛的裁判。除了情报界的制度分立和确保自治权，高级分析者的个人安全和威望也必须受保护。前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菲尔德·特纳(Stansfield Turner)将情报工作与大学进行了对比，认为两者都是生产和传播知识的，[6]专家的自主权都必须受到尊重。拥有经验和与政策保持距离是产生智慧的前提。需要分析者评估总体环境和其他国家历史的战略项目不仅作为日常报告的背景很有价值，而且对分析者来说也是有益的调整定位的经验。政府以外的交换和学术项目则为他们深入鉴别不同观点提供了重要机会。第三方和多国论坛又为他们了解不同的分析角度提供了平台。在健全的情报界内，专家因熟悉对方而受尊敬；在不健全的情报界内，专家因受到对方影响而被怀疑。

国内复杂性

如果“所有政治都是地方化的”，那么国家行为就会受到重要的国内制约。本书第一章关于有定位的利益的分析区分了政治共同体、政府与国家，三者都受非对称关系的影响，但是影响程度不同。作为负责对外事务中权威决策制定的政治领导层和体系，政府承担着国家行为的官方和最终压力，而事实上国家行为是由公众舆论和政治竞争的国内因素与国际互动共同决定的。“与政治家身份相称”的责任是他人取向、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国家的领导者必须是双面人(Janus-faced)。

公众舆论和媒体

非对称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两个政治共同体间实力与联系的同时存在。各自的国家则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权威管理非对称关系。政治共同体的不同私利使其形成各自的观点，也因此可能与国家政策相悖。一般来说，国家都接受有舍有得的谈判，而公众往往追求自身利益的绝对化，接受“得”，却拒绝“舍”。国家必须处理好政治共同体固有的民族主义。

媒体对公众而言相当于国家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和精英媒体基本保持同步，它们都代表国家利益的相同整体优势地位，也有对良好工作关系的彼此需要。媒体、特别是大众媒体则对公众有更大的影响。对国家控制的媒体来说，首要任务是为政策辩护并帮助其被接受。私人媒体的目标是吸引和保持公众的关注度，因此对危机和政策的替代选择更为热衷。在有些国家，比如中国，公开的媒体都是官方控制的，社交媒体就成为舆论和专注于危机的信息源。公众舆论影响所有的国际关系，同时也会夸大非对称关系的结构性错误知觉。

非责任政治力量

几乎所有国家的外交政策最终责任都在主要执行者身上。在立法权

优先并且有竞争性政党的国家，立法机关不具备像行政机关一样程度对现行政策的"支持"，反对党的党派利益与当前领导者也是矛盾的。虽然国家间制度矛盾和党派分歧的形式各不相同，但是基本特征都是由不对现行政策负责的政治力量参与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判。竞争体制中的当前领导者通常都无视反对党，毕竟是他们赢得了之前的选举，但是他们也必须考虑这样做的政治代价，因为还会有新的大选。更重要的是，反对党的声音会是当前公众话语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制度设计上，立法机关虽然不可能接管外交政策领导权，但是却可以否决或者无限期推迟相关行动。

由于缺少公开竞争的政治力量和充分的公众话语，独裁政权在外交操作中有很大优势。然而，政治共同体内的利益和观点分歧是真实存在的，独裁国家也面临突如其来的公众舆论和激进政治爆发的风险。比如，中央情报局支持巴列维上台就是因为摩萨台的民族主义诉求，而巴列维可以让伊朗成为美国的可靠附庸，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引起了美国的排斥和不满，并最终导致被推翻。

复杂社会中的政治才能

如果我们说的政治才能是指实现国际互动中长期利益——包括相互利益和共同利益——最大化的能力，那么更大的挑战可能不是对外的技巧和远见，而是国内的领导权。可以想象，即使是最睿智的顾问向最具有政治家才能的总统解释了实际情况，最终总统还是会在道德上至高的全球恰当行为与本地的对峙选择之间畏缩不前。毕竟，如果总统选择了前者，反对党就会幸灾乐祸地宣称政策还有待改进，而这些改进对大多数公众来说更明显、更便利、更符合私利、更自以为是。即使总统拒绝发挥最高的政治才能，反对党也不太可能占领那样的政治贫瘠高地。某位负责拉美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有一次在被问及对古巴的政策时，就曾冷漠地回答说古巴政策是国内事务。在任何国家，国家领导人的任何外交政策顾问都可能提出外交政策中的首要外交合理性是国内考虑的类似例证。

国内政治才能的良方必须建立在公众舆论有判断力、反对党也合法

的基础上。政治家可以向公众解释保持互惠和彼此尊重关系的长远利益，同时也能邀请反对党提出并不会为短期收益或者毫无意义的姿态而牺牲战略利益的替代选择。虽然不指望公众即时顿悟或者反对党的默许，至少是提出了可以将政治才能解释为不只是将国家优势最大化置于风险中的国内框架。政治才能的其他国内解释可以包括宽容、理想主义、高尚，但是，政治才能更根本的基础却是在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认知熟悉的现实之外还存在一个现实。

在更多日常、非危机的情况下，鼓励国际交流有助于减少彼此孤立。在普通大众层面，这包括签证政策和对语言及旅行项目的鼓励。和平队和富布赖特学者可以说是最成功的这类美国项目。政府机构间、特别是军队间的合作与交流则有助于增强组织意识。另外，外交政策也需要国内政治的优势，可以让政治家看上去更像政治家。1972 年尼克松访华就是外交两面性都取得胜利的最好例证。

平衡非对称互动

非对称关系中导致错误解读的结构性观点分歧也容易产生以消极互补性为特征的互动模式。如果 A 国的行为“太过 A”，它不经意间表现出的优越性可能激发 B 国的脆弱感。如果 B 国的行为“太过 B”，它的焦虑易变和投机取巧可能促使 A 国逼迫其退回原地。在某些情况下，消极互补性会升级成我在第二章描述的敌对状态。更常见的情况是，消极互补性塑造了“傲慢的 A”和“自负的 B”的形象。这两种特征也会因为 A 国的政策偶然性和 B 国的政策一致性两种对立特质而有所缓解。

战术力量

如第一章所述，B 国的相对不重要导致其在 A 国的关注经济中被降低了存在价值。A 国可能根据总体的关系氛围是友好还是敌对来认识 B 国，它对 B 国产生影响的各种政策不可能在全体领导层面进行协调。对

B 国来说至关重要的议题可能在 A 国看来微不足道。无论在对抗还是谈判中，A 国都更愿意尽快了事。

与之相反，B 国特别感兴趣与 A 国的关系。不仅领导层对与 A 国的关系更积极协调和警觉，而且整个政治共同体也更关注关系的进展。政策氛围对 B 国来说不那么必要和有意义。它当然也重视 A 国的承诺，但是实力差距决定了它始终相对于 A 国是脆弱的，所以它必须密切观察日复一日的政治气象。B 国会发现作出政策调整相对容易，一旦利益受到 A 国的负面影响，它也能很快提出抗议。因为持续关注双方的关系，B 国还能利用一些小的优势，并且经常在谈判中耗得过 A 国。

A 国地位的战术力量是其相对实力，在偏好获胜和事情了结之前，它都会乐于使用压力。为了让事情结束在于己有利的条件上，使用压力——无论是“胡萝卜”还是“大棒”——日益成为赤裸裸的工具。这样能在某一具体交易中实现收益最大化，同时也会加剧 B 国被 A 国排斥的感觉。从长远看——国际关系往往都是长远的——排斥的代价会超过强迫 B 国服从所产生的具体收益。如果 B 国不信任 A 国对其身份和边界的认可，它就会寻找反抗和自我保护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受关系的影响更大，B 国也获得了对形势更警觉和调整更迅速的战术优势。当然，警觉可能产生误导。一旦 B 国推动 A 国而得不到回应，它就可能再次推动。最终 A 国的惯性可能达到临界点，以至于再往前推动一步就会引发 A 国对 B 国不可逆转的政策变化。B 国的战术机智（tactical cleverness）也可能抵消长期后果，一旦 A 国感觉到 B 国是不可信赖的伙伴，它会对 B 国的顺从失去信任。

战略特质

非对称关系中强者一方需要的抵消性战略特质是政策响应性。缺少具体互动中的偶然性会造成那种要么被 B 国利用，要么让 B 国感受到威胁的漏洞。A 国的政策响应性意味着不仅对初始行为来说恰当，而且能随着 B 国行动的变化而保持变化。这不仅仅是对不同但却一样严格的政策的一个诱因。如果 B 国执意朝不受欢迎的方向发展，最终导致 A 国作出大规模的“决定性”政策变化，那么 B 国也就没有退路了，只能调整以适

应那些新的政策限制。政策响应性对A国的领导层提出的关键问题是：究竟什么样的B国行为是值得表彰或应受谴责的？什么样的行为需要强化或调整现行政策？这与A国希望尽快了事并不矛盾，只是要求政策反应针对政策存在的问题。政策偶然性看似提出了A国不具备的特质，其实就是对双方关系细节的关注。政策偶然性可以建立在公开的总体政策、多边机制，或者政府间国际组织规则的基础上。由于对特定行为的反应已经常规化，A国不仅使全体领导层不必重新考虑每一次互动，而且确保了B国对结果更好的认识。最重要的是，视情况而定的响应性并非旨在惩罚不顺从行为，而是要在通常谈判形成的关系中维护A国的利益。

B国在非对称关系中的抵消性战略特质则是政策的一致性。由于对关系的关注较少，A国更喜欢可信赖和可预测的伙伴。如果B国总是看起来在为最后百分之一的利益而努力，那么它实际的获益会比因A国的总体排斥和怀疑而产生的损失要多。如果它确立了有原则的行为体的声誉，B国也能赢得A国的信任并且更好地维护自己。政策一致性在危机时刻尤其重要，危机时的B国具有特别的影响力。如果它利用自己的关键优势而不是一如既往地行动，它当然会影响A国的长期态度。正如我们知道的，大象虽然行动迟缓，却拥有长时间的记忆。

归根结底，A国和B国的抵消性战略特质都是源于正常非对称关系的基本准则：A国以对B国的身份和边界的承认换取B国对A国实力优势的顺从。通过提出具体的替代选择而不是不作反应或者只是作为政策诱因，政策响应性表现出对B国作为反对A国利益的行为体的尊重。通过在整体非对称的关系中保持一致性，B国也表现出可信赖的顺从伙伴的形象。这两种特质都是对非对称关系平稳运行的适应。

双边正常化的结构

非对称是结构性环境，因此除了以上分析的个体国家间行为-反应式互动外，还有影响正常化的其他关系模式。结构性正常化并不能消除麻

烦。麻烦会因为国家间的利益分歧和冲突而不断产生，并不仅仅是误解导致的。出现问题的可能性还会随着非对称关系中受影响程度和认知的差异而增加。对利益分歧的管理又决定具体问题的解决轻松程度，及其对整体关系的影响。

图 7.1 说明了正常非对称关系的框架，也可以被视为对第二章中图 2.1 关于错误知觉的消极互补性问题的外交解答。正常化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某一具体利益冲突威胁到基本关系。一般来说，有两种方法可以使风险最小化。一种是通过常规化和去政治化消除可能的冲突领域。换句话说，创造一个中立区，亦即"内部区"(inner sleeve)，在其中持续存在或者反复出现的分歧无论是否解决，都被从政治热点转变成为冷门技术议题。这就是图 7.1 里的中间区域。当然，并非所有的冲突都能预测，很多议题也可能重新政治化。第二种方法是通过消除互动升级的可能性为关系创造一个"外部区"(outer sleeve)。通过外交礼节正式确认正常关系很重要，但是在长期建立的关系中，习惯化——通常意义上的"一切都会过去"——往往是预防不必要危机的最大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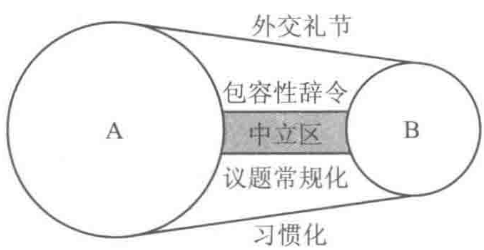


图 7.1　消除结构性错误知觉的因素

"外部区"：外交礼节与习惯化

"外部区"因素，即外交礼节和习惯化，旨在将正在进行的关系互动限制在正常化的框架内。外交礼节是国际关系中重要却可能不受重视的因素，包括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国家首脑互访，以及各式各样的官方赞助和不同层次的友好交流。礼节对小国比对大国更重要，那是尊重的公开表达。美国已经习惯了做世界大国，在外交中任何情况下都表现得不拘礼节，即使国事访问有时也被视为空洞的礼节。当然，国事访问之所以重要正是

因为“空洞”。外交礼节表现出对彼此的尊重，不会在具体议题的相互让步中对任何一方有偏见。因此对首脑峰会的评判不能只看“可交付的成果”即各国首脑决定的具体事务，还要看峰会对整体关系的强化。同理，官员间的相对低水平交流，特别是军队间的交流，也是对整体关系以及相应专业中彼此熟悉的既有优势的进一步强化。

奥巴马政府处理与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伊朗的关系都属于近期的美国外交实例。2009 年奥巴马就职后访问的第一个穆斯林国家就是土耳其，这一表态深受褒奖。尽管 2010 年以色列拦截前往加沙的救援舰队造成土耳其-以色列关系严重紧张，土耳其并未因此疏远美国，开始时略有犹豫的土耳其后来还是积极加入了 2011 年北约在利比亚的行动。在这个例子中，美国的象征性公开尊重无疑缓解了土耳其领导层的政治压力。印度尼西亚的例子更复杂。奥巴马总统先后三次推迟了对印度尼西亚的访问，导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决定不参加地区国家首脑与奥巴马的会晤。奥巴马随后短暂访问雅加达才平息了不满。最后一个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实例是美国不愿参加与伊朗有关的外交仪式，原因在于巴列维的下台加重了伊朗一直以来对美国的怀疑，认为美国从根本上就希望伊朗变更政权而不是协商解决。

另一个“外部区”因素是对习惯化的共同认识。正常非对称关系维持得时间越长，就越不可能因当前的危机而破裂。当前的危机可能在本质上不同于以往所有已经遭遇并且和平解决的分歧。以前的关系习惯化或许是彼此确信双方所处关系稳定性的最重要因素。习惯化的非对称关系可能从表面上看是弱者一方顺从，强者一方主导的关系。然而，弱者一方之所以能顺从是因为确信其身份和边界不会被侵犯。正常关系中的习惯化取决于对共同认识的“短期记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关于过去的不公正和战争的长期记忆会带来导致疏远和警觉的相反效果。长期的国家记忆更可能在全新的环境而不是持续的正常关系中产生重要的政治影响。

加拿大和美国是正常关系习惯化的完美例证。很多喜剧电影都能以美国入侵加拿大为主题，如果是在波兰和俄罗斯之间这就是非常敏感的问题了。需要强调的是，加拿大与美国之间仍然有重要的利益分歧，加拿

大追求的是独特的外交政策。共同认识与历史记忆也可能发生冲突。日本因其对待战争历史的暧昧态度而与亚洲邻国间出现的矛盾，已经同它们之间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形成鲜明对比。深层的历史积怨会加剧民众的相互排斥。

“内部区”：包容性辞令与专家

管理正常化非对称关系的“内部区”是指通过建立在彼此认可原则基础上的表达或者交由专家负责的方式实现潜在冲突区域的中立化。“外部区”旨在控制分歧的扩大化，“内部区”则是通过将议题与政治热点隔离开来创造关系中的“冷却区”。

内部区的第一个特征是，议题的表达方式都是依据普遍原则而不是任何一方的排他性主张。例如，如果边界管理只按照“我方”利益和对另一方的不满来表达，就会引来对方同样的争论说法和态度。无论一方的主张是否属实，另一方如果只接受责难就会丢失颜面。但是，如果该议题按照有助于交流并且保护两国相互利益的方式表达，那么协商、合作与交易都可能发生而不必使任何一方看起来输给了另一方。包容性辞令（inclusive rhetoric）本质上要求的就是领导层依据可以与对方协商而不仅仅是满足国内民众的方式表达官方立场。一旦任何一方的领导层只为国内民众发声，他们面临的就是背对背的局面，很难实现与对方的合作。他们可能相互推动，但是若要达成协议就必须有一方转身背向本国的民众而接受对方的诉求。即使施压能在某一具体议题上奏效，也会带来被损失一方背弃的战略代价。

按照亚历山大·埃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的说法，对抗性外交就是古典西方世界的常态。[7]希腊城邦国家内没有常设的外交使团，危急关头派出的使团也是去宣布最后通牒而非谈判的。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确是常态，罗马则是被邀请作为“利维坦”来控制无政府状态的。同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皇威廉二世的轻率是导致英国背弃德国的关键原因，这是个人层面的一个代表案例。[8]最近一个关于排他性辞令（exclusive rhetoric）的具体实例是奥巴马总统与伊朗核谈判的声明：

> 关于伊朗，由于我们恰当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制裁的确对伊朗经

济产生了致命的影响,他们已经来到谈判桌,并且第一次围绕着提出确保伊朗不是在研发核武器的条件进行了严肃的谈判。[9]

奥巴马可能认为伊朗愿意谈判是其威逼外交的结果,伊朗方面却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所以这是一次糟糕的外交,更可能妨碍而不是促进谈判。还有一个包容性辞令彻底失败的案例是乔治·W.布什总统开始时将他的中东地区反恐运动比作"十字军东征"。[10]

1996年"上海五国"的成立或许是包容性辞令近期最引人注意的成功实例。苏联解体后,中国担心弱小的中亚民族国家的建立会增加其面对边境分裂势力和恐怖主义的脆弱性。然而,中国没有表达疑虑和谴责,而是提出建立一个不支持跨境政治活动的共同协议。这不仅对尚不稳定、同样有跨境麻烦的新生中亚国家具有吸引力,而且吸引了俄罗斯。该组织采用了特别受弱小成员国赞赏的礼节,即各国轮流主办年度首脑会议。于是在2001年,"上海五国"进一步深化了反恐承诺后重新命名为"上海合作组织",并开始将合作扩展到其他领域。

欧盟的准入条款(即哥本哈根标准)是个复杂的例子。条款具体包括:民主制度的稳定性、法治、人权、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运作良好的市场经济,以及应对欧盟内部竞争压力和市场力量的能力;承担成员国义务所需要的能力,包括坚持政治、经济和货币联盟的目标。[11]这些要求既是单方面规定的,又都是普遍标准。土耳其从1963年至2009年申请成员国资格的艰苦历程就是欧盟门槛在某些方面要高于别处的最佳例证。

"内部区"的第二个特征是议题领域的常规化。这涉及把议题转交给双边专家委员会。无论专家是否达成解决方案,双边委员会的形成都意味着存在可能的共同利益或者至少对议题有共同的理解。专家的加入或成立认识共同体往往可以使某一议题避免成为政治热点。专家不仅可以——有时甚至是长期——在公众视野之外开展工作,而且他们往往使用跨国的词汇和广泛的例证及先例表达观点。除了双边委员会,两国还会认可多边的制度或规范来管理议题。当双方都成为相关国际机制的成员时,降级的过程自然会发生。无论世界贸易组织功能多么完善,它都是提供了一个冷却区,避免出现直接的贸易争端。

领土争端是通过常规化使议题中立化的最好例子。领土争端自然是

热点议题，因此也属于最难解决的问题。主权主张原则上是排他的，即使是关于无人居住地区的领土争端也直接涉及一国的身份和边界。一旦政治化，它们将颠覆具有更大实际价值的双边合作，双边边界争端的不稳定影响还会带来严重的地区后果。1979 年中越短期战争宣称的开战理由就是边界争端，2000 年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核心则是达成了通过谈判划定陆地边界的协议。[12]主权纷争很难完全不受政治影响，但是有常设的官方委员会就能让议题常规化。另一个降低争端地区冲突升级可能性的重要途径是协商共同的行为准则。

国际常规化可以有多种形式，从临时引入第三方，到有明确制裁权限和权力的条约型国际组织都有可能。1971 年的柏林四国协定或许是国际常规化的最佳例证。协定终结了因柏林墙而加剧的敌对冲突阶段，开启了增加联系的可能性，为 1973 年的两德关系基础条约（*Grundlagevertrag*）奠定了基础，也成为冷战两大阵营对抗的里程碑。然而，四国协定并没有使用“柏林”一词，对所有争议议题都进行了模糊处理。[1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的基础条约不仅承认了两个德国的存在，而且允许国际上“德国”暂时缺位，作为 1989 年德国最终重新统一的前提。

作为国际主权纠纷常见解决方案的国际法反而会加剧紧张局势。[14]由于主权的基本证据是无争议占领，主张提出国就受到鼓励去占领土地（或者在海洋主张中承诺资源开发项目）以及抗议他国的类似行为。例如，对中国南海的南沙群岛提出主张的六国都往那里的暗礁和浅滩上派驻士兵充当荒废的前哨，同时又强烈抗议他国的类似行为。如果不实际占领或者抗议他国的占领，这些国家自身的合法存在也会受到削弱。自 1988 年以来该议题上就没有发生过军事伤亡，但是关于神圣领土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被民众推波助澜，处于亢奋状态。2002 年的中国-东盟《南海各方行为宣言》[15]帮助形成了该矛盾的“外部区”，然而只要排他性主权还是议题，争夺就会继续。1962 年国际法院裁定柏威夏神庙属于柬埔寨，但它仍然引发了柬埔寨与泰国之间的敌对甚至流血冲突。正如 1919 年《凡尔赛条约》表明的，违背战败方利益的国际裁决可能引发复仇政治。

综上所述，管理非对称关系的“内部区”和“外部区”都是为了促进谈判的政治对话。它们并不假定利益冲突不会发生，或者彼此误解没有可

能，而是恰恰相反。在非常和谐或者透明的关系中就不需要确保协商环境最大化和限定危机的潜在损失的方法。对正常非对称关系的管理是以错误知觉不可避免以及冲突可能出现为前提的。从积极一面看，它也假定了关系是可谈判的。谈判需要双方的非暴力协商一致，因此对正常非对称关系的管理要建立在即使有分歧也要彼此尊重的基础上。

非对称伦理学

全球层面的基本任务实质与双边关系中是一样的：即如何建立稳定而有效的谈判环境。希望解决世界性难题就太过理想主义了，因为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难题，其中很多还要归咎于他们的邻居。关系可能改善，也可能恶化，并且大部分关系都是非对称的。非对称对于管理"多节"国家间结构究竟有什么影响？全球环境中的非对称正常化又意味着什么？

在互动密集且多样的"多节"环境中，每个国家受到整体国际环境的影响都比环境受个体国家的影响更大。美国将继续享有最高自由裁量权，但是即使如此，它也不得不适应受到更多外来影响的环境。实际上，国家就是由 B 国组成的世界，当然这些 B 国在人口和实力方面千差万别。没有一个特定的全球"大国 A"的话，AB 两国之间自治权和顺从的交换变得更具体，但是交换的逻辑不变。如果国家不认为本国的自治权和身份受到了承认，它们为什么还要服从世界秩序呢？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不表现出国际顺从，其他国家又怎么会承认它的自治权呢？相互尊重在全球和"多节"的结构中仍然是关系正常化的基本要求。然而，一国政府所代表的利益的位置性与国家的国际透明度和可渗透性之间的矛盾带来了独一无二的规范和治理挑战。

平等与均衡

非对称造成的最明显规范问题就是平等与均衡之间的矛盾，包括多

个维度，在国际政治中，最突出的是双边和多边环境中都存在的国家间主权平等与实力及人口的真实差距之间的矛盾。人们可能很容易从“人人生而平等”的观点外推到国家而忽略它们之间的差距，问题在于国家间的差距远大于个人之间的差距，其中一点差距就是假定平等的人民作为各国公民却有各不相同的数量。对非对称而言敏感的公平原则可能存在吗？不平等关系中的“公平”自然就提出了挑战。或许我们可以在国际非对称环境中借用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关于公平性的著名思想实验。[16]

罗尔斯认为，只要公正的法官认为互动是公平的，它就是公平的。然而，怎么能找到公正的法官呢？罗尔斯建议将交易隐匿，这样我们就不清楚互动者的身份，并且假设我们自己是交易中的一方或者另一方。如此一来，列宁强调的“谁统治谁”（kto-kovo）即“谁对谁做了什么”的问题就被超越了，因为交易的法官并不知道他是否会成为前一个“谁”抑或是后一个“谁”。

这个思想实验可以应用于非对称国际关系中，却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有用之处在于可以让每个国家（以及外部观察者）摆脱自己的视角，并且都要考虑对方的观点。但是，实验并不能提供公平性的共同基础。虽然明白知道两种观点比只知道自己的观点要好，在不平等的现实与平等的身份之间作选择的问题却仍然存在。

大部分观察者面对隐匿时可能会采纳弱者一方的身份逻辑，因为弱者一方（假设观察者尝试其立场）在关系中承受更多的风险。然而一旦取消隐匿，观察者站在大国一方，他就不可能仍然公正地看待一种仅仅是建立在平等主权基础上的逻辑。所有行为体都带着无知的真实面纱，即未知的将来，会建议 A 国不要让自己的资源受到 B 国平等投票权的威胁，特别是世界上除了 B 国还有 C 国、D 国、E 国等诸多国家。假如联合国大会是允许平等投票权的世界政府，世界人口和实力的多数派国家就会在自由裁量权方面成为永远的少数派。要知道，那六个人口大国加在一起可是占据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那么，如何修正罗尔斯的实验以应对非对称呢？不能简化成“想象 A 国和 B 国是平等的”，那就回避了问题。A 国和 B 国之间的条件差别需要

以某种方式整合到实验中。

图 7.2 表明 A 国和 B 国之间的双边互动，其中 A 国在人口和实力上是 B 国的 12 倍。A 国下面的 12 个方块代表了 A 国人口的 12 等分，每个方块都与 B 国相等。如果隐匿前的问题不是“A 国或 B 国”，而是“从 1 到 13 之间选择任意数字所在的区域，然后留在那里”，这样决策就变得有趣了。因为每个数字都代表了平等的现实，尽管并不是平等的身份，实验也不会产生领导权问题。B 国面临的更大风险被到头来终结于 A 国的更大可能性平衡了。然而，这毕竟不是一场赌博，而是一个关于公平性的实验，B 国的利益仍然必须考虑在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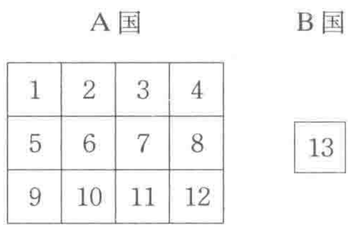


图 7.2　非对称公平

描述实验逻辑时，A 国的不平等现实值得思考，因为参与互动越多，承受的风险越多。B 国的 1 个单元和 A 国相同大小的 12 个单元有同等的发言权看起来并不公平。另一方面，1 个单元（有可能是你，观察者！）长期处于互动中的弱势方，其承受风险的紧迫性可能与其较之强者一方的差距是相称的。逻辑不变，把 A 国拆分成与 B 国同等规模的单元就为发现可能的共同原则奠定了基础。

尊重

变更隐匿内容产生的共同原则是尊重观点的差异。假如有人已经习惯了比如第 7 方格的位置，却不得不考虑成为第 13 方格的可能性，那么他就会更好地理解被孤立的 13 这个单元的更大脆弱性。如果第 13 个方格不得不考虑与其平等的 A 国中任何一个方格的处境，现实的受影响程度不平衡的问题就非常明显。

尊重对方或许听起来是公平的最低原则，在非对称关系中却产生了

非常有趣的推论。那不是简单地尊重任何一个对方，是A国对B国的尊重，B国对A国的尊重。A国对B国的尊重意味着它在互动中必须清楚B国受关系的影响更大。如果B国的身份和利益承受更多风险，A国的尊重就需要公开承认（并含蓄保证）B国的边界。反之，B国对A国的尊重认可A国更强大，在关系中利益更多。于是，B国的尊重就意味着服从于A国更强大的现实。

将相应的公平适用于非对称行为体组成的宪法秩序中，该秩序显然必须反映弱小行为体的身份安全需求，以及非对称实力的现实。事实上，宪法谈判的结果通常是双方需求的混合产物。以联合国为例，大会、安理会和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平衡更复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联合国1945年宪章的谈判与全球权力和人口的分配现实之间也已经出现鸿沟。

全球与地区关系

位置差异和实力悬殊导致国际关系结构本质的复杂性。互为邻国的固定结构往往带来各个方面都更密切的关系，即更密集的互动和更复杂的交往历史。邻国间可持续的互惠关系面临的挑战是正常时期的主要关切，地区外交的瓦解可能产生严重破坏未来关系稳定性的危机。

一个国家不能选择自己的邻国一直都是事实，然而越来越多的例子表明即使地区外的关系也是由必要性而非选择决定的。对健康的威胁很快能超出地区范围，可使用资源的难题在全球供需生态中都存在。在“多节”世界中，与遥远伙伴的关系变得更重要，因此也提高了全球机制和规则的突出价值。位置性仍然重要，却没有什么地方或地区是孤立的。

地区治理

欧盟自2008年以来的经济麻烦可以被用来证明地区政治共同体的治理困境。一方面，欧盟制度日益增强的力量产生了地区身份和共同利

益的意识。另一方面，各个成员国又关心私利，根据别国的利益解读其行为。“搭便车”的问题深受非对称的影响。像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大国对自己的地区影响力更自信，它们明确坚持将国家利益置于地区利益之上会直接威胁地区制度。像希腊这样的小国更可能“搭便车”，因为它们清楚自己位于列车的后部，不可能影响前进的方向。希腊和德国的经济困境就是同体系博弈和将博弈体系化的恰当例证。意大利则造成了严重的体系难题。作为一个“中上大国”，它一方面太小，不足以充当领导者，另一方面又太大，不至于失败。意大利国内很难接受财政紧缩，但是击垮欧元的现实可能性的确存在。由于国内和地区利益更一致，危机促使德国加强了地区关系，然而这对于其他更脆弱的成员国来说却是个敏感问题。

非对称形势中地区成员身份与本土化利益的困境在拥有全面、强制度的地区表现最为明显，在其他任何地区也都存在。东南亚国家联盟只有很小的中心机构，坚持协商一致原则，弱小成员国虽然受到的地区控制相对较少，但是它们也损失了地区协调带来的福利。1997 年的经济危机催生了更多的努力，包括实施地区自由贸易区和发展地区范围的外部经济关系，比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般来说，随着地区互动的常规化，地区制度应当日益增强，以此类推，地区治理的历史进程也会产生不同的发展道路。各个地区无论被导向什么发展方向，其共同基础都是非对称影响形势中共同利益与排他利益的对立统一。

世界同时是人类的世界、国家的世界和地区的世界。全球化没有取消这些分层，但是让它们互动的复杂性更为活跃。我在这里提出两个分别管理地区与国家和全球共同体与地区之间关系的规范，即保持自尊与权力下放。这两个原则在日常和危机互动中的形式是不同的。

保持自尊与权力下放

保持自尊是指尊重弱小实体的道德自主性。在正常时期，较大的集体要尊重成员的实力和权威，只发挥协调并使共同利益制度化的作用，而不是决定共同利益的内容。在发生整体外部危机时，较大的集体具有更活跃的责任，要成为明确表达并使共同利益适应新形势的平台。在发生内部危机时，如果一个成员国被他国认为正在违背共同利益，或者作为一

个道德行为体严重不负责任，集体就应该作出干预的决定并实施干预，主要目标就是将该成员国重塑为道德行为体。

权力下放原则在欧盟的组织条约中表达很清楚：

> 根据权力下放原则，在并非属于欧盟排他能力的领域，除非是并且只能是在成员国无论作为中心，还是在地区和本地都不能充分实现建议行动的目标时，基于建议行动的规模或者效果在欧盟层面能更好地实现的原因，欧盟方可采取行动。[17]

权力下放是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和确保利益多样性的关键原则。在正常时期，很多共同利益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不被提及，在更高的层面又不紧迫。在有些情况下，管理特定的问题需要特定层面的组织，比如湄公河委员会。在危机时期，有必要实施更高层面的干预，并且对干预的管理要尽可能接近问题。全球层面的干预不能忽视地区的观点和实力。来自外部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单边干预不仅会对目标政治共同体造成道德威胁，而且会消除地区共同行动的可能性。世界大国的速战速决愿望其实是含蓄承认了它很少有持续的兴趣。然而我们已经在第二章说过，“小型战争”几乎不能如愿以偿。

互动的学习曲线

给非对称寻找解决方案的问题在于这是些针对静态形势的抽象建议，而各国政府面对的既有现实都是互动的。解决方案相当于把药瓶放在货架上却没有说明如何拿到药瓶的问题。各国政府在任何时候的选择也都受制于自己和伙伴国刚刚采取的行动。它们能做得更好，却几乎不可能做到最好。因此，最后的解决方案就是思考互动的非对称国家行为的基本法则。

对抗

既然国际关系是互动的，完善战略行为的法则就必须既要考虑实现

本国目的的最佳次序，又要考虑确保得到伙伴国（们）有利反应的可能性最大化的次序。如何维持有利关系或者如何摆脱不利局面，并非仅仅是关乎自身价值观、偏好和实力的问题。如果一国的行为引发了排斥或反抗，即使行为成功，也会付出关系代价。大国特别容易忽略或者不理会单边行为产生的互动代价。小国又常常认为它们的行为不受妨碍，自然也无人注意。

互动行为有很多积极或者消极的间接影响，而且会持续调节关系的氛围。更严重的是那些造成国家间公开对峙的行为。即使只有一个国家认为自己的威望和尊严牵涉其中，本质上更艰难的形势就出现了。一旦被冒犯的国家必须让步，其政府会被削弱，长期的怨恨会增加。如果双方被卷入公开的对抗，这就是一场在国内和国际公众面前威望的输赢竞争。即使一方赢得对抗，竞争也可能证明对双方关系是代价不菲的。

中日之间的一系列互动可以证明该问题。[18]2010 年 9 月，一艘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附近与两艘日本巡逻艇相撞，并被扣留。中国渔船船长被羁押，船员和船只被释放。中日两国当时的直接反应都是温和的。船长随后被起诉，以涉嫌妨碍执行公务为由受到当地法院审判，该起诉意味着钓鱼岛及其水域并不存在争议。于是，中国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迫使日本释放船长，包括暂停官方交流，温家宝总理拒绝与菅直人首相会面。中国当时还中断了对日本的稀土出口贸易，尽管在争端发生之前中国的出口额其实已经大幅下降，而且中国方面也声称此举不是针对争端的。[19] 事件发生 16 天后，日本方面释放了船长。随即，中国要求日方对事件发表道歉，并赔偿渔船损失，日本也要求中国赔偿巡逻艇的损失。援引《纽约时报》的说法，日本先是“羁押船长，反常地展示了政治决心”，随后又“在一场太平洋的意志竞赛中屈辱地退却了”。[20]

此次事件急剧扭转了中日之间对彼此的公众舆论日渐积极的走向，[21]削弱了菅直人首相原本对华相当友好的领导层，成为 2012 年由日本从私人手中收购钓鱼岛引发的更严重争端的前奏。[22]事件导致的分裂对任何一方都无好处，双方的糟糕外交造成形势的恶化。日本方面有两个重大错误。一是中国渔船对巡逻艇造成的伤害不能被忽略，但是起诉本应仅仅针对那些伤害。二是扣留船长造成长期事件从而使中国升级了压力并最

终尴尬收场。中国方面，激烈地标榜正义并升级制裁，危机过后又愤怒地要求道歉，对其在日本的国家形象乃至在国际上造成持续的影响。双方都把外交颜面投入该事件，与此同时又否定对方维护颜面的反应。日本人当然丢了面子，但是一定能不再重蹈覆辙吗？中国又从中获得了什么呢？

最好的外交态度应当是确保对方受到尊重，以及关系远比争端重要，尽管不能放弃己方的合理诉求，也愿意与对方合作最大限度地控制争端中不必要又不幸的后续影响。这些不仅是公共关系策略，而且应该是外交互动的原则。例如温家宝总理因为正在发生的事件而回避高层会议的做法，其实是暗示了事件比关系重要。如果不对争端中任何一方有偏见，双方的共同利益理应包括防止争端升级，以及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其他共同利益的伤害。这不等于"和而不同"，但的确是无视对方立场的最佳单边政策，也是菅直人首相最终采取的做法。当然，重视关系超过危机的法则与大国希望尽快了事和小国对风险的夸大是背道而驰的。1888 年索尔兹伯里侯爵(Lord Salisbury)恰当描述了关于成功外交的常识：

> 若要与生活在一起的人友好相处，一定不能总是寻求机会试图凌驾于他们之上，而要以公正和友好的精神对待自己和他们的诉求。一方面，面对你认为可能的压迫或侵犯时，绝不牺牲任何重要和真实的权利；另一方面，避免把小的争议上升为有害的争端，要把每点差异都视为关键原则。[23]

学习"理性的狡猾"

寻找改善方法与冷眼观察人性弱点的差别并非一个是现实的而另一个是不现实的。其实是，一个是针对国际选择的现实，另一个是针对习惯的真实惰性和直接利益的紧迫性。如果一个人认真对待香烟盒上的健康警示，他可能会更长寿。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却不能假定看到警示标志的每个人都戒烟并且长寿了，进而降低赔付率。有两个现实的确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发生了交集，一是公共场合禁烟，一是保险公司向吸烟者收取更高的保费。

对于政治共同体及其政府来说，规范现实主义与惯性现实主义之间

很少有交集。黑格尔认为国家是“抽象的绝对”，社会现实和理性无法超越每个国家的自我边界。国家间会彼此碰撞，很像台球桌上的球，但是它们从不互相学习，也不会创造一个规范其互动的大社会。历史的元理性将盛行，在冲突的过程中，欠发达国家会输给发达国家。这就是黑格尔所谓“理性的狡猾”(cunning of reason)。之所以“理性”，是因为它表达了“多节”秩序中最深层的现实，现实是理性的。之所以“狡猾”，是因为即使发达国家也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获胜。每一个继任的霸权国都自恃为历史的巅峰，不是因为它清楚自己的未来，而是因为它误解了自己的过去。

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国际无政府状态可以被重新解读为不是缺少治理，而是缺少跨国的学习。于是，国际关系的规律就是力学的规律、惯性向量互动的规律，而不是社会规律。经过代数计算的实力决定了冲突及其结果。历史中起作用的不是经验教训，而是各个部分的契机。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经验和历史告诉我们的是，国家和政府从历史中并未学到什么，也从未依据什么本该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采取行动”[24]。

然而，“理性的狡猾”不应被简化为国家间不存在理性。国家间交往的现实领域并不平均，国家的固定位置和长期存在产生了大量重复的国际互动。更重要的是，根据非对称理论的基本原理，大部分情况下的强国都不能消灭弱国，甚至也不能成功使弱国屈服于强国的单边诉求。所以，每个国家对其邻国的反复重创可能只是要确定一种正常的关系模式，即强国承认(证明过的)自主权，弱国服从(经历过的)实力优势。

正常化不是“解决”关系，彼此的错误知觉已经植根于关系中，但是通常会形成一个管理非对称而不是非对称竞争的框架。与现实主义不同，冲突的常见结局不是胜利后的统治地位，而是非对称僵局后的谈判。与建构主义不同，容忍的主观维度是基于客观的经验。与自由主义相互依赖理论不同，相互依赖的主要作用不是因为预期的损失而放弃卷入冲突，而是被冲突的结局挫败。双边和地区正常化的出现并非道德变革或者更高秩序强加的产物，而是对重复经验的习惯化。这可以被称作微观的“理性的狡猾”，如果不是有意习得，试错的学习过程就还要继续。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言，“经验是一所昂贵的学校，而愚人别无选择”[25]。

还有来自各个时代国际互动生态中的宏观"理性的狡猾"。黑格尔也认识到了，并在摒弃历史的道德教训后继续说道：

> 每个时代都有如此特殊的环境——在如此独特的形势中——以至于决策必须，也只能适应其形势。[26]

黑格尔当时就站在历史的终点：对拿破仑改革的彻底幻灭（他在1806年拿破仑的决定性战役地点——耶拿任教时称其为"马背上的世界历史"），战争，以及1815年维也纳重建国家体系。作为柏林大学的校长，他见证了一个有能力成为当时体系中新的竞争者的国家崛起，他看到了国家如何从大规模军事动员和基于工业力量的技术战争中重新获得权力。如果总结说世界是沿着钢轨的铺设奔向20世纪的战争的，未免太"事后诸葛亮"了，于是亚当·沃森（Adam Watson）提出了一些思考周密的反事实叙事。[27]应该说，竞争性工业国家的崛起对于后来灾难的规模来说即使不是充分条件，也是必要条件。

现在的世界不同了。当今"多节"时代的特殊环境是基于1945年以来世界政治的两点基本成就：工业化战争作为一种战略选择的消失，以及国家间密集的相互依存结构的建立。这不是一个更有道德或智慧的世界。政治领袖仍然自以为是地谈论他们狭隘的观点和利益。国际交往活跃的多样性和频繁性在每个国家都催生了更多的焦虑而不是希望。分别以美中两国为代表的发达世界与发展中世界的实力趋同，改变了非对称的全球环境，却没有带来平等。全球患难与共成为一种现实而非一种选择。与相互依存的网络抗争，抑或试图违背全体的共同利益而实现自身狭隘利益的最大化，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固步自封的做法。国家的集体学习是一个缓慢且痛苦的过程，个体国家却可以精心创造一个规范的未来现实从而产生重要影响。正如杰弗里·勒格罗的研究表明的，当国家被其有限的心理建构的结果挫败，而新的建构又力所能及时，它们就处于学习新建构的形势中了。[28]不管怎样，一旦习惯于其现实的结构条件，"多节"的世界会因为经过协商的共同存在而变得更舒适。

注　释

1. 有些思想家，比如卡尔·马克思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会反驳说社会科学是

预言性，而非规范性的。但是，他们都是对自己的影响力非常自满，而没有注意到自己的预测往往问题百出。

2. 根据泰勒的研究，俾斯麦就说过“历史学家永远不能理解文献记录，因为他们不了解人物的背景以及不被记载的影响”。参见 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Oxford：Clarendon，1954），p.574。

3. Robert Jervis，*Why Intelligence Fails*：*Lessons from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nd the Iraq Wa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0），p.2.

4. Ibid.，pp.175—178.

5. 1968 年“春节攻势”前美国获取的关于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力量的情报就是一个经典案例。为了迎合威斯特摩兰将军宣称的进展，收集到的正确信息又被过滤掉了，于是美国方面果然中招。关于该案例的最佳介绍可以参见 Ed Moïse，“The Order of Battle Dispute and the Westmoreland Lawsuit，” www.clemson.edu/caah/history/facultypages/EdMoise/ob.html。

6. Robert Jervis，“Improving the Intelligence Process，” in Alfred Maurer，Marion Tunstall，and James Keagle，*Intelligence Policy and Process*（Boulder：Westvie Press，1985），p.117.

7. Alexander Eckstein，*Rome Enters the Greek East*（Oxford：Blackwell，2008）.

8. MacMillan，*The War That Ended Peace*，pp.56—79.

9. 该讲话刚好发表在共和党在国会取得全面胜利后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参见 Barack Obama，“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a Press Conference，” November 5，2014，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11/05/remarks-president-press-conference/。

10. Peter Ford，“Europe cringes at Bush ‘crusade’ against terroist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ember 19，2001，www.csmonitor.com/2001/0919/p12s2-woeu.html.

11. 准入标准及程序详见 http://ec.europa.eu/enlargement/enlargement_process/criteria/index_en.htm。

12. Womack，*China and Vietnam*.

13. 正如代表美国负责正式谈判的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马丁·希利布兰德（Martin Hillibrand）所言：“在面对特别并列设置在一起的保护协议与一堆不经谈判、也不需要签署基本协议的谈判方签署的附属协议时，没有人能忍住不抓狂。”引自 David Geyer，“The Missing Link：Henry Kisssinger and the Back Channel Negotiations on Berlin，” in David Geyer and Berndt Schaefer，eds.，*American Détente and German Ostpolitik*，*1969—1972*（Washington：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2004），p.91。

14. 这一段是根据我与印度尼西亚前外交部长、海洋法专家哈山·维拉尤达（Hasan Wirajuda）博士的一次谈话写成的。

15. 参见 www.aseansec.org/13163.htm。

16. 下面的论述可以被视为“对罗尔斯主题的演绎”而不是对其理论的诠释。罗尔斯原创的正义观及其在“人民”上的应用都要高深和复杂得多。参见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rev. ed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The Law of Peoples(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在此,我要感谢唐纳德·艾默森(Donald Emmerson)在讨论这一点时给我的启发。

17. European Union, *Consolidated Treaties* Article 5, section 3(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March 2010), p.19.

18. 在此我要感谢蓝平儿向我介绍了关于中日互动的详细信息。

19. “China Cuts Rare Earth Export Quota 72%, May Spark Trade Dispute With U.S.,” *Bloomberg News*, July 9, 2010.

20. Martin Fackler and Ian Johnson, “Japan Retreats In Test of Wills With the Chines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5, 2010.

21. The Genron NPO, “On the Results of the 7th Japan-China Joint Opinion Survey,” www.geron-npo.net/english/index.php? option = com_content&view = article&id = 24: on-the-results-of-the-7th-japan-china-joint-opinion-survey&catid = 1: advocacy&Itemid = 3.

22. 参见 Michael Swaine, “Chinese Views Regarding the Senkaku/Diaoyu Dispute,”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41, June 2013。

23. 引自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 p.39。

24. G.W.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ed. Eduard Gans, 2nd ed. (Berlin: Duncker und Humblot, 1840), p.9.

25. Benjamin Franklin, *Poor Richard's Almanack 1743*.

26. Ibid.

27. Waston, *The Limits of Independence*, pp.16—45.

28. Jeffery Legro, *Rethinking the World: Great Power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译后记

布兰特利·沃马克教授与中国的缘分始于20世纪80年代，作为改革开放后较早关注和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沃马克教授最早被国内熟知的身份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他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被收录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中，受到相关研究领域专家的权威肯定。

本人结识沃马克教授得益于十年前恩师秦亚青的推荐，秦老师一直对沃马克教授严谨勤奋的学术品质赞誉有加，勉励我们要多多学习。2009年本人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前往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访学，在沃马克教授的研究生课堂上进一步了解了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志向。十年来频繁的学术交流和探讨，也让我清楚见证了沃马克教授在中国研究方面的执着与坚持。沃马克教授的中国研究有一以贯之的理论思考方向，有难能可贵的田野调查方法，也有对多元视角和声音的包容和取舍。诚如恩师所言，这些优秀的学术素养都应被我们年轻人奉为圭臬，认真修为。

2017年英文版《非对称与国际关系》在剑桥大学出版社付梓后，沃马克教授第一时间将这个好消息告知他的中国同仁。在由衷为他感到高兴的同时，我郑重向沃马克教授提出了将《非对称与国际关系》翻译成中文的建议。沃马克教授欣然应允，并表示全力支持我为中文翻译和出版所作的一切选择和决定。这份信任给了我莫大的动力，同时也让我有了沉甸甸的责任感。

为了接近“信、达、雅”的目标，我邀请大连外国语大学薛晓芃博士与

我一同完成翻译。晓芃是我在外交学院读书期间最亲密的战友，也是我在英语学习和应用领域最信赖的旧日同窗。在共同翻译“导论”、准确把握了全书框架后，我们先是做了分工，我负责第一、第二部分，她负责第三、第四部分。初稿完成后，我们又互换译稿，给对方负责的部分作修改，最后合稿、通读、精修、定稿。翻译的过程尽心尽力，但是成稿后再读，每每还是感到压力。纠结于自己在不计其数的词句中所做的定夺，是忠于英文原著，还是符合中文表达。我作为全书统校的责任人更是心存敬畏，唯恐不能准确呈现沃马克教授完整的学术思想。

最后，我想特别感谢自己在促成《非对称与国际关系》中文版时遇到的两位良师益友。承蒙潘丹榕老师慧眼，《非对称与国际关系》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东方编译所译丛，有幸为译丛的学术前沿地位添一新砖。感谢王冲老师对翻译过程中若干重要问题提出的修改意见，总是在我困惑、疏漏之处帮我大大延展了思考的动力和方向。得师友如此，前途皆为诗和远方。

李晓燕

2019 年 6 月于蓟门桥南

参 考 文 献

Adelson, Roger. *London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Middle Eas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Amineh, Mehdi Parvizi, ed.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in Global Politics: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s on the Changing Geography of World Politics*. Leiden: Brill, 2007.

Anderson, James, and John Whitmore, eds. *China's Encounters in the South and Southwest: Reforging the Fiery Frontier*. Leiden: Brill, 2014.

Antholis, William. *Inside Out China and Indi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2013.

Appadurai, Arjun.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in Meenakshi Gigi Durham and Douglas Kellner, eds.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 Works*, rev. edn. Oxford: Blackwell, 2006.

Areguin-Toft, Ivan.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Asia Development Bank. *Asia 2050: Realizing the Asian Century*. Singapore: ADB, 2011.

Axelrod, Robert.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Ba, Alice, [*Re*] *Negotiating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Barnett, Michael. *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Barnett, Michael, and Raymond Duval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Winter 2005), pp.39—75.

Bao, Ninh *The Sorrow of War*.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3.

Barrow-Green, June. *Poincaré and the Three Body Problem*. History of *Mathematics no. 11*,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1997.

Bentham, Jeremy. *The Theory of Legislation*. 5th edn. London: Trübner, 1887.

Berlin, Isaiah.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53.

Binder, Leonard. "The Middle East as a Subordinate International System," *World Politics* 10:3(April 1958), pp.408—429.

Black Paper: Facts and Evidences of the Acts of Aggression and Annexation of Vietnam against Kampuchea(Phnom Penh: Department of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Democratic Kampuchea, September 1978).

Boserup, Anders, and Andrew Mack. *War Without Weapons: Non-Violence in National Defense*.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5.

Bowski, William. *A Medieval Italian Commune: Siena Under the Nine, 1287—135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Buzan, Barry,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Buzan, Barry,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Buzan, Barry. "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7:3(1993), pp.327—352.

Calleo, David. *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Carr, Edward Hallett.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London: MacMillan, 1939.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2 accessed electronically by subscription.

Cho, Hui-Wan. *Taiwan's Application to GATT/WTO: Significance of Multilateralism for an Unrecognized State*. Westport: Praeger, 2002.

Christensen, Thomas J.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A Strong and Moderate Taiwan," *Speech to U.S.-Taiwan Business Council Defense Industry Conference*, Annapolis, Maryland, September II, 2007, www.state.gov/p/eap/rls/rm/2007/91979.htm.

Clausewitz, Carl von. Berlin: Dümmers Verlag, 1832.

Conrad, Jeffrey, and Arthur Demarest, *Religion and Empire: The Dynamics of Aztec and Inca Expansio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Copeland, Dale 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Crawford, Timothy. *Pivotal Deterrence: Third-Party Statecraft and the Pursuit of Pea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Dahl, Robert.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 2 (1957), pp.201—215. *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Dardess, John. *Governing China 150—1850*. Indianapolis: Hackett, 2010.

de Waal, Thomas. *The Caucasus: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Deudney, David. "'A Republic for Expansion': The Roman Constitution and Empire and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in Stuart Kaufman, Richard Little, and William Wohlforth, eds.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2007.

Dittmer, Lowell.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33:4(July 1981), pp.485—516.

Doyle, Michael. *Empir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Eckstein, Alexander. *Mediterranean Anarchy: Interstate War and the Rise of Rom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Rome Enters the Greek East*. Oxford: Blackwell, 2008.

Eckstein, Harry. "Authority Patterns: A Structural Basis for Political Inqui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7:4(1973), pp.1142—1161.

Elvin, Mark.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New Haven, CT: Yale Uni-

versity Press, 2004.

Esherick, Joseph. "China and the World: From Tribute to Treaties to Popular Nationalism," in Brantly Womack, ed. *China's Ris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oulder, CO: Rowman & Littlefield, 2010.

European Union. *Consolidated Treaties*.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March 2010.

Fackler, Martin, and Ian Johnston. "Japan Retreats In Test of Wills with the Chines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5, 2010.

Farrar, Lancelot. *Arrogance and Anxiety: The Ambivalence of German Power, 1848—1914*.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81.

Fearon, James.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3(Summer 1995), pp.379—414.

Ferguson, Niall. "A World Without Power," *Foreign Policy* 143(July—August 2004).

Fforde, Adam, and Katrin Seidel. "Cambodia-Donor Playground?: Defeat and Doctrinal Dysfunction in a Hoped-For Client State," *Southeast Asia Research* 23:1(February 2015), pp.79—99.

Findley, Carter Vaughn. *The Turks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Finnemore, Martha.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Cornell, 1996. "Legitimacy, Hypocris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Unipolarity: Why Being a Unipole is Not All It Is Cracked Up to Be," in John Ikenberry, Michael Mastanduno, and William Wohlfor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Unipolar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67—98.

Firsing, Scott. "Asymmetry as Context: The Rollercoaster of South Africa-US Relations Post 1994."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1(April 2012), pp.105—133.

Fitzgerald, Frances. *Fire in the Lake*. Boston: Little, Brown, 1972.

Flemes, Daniel, and Leslie Wehner, "Strategien südamerikaner Sekundärmächte" [Strategies of South American Secondary Powers], *GIGA Focus* 4, 2012.

Foote, David. "In Search of the Quiet City: Civic Identity and Papal State Building in Fourteenth-Century Orvieto," in Paula Findlen, Michelle Fontaine, and Duane Osheim, eds., *Beyond Florence: The Con-*

tours of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Ital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90—204.

Ford, Peter. "Europe Cringes at Bush 'Crusade' against Terrorist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ember 19, 2001. www.csmonitor.com/2001/0919/p12s2-woeu.html.

Franklin, Benjamin. *Poor Richard's Almanack 1743*.

Fray, Keith. "China's Leap Forward: Overtaking the US as World's Biggest Economy,"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8, 2014.

Freeman, Jr., Chas W. *Interesting Times: China, America, and the Shifting Balance of Prestige*. Charlottesville: Just World Books, 2013.

Fuller, Lon L. *The Morality of Law*.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Gallarotti, Giulio. *Cosmopolitan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The Power Curse: Influence and Illusion in World Politics*. Boulder: Lynne Rienner, 2010.

Gelb, Leslie. "US Aides See Need for Big Effort to Avert Rebel Victory in Salvador," *New York Times*, April 22, 1983.

The Genron NPO, "On the Results of the 7th Japan-China Joint Opinion Survey," www.genron-npo.net/english/index.php?option = com_content&view = article&id = 24: on-the-results-of-the-7th-japan-china-joint-opinion-survey&catid = 1: advocacy&Itemid = 3.

Geyer, David. "The Missing Link: Henry Kissinger and the Back Channel Negotiations on Berlin," in David Geyer and Berndt Schaefer, eds., *American Détente and German Ostpolitik, 1969—1972*. Washingt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2004.

Gilpin, Robert.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Goemans, H.E. *War and Punish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Goertz, Gary, and Paul F. Diehl, "Enduring Rivalries: Theoretical Constructs and Empirical Patter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7:2 (June 1993), pp.147—171.

Goldstein, Melvy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2: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 1950—195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Green, Louis. *Castruccio Castracan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Hegel, G. W. F.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ed. Eduard Gans, 2nd edn. Berlin: Duncker und Humblot, 1840.

Hirschman, Albert O.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xpanded edn. 1980; orig 1945.

Hobbes, Thomas. *Leviathan*(Andrew Crooke, at the Green Dragon in St. Paul's Churchyard, 1651). Available online from Project Gutenberg.

Hoffman, Elizabeth. *American U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Hui, Victoria Tin-bor. "The Triumph of Domination in the Ancient Chinese System," in Kaufman, Little, and Wohlforth, eds.,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2007, pp.122—147.

Ikenberry, G. John, Michael Matanduno, William Wohlfor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Unipolar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Ikenberry, G. John.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Immerman, Richard. *The CIA in Guatemala: The Foreign Policy of Interventio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2.

Jervis, Robert.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2(January 1978), pp.167—214. "Improving the Intelligence Process," in Alfred Maurer, Marion Tunstall, and James Keagle, *Intelligence Policy and Proces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 pp.113—124.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Why Intelligence Fails: Lessons from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nd the Iraq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Johnston, Alastair Iain.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7:4(Spring 2013), pp.7—48.

Jones, Charles A. "Hierarchy and Resistance in the American State-Systems, 1400—1800 CE," in Stuart Kaufman, Richard Little, and William Wohlforth, eds.,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2007, pp.176—198.

Jones, Claire, and Chris Giles, "WTO and OECD Add Value to Trade debate,"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6, 2013.

Judt, Tony.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New York: Penguin, 2005.

Kahler, Miles. "Rising Powers and Global Governance: Negotiating Change in a Resilient Status Quo,"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y 2013.

Kahneman, Daniel, and Amos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XLVII(1979), 263—291.

Kang, David C.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4(Spring 2003), pp.57—85.

"Hierarchy, Balancing, and Empirical Puzzles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8:3(Winter 2003—04), p.170.

"Hierarchy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300 to 1900," *Asian Security* 1:1(Winter 2005).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Katzenstein, Peter,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31:2(1996), pp.123—159.

Kennedy, Paul.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0, pp.68—69.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Keohane, Robert,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Third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2001.

Khong, Yuen Foong. "The American Tributary System,"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6:1(Spring 2013), pp.1—47.

Kindleberger, Charles.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World Economic Primacy, 1500—199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Knight, Jack.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Lake, David A.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Lam, Truong Buu. *Patterns of Vietnamese Response to Foreign Intervention, 1858—1900*.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No.11, 1967.

Legro, Jeffrey W,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2(Fall 1999), pp.5—55.

Legro, Jeffrey W. *Rethinking the World: Great Power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Lenin, V. I.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1916), in *Selected Works of Lenin*, vol. 5.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d, pp.3—122.

Lieberthal, Kenneth, and Wang Jisi,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Washington: Brookings, 2012.

Lin, Syaru Shirley. "Bridg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Gap: Alternative Identities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Joint US-Korea Academic Studies* 35(2014), pp.113—132.

Lippmann, Walter. "A Mediator Is Needed",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September 23, 1958.

Lustick, Ian."The Absence of Middle Eastern Great Powers: Political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1:4(Autumn 1997), pp.653—683.

Luttwak, Edward.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Lynch, Allen, and Reneo Lukics, *Europe from the Balkans to the Urals: The Disintegration of Yugoslavia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Lynch, Allen. *The Cold War is Over-Agai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62.

Lyska, George. *Nations in Alliance: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Macdonald, Paul. Networks *of Domination: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Peripheral Conques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2014.

Machiavelli, Niccolo. *The Prince*, tr. W. K. Marriott. London: Dent, 1908. Available online at www.constitution.org/mac/princeoo.htm.

Mack, Andrew. "Why Big Nations Lose Small Wars," *World Politics* 37:2(January 1975), pp.175—200.

MacMillan, Margaret.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3.

Mahan, A. T. "The Persian Gulf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Review*(London), September 1902, pp.27—28.

Manchester, William. *The Last Lion*. London: Sphere Books, 1984, pp.568—570.

Mao, Zedong. "Problems of Strategy in Guerilla War against Japan, (1938)". In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vol 2.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5, pp.79—112. "Problems of Strategy in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December 1936)," in Stuart Schram, ed.,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vol. V. Armonk, NY: M.E. Sharpe, 1992, p.499.

Maoz, Zeev, and Ben D. Mor, *Bound by Struggle: The Strategic Evolution of Enduring International Rivalr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Mearsheimer, John.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Merom, Gil. *How Democracies Lose Small Wa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Moïse, Ed. "The Order of Battle Dispute and the Westmoreland Lawsuit," www.clemson.edu/caah/history/facultypages/EdMoise/ob.html.

Monteiro, Nuno. *Theory of Unipolar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Mueller, John. *Retreat from Doomsday: 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Murphy, Craig.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Global Governance Through Voluntary Consensus*. Milton Park: Routledge, 2009.

Nabers, Dirk. "Power, Leadership and Hegemon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6 (2010), p.943.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e Worlds*. Washington: NIC, December 2012.

NATO 2020. *Assured Security; Dynamic Engagement*. May 2010.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pdf/20100517_100517_expertsreport.pdf.

Naughton, Barry. "The Dynamics of China's Reform-Era Economy," in Brantly Womack, ed., *China's Ris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0.

Nillson, Niklas. "Georgia's Conflicts: Abkhazia and South Ossetia," in Svante Cornell and Michael Jonsson, eds., *Conflict, Crime, and the State in Post-Communist Euras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4, pp.103—128.

Ninth Japan-China Public Opinion Poll. *Analysis Report on the Comparative Data*. Tokyo: Genron NPO and China Daily, August 12, 2013.

Nye, Joseph, and Robert Keohan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2nd edn. New York:Harper Collins, 1989.

Nye, Joseph. *Bound to Lea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Oppenheim, Felix. *Political Concepts: A Reconstru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Organski, A. F. K. *World Politics*, 2nd edn. New York: Knopf, 1968.

Organski, A. F. K.,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Osheim, Duane. *An Italian Lordship: The Bishopric of Lucca in the*

Late Middle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Owen IV, John M. *Liberal Peace, Liberal War: America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The Clash of Ideas in World Politics: Transnational Networks, States, and Regime Change, 1510—201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ape, Robert. "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3 (August 2003), pp.343—361.

Paul, T. V. *Asymmetric Conflicts: War Initiation by Weaker Powe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eace of Constance, available online at www.fordham.edu/halsall/source/barbarossalombards.asp.

Piketty, Thomas.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illar, Paul. "Intelligence, Policy, and the War in Iraq,"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6).

Negotiating Pea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inker, Stephen. "A History of Violence," *New Republic* 236:12 (March 19 2007), pp.18—21.

Powell, Robert. "Absolute and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 4 (December 1991), pp.701—726.

Putnam, Robert D.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 (Summer 1988), pp. 427—460.

Quandt, William.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Leadership: Algeria 1954—1968*.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9.

Between Ballots and Bullets: Algeria's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ism. Washington: Brookings, 1998.

Race, Jeffrey. *War Comes to Long An: Revolutionary Conflict in a Vietnamese Provi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Ramazani, Rouhollah. *The Foreign Policy of Iran, 1500—1941*.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66.

Rawls, John. *A Theory of Justice, rev. ed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The Law of Peopl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Rawski, Evelyn. "Chinese Strategy and Security Issu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Brantly Womack, ed *China's Ris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oulder, CO: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0, pp.63—88.

Reed, William. "Information, Power, and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4 (November 2003), pp.633—641.

Reiter, Dan. "Exploring the Bargaining Theory of War,"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1 (March 2003), pp.27—43.

Russell, Roberto, and Juan Tokatlian, "Implications of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Changes for Argentina's Foreign Relations," *Journal of Iberian and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19:2 (2013), pp.251—267.

Schattschneider, E. E.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0.

Schelling, Thomas.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Schoppa, Leonard. *Bargaining with Japan: What American Pressure Can and Cannot D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Schroeder, Paul.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London: Clarendon Press, 1994.

"Napoleon's Foreign Policy: A Criminal Enterprise," in *Systems, Stability, and Statecraft*. New York: Palgrave 2004, pp.23—36.

"The Mirage of Empire Versus the Promise of Hegemony," in *Systems, Stability, and Statecraft*. New York: Palgrave 2004, pp. 297—306.

Scott, James C. *The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Sechser, Todd. "Goliath's Curse: Coercive Threats and Asymmetr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4:4 (2010), pp.627—660.

Smith, Denis Mack. *Modern Italy: A Political Histo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Smith, Rupert. *The Utility of Force: The Art of War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Knopf, 2005.

Snyder, Glenn.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Snyder，Jack. *Myths of Empir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Stein，Arthur. "When Misperception Matters，" *World Politics* 34：4 (July 1982)，pp.506—526.

Stephan，Paul. "Symmetry and Selectivity：What Happens in International Law When the World Changes，"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0：1 (2009)，pp.91—123.

Swaine，Michael. *America's Challenge*：*Engaging Rising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shington：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1，p.49.

"Chinese Views Regarding the Senkaku/Diaoyu Dispute，"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41，June 2013.

Taleb，Nassim Nicolas. *Black Swan*，2nd edn. New York：Penguin，2010.

Tammen，Ronald，et al.，*Power Transitions*：*Strateg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Chatham House，2000.

Taubman，Philip. "Analyst Said to have Quit CIA in Disput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8，1984.

Taylor，A.J.P.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 London：Clarendon，1954.

Taylor，Keith. *Birth of Vietna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Tetlock，Philip. *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How Good Is It*？*How Can We Know*？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Thompson，William R. "Principal Rivalrie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9：2 (June 1995)，pp.195—223.

Treitschke，Heinrich von. *Politik* 2 vols. (Leipzig：Hirtzel，1897—1898)

Tsou，Tang. *The Embroilment over Quemoy*：*Mao*，*Chiang*，*and Dulles*. University of Uta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y Paper no.2，1959.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Technically Recoverable Shale Oil and Shale Gas Resources*：*An Assessment of 137 Shale Formations in 41 Countries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US Department of Energy，June 2013.

Vasquez, John. *The War Puzz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Vuving, Alexander. "How Soft Power Work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PSA annual meeting, September 2009.

Walt, Stephen.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Waltz, Kenneth. "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disciplinary History* 18:4 (Spring 1988), p.620.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Ward, Karen. *The World in 2050*. London: HSBC Global Research, January 2011.

Watson, Adam. *The Limits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Weber, Max. "Die sozialen Gründ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Kultur" (1896), in Johannes Winckelmann, ed., *Max Weber: Soziologie, Weltgeschichtliche Analysen, Politik*. Stuttgart: Kröner, 1968, pp.1—26.

Wendt, Alexander.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Weyl, Hermann. *Symmet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Wight, Martin *Power Poli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8.

Womack, Brantly, and Yu-Shan Wu, "Asymmetric Triangles and the Washington-Beijing-Taipei Relationship," in Brantly Womack, *China among Unequals: Asymmetric Foreign Relations in Asia*.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0.

Womack, Brantly.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Revolutionary and Post-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China and Vietnam," *World Politics* 39:4 (July 1987), pp.479—507.

"Asymmetry and Systemic Misperception: The Cases of China, Vietnam and Cambodia during the 1970s."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6:2 (June, 2003), pp.91—118.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ina between Region and World," *China Journal* 61 (January 2009), pp.1—20.

China Among Unequals: Asymmetric Foreign Relations in Asia.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ress, 2010.

"The Spratlys: From Dangerous Ground to Apple of Discord," *Contemporary South East Asia* 33:3(2011), pp.370—387.

"Structure and Culture 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Southern Neighbors," in James Anderson and John Whitmore, eds., *China's Encounters in the South and Southwest: Reforging the Fiery Frontier*. Leiden: Brill, 2014, pp.395—405.

"China's Future in a Multi-Nodal World Order," *Pacific Affairs* 87:2(June 2014), pp.265—284.

"China Beyond Status Quo,"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8:2(Summer 2015).

Womack, John. *Zapata and the Mex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Knopf, 1969.

Woodside, Alexander, "The Center and the Borderlands in Chinese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Chinese State at the Borders*, Diana Lary, ed. Vancouver: UBC Press.

World Bank.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Conference Edition. Washington: World Bank, 2012.

Xenophon, *Cyropaedia*, 2 vols, tr. Walter Mill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14.

Zacher, Marc.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Norm: 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and the Use of For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5:2 (Spring 2001). pp.215—250.

Zhou, Fangyin.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2(2011), pp.147—178.

老子道德经[Lao Zi's Classic of the Way and Virtue].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246—249.

This is 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symmet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ISBN: 978-1-107-58953-7, by Brantly Womack,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9.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only. Unauthoriz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此版本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销售。

东方编译所译丛·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

非对称与国际关系	[美]布兰特利·沃马克　著 李晓燕　薛晓芃　译	68.00 元
货币与强制 ——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	[美]乔纳森·科什纳　著 李　巍　译	72.00 元
国家与市场(第二版)	[英]苏珊·斯特兰奇　著 杨宇光　等译	65.00 元
复合系统:人类世的全球治理	[美]奥兰·扬　著 杨　剑　孙　凯　译	58.00 元
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	[美]格雷厄姆·艾利森 陈定定　傅　强　译	75.00 元
表决、否决与国际贸易协定的政治经济学	[美]爱德华·曼斯菲尔德 海伦·米尔纳　著 陈兆源　译	62.00 元
重新思考世界政治中的权力、制度与观念	[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　著 白云真　宋亦明　译	68.00 元
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	[美]约翰·J.米尔斯海默 斯蒂芬·M.沃尔特　著 王传兴　译	98.00 元
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	[美]罗伯特·吉尔平　著 宋新宁　杜建平　译 邓正来　乔　娅　校	48.00 元
长和平 ——冷战史考察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著 潘亚玲　译	68.00 元
国际制度	[美]莉萨·马丁　等编 黄仁伟　等译	110.00 元
联盟的起源	[美]斯蒂芬·沃尔特　著 周丕启　译	68.00 元
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十版)	[美]小约瑟夫·奈 [加拿大]戴维·韦尔奇　著 张小明　译	78.00 元

书名	作者/译者	定价
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	[美]彼得·卡赞斯坦 等编 秦亚青 等译	98.00 元
国际关系精要(第七版)	[美]卡伦·明斯特 伊万·阿雷奎恩-托夫特 著 潘忠岐 译	78.00 元
无政府状态之后 ——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合法性与权力	[美]伊恩·赫德 著 毛瑞鹏 译	52.00 元
我们建构的世界 ——社会理论与国际关系中的规则与统治	[美]尼古拉斯·格林伍德·奥努夫 著 孙吉胜 译	62.00 元
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	[加拿大]诺林·里普斯曼 [美]杰弗里·托利弗 [美]斯蒂芬·洛贝尔 著 刘丰 张晨 译	42.00 元
告别霸权! ——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	[美]西蒙·赖克 理查德·内德·勒博 著 陈锴 译	38.00 元
国际实践	[加拿大]伊曼纽尔·阿德勒 文森特·波略特 主编 秦亚青 等译	65.00 元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	[美]罗伯特·杰维斯 著 秦亚青 译	75.00 元
无政府社会 ——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第四版)	[英]赫德利·布尔 著 张小明 译	45.00 元
大国政治的悲剧(修订版)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 著 王义桅 等译	68.00 元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美]亚历山大·温特 著 秦亚青 译	75.00 元
战争的原因 ——权力与冲突的根源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 著 何曜 译	65.00 元
大战略的政治经济学	[美]凯文·纳里泽尼 著 白云真 傅强 译	48.00 元
国家为何而战 ——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	[美]理查德·内德·勒博 著 陈定定 等译	52.00 元
货币与强制 ——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	[美]乔纳森·科什纳 著 李巍 译	55.00 元
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	[美]戴维·莱克 著 高婉妮 译	38.00 元
超越范式 ——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	[美]鲁德拉·希尔 彼得·卡赞斯坦 著 秦亚青 季玲 译	37.00 元

合作的动力——为何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美]斯科特·巴雷特 著 黄智虎 译	36.00 元
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	[美]肯尼思·华尔兹 著 信 强 译	52.00 元
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	[美]玛莎·芬尼莫尔 著 袁正清 译	25.00 元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 年	[美]邹 谠 著 王 宁 周先进 译	59.00 元
霸权之后(增订版)	[美]罗伯特·基欧汉 著 苏长和 译	55.00 元
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	[美]彼得·J.卡赞斯坦 主编 秦亚青 等译	42.00 元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	[美]罗伯特·吉尔平 著 杨宇光 等译	52.00 元
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	[美]海伦·米尔纳 著 曲 博 译	48.00 元
民主国家的承诺:立法部门与国际合作	[美]莉萨·L.马丁 著 刘宏松 译	30.00 元
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	[美]肯尼思·J.奥耶 编 田 野 辛 平 译	32.00 元
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	[美]本杰明·J.科恩 著 杨 毅 钟飞腾 译	30.00 元
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	[英]巴里·布赞 等著 潘忠岐 等译	58.00 元
干涉的目的	[美]玛莎·芬尼莫尔 著 袁正清 等译	38.00 元
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美]许田波 著 徐 进 译	68.00 元
驯服美国权力	[美]斯蒂芬·M.沃尔特 著 郭 盛 等译	28.00 元
国际政治理论	[美]肯尼思·华尔兹 著 信 强 译	58.00 元
系统效应	[美]罗伯特·杰维斯 著 李少军 等译	40.00 元
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	[英]克里斯托弗·希尔 著 唐小松 等译	36.00 元
世界事务中的治理	[美]奥兰·扬 著 陈玉刚 等译	36.00 元
大棋局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著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译	36.00 元
美国和诸大国	[英]巴里·布赞 著 刘永涛 译	25.00 元

全球政治经济学	[美]罗伯特·吉尔平　著 杨宇光　等译	36.00 元
帝国的悲哀	[美]查默斯·约翰逊　著 任　晓　等译	24.00 元
美国的致命弱点	[美]理查德·福肯瑞斯　等著 许　嘉　等译	22.00 元
美国和美国的敌人	[美]伊多·奥伦　著 唐小松　等译	20.00 元
建构安全共同体	[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　著 王正毅　等译	25.00 元
美国时代的终结	[美]查尔斯·库普乾　著 潘忠岐　译	28.00 元
欧洲的未来	[美]戴维·卡莱欧　著 冯绍雷　等译	28.00 元
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	[美]罗伯特·吉尔平　著 杨宇光　等译	22.00 元
国家的性格	[美]安吉洛·M.科迪维拉　著 张智仁　译	20.80 元
世纪之旅	[美]罗伯特·A.帕斯特　编 胡利平　等译	22.00 元
预防性防御	[美]艾什顿·卡特　著 胡利平　等译	14.00 元

世纪出版

布兰特利·沃马克这部重要作品对最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意义突出。它检验的是非对称－不平等的关系。他认为非对称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的国际关系中都是正常并且普遍存在的。在探索不平等关系影响和塑造大国和小国行为的系统方式时，沃马克对主张所有国家无异、它们的关系实质是平等国家间关系的传统观点作出了重要修正。沃马克基于自己对中国与越南关系的深刻和充分了解提出了更具一般性的论断，这是研究当今世界一个重要地区极具吸引力的视角。沃马克向我们揭示了比军事或者经济权力更为根本的国际关系，远不止是关于权力平衡或者经济相互依赖的无果争辩。这是一本国际关系研究者们不能错过的好书。

——康灿雄，南加州大学

这是布兰特利·沃马克的一本杰出新著，其在理论上有说服力、方法论上合理、经验研究上扎实。该书不仅论及全球体系和地区复合体，而且涵盖了具体的双边关系和至关重要的案例检验，对理解世界政治中的非对称是一种里程碑式的贡献。该书既适用于国际关系研究者和学生，也适合感兴趣的评论家和普通公众阅读。沃马克的卓越分析无疑是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关于非对称政策的指南。

——胡安·托卡林，阿根廷托尔夸托·迪特拉大学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ww.cambridge.org

上海人民出版社
官方公众号

知世书坊
探索新知，触摸世界

上架建议：世界政治
ISBN 978-7-208-16020-0
9 787208 160200
定价：68.00元
易文网：www.ewen.co